

LIENING LUSENBAO KAOCIJI
YU BOENSHITANZHUYI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 与伯恩斯坦主义

贾淑品 著



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摘 要

本书在客观解读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生前的著作、文稿、书信等历史文献的基础展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着重评介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在“最终目的”和“运动”、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和政治自由、资本主义崩溃论、危机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组织原则等方面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判，实事求是地再现他们的理论以及思想中的冲突和矛盾的焦点，深入分析和评价了列宁和卢森堡在这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客观地评价了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过程中的坚定、犹豫与彷徨。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 与伯恩斯坦主义

贾淑品 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伯恩斯坦主义概述	(9)
第一节 伯恩斯坦思想的变迁	(9)
一、伯恩斯坦的早期思想	(10)
二、伯恩斯坦中期思想发展轨迹	(12)
第二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与形成	(13)
一、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条件	(13)
二、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主观条件	(19)
第三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思想渊源	(24)
一、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的改良思想	(25)
二、拉萨尔主义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	(28)
三、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	(31)
第四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内容	(34)
一、“最终目的和运动”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34)
二、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	(36)
三、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与“适应论”	(38)
第五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特征和实质	(40)
一、伯恩斯坦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改良主义	(40)

二、伯恩施坦主义是忽视民众根本利益的实用主义	(44)
第六节 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	(46)
一、造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混乱	(46)
二、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带来严重危害	(48)
三、伯恩施坦主义形成后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51)
 第二章 列宁、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	(56)
第一节 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	(57)
一、列宁寻求伯恩施坦名著的过程及其对其著作的批判	(58)
二、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 的斗争	(61)
三、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俄国形式——孟什维主义的斗争	(76)
四、列宁通过反对取消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展开了全面批判	(79)
五、列宁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83)
第二节 卢森堡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践过程	(92)
一、批判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对马克思 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作了新的阐述	(94)
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前夕及会上由私人批判引入党内批判	(95)
三、汉诺威代表大会前及会上反击伯恩施坦对党的基本原则和 策略立场的攻击	(97)
四、卢森堡对国际上追随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行为的批判	(99)
五、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讨论	(102)
第三节 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践过程及其著作	(104)
一、筹备会议，起草各种决议，反对米勒兰入阁，竭力维护国际 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	(107)

二、正确处理原则与友谊的关系，与“莫逆之交”展开论战	(110)
三、利用《新时代》杂志，为各国反修战士提供斗争场所 ...	(112)
第三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和“运动” 观的认识与批评	(114)
第一节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认识	(115)
一、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所理解的“最终目的”不同	(115)
二、伯恩施坦主张通过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 主义”	(121)
三、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	(127)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批判	(131)
一、列宁密切结合实践，通过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对伯恩施坦“最终 目的和运动”进行批判	(131)
二、列宁批判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阐明改良与 革命的辩证关系	(136)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布朗基主义”	(140)
第三节 卢森堡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评	(142)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的 观点的批判	(143)
二、卢森堡驳斥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	(146)
三、卢森堡批评伯恩施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152)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	(156)
一、考茨基对“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关系的认识	(158)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评以及关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关系的论述	(159)
三、既批评又调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认识	(163)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认识与批评的意义	(171)
一、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系的认识与批评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思想	(171)
二、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76)
三、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理论上的争论关系到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	(178)
四、“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争论，关系到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	(179)
第四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182)
第一节 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的思想	(183)
一、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	(184)
二、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议会的思想	(188)
三、伯恩斯坦对无产阶级政党及策略原则的认识	(194)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199)
一、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200)
二、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议会制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210)
三、列宁对伯恩斯坦政党观的认识与批评	(222)

第三节 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的 认识与批评	(235)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民主观的认识与批评	(235)
二、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议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241)
三、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思想的认识与 批评	(246)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的 认识	(252)
一、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认识	(252)
二、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议会及普选权的认识	(262)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 会及政党思想认识与批评的意义	(268)
一、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民主与专政、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关系	(268)
二、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议会、普选的限制性，认清它们的本质	(274)
三、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伯恩施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	(281)
第五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 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286)
第一节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288)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	(288)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非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	(290)
三、伯恩施坦从股份公司的发展、小生产的顽强性阐述了资本分 散论	(292)
四、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会走向“崩溃”	(295)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299)
一、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300)
二、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批评	(308)
第三节 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对“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与怀疑	(316)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批评 ..	(317)
二、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的论据	(319)
三、资本主义适应论具有一些未被考察的理论前提，忽略这些前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326)
四、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因素	(329)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思想认识	(334)
一、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335)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否定资本积累理论的攻击	(338)
三、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崩溃论”、“剥夺论”的质疑	(342)
四、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批判	(344)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批判的意义	(347)
一、有助于我们联系当今的国际金融危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347)
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清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351)
三、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和危机论拓宽了思路	(354)

四、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做出了贡献·····	(356)
第六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局限性和现实启示 ·····	(360)
第一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	(360)
一、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361)
二、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376)
三、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历史贡献·····	(389)
第二节 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	(398)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398)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410)
第三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的启示 ·····	(420)
一、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420)
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抛弃把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的无原则”的错误倾向·····	(428)
三、对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评判标准·····	(431)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抛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435)
五、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反对情绪化·····	(443)
参考文献 ·····	(446)
后 记 ·····	(455)

导 论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复兴”伯恩施坦和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上迅速蔓延，伯恩施坦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被一些西方社会民主党尊为“教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和建设至关重要，当前我国一些错误思想之所以暗潮汹涌，就是由于近年来社会上少数人对当今我国的政党、民主认识不清，加之西方多元化的价值观又对年轻人的思想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导致少数人现在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要把工人阶级政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甚至声明要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形成的影响，造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也冲击和影响着我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使许多人思想上产生了模糊认识。

因而，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主义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关注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列宁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中起着统率和领导作用。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与她反对第二国际著名人物伯恩施坦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所评价的那

样：“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考茨基作为伯恩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有过犹豫与徘徊，但最终也能冲破旧日友谊，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伯恩斯坦进行批评。因而，研究伯恩斯坦主义，不能不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本书试图通过对伯恩斯坦思想产生的历史、基本内容和实质等进行系统研究，使人们进一步认清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我们厘清第二国际时期那段历史和他们之间论争的是是非非，进而厘清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弄清他们的理论本质，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杜绝“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为此我们既要注重对历史文献的掌握，重视从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中去提炼观点，又要力求避免用搜章摘句的方法对待他们的论述，注意将他们的论述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加以解读，客观地再现他们的思想，同时还要用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思想，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事实上，即使是修正主义人物也是功过兼有，如果因人废言，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看法全部纳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样就会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因而只有认真解读伯恩斯坦主义、研究伯恩斯坦主义的内容、特征与实质等，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清问题的实质，才能正确看待伯恩斯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既是我们科学理解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曲折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又是我们准确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认清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潜在危险的重要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伯恩斯坦的研究多半是从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角度展开的。而从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角度加以比较研究，并客观地进行评价的，则很少。学术界目前除了有列宁、卢森堡或考茨基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文章外，其他关于伯恩斯坦主义的文章并不多，而且这些研究还比较分散，明显地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至于谈到这几个人对伯恩斯坦的认识并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则更

少。而且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集中于对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的思想进行文本解读，对他们的研究没有与当今的现实结合起来，使之融入研究体系之中，因而，已有成果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成果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涉及问题的深度、广度，都稍嫌不足。

本书以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为主题，力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及比较归纳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几种研究方法，依据他们各自的经典文本思想，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对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四个人对待“社会主义目的与运动”、民主、议会、普选权、政党、资本主义崩溃论等观点的比较分析，找出他们认识中的差异，进而对他们思想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分析出对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东方与西方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列宁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俄国和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伯恩斯坦、考茨基则从西方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然，任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有些结论需要修正和补充是正常的。

以僵化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去判断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结果必然会陷入认识的误区。科学社会主义既饱含科学，又富有民主。科学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能百花争艳，繁荣世界；民主必须以科学为指导，才能硕果满园，造福人民。

本书开篇，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整体概述，在概述中主要阐述了伯恩斯坦思想的变迁、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与形成、思想渊源、内容、特征及其实质。

在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整体概述的基础上，从“最终目的”和“运动”、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重点

剖析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上述思想的认识与批评。这一部分包括四章内容，分别是第二章列宁、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第三章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评；第四章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第五章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第三章研究伯恩斯坦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系的认识以及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空想”的思想，并通过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其观点的认识与批判的研究，揭示出伯恩斯坦错误观点的实质。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观点的实质及其对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的危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尤其批评他通过工会、工厂立法、合作社等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同时还批评了伯恩斯坦把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目的与运动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第四章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民主党完全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合法的议会活动，通过普选、投票，争取议会多数等点点滴滴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所认为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的改良党理论，主张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评。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她不但批判了伯恩斯坦单纯强调民主的形式而忽视民主内容的片面观点，而且她还批评了伯恩斯坦“议会迷”的思想，并针对议会迷们疯狂地追逐议席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在应该夺取政权

的时候却消极地等待议会多数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卢森堡还揭露了议会选举和德国普选的虚伪性与狭隘性以及伯恩施坦妄图把党建成改良党、全民党的错误思想。考茨基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民主是促使无产阶级的成熟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第五章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观点的认识与批评。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修正是从批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导致它崩溃的预言开始的，按照马克思的危机论推理，资本主义的危机变得越来越经常和具有毁灭性，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并不符合，他故意混淆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直接原因，舍弃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其中的“价值”与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无非是“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股份公司的发展，小生产经济的顽强性”等限制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各种因素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洛贝尔图斯“没有特别的不同”，世界市场的扩大、信用制度的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等都能使危机消除和避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断是一种极端的“空想主义”等。他还抓住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解中的某些偏误，得出两个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相反的结论，即认为信用制度能够自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个别工业中出现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普遍危机的错误结论。列宁批评伯恩施坦关于价值的理论没有拿出什么新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是像伯恩施坦所说，危机消失了，资本主义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像慢性病发作一样。只是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列宁还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从生产的集中发展到垄断，资本家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和燃料的掠夺，银行成为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工具，金融资本加强了殖民政策，今天的垄断已经发展到集团化、地区化、国际化。

卢森堡深刻驳斥了伯恩斯坦对“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与怀疑，她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作了阐释，卢森堡逐点剖析和驳斥了伯恩斯坦“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的论据，指出这些所谓的“适应手段”并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手段。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及发展性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阐述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错误理论，并在《资本积累论》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必然性，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历史生命的最后阶段。卢森堡从五方面明确指出，信用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更不足以消除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

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观点同柏姆-巴维克的反科学的“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的企图，批驳说伯恩斯坦离开了对问题的严肃的科学的考察而企图机械地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结合起来。考茨基指出伯恩斯坦错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原因，一是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二是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性。由此，伯恩斯坦作为价值论的批判者正如他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者一样，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东西。考茨基还依据许多统计材料，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论据，驳斥了关于在股份公司中似乎正发生资本的“民主化”的观点，关于可以借助于垄断和信贷消除危机的观点，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者”人数增加和无产阶级状况日益“改善”的观点，等等。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除此以外，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否定资本积累理论行为进行了批评。他首先从伯恩斯坦否认的基本事实——资本集中的现象开始，然后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资本积累过程中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趋势、股份公司发展的性质、新的中间阶层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在资本集中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伯恩斯坦所认为的股份公司的发展妨碍了资本和生产过程的集中，使“有产者”人数增加的论断，也是没有根据的；考茨基还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分

析了资本集中导致“垄断化”的新特征。

本书最后一部分即第六章研究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以及缺陷。列宁、卢森堡、考茨基通过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阐明了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命题，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今的资本主义再度处于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的阶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样非常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焕发出更加强劲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国际理论家如何看待伯恩斯坦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富矿”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而本书既要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及它与伯恩斯坦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之处，又要分析列宁、卢森堡、考茨基是如何看待伯恩斯坦主义的，他们究竟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都需要理论联系现实，并通过实践证明。因而本书这方面研究还是一种尝试，还需不断深入。

本书作为阶段性的成果，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也得到了一些收获。

第一，在内容上探讨了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最终目的”关系与以往人们认识的区别；探讨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议会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以及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民主观、政党观的认识；探讨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对待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上的不同观点，比较分析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探讨了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分析问题方法论上的异同。

第二，从解读文本和联系现实的视角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思想中特别有现实价值的内容。结合席卷全球的信用危机、金融危机及实体经济危机，来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伯恩

施坦如何看待资本积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结合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来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是如何看待民主、议会、政党等问题的，从而更好地联系中国实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第一章 伯恩施坦主义概述

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潮，这种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借口时代的变化，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打着“修正”、“革新”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堪称有体系的全面修正。伯恩施坦主义也因而曾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标本”。

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的思想产生的历史、基本内容、实质及其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进一步研究第二国际理论家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厘清第二国际时期的历史，以及当时论争的实质，进而从源头上杜绝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我们的影响。

第一节 伯恩施坦思想的变迁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伯恩施坦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产生当然也离不开伯恩施坦本人这个主要的内因，因而分析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就不能不考察伯恩施坦的成长环境及其思想的发展轨迹。

一、伯恩斯坦的早期思想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当过白铁匠、火车司机。其伯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1866年伯恩斯坦中学肄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学徒，20岁后曾在一家银行当职员，1876年辞职。

1862—1880年，伯恩斯坦由于受到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学生时代崇拜他的伯父、自由主义者A.伯恩斯坦和激进民主主义者J.雅科比，受其影响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1872年初他听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A.倍倍尔的讲演，敬佩该党反对普法战争的立场，在同年4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伯恩斯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K.E.杜林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特别赞赏杜林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他还曾就有关社会主义问题向杜林登门求教。

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着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主要流派。伯恩斯坦热情地赞扬拉萨尔主义，将拉萨尔誉为自己的“导师”。由于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也决定着伯恩斯坦如果不彻底根除拉萨尔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以后的思想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70年代是伯恩斯坦世界观的形成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初次暴露的阶段。1874年，伯恩斯坦参加科堡代表大会，赞成同拉萨尔派“求得谅解”，以便尽快实现两派合并。1875年，他曾作为爱森纳赫派代表参加在哥达召开的两派合并预备会议，并在大会上竭力主张与拉萨尔机会主义派实行无条件的妥协，拿革命原则做交易。1876年，伯恩斯坦辞去银行职务，到瑞士的苏黎世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1877年10月，伯恩斯坦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主办改良主义杂志《未来》，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妄图用关于正义、自

由、平等和博爱的观点代替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1878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发布《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严厉禁止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大批逮捕和流放社会主义者。1879年初，他同赫希柏格、施拉姆形成“苏黎世三人团”，并合作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在文章中他们重新检点了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活动，认为绝对不应反对资产阶级，而应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要求社会民主党放弃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甚至鼓吹党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批评党片面地搞工人运动、宣扬暴力和流血革命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不应成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该是“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要求党不把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最终目的放在首要地位，而以全部精力去实现微小的改良和补缀，无限期地延缓纲领的实现。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吓跑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者合作，社会民主党还应当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目标，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还宣称“非常法”是无产阶级找来的，党应当向政府忏悔，乞求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看到这篇署名三星的文章后，当即于1879年9月写了一封致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五领导和白拉克的通告信，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想把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1880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瑞士符登召开的秘密代表会议上，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职务。

伯恩斯坦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威望，采取见风使舵的办法，向倍倍尔靠拢。1880年12月，伯恩斯坦跟随倍倍尔一起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悔过，要与赫希伯格右倾机会主义决裂，拥护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恩格斯考虑到他还年轻，就给了他在实际斗争中改正错误的机会。

二、伯恩斯坦中期思想发展轨迹

1881—1895年，伯恩斯坦在政治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拉萨尔主义，在此期间，他在瑞士苏黎世负责主编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伯恩斯坦自己也在此期间发表了多篇出色的文章。1881—1890年间他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①。这段时期，他在恩格斯教育下做了许多进步和有益的工作，按照列宁的说法，伯恩斯坦在1880—1895年间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②。伯恩斯坦也因为此间的良好表现，甚至得到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1888年5月，伯恩斯坦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要求下，随该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往伦敦。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获得了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党的组织和报刊、党的议会活动以及工会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英国的十几年使伯恩斯坦观察和体会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且和许多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如维伯夫妇、萧伯纳交往。这一切都对伯恩斯坦产生了很大影响，伯恩斯坦的思想再次发生改变。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益滋长，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一些新看法，他的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体系，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开始系统地发表出来。他开始逐步吸收了以往拉萨尔、杜林等人和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派别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从1896年到1899年，这几年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面目大暴露的阶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一个关键的质变阶段。在此之前的较长时间，他的演变主要是量变，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充其量也不过是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这几年是质变的主要标志有二：一是1896年至1898年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和“系统”的修正。他在这些文章中认为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于指导世界的变革，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在文章中他反对明确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否认从前者过渡到后者是通过突变实现的；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阶级斗争缓和化，作为革命前导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为减少，甚至根本没有。为此，他鼓吹改变党的策略，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公式。^①二是1899年2月，伯恩斯坦用他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全面的“修正”，并将此思想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1899年到1914年，这15年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迅速发展、达到顶峰的阶段。伯恩斯坦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内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得到了几乎完全的贯彻。这部著作也很快成为几乎全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流派的共同纲领性著作，伯恩斯坦也赢得了“民主社会主义鼻祖”的称号。正如列宁在1914年5月所指出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②。

第二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与形成

一、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条件

事实上，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和出现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空穴来风，

^①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6—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我们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时，绝不能仅仅把过错归结为个别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实际上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它是一种国际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数十年和平发展的产物，是资本家拉拢工人贵族的结果，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第二国际的破产。正像列宁在谈到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时所指出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倾向时也指出：它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②也就是说列宁认为伯恩斯坦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因而我们先来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变化情况，进而分析伯恩斯坦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思想渊源等。

（一）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根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研究20世纪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不能不追溯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那么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与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和形成有什么内在联系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资本主义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飞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电机、内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392页。

燃机和电动机、新的炼钢法等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力的广泛应用，代表了这个时期最新的技术进步，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工业，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格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而生产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出现。垄断组织的出现是19世纪最后30年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特征。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这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经济特征。恩格斯晚年在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时分析这种现象，他说：“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单。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①通过对英国和德国某些生产部门卡特尔发展事实的分析，恩格斯已敏锐地指出：“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②列宁后来也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③

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一切。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自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德国的统一，首先结束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的政治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也使德国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产阶级的两面派政策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有直接关系。

（二）伯恩施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阶级根源——工人贵族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的假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可避免“崩溃”的理论，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时期的“合法”斗争，淡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模糊了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必然性的认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也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学说，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普选道路，运用“渐进”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在西欧一些国家，成为一种时髦的“新思潮”。

同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用剥夺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和掠夺国外殖民地财富的方式获取了大量的资本和财富，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统治手法，对部分工人阶级采取了和平收买的策略，从而使工人政党内的合法主义情绪得以泛滥，这在客观上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土壤。

以前，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同社会主义进行原则斗争。现在，他们越来越注重在策略上的改变，常常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来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他们除了采用暴力手段进行镇压以外，还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

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列宁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①

德国的形势显得更为严峻，这是因为，德国存在着强大的工人贵族势力，再加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急剧增长，使得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已经具备。这是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炮弹加糖果”的两面手法，改变了以前的斗争策略，培养工人贵族并拉拢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所致。工人贵族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却拥有特别强大的政治能量，占有重要地位。资产阶级用少许的让步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思想动摇分子，引诱他们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他们的政权。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的症结，就在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用高额薪金和其他优惠待遇这种经济收买政策来收买和腐蚀一小部分工人，在工人中培养工人贵族这一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的生活比大多数工人群众富裕舒适得多，他们也相信资产阶级会逐渐满足工人阶级的一切要求。这种收买工人的方法是隐蔽和狡猾的，是让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工人贵族。就像青蛙被放在温水里，慢慢加热，最后被烫死，却浑然不知。这些工人贵族也是这样被资产阶级愚弄，却又甘愿为资产阶级效力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财政资本的超额利润等，因而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由于工人贵族阶层势力的增长，在党和工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终于由改良主义观点发展到伯恩施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坦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在党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这也是伯恩施坦主义得以产生和形成的阶级根源。

（三）伯恩施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认识论根源——资产阶级折中主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特殊时期，由于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学派、论著也应运而生。其中，以马尔堡大学教授海尔·柯亨、保罗·那托尔卜为代表的马尔堡学派和以弗莱堡大学教授威廉·文德尔班、亨利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所宣扬的新康德主义影响最大。他们提出必须“回到康德去”，抛开康德“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康德的不可知论、先验论等唯心主义因素。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舒尔采·德里奇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则把垄断视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工人筹款举办合作社解救工人的苦难，达到“社会和谐”；拉萨尔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公开鼓吹争取普选权和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地、逐步地变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为“自由国家”并过渡到社会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又出来公开宣扬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党应该走上谈判协商的道路，并在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来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各项改善。伯恩施坦把马克思和普鲁东、阿尔伯特·朗格、康德、拉萨尔、舒尔采·格弗尼茨等的思想拿过来，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某个思想的片段，并把这些思想体系的残片无原则地混杂、拼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伯恩施坦主义。表面看起来，伯恩施坦主义似乎是毫无偏见、不偏不倚的，其实呢就是不折不扣的折中主义。因为折中主义的特征和表现与伯恩施坦主义很相似：它们都是把矛盾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把对立双方调和起来，混淆是非；把一事物的许多属性不加区别地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做完全偶然的机械的拼凑；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固定的立场，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潮、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其理论就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伯恩施坦主义的思想渊源里再详细介绍。

二、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主观条件

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仅仅是为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伯恩斯坦主义得以产生和形成还离不开伯恩斯坦自身思想发展的变化和伯恩斯坦主观上认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具有必要性这一主观条件。伯恩斯坦思想变迁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这儿不再重复。下面主要谈谈伯恩斯坦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曲解与背叛。

(一) 伯恩斯坦以当时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为借口，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修正、否定马克思主义非常必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确实呈现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态势，并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妨碍德国国民经济的稳步上升。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求对“传统观点”进行“自由批评”和“修正”。在当时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伯恩斯坦要求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德国现实来看待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伯恩斯坦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和修正时，并没有全面辩证地分析和思考，对于这一点，他也是认识的。他自己曾经在谈到长期银行工作形成的“思想素质”时，认为“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的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①。这种片面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对他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使他在分析研究问题时，离开事物发展的整体关系，以片面的分析推断整体的性质，在看问题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问题的看法容易走向极端，从而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

伯恩斯坦在1896—1898年间的《新时代》上写了题为《社会主义问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题》的一组文章，后来这一组文章便扩展为伯恩斯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否定和修正，并系统阐述六月革命的教训。从其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斯坦“所做的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在此基础上推翻它，‘另砌炉灶’”^①。伯恩斯坦在该书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他就是要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修正不是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而是深思熟虑，态度非常坚决和明确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②如果伯恩斯坦仅仅是提出在新历史时期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资本主义“崩溃论”，这是可以讨论的。但问题出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蓄谋已久的，“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直率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③伯恩斯坦口中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是指恩格斯逝世这种情况，这也说明了伯恩斯坦的虚伪性，虽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背离蓄谋已久，但慑于恩格斯的崇高威望，一直采取了遮掩的方式。1891年到1893年期间，伯恩斯坦明显地向某种修正主义的方向演变，但直到恩格斯逝世，这场争论才爆发起来。1895年，伯恩斯坦写了一篇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文章。在这篇评论性的文章里，伯恩斯坦提出，六月的日子搞的是毫无必要的冒险主义，他宁愿要路易·勃朗，而不要布朗基；伯恩斯坦确实是从心底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要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做些贡献。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

① 俞吾金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只要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逢到节日才从银柜中拿出来，平时却置之不理’，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①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清除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矛盾”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他说：“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② 他还进一步论述道：“一种理论的错误只有当这些错误被理论的捍卫者承认错误的时候才算是已被克服。”^③ 伯恩斯坦认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之所在，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错误。

（二）伯恩斯坦歪曲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思想

伯恩斯坦主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就是虽然伯恩斯坦自诩为恩格斯遗嘱的继承人，但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歪曲地理解了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思想。伯恩斯坦说：“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④ 伯恩斯坦由此认为，恩格斯晚年已经改变了斗争策略，恩格斯也认为通过暴力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已经过时。他还引用了恩格斯一段话，“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⑤，来说明恩格斯晚年已经改变了以前武装夺权的暴力革命思想。实际上这句话只是说明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发展变化了，应当对这种新的斗争条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6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没有说明恩格斯改变了对实现最终目的的方式的看法。但伯恩斯坦错误地认为恩格斯不希望通过灾变即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将崩溃，因而他对最终目的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灾变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那么，到底实现最终目的的方式应该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灾变方式，还是和平改良的渐进方式呢？恩格斯晚年是不是像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主张和平改良的方式呢？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搞清楚的。

现在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学说，也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方式，实际上这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误解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评了“现代的社会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策只能是把党引入迷途。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响剑鸣”，只宜采取合法斗争策略以集聚力量；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必须懂得，统治者“在制定新的法律反对颠覆”，而“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①“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②，“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③。从中可以清楚地理解恩格斯是反对在德国专制条件下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问题的。恩格斯把暴力革命当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根本的策略和斗争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段，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偏爱”暴力，而是因为只要有资产阶级反动暴力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暴力反对、抵制反革命的暴力。恩格斯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针对那些对暴力革命的无端攻击和道德说教，恩格斯坚定鲜明地作出回答：“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么，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①《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问世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散布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者，并说《导言》一书就是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真实凭证。恩格斯似乎早就预料到，在他死后会有人加以曲解，在临终前曾经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②恩格斯是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待革命斗争策略的。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应根据当时的各种具体条件来决定，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去崇尚暴力是愚蠢的，但是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是自己欺骗自己。恩格斯在《导言》中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变成一个合法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而是鲜明地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各种斗争方式的原则态度。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个一定的条件就是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而他们反对的是在专制制度下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

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① 通观恩格斯的整个论述，他之所以说“可以设想”那句话，除了说明法、美、英这些国家有与德国不同的条件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德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提出建立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政治要求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实行联邦制君主制的德国是不可能实现由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就是说，他认为在充分民主的国家和平长入是有可能的，但在德国专制背景下应该进行暴力革命。还有就是，恩格斯在设想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它的统治受到威胁时，发生逆转、采用暴力的可能性。因此，他告诫各国党，“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②。总之，伯恩施坦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曲解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恩格斯晚年在《导言》中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新时期的历史经验，虽然肯定利用普选权和开展合法斗争，但他是设想一种把合法斗争、日常工作同实现目标、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相结合的策略，决不意味着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也不是认同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就可以获得政权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节 伯恩施坦主义的思想渊源

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和形成，除了受当时主客观历史条件影响，有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页。

产生的阶级、社会、认识根源外，还和伯恩斯坦长期受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渗透和影响不无关系。

伯恩斯坦思想的蜕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在他头脑中长期影响与渗透的必然结果。

伯恩斯坦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而这些理论来源又各有特色，很难说清哪种思想来源是伯恩斯坦主义的主要来源。伯恩斯坦自己也认为他受多种思想的影响。1876年，杜林主义在统一的德国党内泛滥起来，伯恩斯坦一下子变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他指出，杜林“用来说教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他的意。同时，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拉萨尔关于工人普选权的观点。后来，又迷上了费边社的“市政社会主义”理论，还一度对法国可能派表示同情和称道，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思想发生共鸣。此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有康德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成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按照卢森堡的说法，伯恩斯坦主义实际上也并非有什么新的创造，它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结合，结合的结果就是伯恩斯坦主义。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主义，就如“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里找到了公墓地”^①。那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影响的思潮主要有哪些呢？

一、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的改良思想

（一）英国工联主义

英国工联主义是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因其最早出现于英国工人联合会而得名。工联主义是工联领导集团所推行的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总称。它是资产阶级对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实行收买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工联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较早的改良主义思潮，其思想主要表现为：鼓吹阶级合作，主张阶级调和，而反对革命斗争，宣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热衷于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主张工会进行争取普选权和劳动立法的运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将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满足于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把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看成是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注重工人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忽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最终目的。工联主义者作为工人贵族利益的代表，满足于颁布劳动保护法、获得普选权等局部改良，不谋求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工联领袖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是永恒的，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口号。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调解、仲裁等方式来解决劳资争端，把能同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视为一种“胜利”和“光荣”的表现；宣扬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只允许工会进行争取普选权和劳动立法的运动，认为这样能劳资两利，达到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目的，主张通过合法的谈判来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把谈判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根本手段。工联主义者的这些改良思想都被伯恩斯坦主义吸收，成为伯恩斯坦主义的主要内容。

（二）费边社改良思想

费边社是1884年1月由一些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立于英国伦敦的社会改良主义团体，其名称来源于古罗马统帅Q.费边的名字，费边以善于使用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前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萧伯纳和维伯夫妇等人，他们的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只能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新的原则转变，社会改革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他们提出的这些社会改良思想被统称为费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费边社要求一切重大的社会根本改革，必须是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符合宪法的、和平的变革。他们主张采取缓慢渐进的策略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并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而且正在通

过点滴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演进，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渗入”到各政党和各社会阶层中去，特别是影响那些起关键作用的政治家、公职人员、工会领袖等等，使其确信改革的必要性。费边社认为由资本主义演进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要实行普选制和议会制度；在经济上就应该实行市政社会主义和组织合作社。市政社会主义是费边社的重要政策主张之一，费边主义者认为只要扩大市政当局对煤气工业、电力工业、自来水工业和其他公用事业的所有权，加强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理就是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主义的形成和伯恩斯坦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关系密切。1888年，在俾斯麦的压力下，伯恩斯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他刚到伦敦，就一头栽进费边主义者中间去。他参加了费边社在伦敦定期举办的社会主义晚会，对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十分欣赏”^①。随后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

那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能有效地抵御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斯坦在英国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呈现的一切景象，并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但伯恩斯坦仍因对他的通缉而不能返回德国，于是他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他通过与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维伯夫妇和萧伯纳等人的交往，用伯恩斯坦自己的话说，他的眼界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扩展”^②。伯恩斯坦侨居英国的时期对其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乎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在内，都认为伯恩斯坦深受费边社的改良思想影响。卢森堡也说，“伯恩斯坦以英国的情况作为他的理论根据，他透过‘英国眼镜’来观察世界”^③。而且，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费边派自身也认同这样一种看法。伯恩斯坦初到英国时，曾经批判过费边派的许多理论，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与费边派就很接近了。

尽管伯恩斯坦一方面否认费边主义对自己的影响，他说别人认为他受费边社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我是学英国费边主义的榜样而转向修正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①但是，他同时也承认，他是从费边派学到了一些东西的，“维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阶级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种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②。他还说：“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③

二、拉萨尔主义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

（一）痴迷拉萨尔主义，是拉萨尔主义的忠实信徒

拉萨尔作为德国早期工人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党的奠基人”。1863年3月他发表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中，提出要求实施普选权，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等主张，其机会主义理论构成了早期德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基础。他提出了“自由国家”论和“工资铁律”思想，其思想后来也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所遵从。伯恩斯坦认为，拉萨尔给工人阶级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④。他的著作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503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④ [德] 伯恩斯坦：《费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郑异凡、梁建华、于沪生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页。

“就是在今天还能有力地激发和丰富社会主义思想。谁也没有像拉萨尔在其《巴师夏-舒尔采》中那样清楚、动人、深刻地说明了伟大的社会关系。谁也没有……”^① 伯恩斯坦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伯恩斯坦对拉萨尔的崇拜与痴迷。因而，拉萨尔主义通过国家资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成为伯恩斯坦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必然的。

那么，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拉萨尔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的“专政”，主张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让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全社会的权利平等，从而达到改良国家政治的目的。第二，拉萨尔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在于雇佣剥削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而在于分配产品的方式。拉萨尔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从而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反对拉萨尔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一个重大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反复指出，需要“肃清关于拉萨尔的神话”，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恩格斯深知伯恩斯坦对拉萨尔主义非常痴迷，把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当做传家宝。为了挽救伯恩斯坦，恩格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上来。但是，伯恩斯坦虽然口头上接受了批评，实际上却是坚持其错误思想，不愿改正。他为了拼凑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也从拉萨尔那里吸取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可以说他的许多观点和拉萨尔大同小异。比如，拉萨尔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个规律，就必须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企业主，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要建立生产合作社，必须依靠国家帮助；要取得国家帮助，必须争取普选权，其途径是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和平和合法的宣传鼓动。而伯恩斯坦也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很多

^① [德] 伯恩斯坦：《费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郑异凡、梁建华、于沪生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9页。

思想可以说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拉萨尔主义也可以说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先声。

伯恩斯坦迷信拉萨尔，在他的行动上也是有所表露的。“他总是想冲淡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甚至玩弄各种伎俩，破坏和阻止恩格斯进行这项工作。”^①

恩格斯在1882年曾说过，他已有了一个计划，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组文章来批判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第一部分是俾斯麦，第二部分是拉萨尔。鉴于革命队伍中还有许多同志深受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和“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等思想的影响，恩格斯着重指出：“这比第一部分更需要，这里需要作彻底清算，而如果这将触怒不幸被接受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拉萨尔派‘领袖’中的某一位，那就更好了。因此，老实说，第二部分对我来说最为重要。”恩格斯的意思是在当时批判拉萨尔主义比批判俾斯麦更为重要，但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的警告置若罔闻。恩格斯对此进一步明确指出：“但是，我不知道，对神圣的斐迪南（即拉萨尔）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否合乎某些人的口胃。他们大概会认为，在党的机关报上出现这种东西，就会挑起党内分裂和破坏曾经同拉萨尔派订立的协议。”^②恩格斯在此看出伯恩斯坦把拉萨尔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看出了他不同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这种文章，会拿出各种借口反对批判拉萨尔。

（二）推崇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德国新历史学派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继承者。新历史学派教授以瓦格纳、施穆勒、慕尼黑大学教授卢哥·布伦坦诺、布勒斯劳大学教授维尔纳·桑巴特等为代表，他们多为大学教授，因在大学讲坛上鼓吹社会主义，故名“讲坛社会主义”又称“教授社会主义”。但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5、356页。

他们却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幌子，实际上宣扬的却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他们的基本观点主要为：第一，他们宣扬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道德中的地位和作用。施穆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说成伦理关系，劳工问题是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改变而产生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力图把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说成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关系。第二，他们极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调和敌对阶级关系，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此外，他们还强调法律对经济的制约作用。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是新历史学派最突出的特征，这一点也最明确地反映出他们学说的本质。由于新历史学派的主要领导人和德国的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社会主义运动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因而，主张企图利用国家至上的学说，鼓吹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经济政策，以削弱和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新历史学派是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重要流派，伯恩斯坦就公开承认这一点。伯恩斯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时曾用佩服的口吻指出，被普遍认为当代德国最有才气社会学家之一的维·桑巴特教授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他写道，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驳倒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结论，而在于消化和发展这些结论……列宁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布伦坦诺和桑巴特。布伦坦诺热烈拥护工联主义，极力颂扬帝国主义的卡特尔组织，认为卡特尔可以缓和资本主义危机，伯恩斯坦就秉承了此思想。

三、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

新康德主义，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它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欧各国，特别是在德国广泛流行的一个提倡复兴康德哲学的流派。这个流派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某些因素，迎合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极力“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拼凑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康德强调意志自由，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你应该这样行动，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你自己和别人，都要把人当做目的，而绝不是看成手段”。在后来的新康德主义的眼里，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因而新康德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时，就以此为据，提出以伦理学代替唯物主义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即所谓理性的先天的道德规律）作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在康德那里，所谓“绝对”就是指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主观经验、感性欲望、利害关系等条件制约的理性。“命令”是指“应当如此”，实际上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新康德主义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的社会主义是“意志”、“应当”领域，是人们“善良意志”所信仰的东西，不是科学所能认识和实践可能到达的东西，这对伯恩斯坦影响很大。

19世纪后半期，伦理社会主义随着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出现而产生。伦理社会主义是把唯心主义的伦理思想当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说，19世纪末流行于德、意、俄等国。其主要特点是反对按照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一部分新康德主义者试图使社会民主党接受“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这种思想，以代替或者“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一种脱离阶级和现实的“道德完美”。伯恩斯坦深受此思潮影响，他用新康德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还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是建立在“利益”、“认识”和“道德意识”基础上的。这里的“利益”也仅仅被看做“伦理上的”、“理智上的”、“道德上的”观念。伯恩斯坦从道德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只看做是一些意向，以及为实现这些意向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本质被伯恩斯坦解释成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产物，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无目的的“斗争”，从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遥远的、难以到达的“彼岸”世界。由此就不难理解伯恩斯坦为什么不关注最终目的，而只关心现实的运动了。

伯恩斯坦推崇新康德主义就是为了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行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在《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观

念因素》一文的开头曾表示感谢康拉德·施密特。因为施密特的一篇论康德的文章对他有直接启发，所以他指出，在他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因而，他宣称要“回到康德去！”也即要回到以朗格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去。

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为“空想”和“自我欺骗”。他根本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世界观”，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二元论哲学的批判。他认为康德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使二者妥协，使各种互相对立的哲学学派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是最具有科学性的哲学，这种思想是和伯恩斯坦推崇改良主义分不开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改良主义就是妥协主义。在他看来，哲学是“超阶级的”，因而应该也是能调和各种矛盾的。

伯恩斯坦特别仇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他认为，人们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往往具有轻视观念而夸大物质因素作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十分有害。他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激进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死板公式”、“神秘主义”、“诡辩策略”，提出要“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伯恩斯坦之所以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恐怕就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的革命因素。他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致命之点”——对立统一规律。他既然否认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可能认同质量互变规律，他否认质变，只承认量变。他宣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只有进化和改良，而无飞跃和质变。这就是他的庸俗进化论思想。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伯恩斯坦为了篡改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说成是“庸俗的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认为马克思错误地“把技术和经济的因素”看成“历史上具有几乎无限的决定

力”，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因素”，因而把“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表现，看成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他认为这是具有宿命论倾向的经济决定论。他宣称，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愈来愈小，“非经济因素”愈来愈独立、愈来愈不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这样，精神因素就被宣布为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和基本的力量。

第四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内容

伯恩斯坦由于深受英国工联主义、费边派、拉萨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所以，伯恩斯坦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思想的印迹。而实质上伯恩斯坦主义并不新鲜，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杂烩而已。

伯恩斯坦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终目的和运动”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一）“最终目的和运动”

伯恩斯坦在1898年1月《新时代》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地政策》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宣布了他的实用主义的修正公式，即“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以后他又在1898年9月29日的《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重申此公式，在1899年1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专门把《最终目的和运动》列为一章，为其思想寻找理论根据。伯恩斯坦声称社会民主党不要谈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要多谈些实际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伯恩斯坦不追求最终目的，只是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理解上与当时社会民主党人“通常”理解“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

伯恩斯坦认为当时社会民主党人“通常”理解的“最终目的”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但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太渺茫，太遥远，只能是一种空想，现在只需搞改良，做些实际可行的事情。革命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应该抛弃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承诺，而要将最大限度的时间用在那些构成党的日常实践的各种议会与工会活动上，并以此替代革命，他一再声明“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只要“以普选权和民主”为基础，争取更多的议会席位，通过民主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利，采用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以看出，伯恩斯坦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寄希望于实现合作制的种种改良。但实际上当时党内并没有迷恋未来社会主义模式，也没有人空想未来社会的详细图景，而是主张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因而伯恩斯坦反对的这种所谓“最终目的”的才是空想，是无的放矢，是一厢情愿的改良。伯恩斯坦过分关注于日常合法斗争，把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当做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还试图将议会及工会中的日常斗争与对社会的革命性重建的最终目标对立起来。

（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伯恩斯坦在《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是伯恩斯坦所有理论的灵魂，也是他推行一系列经济和政策方针的依据。伯恩斯坦认为，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前，必须建设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国家。他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中，并不需求“炸毁”现存的国家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等待”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自由制度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在这漫长的“过渡”时期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有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但伯恩斯坦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说他作了“修正”的、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一种“进化”的资

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还设计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模式，那就是推行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是伯恩斯坦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与特征的中心命题，它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得以实现。伯恩斯坦断言：尽管这种合作社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是它们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如果始终充分听任它们自己从事自己的组织和管理，那么它们肯定会极好地完成自己的经济任务。

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人们从“实质”上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伯恩斯坦所谓的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企业的良好的民主管理的逐步发展，等等。在他看来，只要社会充分行使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就能实际地使私人经营的企业向公共经营的企业转移。

二、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

（一）关于民主

伯恩斯坦论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即是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伯恩斯坦还提出民主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民主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仅仅从字面上很难看出伯恩斯坦的民主观所存在的缺陷，但实际上，伯恩斯坦的民主是不存在阶级统治的民主；是要放弃宣传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是可以改变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割裂了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民主。伯恩斯坦的“民主”带有理想化色彩，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是“全民”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他要求人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制已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从而美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

（二）关于议会

伯恩斯坦痴迷拉萨尔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使得伯恩斯坦迷恋于议会讲坛，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即将崩溃，而是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应当破坏它，而应当进一步发展”它，不应当搞“革命”、“起义”，只能搞“社会改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应该要以普选权作为支点，以议会作为场所，以费边主义的市政社会主义作为杠杆，走“立法或者合法改良的道路”。

（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

伯恩斯坦的政党理论充满了基督教的“仁爱”精神，这渊源于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伯恩斯坦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本来面目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党，是“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应该是“和平的党”、“改良的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为了改进自身的处境而成立的组织，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致力于追求革命，而应该关注于日常的运动和改良，为此也要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建成“全民的”、“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政党”，伯恩斯坦的改良政党的理论是服务于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的。伯恩斯坦认为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

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这样，伯恩斯坦就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社会改良党。

三、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与“适应论”

伯恩斯坦否定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倡导资本主义“适应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基本精神制定了《爱尔福特纲领》，并在其中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内容。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称，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指出，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但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垄断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伯恩斯坦崇尚资本主义制度，把它说成是永远“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

首先，伯恩斯坦从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出发，认为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论”是没有什么理论根据的。他从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的角度否定社会灾变的可能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大量事实材料，力图证明事实上阶级斗争并没有像《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尖锐化。伯恩斯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社会不是日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两极，而是出现了中间阶层，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化了。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会不断增加，无产者也将成为有产者，从而无产阶级便会日益“幸福”，阶级矛盾有缓和削弱下去的趋势。因而，他认为：在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资本家巨头的数目不是愈来愈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在不断增加。由于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的不断出现，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

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各种中等阶级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改变了性质，因而会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伯恩斯坦指出，经济危机目前已经成为“根本不可能”，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显著差别”，并宣称这一理论已经“过时”。由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空想：他们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飞跃；并假定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稳妥、最短的必经之路。伯恩斯坦称这种“崩溃论”是“空想”，他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的“灾变论”，提出资本主义适应论。

其次，伯恩斯坦根据所谓的现实经济状况，反对“崩溃论”。他认为，在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现象固然能证实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有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说的那种程度，农业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据工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伯恩斯坦还举例说，工业中已经逐步在提高儿童从事工业劳动的年龄限制，劳动保护法的制定与工作日的缩短等措施，说明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正一步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这也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崩溃。他指出在这些制度的影响和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就会出现一种反对资本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另外，工厂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的劳动中都考虑到建立工人组织，并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都在扩大，工会和合作社已经摆脱了一切法律上的障碍。由此，伯恩斯坦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标志。他还引证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料力图证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的问题、工人阶级因绝对贫困化而必将在短期内爆发革命等看法都不符合实际。

第五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特征和实质

一、伯恩斯坦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改良主义

伯恩斯坦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而不仅仅是致力于社会改良。

第一，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之间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如果没有革命形势，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获得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从事社会改良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劳动条件、社会状况的社会改良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领域参加竞选，积极从事议会斗争，力求通过参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上支持工会组织罢工，进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劳资斗争；在文化领域，创办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善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工人职业教育。这三个领域的斗争都属于社会改良范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近百年来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要有客观的评价。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对人民有益的改良运动，而不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马克思是崇尚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

社会改良主义则把社会改良极端化、绝对化。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具有革命形势的危机时期，也要放弃革命，而把社会改良作为唯一手段，把它的功能片面夸大，寄希望通过缓慢的和平改良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这种和平改良方式的局限性，认为这种改良，它只能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作一些修补，却不可能实

现制度性的根本变革。因为社会改良是建立在资本让步基础之上，而这种让步是有底线的，是以不损害资本核心利益为基准的。社会改良成就再大，也跳不出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至今依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社会改良成就最大的当属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它创立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举世赞扬。尽管如此，瑞典至今依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垄断资本，始终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二，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在对待革命的关系上，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阶级社会中，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徐崇温在《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中认为，改良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做出的让步，或被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到的让步；而革命则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①，“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②。这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暴烈的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所做出的局部的、点滴的让步。改良和革命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改良与革命之所以能够互相转化，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运动形式。改良虽然是局部的、缓慢的、逐渐的，但却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因而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前，它往往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在革命胜利以后，它又往往是革命的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

改良主义与改良在同革命的关系上，也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改良主义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它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改良主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页。

义是 19 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思潮。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是（按此指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亦即马克思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存在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就极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① 这时的资产阶级“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② 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阶级实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断出现改良主义这一修正主义的流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③。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伯恩斯坦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实际上就是认为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改良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伯恩斯坦主义者就是主张在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框内进行改良的改良主义。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与夺权，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伯恩斯坦宣布：在这样的时代，“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政党“有最大意义”的不是“取得政权”，实现最终目标，而是进行“细小的工作”。伯恩斯坦曾指出，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他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这样，伯恩斯坦实际上就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1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1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5 页。

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改良党。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最明确地表明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实质。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用来顶替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指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改良主义，即使是完全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都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① 改良主义“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②，“用改良来反对革命”，它毫无进步意义可言，是完全反动的。改良主义是革命的绊脚石。只有战胜改良主义等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思潮，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时，采取了层层剥笋的方式，她最后总结说，伯恩斯坦的改良理论是一种堕落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然后是放弃社会主义阵地，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放弃剩余价值学说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最终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便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发展，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它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破烂货的堆积，而且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的。

卢森堡预言了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的下场，即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就像堂吉珂德一样骑着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骑着它想干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结果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列宁对此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列宁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③。列宁进而提出，所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都是“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④。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因而，我们决不能混淆改良和改良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革命的，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改良。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应当尽可能地争取和利用改良，并以此为革命做准备；当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就要毫不犹豫地不失时机地把争取改良的斗争转变为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不论在宣传、鼓动或经济上的群众活动等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倦地进行工作，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改良和利用改良的“机会”，同时，他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还支持和注意发展任何一种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新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改良的一个明证。但是对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历来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同它进行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伯恩斯坦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改良主义、修正主义。1908年，列宁曾经明确地提出过“修正主义”概念的内涵，即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①。

二、伯恩斯坦主义是忽视民众根本利益的实用主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更加突出，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强调“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实用主义者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把人的行动、信念、价值当做中心，把获得“效果”当做最高的目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指客观实际，而是指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要求。所谓信念也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所制定的计划、目标，而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价值也仅仅是对人的生存有益的东西，行动就是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效果就是个人所追求的利益、功效。伯恩斯坦深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反复强调并重申的修正主义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鲜明地说明了伯恩斯坦只重视“运动”，而忽视“最终目的”的实用主义特征。尽管以往人们对伯恩斯坦这句话的理解存在着偏差，他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毫不关心，而只是表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比较遥远而渺茫，相比较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问题，他更关注当前的运动，即对资本主义的现时改良。但是，伯恩斯坦的这个公式，却是集中反映了其理论的实用主义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实用主义”当然是以“有用”为目标的，但是却是以“实”为前提的。我们评价一样东西是否“有用”，以及是否真的有用，是根据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是以满足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上的“有用”为标准呢？还是以满足资产阶级暂时的、眼前利益为标准呢？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显然是应该以满足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为标准的，伯恩斯坦主义者却并非如此。

虽然伯恩斯坦主义者，一再强调他们只关注运动，不关注“最终目的”，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而非民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用实用主义的方法阉割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上他们背弃、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上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宣扬通过阶级合作实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诱骗工人群众为谋取暂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为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而奋斗的任务。

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

主义的实质。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 还有人形象地说伯恩斯坦主义是理论上的“折中主义杂碎汤”与实践上“迁就眼前事变”的爬行术。

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的全部修正主义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他的一句话：“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也就是要工人阶级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手段变成目的，用它来取代社会革命。显然修正主义的这一实质同一般机会主义是相同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更加精致的机会主义。

第六节 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

一、造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混乱

伯恩斯坦在1899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修正，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完整阐述，是“改良主义”的宣言书，标志着他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本书“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②。此著作出笼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对一些人的信仰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

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编辑威廉·亨利希·彼务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引申伯恩斯坦的一些理论，并提出：“我讨厌最终目的这个整个概念，因为根本不存在最终目的。因为最终目的达到以后，不言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而喻还会有一大批新的目的。”^①

卢森堡针对伯恩斯坦主义所造成的影响，说道：“在我们党内，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对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的理解已经弄模糊了。”^② 彼乌斯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党内长期受到鼓励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某种突然的崩溃以及社会主义的与此相应的同样突然的胜利的观点最终被埋葬了”^③，彼乌斯认为这是伯恩斯坦的胜利。

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表示了对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担心，他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华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④

考茨基认为，当伯恩斯坦高呼“退回去！”“回到康德去！”“回到蒲鲁东去！”的时候，“他是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谁要是更细心地注意一下，将会发现有时还喊：回到巴师夏去！”^⑤ 党的一些活动家虽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论修养和素质，不知道该如何剖析和反驳。党的许多基层组织更是茫然不知所措而听凭这种思潮到处泛滥，有的人甚至当做“新潮流”来追求。由于伯恩斯坦是打着使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和改进”的旗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了解或了解较少的人都对伯恩斯坦表示支持，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需要的。

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认为，伯恩斯坦的著作不过是资产阶级甚至社会主义者几十年经常说的东西，是这些思想的大杂烩。不过针对那么多人迷恋伯恩斯坦，对伯恩斯坦绝口称赞的做法，他说：“我不责怪他们，因为如果在象社会主义党这样一个伟大的令人生畏的党里，最优秀的党员之一对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17 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26 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306 页。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3 页。

⑤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333 页。

他一直维护的基本观点表示怀疑，并且部分地使用了和敌人所使用的一样的论据，那么，敌人确实有一切理由最热烈地给这样的人喝彩。因此从无政府主义者起一直到汉斯·德尔布吕克和尤利乌斯·沃尔弗都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尤其是布伦坦诺，他竟然声称伯恩斯坦十分出色地证实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①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伯恩斯坦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党员之一，却对自己信奉的理论反戈一击，难怪敌人会对他吹捧至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伯恩斯坦并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主义影响深远，联邦德国前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1979年11月14日在波恩发表纪念哥德斯堡纲领通过20周年的演讲上，还高度评价伯恩斯坦和他那句被批了上百年的“名言”。他明确指出：“在近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讨论中就伯恩斯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从哥德斯堡的角度谈到他，一再把他的称作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伯恩斯坦所作的反对马克思——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雷鸣般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象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②仅就勃兰特把伯恩斯坦尊称为“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一点来看，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社会民主党曾经并且现在还在发挥着影响。

二、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 带来严重危害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揭露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4页。

^② 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学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继承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现了变革社会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伯恩斯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作为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却在恩格斯逝世后，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正。他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否定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否定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空想，资本主义不是即将崩溃，而是越来越适合社会发展等。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在其他各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拉·龚普洛维奇在《伯恩斯坦和社会主义》文章中谈到，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完了伯恩斯坦的著作，并指出“这部著作确实做了我希望做的事情，这就是：一次解放的行动”，他还说，“凡是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且读过伯恩斯坦著作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人，再也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这一次终于完结了”，“尤其是，伯恩斯坦促使崩溃论终于崩溃了，这是这种口头革命的清静无为的不幸理论完全罪有应得的”。^①

国际上，由于深受伯恩斯坦改良思想的影响，当时在法国出现了以米勒兰为首的入阁派（其中米勒兰入阁又被称为“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51、153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取消主义、召回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以及思想领域内的马赫主义、神秘主义等唯心主义流派。

19世纪90年代，经济派、孟什维克的取消派等都深受伯恩斯坦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在俄国占据优势。经济派崇拜伯恩斯坦改良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进行经济斗争，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将党建设成为改良主义政党。列宁曾经明确指出，经济派言论是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列宁揭露了经济派崇拜改良主义和自发性的危害。孟什维克崇拜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自治制”，宣称党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于整体有自治权。列宁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伯恩斯坦主义倾向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体现。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主张放弃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不惜以任何代价求得党的合法存在。取消派从改良主义的观点出发，以不能预计武装起义是否必然取得胜利为借口，主张无产阶级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放弃武装斗争，只进行改良主义的合法斗争。为了换取进行合法斗争的机会，取消派不惜以取消党的纲领、策略与组织为代价，故列宁称其派为“取消派”。取消派在工人队伍中鼓吹的改良主义口号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所希望鼓吹的东西，其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削弱，将无产阶级策略原则和革命目的下降到追求改良的水平。还有些修正主义者不是公开反对党的实践行动，而是用自己的改良主义的价值观对工人阶级进行渗透、影响，用这种隐蔽的手段并企图使工人阶级逐渐脱离阶级斗争的轨道。

在法国，米勒兰入阁后，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白里安、维克安尼相继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实际上是米勒兰事件的继续。在这期间，被选进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改良主义分子，其中有伯恩斯坦、奥艾尔、大卫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已逐渐成为领导党的关键机构，这些人对党的立场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总之，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给各国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带来了严重影响，还表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以后的理论上认可并在实践中执行了改

良主义道路，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施改良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反过来又促使了党内改良主义的进一步盛行。

三、伯恩施坦主义形成后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19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和平发展，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伯恩施坦主义正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又有其发展滋生的土壤，因而它形成后像毒疮一样溃烂和蔓延，并成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动纲领。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及无产阶级叛徒对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无不欢呼雀跃，都起来弹冠相庆。英国的波纳尔在资产阶级的喉舌《经济学家》上宣称，他们同伯恩施坦派再也没有任何的基本分歧了；沙俄的莫斯科警察当局把伯恩施坦那本书推荐给个人作读物；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客反应更为强烈，反动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盟领袖纳务曼在《扶助》第四期，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瓦解》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他在文中说：“我感到高兴，因为伯恩施坦继续在党的内部鼓吹：让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已经过时和已经无效的公式吧！”“过去虚构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致，已经破灭了”。^①并说伯恩施坦的影响“将长期被人感觉到”，他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最前哨”。

伯恩施坦主义受到资产阶级的青睐，并被资产阶级推崇到极致，德国资产阶级的学者尤·沃尔费评论说：“伯恩施坦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是向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宣战’”，是‘打在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拳。’”^②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②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页。

资产阶级认为《前提》的出版，是他们的胜利。德国反动杂志《普鲁士年鉴》发表文章说，伯恩斯坦“所思考的工人运动自身连一个革命主义的原子都不包括在内。他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同马克思和唯物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同”^①。这说明资产阶级已经看得很明白，伯恩斯坦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所思考的工人运动不同于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运动；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等，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是资产阶级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内的理想代理人。伯恩斯坦所主张的这种改良思想，势必影响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影响各国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的贯彻执行。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卡尔·狄尔认为，在《前提》中“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今天认为正确的一系列学说已被驳倒”；伯恩斯坦研究的结果，“只能使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感到满意”。狄尔的结论是，“今后伯恩斯坦无论如何不能再被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了”，“伯恩斯坦是民主的社会改革家，因此他同马克思主义是针锋相对的”。^② 列宁对资产阶级之所以称赞伯恩斯坦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斯坦不仅是因为理论，甚至完全不是因为理论。资产阶级唾弃任何理论。资产阶级称赞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主张另一种策略。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和革命策略不同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搞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就是因为这些伯恩斯坦才受到称赞。资产者称赞伯恩斯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③ 列宁这段话真是道破了伯恩斯坦之所以受到资产阶级吹捧的天机。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②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伯恩斯坦则对资产阶级的吹捧和赞扬甚为得意。他说：“本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式各样的称赞象雪片似的飞来”，“我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了。”^①他为此而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伯恩斯坦承认自己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修正、审查和析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清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和政治倾向的说明”。1936年瑞士的埃雷卡·雷克利的在《修正主义。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修正尝试（1890—1914）》中，认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在已经改变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新”与“现代化”，是“社会改良的社会主义”，“它提供了通过社会改良废除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②

总之，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国际现象。有关伯恩斯坦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世界范围。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当然与德国的伯恩斯坦分子相呼应，国际上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法国有以米勒兰为首的入阁派、阿勒曼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英国有费边主义，俄国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以及后来的孟什维克等。与此相对应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流派的头面人物，如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法国的米勒兰、饶勒斯；美国的龚柏斯；意大利的屠拉第，奥地利的阿德勒、鲍威尔；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等人，他们一起“义愤填膺”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1898年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就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具体实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页。

^② 殷叙彝：《西方的伯恩斯坦主义研究述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2年第3期，第1—2页。

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①。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借此大肆吹嘘逐步“排除”资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甚至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描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伯恩斯坦主义思潮的形成加上米勒兰入阁，这两件事情合并构成了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发展的高峰，第二国际逐渐被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控制，进入了伯恩斯坦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前，伯恩斯坦派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派别，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却仅仅通过了谴责伯恩斯坦主义的决议，否决了伯恩斯坦的六月建议，而没有将伯恩斯坦等人开除出党，甚至在决议中连伯恩斯坦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相反，却听任伯恩斯坦在大会上散布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而不予反驳。伯恩斯坦在1903年9月19日的发言中，极力否认“党内有一个修正主义的党”或“一个图谋反对全党统治的修正主义派别”。他辩解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派，没有搞分裂，而是什么“仅仅为了维护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才“聚集在一起”的。在大会上，伯恩斯坦派的严重危险被掩盖下来了。从此，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越来越得势。这一点，从伯恩斯坦在1909年4月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讲演中得到了反映。

国际共运史上，曾对1908年《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二版）一书为什么要删去“暗示要求开除伯恩斯坦的话”这个问题争论不休。1925年，保尔·弗勒里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卢森堡修订该书的时候，要求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因为从1899年到1908年，这9年中修正主义分子已占据党内许多重要位置，这时候再提出开除的问题，那就成为一桩滑稽可笑的事。^②

“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在社会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小朵乌云，但是1908年出二版的时候，这种危险的乌云已经布满了整个天空。”^③这些都说明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② 参看《卢森堡文集》1925年德文版，第35页注释。

^③ 转引自罗兰·霍尔斯特：《卢森堡传》1937年苏黎世德文版，第60页。

了伯恩斯坦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伯恩斯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人们把这种发动只是看作德国党内少数人的事，那么到二十世纪初期，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已开始从德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了。”^①

总之，由于伯恩斯坦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的迅速蔓延，严重地侵蚀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基础，扼制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伯恩斯坦主义在受到资产阶级欢迎的同时，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帕尔乌斯、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以及远在流放地的列宁都纷纷发表文章，抨击伯恩斯坦主义。

^① 《国际共运史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页。

第二章 列宁、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

如前所述，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晚年的恩格斯根据当时所发生的变化，发现各个工人政党有可能通过包括民主、议会斗争在内的和平方式取得国家权力，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向工人国家的方向演进。恩格斯的判断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社会矛盾比较缓和、资产阶级民主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取得一定成果的欧洲社会是相一致的。

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些领导者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教条地照搬恩格斯晚年的判断，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存在错误，需要修正。在理论上，他们用恩格斯晚年的具体判断的一些碎片和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情况去批判、清算、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从而制造出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根据自己对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使整个社会的生活具有了“另一种性质”，“或者人们愿意的话”，它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的思想。^①正是基于以上判断，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主张完全放弃社会革命，走和平改良的道路；在理论上则主张用新康德主义代

^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替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当时的左派理论家如列宁、卢森堡等，也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理论家一样，较早地觉察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化。但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这种变化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化并不具有“根本意义”。因为，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范围内的变化，而不是与社会主义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据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而不能完全依赖社会改良；因而，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需做任何改变。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同样也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出现的各种变化。但是，中派对这种变化的判断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调整与前两派有所不同，与此相应，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出场路径上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大致说来，考茨基走的是一条折中主义路线。

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以列宁和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

第一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判的实践过程

伯恩斯坦主义产生后，他的著作立即被沙皇当局指定为“工人读物”，伯恩斯坦也因此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就这一点而言，伯恩斯坦自己也不讳言。因而，伯恩斯坦主义作为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被称为嘴角沾着马克思主义的辣椒末的教条化的改良主义。列宁把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这一斗争同批判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研究俄国的社会矛盾、解决俄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

一、列宁寻求伯恩斯坦名著的过程及对其著作的批判

1899年1月，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这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露面，立即引起了各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欢呼，同时，也激起了革命者的愤怒。俄国的机会主义者支持伯恩斯坦主义，说什么从《共产党宣言》到伯恩斯坦主义“是一种最合逻辑的发展”，“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伯恩斯坦主义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巨浪的时候，列宁却被沙皇统治者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偏僻的地方。伯恩斯坦发表专著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消息，只是在几个月以后，才传到了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所。列宁在获知此消息后，一方面，是出于革命的义愤和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及时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情况，迫切要求看到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为此，他不辞劳苦地向亲属和同志，写了一封又一封的催要信，希望他们千方百计地帮他弄到这本反面教材，以便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挑战和批驳。在讨要著作的同时，他又尽量搜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法兰克福报》以及左派的《萨克逊工人报》等报纸了解关于此方面的信息。

这时候，列宁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伯恩斯坦主义和本国以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吹捧伯恩斯坦的方式，利用伯恩斯坦主义为自己辩护的，也更加加剧了列宁看到伯恩斯坦这本著作的迫切心情。

1899年4月27日，列宁给波特列索夫写信，信中写道：“我觉得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迷恋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这股‘新的批评的潮流’……极为可疑，因为‘批判’、‘教条’等等高调根本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批判效果。”^①列宁斥责了布尔加柯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妄行为”，讽刺他带着“科学”总则“毋得违拗的口吻”来重复伯恩斯坦的理论。列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宁这时已经看到了普列汉诺夫给考茨基的公开信，很赞成普列汉诺夫关于埋葬伯恩斯坦主义的这个提法。列宁认为伯恩斯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等方面的反驳“是极其软弱无力的”，“如果彼·伯“(司徒卢威——引者)真是这样一位热心的伯恩斯坦的辩护人，为了他几乎要‘骂街’了，这就太可悲了”。^①

1899年5月1日，列宁给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继续写道：“但是布尔加柯夫的文章令人愤慨。他公然歪曲考茨基的话，再加上还有这种跟伯恩斯坦的‘批评’遥相呼应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狂妄言论书店拒绝寄送伯恩斯坦的这本书。我向玛尼亚莎要过，不知她能不能带来。你能弄到一本吗？”^②

1899年5月9日，列宁给阿纽塔写的信中说：“目前在德国对于伯恩斯坦的书的争论是颇有意思的，可是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也没有看到任何论述它的文章。”列宁这时深感国外报刊的缺乏，特别是德国的报刊比较缺乏。他只能从一份《法兰克福报》上读到几篇短评。列宁对此感到“非常遗憾”。^③

1899年6月20日，列宁给他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德·伊·乌里扬诺夫写信，在信中，谈到，他在1899年《科学评论》第五期上，读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的修正主义文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抽象理论的基本错误》。从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反动和没落，也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的联系。他说：“我现在愈来愈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新的‘批评的潮流’和新康德主义（把社会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分开的思想就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个产物。”^④列宁感到愤慨的是，伯恩斯坦一伙贩卖新康德主义的行径，竟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③ 《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④ 《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1899年8月22日，列宁以他和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名义给玛·伊·乌里扬诺娃写信，信中说：“玛尼亚莎：从信中知道你终于为我弄到了我迫不及待地盼望得到的伯恩斯坦的著作，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已经收到雅库特卡的来信，他们正在阅读伯恩斯坦的书，可是我这里还没有弄到！！这个人愈被人吹得厉害，愈被形形色色愚蠢的资产者和非资产者的‘青年派，（从各个意义上来说）利用，那就愈有必要尽快地认识这位‘最时髦的’机会主义英雄。”^①列宁得悉10月9日在汉诺威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将讨论伯恩斯坦问题，因此他在信中希望得到大会的报告，并且建议给国外的朋友写信，以便找到刊登大会报告的报纸。

1899年8月31日，列宁在收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后，立即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加以批阅。列宁把他批阅的情况和初步的看法，写信告诉了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的意见主要有四点：

一是，从理论上讲，水平极差，一直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但连认真进行独立批评的尝试都没有。

二是，从实践上看，完全是机会主义，是费边主义，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

三是，从前途看，伯恩斯坦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

四是，令列宁感到气愤的是《前提》的三处地方谈到关于有许多俄国支持者的问题。列宁对一些俄国人支持伯恩斯坦和抄袭伯恩斯坦的“新理论”感到非常气愤。他把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同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解决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列宁认为，对于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义不容辞地进行批判，这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尽的责任。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斗争，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它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在1899年8月底到9月初，列宁在第一次批阅《前提》期间，写了

^① 《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文中，他把伯恩斯坦主义称为“臭名远扬的伯恩斯坦主义”。抗议书解释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含义，并说伯恩斯坦主义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①。列宁由此提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必须把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和批判俄国的修正主义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895年到1902年期间，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就是通过与批判俄国经济派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伯恩斯坦主义作为国际性的思潮，在俄国也有它的代表和表现。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取消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俄国形式或变种”^②。列宁反对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斗争，是第二国际范围内反对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下面重点介绍列宁反对他们的斗争。

二、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 ——“经济主义”的斗争

（一）列宁反对俄国机会主义的几个阶段

列宁在1914年5月发表的《图快出丑》一文中，回顾了反对俄国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列宁把1895年到1914年的俄国机会主义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1895年至1902年，机会主义表现为“经济主义”。在1899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侈谈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只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而已，并指出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臭名远扬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含义“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①在《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了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他分析了机会主义在各国表现的特点，批判了伯恩斯坦一些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米勒兰主义的实质，即实践中的伯恩斯坦主义。^②

1903年至1908年，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表现为“孟什维主义”在此期间，列宁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同批判俄国孟什维克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1904年2月至5月所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揭露了机会主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的特征，批判了伯恩斯坦“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在1905年6月至7月，俄国革命的高潮中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认为伯恩斯坦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投降主义策略是一脉相承的。

1908年至1914年，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表现为“取消主义”。在此期间，列宁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同批判马赫主义及俄国取消派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对“跪着造反”^③的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即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在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10年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和《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4年的《图快出丑》等论著中，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作了科学的总结。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列宁首次把伯恩斯坦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并且把伯恩斯坦主义概括为“来自右面的修正主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义”，把革命工团主义等概括为“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并指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列宁还对伯恩斯坦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等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以及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社会基础、反动实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意义和前途等，都作了分析。列宁除了在上述一系列书信和论著中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分析批判以外，还于1904年8月派遣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带去他亲自起草的关于俄国党内斗争的说明材料，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支持孟什维克、攻击布尔什维克搞“分裂”的错误态度。

列宁强调指出，“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取消主义”“正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俄国形式或变种”^①。针对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列宁领导俄国的革命者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列宁驳斥经济派的《信条》宣言，批驳经济派的错误言行

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由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并且受国际伯恩斯坦思潮影响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是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

经济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地把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自发性和自觉性、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对立起来。他们否认革命理论，崇拜自发性，不了解革命斗争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辩证法；否认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维护组织上的涣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与此同时，他们还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以单纯追求工人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只进行经济斗争，至于政治斗争则应让自由资产阶级去作，这就使无产阶级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属品。他们还以“批评自由”为旗帜，篡改马克思主义。因而，经济主义思潮很快同伯恩斯坦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修正主义思潮合流在一起，严重地阻碍着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经济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马尔丁诺夫等人，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无视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无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无视政治斗争的重大意义。

他们趁列宁被捕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混乱之际，不但在1897年彼得堡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在国外出版了由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主编的《工人事业》杂志，而且还于1899年发表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信条》，比较系统地宣扬经济主义的主张。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更系统的、有影响的哲学著作和哲学理论。但是，透过《信条》以及他们所表述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宣扬了一系列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这表现在，首先，他们割裂经济同政治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贬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作用。其次，他们在其纲领《信条》中，歪曲西欧的工人运动，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西欧的熟练工人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这种情形比较容易进行政治斗争，而进行经济斗争则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①这种依靠政治组织进行的政治活动的路线，是“阻力最小的路线”，“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②后来，由于政治活动搞得过于紧张，活动者的精力耗尽，议会活动软弱无力，愚昧的工厂无产阶级群众走上舞台，因此马克思主义便发生了危机，伯恩斯坦主义便应运而生。《信条》的作者据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③那种固执己见，否定一切，过分死板地划分社会阶级的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宗派主义小团体的任务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和夺取政权的意图，将被改良现代社会、保护劳动阶级权利的“政治”所代替。《信条》鼓吹俄国工人运动应当实行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这条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因为俄国工人力量薄弱、所受政治压迫沉重，无法同这种压迫作斗争，运动还处于原始状态之中，不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因此，只能进行经济斗争，尽管很困难，但终究还是可行的。^①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抗议书》中，引用《信条》的原话，并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0年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的《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因为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

《信条》声称，从西方照搬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践方面是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有害的，因此应当“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①《信条》号召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抛弃“高谈政治的空话”，不要“信守阶级公式而不能积极地参加实际生活”，应该把精力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同非工人阶层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携手合作”。经济派依据上述“阻力最小的路线”，从庸俗唯物主义出发，把工人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看做是高于其他一切斗争的形式，他们给俄国工人运动提出了一个座右铭：“为改善经济状态而斗争。”怎样改善工人的经济状态呢？他们提出成立罢工储金会等组织，说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增加工资的斗争比任何政治理想和目标更重要，“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②，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在他们看来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重复西欧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人们因经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煞了运动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在进行斗争时，只要想到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就够了，不应想到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和将来的社会主义。

经济派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为其经济主义路线辩护。《工人事业》杂志宣称：“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经济主义者还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③，“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④，经济斗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6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 页。

争是提高工人群众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手段。

对于经济派的这种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言行，列宁给予了坚决的驳斥。

首先，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马克思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也不要对经济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好像布朗基主义那样的密谋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的无政府主义或者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社会主义等。其次，列宁还指出，《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

列宁详细分析了经济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国内、国际条件及根源，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思想，并指出经济主义一方面受伯恩斯坦主义的国际性思潮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等人的思想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济派”千方百计地计划着把伯恩斯坦主义的“时髦的”观念，输入到俄国的工人运动中去。列宁在1899年写道，《工人思想报》的社会主义“这简直是伯恩斯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①。

列宁重点强调指出，毫无疑问，经济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而俄国人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又是德国人的回声。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准确无误地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之间争论的实质。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列宁强调，看待俄国的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应该从国际范围内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来看，这足以说明列宁对这场斗争的重视以及这场争论对俄国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这样做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将被以后事态的发展所完全证明。

面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列宁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他在从西伯利亚流放所发出的信中，就曾着重指出，由于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修正主义者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明确地指出：“坚决捍卫‘旧思潮’（马克思主义——引者）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① 针对经济派头目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所发表的《信条》宣言，列宁在流放地看到信条后，联合 17 名社会民主党人，向经济派发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书中他驳斥了经济派的观点。在《信条》中，经济派头目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声称要用“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在这里要推倒马克思主义旗帜，举起修正主义旗帜，从而达到改旗易帜，跟随伯恩斯坦的目的。

列宁毫不客气地批判伯恩斯坦及其俄国同伙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他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保卫它、实现它、继续发展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③。列宁批驳经济派的《信条》对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经济主义纲领，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信条》所表述的经济主义思想体系作坚决的斗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原理，强调“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④。列宁指出，经济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8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8 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8 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 页。

派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企图使俄国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列宁阐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俄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流传，得到各地真正革命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列宁对经济派《信条》的批判，不仅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派，也打击了西欧的伯恩斯坦主义，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团结起来同经济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但经济派并没有接受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正批评，一再在他们把持的《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上宣扬机会主义观点，继续附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

列宁一边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一边批判了伯恩斯坦及俄国同伙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列宁质问那些纠集在伯恩斯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究竟有些什么“新的贡献”？实质上，他们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向反动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让步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斯坦主义”^①。

1899年8月22日，列宁在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严肃指责形形色色愚蠢的资产者和非资产者的“青年派”对伯恩斯坦《前提》的吹捧和利用，认为很有必要尽快地认识认识。列宁揭露经济派说，他们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却非常重视。这表现在《前提》在很短时间就被翻译成三种俄文译本出版。他们在《工人事业报》上，极力模仿伯恩斯坦，要人们去注意修正主义的“实际运动”，而不必去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把经济派这种模仿称为奴隶式的模仿，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是猴子式的模仿。列宁宣布“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①

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俄国，老民意党人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的旗帜不是革命的理论。早期的民粹派也是如此。只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革命者才在痛苦的摸索中找到了真正革命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是各国的革命者在解决本国革命实际问题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使革命有明确的目的，才能使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从胜利走向胜利。列宁着重指出：“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② 列宁在这里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但有力地揭露了伯恩斯坦及其俄国同伙妄图砍倒马克思主义旗帜、兜售其修正主义公式的阴谋，而且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列宁指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基本原理应用到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1899年，列宁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国。”^①列宁的这段论述客观地说明了任何科学的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同时也说明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过程中，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他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决批判伯恩斯坦主义。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经济主义者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无视先进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否定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崇拜自发性和轻视革命理论是经济派的一个根本错误。他们不了解把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的意义，割裂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辩证关系，夸大自发性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只限于跟在自发工人运动的后面，简单地记述自发的工人斗争。他们攻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轻视发展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他们完全否认社会民主党向无产阶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是自发工人运动的产物，并不是革命知识分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自觉进行理论创造的结果；自发的工人运动不但不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充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俘虏，反而会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根本否定先进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否定革命理论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否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另外，经济主义者反对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领袖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经济派不仅推崇政治活动的自发性，而且还推崇组织工作的自发性。他们反对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说什么“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做研究的工具，而是当做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②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经济派安于组织涣散状态，热衷于工作规模狭小的手工业方式，极力反对建立集中的、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并污蔑这种组织违背“民主原则”等等。经济派把职业革命家同群众对立起来，说什么群众“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旦扶持力量离开了或被反动当局破获了，工人运动就会停顿下来。他们认为，为了避免这种状态，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根本不需要秘密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经济主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初期产生的，它对于在俄国建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个很大的障碍。

在伯恩斯坦主义大肆泛滥的严重情况下，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和高举什么旗帜这个问题紧密相联系的。举什么样的旗帜和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这两个问题，是列宁同经济派斗争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的纲领》、《怎么办？》等文章和著作。还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谬论。列宁反对经济派的这些文章和著作，是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思想和政治领导，而当时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由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和平”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抱着种种幻想，迷信议会制度，鼓吹改良，成了议会党团或工会的附属品。因而，这些党根本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揭露伯恩斯坦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势以后，就毫不掩饰地宣布：“请看看实际情形吧，鼓起勇气说出实际情形吧——我们在德国都在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①因而，在俄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情况就更为特殊和迫切。1895年，列宁领导俄国工人在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1898年，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当时仍被沙皇政府流放在西伯利亚没参加这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次会议。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俄国西部地区工人组织的九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党章，也不具有广泛性，只有9名代表，而且当时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会后立即被捕。这也就造成各地方组织仍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领导。因此，这次大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俄国的工人政党。

经济派控制着工人运动，鼓吹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帮派作风和手工业式的组织形式，极力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们在《信条》中叫嚷：“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①显然，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而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同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划清界限。

在西伯利亚流放所里，列宁考虑到伯恩斯坦主义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的严重危害，认为当前当务之急的大事就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抵制伯恩斯坦主义腐蚀的党组织，而要在俄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关键在于办起一个能够既发挥宣传群众、又能组织群众的党报。1900年12月，《火星报》在德国的莱比锡秘密出版了，列宁多年来的建党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列宁在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一开始就严肃地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这表现在：一方面是工人运动方兴未艾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由于革命组织的分散状况不符合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要求，因而造成了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人们思想动摇的情况，表现在“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伯恩斯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②。这就成为运动的阻力，严重地阻碍着革命运动，把建立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助长了宗派习气和无政府状态的蔓延。正因为如此，“伯恩斯坦……才能历数自己的成就，才能在书刊上扬言在俄国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是他的信徒而不受驳斥”^①。为了根除这种思想混乱与组织上涣散的恶性循环，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而首先是在思想上采取有力措施。列宁认为，要做到巩固的思想上的统一，必须“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华·伯恩斯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②。只有从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业”^③。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后，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902年发表了《怎么办？》一书，在书中他不但彻底地、系统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而且详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建立新型政党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古代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世界翻转过来。”列宁把这句名言改动了几个字，“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④。列宁所说的这个革命家组织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有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广大群众有联系的党，就能够改变俄国的面貌。这句话说明列宁是何等地重视党的工作。如果我们联系伯恩斯坦在《前提》中“给我普遍的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的改动，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虽然伯恩斯坦和列宁的改动差别较小，仅仅是几字之差，却表现了意义上的天渊之别。伯恩斯坦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成改良党，他热衷的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支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普选权”。列宁决心建立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新型革命党，认为这是把资本主义旧世界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支点”。列宁的改动，实际上是对伯恩斯坦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修正主义“自发论”的有力批判。

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地指出,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个要害就是企图把主张社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一大套骗人的论据和理由,都公然为这个目的辩护。经济派为了同一目的,也制造了种种论据和理由,来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党。他们说,工人阶级只应该关心经济斗争而不要干预政治,工人的党不必组织领导工人从事政治斗争。列宁批驳了这种说法,认为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只局限于经济斗争,就无异于政治上自杀。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反对经济斗争,但是它知道: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斗争中组织和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坚决反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经济派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发性的产物,因而工人政党不需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批驳了这种说法,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产生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阶级,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理论只有同革命的运动相结合,才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经济派还用“统一”的口号来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党。列宁揭穿了这个阴谋,坚定地宣布:在统一以前,并且是为了统一,我们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总之,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的实际情况,把经济派的修正主义驳得体无完肤。

列宁这部著作不但批判了国际上和俄国修正主义在建党问题上的谬论,而且也揭穿了他们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骗局。列宁指出,这种修正主义的“批评自由”存在于第二国际各党之中,经过经济派的宣传,把它引进到俄国,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列宁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反对经济派斗争的艰巨性:“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① 列宁还根据历史向俄国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任务，预言在摧毁沙皇俄国这个欧亚两洲反动堡垒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将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列宁在为建立新型政党的过程中，把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同俄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毫不妥协地批判了伯恩斯坦及其在俄国的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1900年12月至1903年11月期间的《火星报》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人们领会革命真理。因而，它受到了革命者的热烈欢迎，但却为伯恩斯坦之流所深恶痛绝。

《火星报》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且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纲草案。这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7月召开。它结束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创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

三、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及其俄国形式 ——孟什维主义的斗争

列宁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活动，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后移到伦敦，在大会通过了党纲。但是，在讨论党章时出现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最后拥护列宁观点的人占多数，称布尔什维克，反对者占少数，称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不仅在思想政治路线方面，而且在组织方面都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它同经济派相比，是后来居上的。孟什维主义就是变相的伯恩斯坦主义。二大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进入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新变种（孟什维主义）的斗争阶段。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1903年到1908年这一阶段，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斗争集中在建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焦点进行的。如同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一样，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也是同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列宁要建立的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工人政党，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所要建立的是伯恩斯坦主义的改良党。这就决定了在组织问题上以及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原则分歧。在党章草案第一条，列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且明确写上：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列宁认为，只有用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政治上、思想上统一和行动上统一的党，才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马尔托夫等人则主张：凡是罢工者或党的同情者只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都可以自行宣布为党员，而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与此同时，马尔托夫还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反对民主集中制，赞美个性的自由发展，攻击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农奴制”。他的理由是：第二国际各国党是完美无缺的榜样，而这些党都是自治制，都没有要求党员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的表现，其目的在于把党变成一个成分复杂、不定形的、崇尚空谈、组织涣散、毫无战斗力的俱乐部，从而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丧失领导作用。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按马尔托夫的意见建党，那无疑是要建立一个涣散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党。他说，他肯宁让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有机会做一个党员。在1905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党章草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建党问题上对修正主义的又一次胜利。

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标志着列宁主义政党的诞生，孟什维主义遭到了惨败。由于创立了这样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它同西欧各国修正主义党相对立，因而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为了进一步批判孟什维克的修正主义路线，规定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列宁在1904年写了《进一

步，退两步》这部重要著作。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列宁强调说，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纲领。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破坏党、分裂党的行径，着重指出：不许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和分裂党的宗派集团存在。列宁在这部书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修正主义政党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它不仅为刚成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拨开了笼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迷雾。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暴，使孟什维克主义这个俄国伯恩斯坦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孟什维克提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应当支持资产阶级，不能用任何行动吓退资产阶级。这是一条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甘心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投降主义路线。当然，这并不是孟什维克自己的创造，而是伯恩斯坦主义的翻版。伯恩斯坦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反对工农联盟，反对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反对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在他看来，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革命以后要经过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到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占绝大多数以后，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只不过是把这些理论搬到了俄国而已。

为了揭露和批判孟什维克的投降主义路线，列宁在1905年6、7月间，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这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列宁在这部书中，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中心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在这本著作中，列宁以伯恩斯坦为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从而深刻地分析了俄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

质和意义。列宁指出，伯恩斯坦要求公开承认现存东西的合理性，因而就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策略。伯恩斯坦的这些言论，是孟什维克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孟什维克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移植到俄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列宁在反对俄国国内的修正主义时，密切关注着国际范围内的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在建党思想、组织原则以及革命策略方面的原则分歧，党内分裂为两大派。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不择手段地污蔑、攻击布尔什维克派，费尽心机地支持孟什维克派。1904年，列宁亲自起草了俄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明材料，并派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8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在说明材料中，申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揭露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一贯支持孟什维克的反动立场。列宁的声明对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攻击布尔什维克搞“分裂活动”的谣言，是一个有力的回击，使广大党员知道了真实情况。1905年2月和6月，第二国际执行局两次作出决定，成立仲裁委员会，强迫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布尔什维克放弃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弃革命路线，“统一”于孟什维克。

列宁坚决抵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俄国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反对修正主义的纪律，否定国际执行局的决定，保持了党的独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严正立场。

四、列宁通过反对取消主义，对伯恩斯坦主义展开了全面批判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1907年，出身于俄国贵族的斯托雷平策划并发动了“六三政变”，他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

当时的俄国处于斯托雷平反动的白色恐怖时期，孟什维克派对此悲观失望，他们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妄图把党的秘密组织取消。孟

什维克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宣称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专制制度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民主革命的任务可以由沙皇政府来完成。他们主张放弃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不惜以任何代价求得党的合法存在，因而，这样孟什维克派就变为取消派，孟什维主义就为取消主义所代替。取消派在工人运动内部推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列宁称取消派是“斯托雷平工党”。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出现了暗藏的取消派分子。他们大多是被1905年革命风暴卷入布尔什维克党里来的。革命失败后，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政治上以“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派别——召回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过去，再也不会新的民主革命。他们无视革命转入低潮的客观形势，还在重复革命高潮时期的口号，要求召回党在杜马中的代表，主张停止党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团体中的工作，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妄图取消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事实上取消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取消革命，因而是变相的取消派。这些人在思想上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贩卖马赫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进攻。召回派的活动同样威胁着党的存在，党一旦放弃合法斗争的机会，必然变成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起的领导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列宁称召回主义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和公开的取消派勾结在一起，和反动的宗教学派相呼应，鼓吹建立“社会主义”宗教。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比公开的取消派要危险得多。

取消主义思潮不单单是俄国一国的现象，也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走向全面反动的表现。这股思潮的出现，同各国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伯恩斯坦主义的泛滥和第二国际的蜕变等原因直接相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伯恩斯坦主义借助新康德主义推行其路线。进入20世纪以后，马赫主义取代了新康德主义，又成为修正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武器。伯恩斯坦主办的《社会主义月刊》大量刊登马赫主义者的文章，大

肆宣扬马赫主义哲学。俄国的取消派、召回派以及西欧的伯恩斯坦派等修正主义派别，则同马赫主义结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阿德勒和鲍威尔，把马赫主义的反动唯心论奉为至宝。他们把这个主观唯心主义作为“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向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

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力挽狂澜。他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的艰苦年代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有秩序的革命退却，坚决顶住了取消派、召回派和伯恩斯坦派及其他反动势力的进攻。

在这些年代里，列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与修正主义》等论著。其中，1908年4月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是列宁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写的一篇讨伐伯恩斯坦主义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是列宁对10年来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全面总结，列宁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回顾了从1898年以来10年中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历史，总结了斗争的成果。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列宁第一次把伯恩斯坦主义称为“修正主义”，从而给伯恩斯坦的思想体系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从此，人们对伯恩斯坦代表的思潮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列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地揭露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深入分析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特点、反动实质及其在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的表现，论述了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认为它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实质。列宁深刻地指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使这场斗争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和更加尖锐的程度。列宁满怀着革命的激情预言：“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

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取消派、召回派、伯恩斯坦派等流派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批判了修正主义“超党派”、“超阶级”的谎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这个论断说明了，世界是运动的、有客观规律的、不依人们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列宁关于认识论的深刻论述，有力地打击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列宁的指引下，这场反对取消派、召回派的斗争取得了胜利。1909年，布尔什维克党把召回派从党内清除出去，消除了一大隐患。191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和取消派也被清除出党。在此期间，曾经是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托洛茨基曾经收取取消派、召回派及其他反动分子拼凑了反党的“八月联盟”，试图挽回败局。但是这些乌七八糟的残渣余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击下迅速土崩瓦解。眼见失败不可挽回，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前进派”见风使舵，不再“前进”，宣布退出“八月联盟”。失败后的取消派，又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乞援，希望他们出面干涉。这个阴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决抵制下遭到破产。此后，孟什维克内部分化加剧，许多被他们打扮的工人组织也摆脱了修正主义的影响而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了修正主义，在组织上也巩固起来，成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为彻底埋藏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取得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准备了条件。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五、列宁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

（一）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

1907年8月，第二国际在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列宁率领俄国党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代表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第一次就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殖民地问题、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等，同伯恩斯坦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非常多，有五大洲的25个国家的代表，共886人，其中右派和中派占大多数。德国党的代表团成员达289人之多。著名的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福尔马尔、休特古姆、列金、谢德曼等，都是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工会官僚占代表团成员一半以上。就是在俄国党的代表团中，还有普列汉诺夫这些俄国孟什维克的代表，也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托洛茨基。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列宁敢于反修正主义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团结了各国党内为数不多的革命左派，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军国主义问题。当时，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欧洲正面临着由于摩洛哥和巴尔干的冲突而卷起的新战争的满天乌云。在大会前夕，德、奥、匈和英、法、俄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疯狂扩军备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以空前的速度急剧地增长着。如何制止军国主义？如何对待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要求代表大会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本来想采取随便应付的态度，像过去一样敷衍一番。但是，由于列宁的直接参加，有列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的指引，在关于“制止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委员会”这个问题上，终于使大会把它作为重要议题并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决议。

关于“制止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委员会”这个问题，一共提了四个

决议草案。第一个是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出的“保卫任何遭受进攻国家”的草案。由于他们把战争错误地分成“进攻”与“防御”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因而被大会否决。第二个是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只提出了一般的关于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没有提出切实具体制止战争的措施，因而，也没有通过。第三个决议草案是法国党内半无政府主义分子爱尔威提出的，他借口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提出要以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这个提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没有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没有把反对军国主义宣传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作联系起来，他提出这样的口号，说明了他不懂得采取什么手段，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事先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因此也被否决了。第四个决议草案是倍倍尔提出来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根源，正确估计了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个草案仍然没有提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什么；也没有提出制止军国主义的具体措施。由于倍倍尔在战争根源上坚持了正确观点，同时，由于他是代表德国党提出的，因而，比法国两派提出的草案更有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列宁决定对这个草案进行修改和补充，作为正式文件向大会提出。

在讨论这四个草案过程中，伯恩斯坦的同伙福尔马尔几次出来反对。他从右的方面大肆攻击爱尔威的草案，警告法国党注意爱尔威的反军国主义倾向，并指出“这种反军国主义是令人担心的”，并表示他要永远反对罢工和起义。列宁在谈到福尔马尔的发言时指出：“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他大骂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承认，尽管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其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① 爱尔威的草案是错误的，他不懂战争的根源，却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一举结束战争，他用“左”的煽动性词句鼓动无产阶级，实质上在如何对待战争问题上没有交给无产阶级任何东西。列宁正是从这些方面批判了爱尔威的错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误，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要用积极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至于用什么斗争形式，应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福尔马尔完全是用修正主义的立场反对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草案，他从根本上保护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并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害怕罢工和起义这些革命斗争触动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列宁指出他“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是一群“议会迷”，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在他和爱尔威之间重新进行选择。

在讨论倍倍尔的草案时，福尔马尔表演得更充分。革命左派反对决议草案简单重复1893年苏黎世大会的决议，因为那个决议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反对军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口号。福尔马尔对此竟然“表示遗憾”。他声明：“对于人类的任何的爱都不能妨碍我们做一个优秀的德国人。”谈到反军国主义时，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影响”政府和社会舆论以此来防止军事冲突。右派代表对他的发言热烈喝彩。福尔马尔对倍倍尔的草案作了完全机会主义的解释，他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危险性方面，一直向后退，退到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程度，退到社会沙文主义的程度。列宁批评倍倍尔的草案时说过，人们有可能戴上机会主义的眼镜来阅读倍倍尔的正统条文。福尔马尔把这种可能性在大会上变成了现实性，他正是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墨色眼镜来阅读、解释这些条文的。

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倍倍尔的草案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它成为一个正确的决议。为此，列宁做了大量工作。他同德国党的左派卢森堡等人交换了意见，取得一致的看法。在修改稿最后审定以前，列宁同倍倍尔进行了长时间商谈，取得了倍倍尔的同意。经过同法律专家研究措辞之后，形成了新的决议案。

经过列宁修改过的决议案，与倍倍尔的草案有着根本的区别。决议案删去了倍倍尔关于进攻战与防御战的划分，提出了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倍倍尔关于“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偏见”促使战争的发生的说法被抛弃了，而代之以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

条文。决议案号召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使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不受反动派利用。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删去了倍倍尔的“迅速结束战争”的提法，号召各国的无产阶级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同时，决议草案提出，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

列宁后来总结说：“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可以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的决议案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决议案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道理，以教训那些为了反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相对和平与平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①伯恩斯坦主义被驳倒了，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也被驳倒了。

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是一个革命的决议，它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号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准备采用最革命的手段，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通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失败。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二个重要议题是关于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更为尖锐。同时，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作为掠夺和暴力的政策加以坚决谴责的。但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修正主义者占了多数，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荷兰的万·科尔，他是工人贵族的头目、伯恩斯坦的死党、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这个万·科尔却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垄断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权。在这次大会上仍然是由他来主持殖民地委员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会议上宣扬“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公开为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辩护，不主张摧毁殖民制度，而是主张改良殖民政策。他的决议草案是地地道道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草案中，他公然提出了“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论点。

列宁愤怒地批判了这个伯恩斯坦的反动谬论，严厉斥责了他们美化殖民政策的帝国主义论调。列宁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①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的唯一立场就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② 列宁后来回顾这一斗争时认为，“修正主义者早就在宣扬殖民政策进步，能传播资本主义，因此‘揭露它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就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特性’，资本就像‘没有双手’一样”^③。在列宁的领导下，德国、波兰等革命左派联合起来，批判了伯恩斯坦和万·科尔一伙修正主义者，提出修改的决议草案。伯恩斯坦曾经妄图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压服德国左派，不许他们同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联合。当这个阴谋失败后，他又污蔑德国左派“叛变”，理由是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批判了他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德国左派在列宁的支持下，坚决地顶住了伯恩斯坦的反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也纷纷起来驳斥伯恩斯坦一伙。一位美国代表说，“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印度代表卡马说，英帝国主义给印度留下的“文明”是饥饿、死亡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在各国革命者的支持下，列宁的修正草案被大会通过。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了修正主义路线。

列宁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指出，伯恩斯坦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进一步暴露了自己，这种暴露说明了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列宁从物质经济基础上说明修正主义者在对待殖民地问题的政治态度，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修正主义拥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原因。如果说，这班工人贵族在国内还极力掩盖他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们同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那么，一到殖民地问题上，他们分享超额利润的面目便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了。这正像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谈到印度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本国还以道貌岸然的文明的基督教徒自居，但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最容易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

伯恩斯坦及其同伙不甘心失败，在大会上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甚至无赖地说，否定他们的论点也没有什么用，否定者并不了解“改良”的意义，等等。大会以后，他们又鼓吹帝国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和平”与殖民政策的“进步”。列宁在其1913年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写道：“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①列宁用亚洲革命风暴的现实，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的谬论，深刻地论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列宁这个论断，沉重地打击了向来自命为世界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及其修正主义者。列宁说，有了欧洲和亚洲的革命经验，打着“非阶级的社会主义”旗号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中国的东北虎一样供人观赏。

斯图加特大会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工会这个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关系也就随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07年，在欧美无产阶级队伍中，已有将近九百万人参加职工会，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英国和德国，都拥有一百八十万多会员。无产阶级通过工会组织进行了经济和政治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斗争提出加强对工会的领导，把工会变成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联系群众的纽带。但是，无论在西欧、北美，还是在俄国，修正主义者都在散布“工会中立论”，妄图使工会摆脱党的领导。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4页。

在列宁领导下，1907年5月的俄国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必须领导工会的决议。这是对孟什维克的巨大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孟什维克，向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派出了他们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准备借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推翻俄国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正确决议案。斗争是很激烈的。特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个不坚定的分子，在工会问题上他耍了两面派手法。列宁虽然给他做了许多工作，要他在委员会上坚持党的五大决议精神，捍卫党必须领导工会的立场，并批评了他的工团主义倾向。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面前满口答应，坚决保证照列宁的指示办事，但在内心里暗自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根本不同意党的五大决议。

在委员会上，一共提出了八个决议草案，几乎都是程度不同地带有“工会中立论”的倾向。但是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大多数都不敢公开提出“工会中立论”。当时，布尔什维克有1905年俄国革命中领导工会的实际经验，党的五大决议彻底摒弃了“中立”原则，提出了工会的党性原则，因而是最有权威的。但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过错，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草案甚至没有在大会上提出。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在各个主要问题上都遭到失败。正如列宁所估计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加坚定地确定了这条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①

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起，就已经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时各国党内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也迅速成长起来。1910年8月，列宁率领俄国党代表团第二次参加了第二国际哥本哈根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占优势。列宁在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革命左派会议，把革命左派团结在自己周围，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基本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议。在反对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军国主义和防止战争危险方面，大会的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论点。此外，补充了要求各国政府裁减军备和全面裁军，由仲裁法庭调停国与国冲突，建议各国党组织一致行动来抗议战争威胁。

（二）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列宁率领俄国党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大会在合作社问题上斗争特别尖锐。这是斯图加特大会上关于党同工会关系问题上斗争的继续。

在大会开幕前就公布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三个决议草案，一个是比利时草案；一个是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草案，饶勒斯派草案；一个是法国以盖得代表的社会党少数派草案。盖得和比利时的草案坚持阶级斗争原则，认为合作社是阶级斗争中的辅助手段；而饶勒斯则抹杀阶级斗争，把合作社的作用夸大化，认为它可以看做是和平“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两个草案反映了两条路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一个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

列宁支持比利时和法国社会党盖得的少数派草案，坚决反对法国饶勒斯的多数派草案。但为了争取大会做出最正确的决议，他还亲自拟定了俄国党的决议草案，即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列宁在草案中对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他认为，首先，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可以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减少各种商业中介人的剥削。其次，这种合作社由于可以在工人罢工、同盟歇业和政治迫害时期，从经济上支持工人群众，因此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合作社就不能显著地改善工人生活。另外，虽然合作社可能造成错觉，以为不进行阶级斗争和剥夺资产阶级，通过它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合作社不是同资产阶级直接斗争的组织。所以，列宁在草案中特别强调“通过在消费合作社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促进工

人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①。列宁的草案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草案出现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它清楚而准确地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了界限。

在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左派的坚持斗争下，大会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号召各社会党支持协助无产阶级合作社，但对合作社不能抱幻想，要向无产阶级强调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的任务，“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往后推了，但是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②。这就是列宁在总结哥本哈根大会时所作的判断。这个判断既是对当时斗争的估计，也是对这一斗争的展望。列宁在此次代表大会上，就反对军国主义和防止战争危险、成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合作社等问题，继续抨击了修正主义。列宁在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敢于反对错误潮流方面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回顾列宁的战斗历程，首先使我们看到，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在建立后不久就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1905年的革命斗争。列宁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及其俄国同伙的斗争中，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比如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1909年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10年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光辉文献。列宁的这些理论与实践活动，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更有效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从1910年以后，考茨基的中派主义开始形成体系，逐渐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威胁。列宁逐步把批判的锋芒转移到考茨基中派主义方面。但是，列宁并没有停止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期间，他在1913年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确定了马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与组成部分，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列宁的这一著作实际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的续篇，也是对伯恩斯坦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更深入批判。当然，这个著作更侧重于正面的分析。它既反对了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前人类文明成就没有继承性的人，也反对了只看见继承性而看不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实行的革命变革的人。显然，列宁把批判伯恩斯坦的斗争更加引向深入了。在1910年列宁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和1913年《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这两篇著作中，列宁又一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既反对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又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他既反对欺骗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又反对欺骗无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

直到1914年5月，列宁还提醒人们注意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修正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才扬名（臭名）于世界。”^①正像列宁所预料的，这个危险性在3个月以后，即1914年8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终于表现出来了。列宁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关于“斗争将来是不可避免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从此，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列宁在这个斗争中，于1915年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又发表了《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卢森堡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过程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以下简称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运动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令人称道的传奇式的女性。她的革命实践活动尤其是理论研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

卢森堡是犹太裔波兰人，她的祖辈早几代已定居波兰，她的家庭中使用波兰语，一切风俗习惯均按波兰人行事。所以，卢森堡一直认为波兰是自己的祖国。卢森堡从小就体弱多病，幼儿时期，大约在1874年前后，她患了腿关节病，却被误诊为骨结核病，从而耽误了治疗，结果造成了轻微的瘸跛。卢森堡的少年时代，正是她的祖国波兰遭受外国占领者恣意蹂躏和奴役的苦难岁月。沙皇俄国在血腥镇压了波兰1863年民族大起义以后，在波兰王国变本加厉地推行民族压迫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卢森堡耳闻目睹了波兰被压迫、被侵略的一些状况。从此，在她童孳的心里，萌发出了对祖国的挚爱和对外国侵略者仇恨和蔑视的幼芽，也使她对探究政治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兴趣。卢森堡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波兰革命斗争，曾因此被迫在1889年流亡瑞士，次年进苏黎世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她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894年卢森堡参与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她移居德国，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正值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公开化，伯恩斯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他的一些机会主义理论观点，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击。在修正主义猖獗时期，卢森堡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这正如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所评价的那样：“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卢森堡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而且在分析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认识与批评的重要文献首先集中于她1898年9月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文，这组论文后来收入在1898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这组论文中，卢森堡针锋相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伯恩斯坦《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和怀疑，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论点，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

一、批判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作了新的阐述

针对伯恩斯坦企图用资本主义适应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的错误做法。卢森堡主要从信用、企业主联合组织、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及发展性质三个方面，对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适应论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认真的思考，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原理。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确可以把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限度，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是一旦生产过剩时，它又作为流通手段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并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信用不仅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同时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的财产，去进行大胆的投机。信用还把整个流通过程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因而信用发展不仅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还会在新的形式上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企业主联合组织性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分析了卡特尔这一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形式。她认为，卡特尔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只是力求在一个部门内消除利润和分配上的竞争，如果把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同时，为了使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卡特尔通常还把国内的部分闲置资本用作世界的生产，这就加剧了同国外资本及其卡特尔组织的竞争，最后导致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

来并趋于成熟”^①。

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及发展性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阐述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她指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科技革命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从而使中小企业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的先锋。同时她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地逐步走向灭亡。

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前夕及会上由私人批判引入党内批判

1898—1903年，德国党连续召开多次代表大会，围绕着伯恩斯坦问题，以卢森堡等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督促党的领导层能够把伯恩斯坦问题列入这次大会议程，卢森堡以极快的速度，在两天内赶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她刚接任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上，论文名称是《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在这篇文章中，面对伯恩斯坦等人向党的一般原则问题的挑战，卢森堡在文中强烈呼吁要对党的策略原则展开争论，要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策略。针对党内有些人对伯恩斯坦理论实质的模糊认识，卢森堡已强烈地意识到党同伯恩斯坦理论思潮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她不指名地提到，不能否认，最近一个时期，某些知名的同志的一些言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这些混乱的言论“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②。卢森堡还特别提醒全党，认为争论有害的看法是不对的。她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指出：“有一些同志会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策略的一般原则展开争论是不容许的，做不到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对党的策略原则进行争论是必要的、可能的和有利的，反对进行这种讨论的理由是似是而非的。”^① 因为“无论何时，在继续不断的，时常束缚人们眼光的日常斗争中，始终是我们整个革命世界观的牢固基础为我们提供令人生气勃勃的养料，使我们擦亮眼睛，振奋精神。这一次重新探讨我们纲领的基础，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②。她同时还引用了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作比喻，认为讨论党的世界观的基础，就会像巨人安泰接触到大地母亲能获得克敌制胜的力量一样，使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新的力量。

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此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清醒地认识修正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因而他们也没有接受卢森堡在会议之前就提出的“批判伯恩斯坦的混乱言论，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策略”的正确建议，也没用把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列为大会议程。以奥·倍倍尔、卡·考茨基为首的一部分人害怕党的分裂，力主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小心谨慎的党内策略结合起来；以卢森堡、帕尔乌斯为首的一部分人持比较坚决的立场，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辩论，不怕分裂。伯恩斯坦本人当时因滞留英国未归，也未参加此次代表大会，但他寄来了一份顽固地坚持其观点的书面声明，这篇书面声明实际上是他向大会发出的挑战书，在声明中，伯恩斯坦向党重申了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但担任大会主席的老机会主义者奥艾尔，拒绝将伯恩斯坦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甚至也没有对伯恩斯坦寄给大会的书面声明做出严厉的批判。正如威·李卜克内西所言，“我感到遗憾的是，策略问题没有作为特殊的问题列入议程，否则就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0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9页。

可以进行一次集中的争论了”^①。但所幸的是，卢森堡还是和一小撮伯恩斯坦分子对伯恩斯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观点自发地展开了激烈争论。伯恩斯坦之流彼此呼应，极力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否定党的原则，放弃最终目的。修正主义者威·彼乌斯公开声明“反对”“最终目的”这一概念，断言“最终目的”一般是不存在的。奥艾尔、海涅、福尔马尔、大卫等修正主义分子也发言批评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舍恩兰克、施塔特哈根等马克思主义者则针锋相对批评了伯恩斯坦主义者的发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分子对他们的攻击毫不怯懦，她勇敢而果断地登上讲台，就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与日常斗争的关系作了简短而精辟的分析，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了伯恩斯坦“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她谴责伯恩斯坦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放弃最终目的的观点，阐明了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的辩证关系。并指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卢森堡的发言精彩有力，博得革命左派的阵阵掌声。修正主义者也大为吃惊，伯恩斯坦闻知此况，曾经到处打听，迫切想知道卢森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卢森堡在此次大会上，还敏锐地指出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并公开宣称将站在革命左派的立场上同敌人作斗争。但由于以卢森堡为首的左派，在代表大会始终处于少数地位，大会并没有就此问题做出任何决议，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会后，在该党的报刊上展开了辩论。

三、汉诺威代表大会前及会上反击伯恩斯坦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

为了促使1899年10月中旬即将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对伯恩斯坦分子进行清醒的认识和批评，1899年9月14、15、16日卢森堡发表了《致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1页。

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在文中她提出，如果要弄清伯恩斯坦派和党之间的真正对立，可以重温一下倍倍尔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只要把提到福尔马尔的那些地方当成是指伯恩斯坦就再也没有比这样做更加准确和清楚的办法了。卢森堡还指出伯恩斯坦派与党对立的核心是最终目的和实际斗争的相互关系问题。她说：“我们争取政治自由或者社会改良的斗争不过是取得国家政权和消灭现今社会的预备步骤，所以在这个斗争中，最终目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整个斗争因此带有根本同现社会对抗的性质。”^①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则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1899年10月9日到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期召开了汉诺威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又一次交锋。伯恩斯坦问题被正式列入了大会的第五项议程。“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倍倍尔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长篇报告，倍倍尔在会上深刻而详尽地驳斥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最后，他说：“我把我的发言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一如既往。”倍倍尔在此重申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倍倍尔的报告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卢森堡在大会上不但支持倍倍尔对伯恩斯坦关于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批判，还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发起又一次攻击。针对伯恩斯坦在会外写文章声言要用“批判的社会主义”来代替科学的社会主义，还竟然要取消“资产阶级”这个词，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恶劣行径，卢森堡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久经考验的真理，不容伯恩斯坦派进行歪曲和污蔑。她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卢森堡从工会、合作社等方面批评了伯恩斯坦认为党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不必夺取政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权，只需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社会改良的观点，但卢森堡也并没有排除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她还同蔡特金一起，提出要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但由于当时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已经泛滥，这个要求未能实现。不过至少对伯恩斯坦分子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伯恩斯坦的积极追随者福尔马尔受到很大震动，他对此非常恐惧和惊慌地说：“我们党内的一位女作家发现了真理：既然掐住了伯恩斯坦的脖子，还有什么必要让那些还在从事实践活动的大量伯恩斯坦分子逍遥自在呢？”他还说：“这一个小小的、但却影响很大的集团（像人们所说的）：奥艾尔、海涅、自然还有我——我每年都是被列在黑名单的——我们的脖子全该被掐住。”^①大会经过四天的讨论，以倍倍尔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攻击的问题》的决议。决议严正指出，“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等。这是对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沉重打击，是德国党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四、卢森堡对国际上追随伯恩斯坦机会主义行为的批判

1899年6月，法国杜毕伊内阁辞职，法国资产阶级温和派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奉命组阁，用“约请”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的狡猾手段来分裂工人运动，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阿历山大·米勒兰借口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利益，欣然应邀，未征得党的同意，就实践了伯恩斯坦的理论。米勒兰在社会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采用两面派手法，私自同卢梭进行入阁谈判。当月22日，加入了反动的卢梭内阁，出任工商部长。他建议新内阁应“面向所有的共和派力量，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米勒兰入阁后完全背弃社会主义，与同为内阁成员并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合作共事，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6页。

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

由于米勒兰是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的社会党人，这在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分歧。有人说，我们曾经在议会和市参议会里为工人阶级争得了有益的改良，为什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不行呢？他们实际上是说，在资产阶级政府里改良也是行得通的。对此卢森堡认为，过去我们在议会和市参议会里为工人阶级争得了有益的改良，是通过同资产阶级斗争得来的，而米勒兰担任内阁部长后却只能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同样的改良。一个部长的改良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只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所以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是社会党人局部地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局部地征服了社会党。”^① 围绕着米勒兰入阁问题，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两个社会党对立的局面。一派是以可能派布鲁斯为首，饶勒斯、白里安、维维安尼等人为核心的“入阁派”；一派是以盖得、瓦扬、拉法格等人组成的“反入阁派”。米勒兰入阁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广泛反响。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以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明确反对。

在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中，卢森堡站在党的左翼一边，坚决反对米勒兰入阁。她撰写文章，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主张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的机会主义者。在米勒兰入阁不足半月之际，卢森堡在7月初就及时地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一个策略问题》，她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革命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危害性，指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因此，……社会民主党人进入政府只会带来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引起腐化和混乱的后果”^②。最后，她认为，在一般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情况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废墟上，它才能成为执政党”^①。卢森堡揭示了法国的米勒兰主义同德国修正主义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国际性质。她说：“如果把法国米勒兰入阁以及与之联系的策略在我们这里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得到机会主义的拥护者最热烈的同情，那么，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情况也使得米勒兰事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卢森堡通过这段话旨在表明，米勒兰入阁实质上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策略的实践，因为它反映了伯恩斯坦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因而米勒兰主义被称做是“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列宁曾指出，米勒兰的入阁叛卖行为是实践上的伯恩斯坦主义。

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期间和大会前后，卢森堡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猛烈抨击了米勒兰主义。9月下旬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坚决支持法国党内盖得等左派提出的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决议。卢森堡认为像米勒兰这种行为，不仅丝毫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相反，却会使党在工人群众面前威信扫地。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她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允许成为执政的党。”^②但各国机会主义者首领都支持米勒兰入阁，特别是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认为这只是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由于考茨基等人的妥协，大会最后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所谓“橡皮决议案”。把米勒兰之流的背叛性行径说成是无关大局的“策略问题”，从而为米勒兰主义打开了通行无阻的绿灯，使盖得、卢森堡等左派的斗争遭到了挫折。此后，卢森堡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写作了许多文章，如《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卡尔·马克思》、《社会民主党与议会民主》等，批驳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实践——米勒兰主义。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② 转引自刘佩弦、马健行：《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当德国党内老牌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仍吹捧米勒兰时，卢森堡怒不可遏，在致友人信中认为对他“应该猛击一掌”。在党的各种会议的发言中，在群众集会的讲演中，卢森堡毫不倦怠地展开了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卢森堡不屈不挠的坚定立场使修正主义者大为恼火，也招致了他们的密集攻击。伯恩斯坦分子从多次较量败北的事实中总结了一点经验教训，那就是尽量避免与卢森堡正面交锋。因为她立论深刻，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言词犀利，谁也驳不倒她。于是他们就变换手法，从侧面进攻，说她是个“外国人”，“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对伯恩斯坦等人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在1901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他们实践了这套改良“理论”，机会主义者李·费舍尔跳出来攻击卢森堡说她是“来自东方的外来者”，是一个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格格不入的人物”，她对党内一些活动家的攻击是不能容许的。对此，卢森堡十分气愤，她向大会提出了抗议声明，指出这不仅涉及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关系到了她所代表的政治方向。但是，考茨基借口维护党的团结，拒绝在党刊上刊登这则声明。但不管怎样，在卢森堡等一批革命家的推动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指名谴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决议。

在1902年9月13日至20日召开的党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尽管卢森堡已就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的问题准备好了发言稿，但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大会主席团竟然不允许卢森堡登台讲话，借口是为了保持党内的“和气”，不要因爆发争论而为敌人所利用，只允许她就普占区的波兰工人运动发言。对此，卢森堡感到十分气愤和忧虑，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党内左派处于少数地位，备受排挤和压制，尤其是像卢森堡这样活跃的、令人瞩目的左派代表人物，更是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他们用迫使她缄口的手法来削弱其影响。

五、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讨论

1903年9月中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累斯顿举行了党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的策略问题仍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伯恩斯坦、福尔马尔等人仍企图通过改变党的策略来改变党的性质。大会围绕国会选举、党应否争取副议长职位、修正主义的意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森堡已就上述问题发言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就像上一年的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上她的发言要求遭到了拒绝一样，这次代表大会也仅允许她就普占区波兰工人运动发表意见，理由仍是怕她“过分激烈”的言论“伤了党内和气”。卢森堡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她没有气馁，而是紧密团结革命左派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批判伯恩斯坦的观点。倍倍尔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斯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伯恩斯坦“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卢森堡、蔡特金也是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核心人物。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则极力为伯恩斯坦辩护，并继续公开地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分歧。但卢森堡和其他革命左派，坚持斗争，终于使这次大会通过了谴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决议，明确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欲把党从革命政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意图，驳斥了修正主义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倾向。同时还谴责了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放弃原则、改变党的性质，使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转变成向现存制度妥协的企图。这次大会通过的德累斯顿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决议，它指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否定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观点，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不谋求在资产阶级内部参与政权，这个决议成为第二国际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的决议的基础。决议还首次指出修正主义已成为一种国际思潮，这就为其他各国党反对修正主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借鉴，也成为以后国际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这次党代会是德国党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德国党把反击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但是，这次大会是有很大缺陷的，这不仅表现在屈从于修正主义者的压力，不让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左派发言，更主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满足于对修正主义者局部表现

的批判，而没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更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修正主义思潮和势力得以继续蔓延。这次党代会以后，德国党也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声讨和批判。从修正主义分子会上的发言和会后的活动来看修正主义远远没有被克服，修正主义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活动中都在继续发展，这不仅使党的健康肌体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蚀，而且使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分子逐渐在党内处于优势地位，而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处于上风。

不管怎样，卢森堡在同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她在德国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和在国际第二国际的大会上所做的讲演中，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坚持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节 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过程 及其著作

卡尔·考茨基（Kautsky, Karl Johann，以下简称考茨基），他生于1854年10月18日，卒于1938年10月17日，作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于1875年1月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次年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建立联系。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80年应聘到瑞士苏黎世，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改良主义者K.赫希伯格的助手，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81年3月被派往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秋，筹备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考茨基任主编。1885年迁居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19世纪80—90年代，发表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以及党的纲领作

了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代表，他曾出版过《土地问题》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05—1910年间编辑出版被认为是《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多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他前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许多问题上坚持正确主张，后期也发表过错误言论，走向机会主义。

考茨基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新的事实进行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待遇的提高以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系列成果等方面的分析，他认为，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并指出“谁也没有象伯恩斯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①。可见，考茨基当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新形势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已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在第二国际内部造成了深刻的思想震动和混乱。

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内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在与伯恩斯坦的争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对此，考茨基回忆说：“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此后不久，伯恩斯坦也同我发生对立：但是我深感那些我从前视为榜样并且是我最好的支持者的人恰恰离开了我。在修正主义危机中，驳斥修正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于是就落在我的肩上。”^②由于考茨基开始对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持赞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9页。

② [奥]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8页。

同和观望态度，因而，考茨基最初并没有站出来，而是以“沉默”的方式对伯恩斯坦的观点表示疑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茨基没有意识到同伯恩斯坦的斗争的不可避免。“起先我表示对此深有同感，把他的这种做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的做法的继续。但是这些文章在1897年和1898年内愈继续发表下去，我就感到它们愈值得怀疑。我当时还希望，当伯恩斯坦把他的看法在一本书里有系统地加以概括和阐明时，我的怀疑会消失。事实恰恰相反，我的怀疑这时就变成了激烈的反对。”^①

1898年4月，他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就曾对伯恩斯坦这样进行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变得抱怀疑主义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如果他不改换他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②考茨基后来发现，伯恩斯坦已经是“不会改邪归正了”。

考茨基在后来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主动地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争论，并超越与伯恩斯坦的旧日友谊，站在反修战士的一边，支持反修斗争。在1898年10月初的斯图加特大会结束后不久，考茨基在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针对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进行了批判，考茨基提出将会对伯恩斯坦进行斗争。他针对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1898年12月23日致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给予伯恩斯坦有力的回击。考茨基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有改变，……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③

在伯恩斯坦的《前提和任务》一书出版后不久，1899年3月至4月，考茨基就在《前进报》、《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

① [奥]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1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

《伯恩斯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伯恩斯坦和辩证法》、《伯恩斯坦论价值学说和阶级》，它们对伯恩斯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1899年9月，考茨基在总结之前批驳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著作。《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除导言外，全书分为《方法》、《纲领》和《策略》三个篇章。他从方法、纲领和策略三个方面入手，展开了对伯恩斯坦主义的系统批判，这是他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一大特色。他批判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对恩格斯晚年著作的歪曲、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歪曲，并正确地指出，辩证法是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钥匙；唯物史观与宿命论有着本质区别；无产阶级民主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等，列宁为此书作了书评，肯定该书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说考茨基的著作是他“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①。

此著作后来得到倍倍尔的高度评价：“关于伯恩斯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个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②

一、筹备会议，起草各种决议，反对米勒兰入阁， 竭力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

1898年后，德雷斯福案件导致法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法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政治危机。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摆脱这场政治危机，决定改变以前的斗争策略，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党人入阁的办法缓和国内矛盾。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米勒兰借口挽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利益，建议新内阁应“面向所有的共和派力量，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

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擅自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任工商部长。由于米勒兰是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部长职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3页。

务的社会党人，这在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分歧。因而，这也产生一个问题，社会党人能不能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

1900年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就对米勒兰入阁这一事件进一步展开了辩论。根据对是否入阁问题的不同回答，会议代表分成了三个支派，即坚决反对米勒兰入阁的左派、为米勒兰辩护的右派以及持折中主义立场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考茨基受大会的委托，代表起草委员会就154号“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问题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也被称为“考茨基决议”。经过补充和修改后，考茨基的提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尽管这个决议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总起来说，还是反映了当时第二国际各党主要领导人的水平和态度，有不少正确的理论观点。如该决议指出：“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的手段。”^①这一论述说明了考茨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原则上也是反对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比如该决议还谈到，社会党人只有在具备紧急或特殊情况并征得党组织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而米勒兰的入阁并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这实际上是婉转地批评了米勒兰，表明考茨基并不赞成米勒兰入阁。

巴黎代表大会以后，考茨基还曾撰文对决议进行解释和辩护，并说自己早在1899年8月12日就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坚决表示不赞成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②。应该承认，考茨基在米勒兰事件中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

在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斯坦的几次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和倍倍尔、辛格尔等人商量会议怎么开，而且还一起草拟或联名提出决议案，如在1904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倍倍尔、辛格尔一起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并且把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② 转引自《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30页。

革命的党改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企图。这个决议案在会上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后来成了1904年召开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决议的基础。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考茨基批判了饶勒斯的机会主义策略，认为国际代表大会应该接受德累斯顿决议为国际各党制定社会党策略的总原则，各国党根据这些原则确定各自的行动方式。

但是，考茨基及其决议案在米勒兰入阁这一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表现在：一是考茨基把米勒兰入阁问题仅仅看做法国社会党的内部事务，看成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不应提到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份决议因其闪烁其词的特点而被称为“橡皮决议”，但是该决议却恰恰反映了考茨基在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下矛盾的心态和两难的境地以及维护社会主义运动团结、防止分裂的初衷。这反映了他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国际性和危害性缺乏深刻认识。实际上，米勒兰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得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赞同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茨基决议案提出“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这都是对国际性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让步。二是考茨基决议案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有作全面的阐述，它片面强调了议会斗争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致使大会后机会主义思潮在各国党内迅速蔓延。从决议案中可以看出，考茨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认识上是模糊的，他把夺取政权当成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并长期从事艰巨任务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以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地方政府权力和地方立法议会的结果。三是考茨基决议案并没有实现帮助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各派消除分歧的任务，并且在试图实现法国党人团结统一的同时，片面注重了团结统一的意义，忽视了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实现团结的原则，从而使法国党在巴黎代表大会后正式形成以盖得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和饶勒斯领导下的法兰西社会党，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损失。

总之，考茨基在几次党代会上批驳伯恩斯坦及其同伙的言论，表明他的反修立场是积极的。在当时第二国际和德国党内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的

斗争中，他基本上是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的。

二、正确处理原则与友谊的关系，与“莫逆之交”展开论战

伯恩斯坦曾经是考茨基的密友，他们一起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参加起草了《爱尔福特纲领》，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的《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就是伯恩斯坦写的。但在批判伯恩斯坦的斗争中，考茨基虽然有沉默、犹豫，但还是正确处理了原则和友谊的关系。比如1898年10月23日，考茨基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我们在理论方面一贯的合作是不再可能存在了，它反倒成了经常冲突的根源。我认为，除了结束合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出这话来并不是容易的。我已经和自己斗争了半年之久，而且我试过了所有别的出路，想找一个和谐相处的方式，但是白费劲，而且这样下去没有意思，长疼不如短疼。”^①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考茨基认为友谊的基础应当是政治原则，是“事业的利益”，当这个基础条件受到破坏时，友谊就要受到损害。他认为，人们可以为了事业的利益容忍那些个人不欢喜的伙伴，但是相反，如果两人之间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长期持续的公务上的对立，那么面对它所造成的敌意的影响，私人之间再亲热的友谊也是保持不了的。“我们的共同战斗是完结了，我不能跟着你，我的信念和你同样深，同样坚定。”^②但这以后，考茨基有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主要是由于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仍抱有幻想，希望他回头。比如，考茨基曾期望当时侨居伦敦的伯恩斯坦投身到另一种环境中去，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更加紧密的交往，在交往中他以前的观点将会恢复。另外，这也是出于和倍倍尔同样的考虑，即想让伯恩斯坦把观点全部讲出来，给他以安静的写作时间，来全面阐述他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妥协。他曾在《私人启事》中表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9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83页。

示：伯恩斯坦的著作一发表，就会出来战斗。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他的沉默。1898年12月，他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中还说：“我将对爱德发动进攻，态度上纵然可以温和，实质上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这是他自找的！他也不会放过我们。”^①

1900年2月21日，考茨基在《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决议》一文的批注中，更明确地写道：“尽管我们愿意为了可爱的和平保持沉默，我们的敌人却促使我们说话。”^②到了1903年，考茨基的措辞更加尖锐，他在1月5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是“一个比公开的敌人更不理解马克思而且更加敌视马克思（这种情况是叛徒的特性）的人”。^③从这些信件、声明以及以后的论战实践中可以看出，尽管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与伯恩斯坦和好如初，但在1910年以前他与伯恩斯坦还是划清界限的。

如果说考茨基在这一问题上有错误，那就是当他起来反对伯恩斯坦并且知道后者实际上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必要的组织措施。1899年春，他在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必须把爱德开除出党。”^④但是如把以后修正主义的泛滥完全归罪于考茨基，那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考茨基主要是理论家，除了通过他的著述以外，在组织中所起作用很小，而当时在组织系统里地位较高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以，未能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不在于考茨基。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09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21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41页。

④ 转引自〔苏〕切尔涅佐夫斯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三、利用《新时代》杂志，为各国反修战士提供斗争场所

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问题逐渐清晰化、明朗化以后，考茨基充分利用《新时代》这个重要的理论阵地，除了自己发表大量论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文章之外，还为普列汉诺夫、倍倍尔、卢森堡、梅林等各国左派提供批判场所，这就有助于第二国际左派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观点及时进行驳斥和批判。同时，他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和纯洁性，认为不能把《新时代》变成“文字杂耍场”。考茨基说：“我对《新时代》的任务的看法，你是了解的。我编辑它一天，它就一天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不是《社会主义月刊》或者《社会主义评论》之类的折中主义的机关报。”^①考茨基认为，如果去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那就是去掉它的特征。因此，他掌握的《新时代》刊物，不仅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而且还限制了伯恩斯坦及其拥护者发表文章，对伯恩斯坦及其拥护者的文章都要经编辑部审查，如要发表，还需加上批注。比如他批评伯恩斯坦说：“你在受到攻击时经常可以随意使用《新时代》的篇幅来保卫和阐述你的观点，是的，在这方面它是责无旁贷的机关报，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你退出《新时代》，而是要停止你给它的固定撰稿。”^②考茨基认为科学概念是应该包含着自我批评的，我们甚至也可以偶尔批评下它的基本原则，但是伯恩斯坦作为在《新时代》有特殊地位的人，固定撰稿人，是给《新时代》定调子的人，不能偏离、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不可否认，他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有改变，但是对“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8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9页。

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继续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①。由此，刺痛了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他们纷纷指责考茨基太片面、不公正。伯恩斯坦还于1900年4月发表声明，退出《新时代》，他的追随者也纷纷离开《新时代》，不再为它写稿。由此可见，尽管考茨基起初也曾借口《新时代》杂志的读者对哲学不感兴趣，阻挠过普列汉诺夫发表一些哲学批判文章，但纵观全过程，考茨基领导的《新时代》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基本上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当然，以考茨基的威望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完全有能力在理论上彻底批倒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并且在实践中阻止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的。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批判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是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脱离的，同时在理论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这正是他不如列宁、卢森堡、倍倍尔等人的地方，也正是他在这场反修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

第三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评

“伯恩施坦作为一位‘密切关注时代趋势的观察家’似乎较早地觉察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景象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①因此，他先于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伯恩施坦一再反复强调，他在分析这些现象的时候是本着“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的精神去分析以“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②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弄清“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③。

①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57页。

③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第一节 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认识

一、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所理解的“最终目的”不同

(一) 伯恩斯坦对“最终目的”的理解和“通常”的理解的不同

在无产阶级应该如何进行革命以及应该不应该革命的问题上，伯恩斯坦与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不主张革命，而是主张社会改良。他认为：“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①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和扩大今天已经运用于这一目的的那些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来实行的而且最终也多半是会这样实现的”^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一问题，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③此后，伯恩斯坦曾多次重复这个公式，还多次为自己的修正主义公式辩解：“按照我的看法，马克思的理论事实已在原则上推翻了关于最终目的的观点。对于一种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学说，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目的，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根据这个学说，可以有大的方针路线和目标，但不能有最终目的。”^①

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他被斥责为“修正主义的鼻祖”的同时，他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的格言，也成了否认社会主义运动有任何确定目的的“修正主义公式”。伯恩斯坦虽然否认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没有目的。他在给《前进报》寄去的声明中说：“一个运动没有目的，就是混乱无主的行动，……没有目的就没有方向，要使社会主义运动不致失去罗盘流来荡去，不言而喻，它必须有自己的自觉奔向的目的。”伯恩斯坦也提出了他的目的观：“这个目的并不是实现一个社会计划，而是贯彻一个社会原则。……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的杂谈，事实上只能把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表述为原则，譬如‘全面实现合作制’。”^②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困惑，实际上也凸显了他并非没有目的。只是他所理解的“最终目的”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不同的。伯恩斯坦自己也说他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那么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伯恩斯坦在这重点强调了“通常”一词。说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通常”理解。笔者认为倍倍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党的最终目的，即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我们

① [德]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史集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1—12页。

②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必须夺取政权和利用政权”。^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和蔡特金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发言在这一点上和倍倍尔所讲是一致的。卢森堡说法略有不同，她认为，最终目的不是未来国家的设想，而是“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② 这种提法主要是批驳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学说的。

(二) 伯恩斯坦误认为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假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飞跃”，他对此不感兴趣

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所理解的“最终目的”指什么呢？伯恩斯坦不止一次地在《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谈到这个问题。他在1896年10月28日的《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中说：“现代社会民主党引以自豪的是，它在理论上已克服了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而如果仅就未来国家的模型这一方面看来，这种自豪也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画出一幅固定模式的未来图画……”他又说这种真正的空想，也就是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那种空想，可以看做已经绝迹了。“但是还有另一种空想主义，可惜它还没有绝迹。它是同旧的空想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研究，而假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飞跃。”^③ 他还说：“把一切解决办法都推倒流行的说法，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他而摆脱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④ 从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通过革命的灾变方式实现的，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假定，是一种空想，他希望现代社会主义民主党在理论上能克服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一步步地渐进式改良，实行合作制等，他认为人们过于热衷社会主义这个虚幻的抽象的目标。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针对因“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几种党报对他的批评，他进一步列举了作家巴尔扎克的例子，他认为巴尔扎克把小说的人物当做现实活人来讲“他的小说人物全是活人。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把这些人物当做活人来讲，他的幻想产物对他说来就是‘现实’”^①。他通过举这个例子，旨在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把空想当做现实来讲。他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空想的东西。”^② 这进一步说明了在他的思想意识里，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把空想当作现实。下面这段话更清晰地表明他这一思想，“现代工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人们把月亮指给他们看，使他们欢欣鼓舞起来。现代工人阶级正在成熟着，而且它的广大阶层已经成熟了。它不需要空想，用不着这个毕竟是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励它为社会主义奋斗”。^③ 他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是遥远的事。针对这个问题，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批判他时，曾直截了当地追问伯恩斯坦，按照他的种种“高论”，是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无限期拖长、以至于拖到“直到希腊人的朔日”呢？古代罗马历称每月第一天为“朔日”，古代希腊历中没有“朔日”，这个名称。古代罗马人习惯在“朔日”缴付租税和偿还债务。所谓“延期到希腊人的朔日”，实际上是拒绝付租还债的意思。巴克斯借用这个典故，意指伯恩斯坦妄想取消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打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③ [德]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页。

着社会主义的幌子的一种骗人的假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对巴克斯的责难耿耿于怀。他对此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中进行了反驳并答复了巴克斯。他说：“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那么我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声明，我觉得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相反，我倒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现在这一代人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得到实现。”^①为此，伯恩斯坦认为应该追求不断的前进和各种改良方针，而不是遥远的最终目的。“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阶级的经济活动。”^②

为此他再一次指出：“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今天仍旧承认它。即使‘通常’这词还没有能指出这句话只能是有条件地加以解释，但是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操心。”^③

从其言论中可以看出，伯恩斯坦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还十分遥远，对此他要求人们关注于眼前目标：合法斗争。后来，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正如我已简单提到过的，这当然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如果人们从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结尾所写的几句话得出结论说，他真正认为社会主义变革是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内完成的行动，那么这是对些句子的极不成熟的理解。不，社会主义变革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④。伯恩斯坦过分关注于日常合法斗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太渺茫，太遥远，只能是一种空想，实际上从资本主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义到社会主义飞跃并不是一种假定，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事物发展过程中本来就包含着质变与量变，我们在认识事物的发展时，既不能只看到点滴改良的量变，也不能只看到武装夺取政权的质变。而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既看到德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量变条件，又结合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既不健全又不完善的历史背景，才主张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伯恩斯坦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空想”，是无的放矢。与此相反，伯恩斯坦主张在专制的德国，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却只能是一种空想。

伯恩斯坦认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那么，他果真只要“运动”而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拒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的”，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看做“空想”。他认为“运动”的目的应该用“社会原则”来表述，这个原则就是“全面实现合作制”。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但实际上这里面就隐藏着目的。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同资本主义实行合作，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企图用这种“运动”来激励无产阶级斗志，瓦解无产阶级队伍，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他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修正主义公式的目的。

总之，伯恩斯坦这个公式的提出，标志着他的修正主义在系统化方面，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从此以后，这个修正主义公式风行一时，成了修正主义的“格言”，列宁曾经说过这个修正主义公式，它要比伯恩斯坦的许多长篇大论的文章和书籍更清楚地说明了修正主义的实质。

二、伯恩斯坦主张通过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的方式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一)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长入”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同时，德国就出现了以卡尔·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宣扬“博爱”、“人道”并把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标榜通过阶级和平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19世纪60到70年代，在工人运动中颇有影响的拉萨尔派公开鼓吹通过争取实现普选权和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地逐步地变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为“自由人民国家”。他们提出：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需要通过“合法的手段”，依靠地主资产阶级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福尔马尔声称：社会主义始终是和平地发展的，只要能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不但深受“和平长入”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机会主义思想。1891年10月，由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所编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就包含有“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观点。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致使《草案》不仅回避了暴力革命，而且连废除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也未提出来。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法兰西内战〉导言》等著作以及书信中，着重地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策只能是把党引入迷途。

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的批判置若罔闻，他在1893年撰文谈卫生事业的国有化问题时，仍认为“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更是系统地

阐述了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会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民主制、普选权对于无产阶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只要“以普选权和民主”为基础，争取更多的席位，再通过工会、合作社运动、工厂立法等经济改良的方式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伯恩斯坦得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结论，即用民主的手段，以普选权作为杠杆，以议会为场所，在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下，通过政治改良、经济改良的途径，就可以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

（二）伯恩斯坦主张通过工会、合作社等经济改良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在1890—1891年第9卷第1册《新时代》上发表了《关于铁的工资规律问题》，在文章中他认为，工会最重要的职能在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即按照劳动力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手段。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他还认为：“工会作为受雇于某一工业的全体人员的组织，始终只有在它满足于保持参与者的地位时，才能同时既维护这些会员的利益，又促进普遍福利。超出了这一点，它就总是有退化成具有垄断的一切恶劣特性的排他性团体的危险。”^① 伯恩斯坦指出，工会在这一方面同合作社一样。作为某一整个工业部门的支配者的工会，是许多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垄断性的生产合作社，一旦它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或者实行了垄断，它就是同社会主义和民主相对立的矛盾，不管它的内部体制是什么样子。伯恩斯坦在此处天真地认为，只要工会内部实行民主，工人就可以通过工会运动争取到正当的经济权利，而不必采取革命的暴力运动。伯恩斯坦引用西班牙社会党人巴勃罗·伊格来西亚斯的观点来证明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不管是哪种色彩的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资产阶级必须确信，我们不打算用他们曾经一度运用的手段即通过暴力运动和流血来强暴地夺取统治，而是要用同文明相称的合法手段”^①。

伯恩斯坦在“经济合作社的效能”中埋怨马克思“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或者说马克思“关于剥夺的公式，成了他的巨大分析力的阻碍。只有表现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最直接对立的合作社形式才中他的意”。^② 伯恩斯坦在此说明，马克思之所以支持生产合作社，向工人推荐生产合作社，是因为生产合作社能从根本上冲击现存经济制度，这符合辩证法的精神，他才积极热心于此。伯恩斯坦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反对人们对合作社的否定态度，他认为合作社提供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对抗通过商业的剥削，另一方面带来在其他许多方面使他们的解放工作容易进行的手段。”^③ 他还指出，其中生产合作社在工人为生活状况的斗争中能对他们起很大的作用，但他同时还认为“生产合作社只是以消费合作社作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在伯恩斯坦心中“这一形式”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诉说生产合作社的作用之前花了大量的篇幅说明了消费合作社的功能与作用，并认为只有与消费合作社联合，生产合作社才能发展，因而他更为推崇消费合作社，并认为它最为重要。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是一个“有发展能力的机体”和“经济势力”^④，“工人消费合作社既是克服剥削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储蓄银行”^⑤，“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却不必直接消灭生命，不必诉诸暴力”^⑥，财富就能归工人阶级所有，“我们可以确定不移地认为，消费合作社现在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⑤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248页。

⑥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已经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①等，而且“关于这种消费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伯恩斯坦在最后作了这样的估评，“它们作为工人组织充分地包含着社会主义的要素，并且终将把自己发展为对社会主义解放具有很大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将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自由、合作的社会。

（三）伯恩斯坦主张通过政治改良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

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利，直到最后夺取全部政权，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他说：“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②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阶级合作”才应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看做是“破坏因素”。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而是各由“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要求”的人们凑成的“混合物”，在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说《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③并宣称暴力革命已经“过时”，要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伯恩斯坦不认同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反，他认为，相似力量的合作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因此他致力于利用阶级合作，一致行动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他提出了一套在政治上发展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发展消费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纲领。他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同伙”，解释为“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将在资本主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义制度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像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那样要靠暴力来摧毁才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继续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模式，只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既然如此，伯恩斯坦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可以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①

伯恩斯坦认为“剥夺剥夺者”这种灾变方式是“加劲冲回空想主义”。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自然生长出来，人们无须过多地考虑社会革命，只要在日常问题的基础上，就可以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不必坚持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中心的“崩溃论”，只要坚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渐进、和平、改良的策略，即可达到使资本主义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为此，他坚信，“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②。“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阶级的经济活动。”^③为此，他再一次指出：“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今天仍旧承认它。即使‘通常’这词还没有能指出这句话只能是有条件地加以解释，但是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态漠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操心。”^①

伯恩斯坦否认资本主义“崩溃论”，主张“不断地前进”的渐进式改良，在这种渐变改良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社会主义实现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灾变方式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去取代资本主义，而应是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不破坏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变革。伯恩斯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②。伯恩斯坦借此来说明恩格斯晚年已经改变了以前武装夺权的暴力革命思想。实际上这句话只能说明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斗争条件发展变化了，应当对这种新的斗争条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并不能说明恩格斯改变了对实现最终目的的方式的看法。但伯恩斯坦却认为“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③。由于他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错误理解和背叛，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④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

从伯恩斯坦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伯恩斯坦不希望通过灾变即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民主、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他“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伯恩斯坦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将崩溃，因而他对最终目的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渐进式改良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灾变即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

当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情况下，他仍在坚持认为，“在生产水平低、无产阶级不占居民多数的国家中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此为借口，猛烈攻击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伯恩斯坦利用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笔者认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是有多种形式的，决不会也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形式，把暴力革命的道路绝对化或是把和平发展的道路绝对化，都是片面的。但伯恩斯坦错误在于他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把和平发展的道路绝对化。还故意歪曲了恩格斯晚年“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

三、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

在伯恩斯坦眼中，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空想。他在写于1896年的《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文中，把空想主义分为两种。第一种空想主义热衷于描绘未来社会的具体图画。他认为这种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菜单”的真正的空想，可以看做已经绝迹了。因为“任何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社会主义者今天都不会画出这样一幅关于未来的图画”，但他指出，“但是还有另一种空想主义，可惜它还没有绝迹。它是同旧的空想主义相反的一个极端。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研究，而假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飞跃”，这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第二种空想主义。伯恩斯坦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飞跃只是一种假定，而第二种空想

主义是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的解决办法，即使不是在旦夕之间，毕竟也是在很短的时期内”^①。伯恩斯坦认为这是“不相信奇迹，却要假定奇迹”的极端空想主义。从他对这种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来看，他是把无产阶级政党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揭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把一切不顺从资本主义、不停留于和不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作修修补补的工作，把一切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把一切对“阶级斗争和经济的发展”会推动社会的进步的信念，都说成是异想天开的想入非非。这也说明了伯恩斯坦忽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渐进改良式的量变，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质变。并把社会民主党人所认为的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说成是热衷于空想。伯恩斯坦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的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的空想上的东西”。^②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指出：“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它的主导的基本思想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在应用时还黏附着空想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③在伯恩斯坦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人们没有必要以此为目标而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伯恩斯坦借助于反对空想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为了推行和维护资本主义原则。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需通过革命，只需通过议会斗争和改良的方式，就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如果不相信这种方式，而硬要采用暴力革命、武装冲突的阶级斗争等其他办法“人为地”使资本主义制度变为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

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叫做加劲地冲回空想主义”^①。

伯恩斯坦感到最恼火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对未来社会“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允许有别的样子”所作的论证。伯恩斯坦认为，“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但同时他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比如“社会主义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② 伯恩斯坦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句名言：“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③ 也就是说，在伯恩斯坦看来，只要社会走向富裕，而不管这种富裕是哪些人富裕，不管在少数人富裕的同时多数人是不是仍然生活在相当贫困之中，也不管这种富裕是怎么得来的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管这种富裕能不能持久和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他自诩自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是在实质上毕竟是实现了的。”^④ 伯恩斯坦笃信自己的理论，他在谈到自己时说过：“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教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作的订正。”^⑤

伯恩斯坦为了使他这种在“面对事实本身”的幌子下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的要求更具有鼓动性和迷惑性，竟然公开曲解社会主义，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伯恩斯坦从新康德主义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⑤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页。

者那里抄来用伦理学拼凑的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德需要，不可能是科学的，只是一种“道德意向”、“伦理要求”。他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认为这样做是“最多余的事”，是真正的浪费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宿命论”。^①他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他断然否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处处都有“社会主义”成分。比如资本家采取了缩短劳动时间的做法；还有对于“工业中的童工问题”的年龄限制问题等。伯恩施坦认为，在两代以前，对童工问题几乎没有限制。现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本身却和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者、教育赞助者一起，不断促进了提高儿童从事工业劳动的年龄限制，工厂把不招收 13 到 14 周岁以下的儿童的年龄限制提高到满 15 周岁或 16 周岁。

他提出，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是：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和地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而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和平地长入了”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用民主对国家和企业产生影响，那么领导企业的资本家就会按照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企业，与此同时，有特权的资本家的利益也会很自然地服从于公共的利益，而这整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说到底，伯恩施坦反对空想主义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本身说成是一种空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②伯

^①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63 页。

^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 页。

恩施坦对空想主义的反对最后就归结为这样一句口号。其实，伯恩斯坦在高喊“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之时也是十分虚伪的，因为他实际上并非没有目的，他的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反对的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注重“无目标的运动”。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批判

一、列宁密切结合实践，通过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进行批判

（一）列宁对“最终目的和运动”的批判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并主张在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框内进行改良。列宁批评此书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①。关于这个公式中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中谈到俄国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来源时指出，俄国改良派的一位年轻首领即《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列宁认为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这个公式同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公式本质是一样的，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列宁认为，不过伯恩斯坦的公式比列维茨基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的最终目的）即无产阶级以推翻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伯恩斯坦认为这个最终目的，他“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认为“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

而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时，而且还要脱离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与夺权，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宣布：在这样的时代，“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政党“有最大意义”的不是“取得政权”，实现最终目标，而是进行“细小的工作”。伯恩斯坦曾说过，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他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这样，伯恩斯坦实际上就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改良党。“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列宁指出，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最明确地表明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实质。

列宁不仅指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实质，还密切结合俄国的革命实践，全面清算了这个公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着重论述党的建设的著作中，批判了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伯恩斯坦，他指出：“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① 列宁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里的修正主义倾向“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② 列宁的这些话，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在联系。列宁对修正主义的实质和政策作了精辟的概括和揭露。他指出，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么，运动就是一切”这句风行一时的话，最清楚地表明了修正主义的实质。它“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①，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它集中地反映了修正主义的经济倾向、政治倾向和哲学世界观。而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政策。列宁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的这些概括和揭露，为识别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威胁”^②。

列宁还说过，因为“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其中也包括自决）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二）列宁通过制定党的革命纲领，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的改良策略进一步批判

伯恩斯坦把“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作为伯恩斯坦主义的行动纲领，其核心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十分关心自己的方向，时刻牢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为此，列宁高度重视从政治上建党，制定革命的政治纲领。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文的党纲，而这正是由于列宁的坚持才做到的。列宁说：“在这个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得很明确，而且是针对伯恩斯坦、针对机会主义提出来的。”^② 他先后拟定了三个纲领草案，尤其在第二个纲领草案《我党纲领草案》里，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关于党纲的基本原理。列宁指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党的纲领确定了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最终目的和实现最终目的的根本手段以及种种要求，使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同时它也是衡量一切地方党组织和所有党员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这一方面有利于党摆脱“手工业方式”，组成坚强的政治大军。另一方面，党纲也可以作为一面判断党的性质和活动方向的旗帜，人民通过这面旗帜能了解党的真正任务、要求和斗争方法。从而有利于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凝聚最广泛的革命力量于党的旗帜之下。列宁指出，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③ 党纲的这一实质，同伯恩斯坦主义的种种观点，如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无关紧要，工人主要是关心经济斗争，党不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无论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较温和的形态”，“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不使用暴力革命的发展阶段”，等等，是完全不相容的。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列宁强调，党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时刻注意加强自己的领导和组织的责任，把工人的自发运动引导到党纲的高度，促使其遵照党的近期目的和长远目的相结合的方针开展斗争，并把近期目的和长远目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一致起来，分阶段逐步前进，才可能尽快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

列宁在1905年6、7月间，写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列宁指出，伯恩斯坦要求公开承认现存东西的合理性，因而就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策略。伯恩斯坦的这些言论，是俄国孟什维克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孟什维克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移植到俄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列宁认为，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对当前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党的目标。当前工作只有是构成实现最终目的的一部分的时候，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同时，也只有从最终目的的高度，才能认清当前工作的发展方向。

列宁指出，只有永远记住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项个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不采取错误的步骤，避免犯可耻的错误，也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和保持自己队伍的高昂斗志，清醒地估计已取得的进步。不被已取得的成果所陶醉，继续朝着最终目的奋进；只有不断前进，夺取新胜利，才能巩固和发展已得到的成果，否则就可能丧失已得到的成果。因而，我们必须搞清伯恩斯坦所推崇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真正目的，就是企图扰乱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和目标。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批判伯恩斯坦主义说：“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①

为了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列宁制定了党的纲领，这一方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面实现了从政治上建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政策即“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①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这就从政治上保证了新型政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性，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进方向。

列宁在批判伯恩施坦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②，这个“最终目的”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伯恩施坦关于“最终目的与运动”关系的公式则在客观上表现了那些没有前途的阶级的精神状态。那些没有前途的阶级，由于受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无力通观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所以才得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错误结论。伯恩施坦的论述实际上是理论上的“折中主义杂碎汤”与实践上“迁就眼前事变”的爬行术的混合物，这也决定了他们由于害怕或者不能认识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不可能赢得未来。他们只见到当前而又不能认清当前，无法把当前与未来统一起来，而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同，他们既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又有高度的求实精神，他们能够把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与最终目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把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统一起来，不悲观，不空谈，满怀信心踏踏实实地朝着“最终目的”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二、列宁批判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阐明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针对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指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上，选定“调和的道路”，而主张“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这是由他们的改良主义本性所决定的”，其原因，在于他们“胆怯”，在于他们“不愿与资产阶级决裂；在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周围，在庸俗的市侩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东西，忘记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在于他们盲目崇拜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假象，从而把这种“政治形式当做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①。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法，就是“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②。而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③。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诡辩的手法，“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从而“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④，来为自己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的叛卖行径作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伯恩斯坦则提倡以民主的、渐近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改良，以便和平地、合法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列宁指出：伯恩斯坦的理论，来源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正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总是不断地宣称在资本主义的议会制下一切公民都拥有投票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伯恩斯坦之流不过是照搬他们的陈词滥调。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是一般规律。他说，“虽然对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不能否认，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在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平让出政权是可能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因此，承认这种战争应当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①

在批判伯恩斯坦分子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他指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②。列宁在这里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阐明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他还特别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即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③。因此，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④。针对伯恩斯坦之流只要改良不要革命的理论，列宁进一步阐明了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他首先肯定了改良的积极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改良，“革命者永远不会拒绝为改革而斗争，不会拒绝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⑤。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上，列宁并没有拒绝议会斗争，相反，他认为，只要条件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宣传革命主张，揭露资产阶级和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真正的权力机关并不是议会而是它的官僚军事机器，而改良、议会斗争又是以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⑤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权基础，而是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因此，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反而会由于将它视做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的、最高的、决定一切的形式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①才不致使实现社会主义流于空想。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主义时指出，他“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②。这种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只要经济斗争、放弃政治斗争的理论，实质上与伯恩斯坦主义一样，都是“主张保存现存的东西”，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在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玩弄的手法，不过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实质即是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因为他把阶级斗争的范围限制在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内，这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的”，正是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之内，资产阶级同样“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在分析和揭露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法和实质中，列宁还揭露了以改良主义为社会主义道路的伯恩斯坦理论和实践的归宿，指出他们“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③

俄国国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正”。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东西，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被称为伯恩斯坦的变种的经济派则强调工人阶级只应进行经济斗争，断言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孟什维克除了照搬第二国际各个党的党建模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政党外，还在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主张。

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年代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斗争领域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在政治上“否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在组织上“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的取消派，另一方面又反对用“左”的词句掩盖机会主义面目，要求召回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主张完全停止在合法组织中工作的召回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追随第二国际，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前，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有时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可以说，如果不在理论上揭露批判和战胜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有可能被取消。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布朗基主义”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社会主义者路·奥·布朗基为代表，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思潮。由于以布朗基为代表的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所以他将革命设想为由代表工人行动的一小部分革命精英所赢得的行动。

伯恩斯坦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布朗基主义。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摒弃不问时间、地点、

条件而盲目举行暴动的思想，仍旧未能从布朗基主义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同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精神。”^①“《宣言》的革命的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几次通告中，都把布朗基说成无产阶级的党。这说明马克思赞扬布朗基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但同时又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评论了巴黎公社进程中的布朗基主义者，他认为这个集团“只是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根植于对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基础的恰当考虑之上。和恩格斯与马克思是私下的雅各宾主义者的说法形成强烈对比，恩格斯驳斥了布朗基的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的提法，声称布朗基主义（雅各宾）的方法是“独裁”的“过时”的革命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之间的差别：像前者一样，它根植于自下而上的真实运动，但是又像后者一样，它意识到社会主义领导权在推翻旧国家上的关键作用。要点在于，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权必须扎根于现实运动中，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实施。正如托洛茨基认为的，将自发行动同领导相对立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伯恩斯坦为了给他修正马克思主义寻找理由，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布朗基主义”，后来的机会主义者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一说法，以此来反对暴力革命。列宁在多篇文章里批驳了伯恩斯坦及其门徒们的狂言滥语。他在《论两个政权》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资产阶级。”^① 列宁还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具体谈了在起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区别。“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② 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区别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可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国的一些人居然信口胡言，也说什么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和愚昧。“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③ 列宁明确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区别，反复声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布朗基主义”，伯恩斯坦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反而使他具有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声。

第三节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评

1898年1月，卢森堡第一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她与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她指出：“对于我们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没有比最终目的更加实际的问题了。正是因为有了最终目的，我们社会主义斗争才有了意义深远的精神和内容，只有最终目的才赋予了 this 斗争以阶级斗争的性质。为运动而运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动，在我看来等于零，而最终目的才是一切。”^①为了反击伯恩斯坦，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将这些论文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名辑册出版。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所提出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最终目的和运动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工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她深刻论证了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立法改良活动，并不具有自己的、脱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无产阶级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她并不否定改良工作，而是把改良看成准备革命的手段，要求日常的改良工作必须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相结合，每一个日常任务的解决都应该是向最终目的靠近一步而不是相反。她认为修正主义者主张以合法改良的道路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并把两者对立起来，其目的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 最终目的微不足道”的观点的批判

（一）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

卢森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针对伯恩斯坦分子的攻击，毫不畏惧，就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与日常斗争的关系作了简短而精辟的分析。她指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把日常斗争超越于党的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这个根本任务之上，她批判伯恩斯坦之流错误地认为最终目的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他们截然相反的看法。她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

^① [苏] 叶夫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①“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②卢森堡还分析了伯恩斯坦之流所强调的整个运动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她通过分析不但否认了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而且提出了“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社会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③，而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抛弃海涅“把最终目的理解为关于未来国家的这种或那种设想，而是要理解为在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④。卢森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锋利明快，像一阵密集的枪弹，打得伯恩斯坦分子气喘吁吁，束手不及。卢森堡指出：“……为运动而运动，在我看来等于零，而最终的目标才是一切。”^⑤并提出“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⑥。卢森堡在同伯恩斯坦论战时虽然强调革命，强调夺取政权，但她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与布朗基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的，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卢森堡认识到，布朗基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不讲阶级斗争而讲暴力暴动主义，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少数精英。这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布朗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⑦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⑤ [苏]叶夫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⑥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6页。

⑦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二) 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实质是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推崇和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走向社会主义

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改良的方式。“难道伯恩斯坦没有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自己没有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吗？”^① 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指出，伯恩斯坦并不是不关心最终目的，而是他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为此他提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从而为他的改良理论服务。确实，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都被看做是“微不足道”的时候，怎么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呢？又怎么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正确性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运动”本身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说只有把“最终目的”和现实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及政策、策略的正确性的。

卢森堡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中指出，伯恩斯坦主义的最危险的一面在于它们的结论，也就是当它们完全成熟时会给运动带来的结论。她认为我们党内所有反对伯恩斯坦的人一致认为，他的观点的最终普遍后果将是“瓦解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她进而指出伯恩斯坦派和党对立的核心是“最终目的和实际斗争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争取政治自由或者社会改良的斗争不过是取得国家政权消灭现今社会的预备步骤，所以在这个斗争中，最终目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的决定性因素，整个斗争因此带有根本同现社会对抗的性质”^②。伯恩斯坦则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他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当成目的，这样他就错误地认为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所有手段都是好的。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实质是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推崇和反对通过革命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手段走向社会主义。她幽默而诙谐地讥讽伯恩斯坦说：“伯恩斯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①。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在此，卢森堡不仅批驳了伯恩斯坦希望改良资本主义的荒唐想法，而且指出了要打倒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筑的这堵高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卢森堡为坚定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还进一步说明了改良主义的下场。她指出：“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运转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堂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③

针对伯恩斯坦所提出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颓废立场，卢森堡说：“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④

二、卢森堡驳斥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

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处处都有“社会主义”成分，比如工会、“工厂立法”、合作社等。无产阶级将愈来愈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工厂立法、建立合作社，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等方式获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权利，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的方式完全可以实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现社会主义，没有必要非要用暴力革命的灾变方式取得政权。

卢森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路线。卢森堡针对此改良主义路线轻蔑地说，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不过是所谓的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这个计划企图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是合作社，二是工会。但是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经济支柱是行不通的。

首先，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关于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在经济改良重要作用的观点。卢森堡把合作社分为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从两个层次分析了合作社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卢森堡指出，就合作社而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而且由于竞争的缘故，肆无忌惮的剥削即生产过程完全受资本利益支配成了企业的生存条件。“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工人必须服从充满矛盾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专制制度来管理自己，必须改革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这种矛盾也就把生产合作社引向毁灭，因为它要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末在工人利益居于统治地位时就瓦解。”^① 伯恩斯坦本人也证实过这一事实，但是他理解错了，因为和波特·韦伯夫人认为生产合作社垮台的原因是缺乏“纪律”，实际上是伯恩斯坦不愿意承认合作社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当它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消除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逃避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②。卢森堡同时还认为，要生产合作社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有一个销售市场，有一批固定的消费者。作为这种辅助手段为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卢森堡指出，“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组合”。^①

伯恩施坦对于为什么只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的原因进行过探讨，却没有也不可能成功。卢森堡对此原因做了解释和说明，她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生产合作社在有消费组合的情况下，也不能存在下去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那就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生产合作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少量的地方销售和少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但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②

其次，卢森堡从工会的职能、工会活动等方面批评了伯恩施坦所认为的工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的错误思想。卢森堡认为工会不可能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工会斗争不能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对伯恩施坦的所谓“关于工会能够通过压低资本利润率直到剩余价值不再存在、资本家的剥削终止，从而为工人赢得公平工资”的观点，卢森堡对此持拒斥态度。卢森堡并不认为工会能够扮演伯恩施坦所赋予给它们的特殊角色。她指出，“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但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

取消也做不到”^①。在卢森堡看来，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这乃是工会力所不能及的。从而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工会发展的进程不可能同伯恩斯坦所设想的相符，即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引向社会主义。卢森堡说，仅仅限于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会活动，实际上仅仅是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节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因而，工会既不能影响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领域，也不能够影响生产自身的规模。在卢森堡看来，工会所扮演的，乃是一种对劳工应得工资分配的监察功能，工会绝没有可能去改变决定实际工资水平的“铁的规律”。因而，工会仅仅可能是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工人免遭最坏的伤害的一种防护性手段，而并非像伯恩斯坦所讲能够是该体系的一种进攻手段。卢森堡认为，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组织教育无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它不可能是夺取政权的手段。伯恩斯坦认为可以通过工会斗争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改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卢森堡指出，“按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本身，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赋予它社会主义性质”^②。

她强调，仅仅有日常的实际斗争如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也说明了卢森堡并没有否认其他斗争方式，而是试图说明采取纯粹的改良方式，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卢森堡通过对工会和合作社职能的分析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使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方面成了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西西法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山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顶，石滚下山坡，又得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的工作)。但是，如果工人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行情应得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应当加以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更确切些说，要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那么西西法斯的工作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以两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停止增长；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这两种情况，也和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都得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但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卢森堡以此说明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即合作社和工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已经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卢森堡同时还指出，“其实伯恩斯坦自己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它们只是看作可以撕下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以使工人致富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斗争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但是资本主义如何实现分配呢？伯恩斯坦实际上这是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上，他希望寄托在“公平的”、“较公平的”甚至“更加公平的”的分配。但实质上又是怎么样的呢？“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自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①，卢森堡以此说明，仅仅通过资本主义的改良，实质上是无法实现伯恩斯坦所想的。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框里的分配，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本身。一句话，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斯坦的方法则相反，他想同资本主义的分配作斗争，并且希望通过这条道路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②。伯恩斯坦妄想通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好像是一个病人身上长了恶性肿瘤，但他却坚决不同意做手术割除这个恶性肿瘤，而是妄想使病人通过服用一些药物能控制肿瘤，但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卢森堡基于上面的分析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的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发展趋势吗？根本不是。因为，第一，他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他所希望达到的生产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则。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他在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不得不抓住唯心主义的论据不放。这就是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靠经济的必然性，而是靠公平的理解力，靠公平的观念。“伯恩斯坦实现公平分配靠的是人类不依赖于经济必然性的君主的意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既然意志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那就靠公平的理解力，总之，靠公平的观念。”^①但仅靠公平观念是否可行呢？卢森堡以讥讽的口吻说：“我们幸运地找到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运转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堂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②

最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工厂立法”这样的措施提出了质疑，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的“工厂立法”看做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监督”。那么伯恩斯坦所说的实施“社会监督”又是什么呢？在他看来社会监督的理想状态就是让社会同工会组织一起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文，让资产阶级根据这些条文行事。在伯恩斯坦看来，这种“工厂立法”的过程就是走向议会社会主义的过程。

卢森堡指出，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社会监督”，因为它不是自由劳动者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这种性质的监督，在其监督主体、监督对象或监督性质上，丝毫不包含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伯恩斯坦所宣称的社会监督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干预，而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调节。卢森堡认为，所谓的工厂法、对劳动的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这些被伯恩斯坦视为社会监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督的东西，“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①。

既然以工厂立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监督”是以不触犯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那么这种社会监督也就根本不会在所有制变更和剥夺“剥夺者”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也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迈出一大步。卢森堡讽刺伯恩斯坦说：“如果伯恩斯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② 卢森堡指出，如果这种调整手段能终止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并能消除其矛盾的话，那么日益发展的生产社会化就会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多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客观上的必需，而只是一种空想而已，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总之，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上的内在矛盾必然引起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可见，卢森堡对革命进程中的“不和平”一面认识是十分清楚的。

三、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伯恩斯坦在“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修正主义公式中企图将议会及工会中的日常斗争与对社会的革命性重建的最终目标对立起来。针对伯恩斯坦的这一企图，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他把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目的和运动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认为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主张以合法改良的道路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并把二者对立起来，这就意味着选择一条不需要建立新制度，而只是在旧制度中做些无关紧要的修修补补的工作，选择了一条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社会主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她认为，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其外壳里挖出来，就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卢森堡反对盲目冒险的布朗基主义，但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在无法像药剂师那样精确地测定是否有百分之百革命成功的可能性的时候，采取节制斗争和谨小慎微的策略是不正确的。她完全赞同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中高度评价了卢森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问题，而在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方法论的精华，即总体论的方法，而卢森堡正是继承了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论，并以此为武器来批判伯恩斯坦的。他认为伯恩斯坦假借马克思的名义，“开始对辩证法猛烈地攻击，这绝非偶然。因为只要你根本上放弃了总体性的观点，你肯定会舍弃辩证法的出发点、目标、假定和要求，这是必然的。这样就不会把革命作为过程而是作为部分去理解”。^① 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篇文章中，正是从总体性方法的视角批评了伯恩斯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卢森堡首先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选择性的标题作为文章题目进行设问，引发人们对改良和革命关系的深入思考。她说：“本文的标题乍一看来令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吗？或者说，它可以把构成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吗？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卢森堡并没有反对改良，只是她不赞成伯恩斯坦把社会改良和社会目的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片面强调改良之路。“我们在爱德华·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 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0 页。

伯恩斯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① 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在他发表在 1896—1897 年《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论文和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表述了他片面强调改良的理论。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不但把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而且要用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他不但把“最终目的”与“运动”对立起来，而且要用运动来取消、代替最终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卢森堡认为，在改良与革命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再一次暴露出来了。他竟武断地将任何改良和革命都机械地划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认为，立法（二版改为合法的改良）是理智的，革命的发展是却是纯粹感情的，立法（二版改为合法的改良）是有计划的工作，而革命则是自发的暴动。这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伯恩斯坦对矛盾观点的蔑视。在对待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上，卢森堡讽刺伯恩斯坦好像是在用“称”来称量桂皮和胡椒一样来精确测量它们，唯恐革命的砝码增加。实际上他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②，那就是，“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批判伯恩斯坦错误看待革命与改良观点之后，卢森堡进一步指出，合法的改良和革命“并不像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③。合法的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不是因为时间长短的不同，而是两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它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据。卢森堡指出，合法的改良总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它感到已经成熟到足以夺取政权，推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0 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1 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0 页。

翻整个现存的权利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为止。伯恩斯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咒骂为布朗基主义的暴力论，他的错误就在于，把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轴承和动力的东西看做布朗基主义的错误。为此，卢森堡指出，“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量的变动”^①。卢森堡关于最终目标与日常斗争的辩证分析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含蓄假设，即一个肯定的未来是能够建立在对现状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对伯恩斯坦方法论的剖析，卢森堡从伯恩斯坦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而是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取剥削的轻些或少些，一句话，仅仅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②卢森堡在明确了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改良的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在对待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观点，她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他们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伯恩斯坦“开始，他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③。这一点，他和形而上学地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有点相似，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 和“运动”观的认识

1899年3—4月，考茨基开始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对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文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做出了详尽的系统的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他发表在《新时代》第二卷上的三篇论文：那就是第27期的《伯恩斯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8期的《伯恩斯坦和辩证法》和第29期的《伯恩斯坦论价值学说和阶级》，这三篇论文对伯恩斯坦所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后来，根据党内许多同志的建议，考茨基对他发表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的这些论文作了修改，并作了一系列的补充论述。1899年秋，整理出版了他的题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反批评》的著作。这一著作正式推出之后，倍倍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祝贺你反驳伯恩斯坦的小册子，很出色，它严厉地谴责了爱德。爱德读了之后大概会明白，不可能和你继续合作下去了。”^①“关于伯恩斯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②列宁一方面写了书评，对考茨基这一著作做出了肯定评价，另一方面又授意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将这一著作译成俄文。

在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因为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才通用的，“在这一格言下所进行的宣传并不是有益的”。伯恩斯坦认为时代变了，无产阶级专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5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3页。

政学说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他将议会制度理想化，把议会斗争、通过议会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高的、决定性的形式，这就是他的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

考茨基认识到，由于党内不少人深受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还缺乏足够的社会主义觉悟，这已经成为制约无产阶级战斗的一个障碍。为此，考茨基言辞激烈地批判了以伯恩斯坦、福尔马尔为代表的、那些妨碍无产阶级认识自己力量和参加夺取政权斗争的机会主义者，强调只有自由主义者才幻想不消灭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而只通过各个阶级的某种自制，来建立阶级之间的社会和平。考茨基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阶级协调和社会和平的幻想”^①。正因为“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②因此“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③，“无产阶级只有在根本不同于现存制度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满足”^④。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证的这条原理，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18世纪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欧文和傅里叶的拥护者等。但是考茨基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须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虽然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但是他又进行了区分，即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布朗基的不同之处。从这些可以看出，考茨基在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时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并不像伯恩斯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看做“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

① [奥]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1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8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一、考茨基对“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关系的认识

伯恩斯坦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考茨基前期对伯恩斯坦关于此问题的看法保持缄默。但是，他在1918年《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中在谈到“民主和夺取政权”的关系中还是谈到此问题，他说：“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①考茨基又接着解释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②这段话明确说明了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它是针对一个阶级或政党，还是一个性别或种族。

在实现“最终目的”的方式上，考茨基指出：“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绝不可以断言，在何处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正象我们的敌人无力阻止这场革命一样，我们也无力制造这场革命。因此，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挑起或准备一场革命。既然革命不能由我们任意制造，我们也就丝毫不能说，它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出现。”^③考茨基说明了实现最终目的方式千差万别，具体采取何种方式，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考茨基反对通过秘密结社的方式夺取政权方法。在考茨基看来，夺取政权的方法一般分做两种：秘密组织和群众斗争。但是前者的结果往往是“导致个人独裁，或一小撮人的独裁”，因为“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6页。

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而是一种单纯的、上下级命令服从关系；后者却能“组织和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民主”，再有，“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①。考茨基倾向于通过民主动员更多的无产阶级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

考茨基接着还进一步论证了为什么要以支持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斗争目的缘由，那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最后胜利”^②。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评以及关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关系的论述

（一）考茨基对伯恩斯坦误认为社会民主党只重视走革命道路的批评

考茨基指出伯恩斯坦一再强调走合法道路，好像社会民主党不赞成走合法道路，而只希望走武装斗争之路似的。但实际上他理解错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内也是赞成走合法道路的。伯恩斯坦之所以错误理解了社会民主党，那是因为伯恩斯坦同党失去了接触。“如果他向我们说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们于死命，却会致我们的敌人于死命，……伯恩斯坦说这些话干什么呢？难道党内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场上吗？……”^③

考茨基非常遗憾地指出：“伯恩斯坦曾经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6页。

一场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①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后来，他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通过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政治革命的方式是多样的，他反对布朗基和魏特林的做法，即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暴力革命会留下两个瘤疾：第一，整个无产阶级并未成熟到必须革命的阶段，因此，政治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精神状态上，不能成为统治者和管理者；第二，大权独揽的救世主往往在政治革命后成为新政权的独裁者，革命成为改朝换代而丧失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

（二）关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关系的论述

考茨基在1902年所发表的《社会革命》一书，专门论述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关系，在这本书中考茨基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第二部分是“社会革命后的日子”。在第一部分，考茨基区分了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他指出，“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②。而在于改良是“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的任何变革^③；而社会革命则是指“受压迫阶级的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④。所以，夺取还是不夺取国家政权，这才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区别所在。考茨基还意识到，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对统治阶级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指出，“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6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①。考茨基在此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改良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社会革命则是要消灭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由于“政治范围还太狭小，社会意识还很不发达”，因此，“是不会有这种社会革命的”^②。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社会革命也将消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社会阶级中最低的阶级，必然利用它的统治去消除一切阶级统治和全部阶级，从而也将消除任何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③。考茨基通过对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是可以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等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因为，“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④。因此，伯恩斯坦等人的“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⑤。这些都充分说明考茨基在理论上不是赞成改良，而是希望革命的。我们也且不要强求弄明白他为什么后期在实践上反对革命。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无论经济发展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⑥。考茨基认为，与自然界和生物界一样，“革命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是缓慢的、逐渐发展（演进）的结果”^⑦，“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结束，而只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开始”^⑧。

更为重要的是，“如一切动物必须经历一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⑤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⑥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0页。

⑦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⑧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①，这里也进一步明确了考茨基并不像伯恩斯坦那样只强调量变，强调渐进式的改变，他没有否认突变。考茨基简要回顾了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分析了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社会革命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第一，“现代国家中任何一桩重大的政治变化都会立即极深刻地影响着广大的社会领域”；第二，“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第三，“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上的威力，较之以往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四，“现代国家还拥有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另外，“竞争成了推动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使得“国家权力越强大，统治阶级就越依靠国家权力，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特权，而不愿意作任何让步”^②。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使得社会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而且“统治阶级越是依赖国家机器，越是滥用它来从事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愤恨就必然越强烈，阶级仇恨就会越增长，夺取国家机器的劲头就会越强大”^③。对于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正在缓和的论调，考茨基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强烈的批驳，指出当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无产阶级愈加的贫困，剥削正在加剧。但是，与经济水平的提高落后于资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在道义上和思想上迅速而不断的提高”^④。正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加剧，无产阶级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的提高，使得资产阶级内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特别是从资产阶级圈子里冲出来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构成了最激进和最革命的一支力量”^⑤。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⑤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三、既批评又调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认识

考茨基原则上主张社会革命，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他又采取了一条类似于伯恩斯坦的道路，即企图通过议会等和平手段来取得政权的道路。

（一）考茨基对伯恩斯坦通过各种手段“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批评

考茨基在1902年写的《社会革命》一书中，驳斥了各种以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的理论，批判了伯恩斯坦企图通过议会实现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他不提名地指出，“有不少政治家指出，只有处于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下，才有必要发动革命；有了民主，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①。考茨基称这种人实际上只是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了通过民主、合作社、议会等方式可以代替革命的田园景色。但实际上“这样的田园景色只有在作为矛盾一方的无产阶级日益茁壮成长，而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资产阶级仍然原地踏步不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②。但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资本主义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③考茨基还以铁路和分娩为例，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实质只能是被压迫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突变过程，即他所说的“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④。考茨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指出欧洲大陆到处都是军国主义的最发达的形态，到处都是专制主义统治着的官僚。在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发言指出：“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诚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民主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取得。”^①考茨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得到党的领导人的肯定。德国党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同一天的发言中说：“当考茨基在原则的基础上并且从理论和科学的高度对问题作了说明以后，整个代表大会对他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只有考茨基才把关于策略的争论引导到恰如其分的原则高度。”^②1898年10月16日，倍倍尔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讲到“特别是卡尔的自发介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③。倍倍尔的话肯定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同时肯定了他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这场斗争的进行。

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分子想通过保护劳动、工会和合作社的法律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足以把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排挤出去，并且不知不觉地剥夺他们，而无须乎进行政治革命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的观点只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普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因为仅仅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是不可取的。考茨基还批评了有些人认为不通过革命，也就是不通过夺取政权的急剧手段，而只借助于同靠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的错误观点。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占据了人口大多数和政治上成熟了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使得两个阶级不可能分享国家政权，因而也不可能联合。

考茨基还批驳了在所谓的民主议会制度下革命时代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论调。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力量增长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8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51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1页。

长，资产阶级会想出和采用新的抵抗手段和压迫方法。伴随着无产阶级合法的议会斗争，议会在国家中的作用正在逐渐的减弱，“议会制度愈来愈没有能力去朝着某一方向推行一种坚定的政策。它已愈来愈显得老态龙钟和软弱无力了”^①。正因为如此，“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②。考茨基阐述了对民主制的看法，他认为，“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③。考茨基强调，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所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估计过高，“实际上它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④，“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是一种空想”^⑤。

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中指出，“社会主义者懂得，不是异想天开的阶级协调，而是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在社会中建立和平”^⑥，但是，伯恩斯坦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由于他失掉了对革命的信心，那么他就只能盼望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把其他阶级逐步吸入自身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和平地、不知不觉地消灭阶级。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调和

考茨基曾经一方面反对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阶级协调和社会和平的幻想。……不是异想天开的阶级协调，而是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在社会中建立和平”，但另一方面他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⑤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⑥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又指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包含着极其现实的内核”。^①按考茨基的分析，“长入”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所依据的事实将为现实的发展所证实，同时证明着我们正在实际上走向社会主义”^②。马克思学说曾描述这一过程，并且论证了它的合规律性变化，但伯恩斯坦回避了长入过程中的矛盾，只突出其可能“和平长入的一面。”

当时，考茨基身为德国党的领导人和理论权威，没有忽略伯恩斯坦修正的“现实内核”的那一面，也没有回避对改良主义的批评。他指出，“长入”社会主义，是一个客观过程，它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资本的积聚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是“工人阶级也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即“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中无产者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无产者正在成为社会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的组织也在日益发展……”^③。考茨基认为，这种“长入社会主义”的前景是相当诱人的，“只有具有真正恶魔性格的人才拥护那种将要破坏如此美妙的‘渐进的改良主义高涨’的大变革。”不过，他也认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的错误在于，实际的“长入”过程“不是单一因素的发展，而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发展”，这样，“长入社会主义不外就是长入那个将动摇国家一切基础的伟大战斗，这个战斗将不可避免地日益激化，并且只能以推翻和剥夺资本家的阶级告终”。^④修正主义者虽然不愿意承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不曾提出任何反对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考茨基指出，即使修正主义拿出他们所认为的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并不能证明“长入”社会主义，而只能证明社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最后，这一切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必须用个人的巨大创造和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加以添补。但是，这个应该补充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由意志，实际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上不外是长入理论的寿终正寝。”^①

从这些方面来看，在理论上，考茨基一方面承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错误之所在。但是，考茨基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是不一致的，在实践上他是彻头彻尾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践行者。考茨基认为：“从现在起发展能够和平地进行，当然不是没有斗争，但是毕竟可以不经大的灾变。无产阶级得到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通过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通过建立合作社等等获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融化到社会主义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斯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错误，而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在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国去找。”^②这就是说考茨基对于伯恩斯坦鼓吹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真正反对，他反对的仅仅是把适用于英国的策略错误的照搬到德国来了。而笔者以为两人的分歧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实践证明重要的不在于“和平长入”的策略究竟适用于哪一国，而在于他们是否都赞同这一策略。

作为《社会革命》的“补充”，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但这时他侧重于阐述革命中合法手段同非法手段相结合的斗争方式。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说：“没有政治上的胜利，我们就不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有强大的、富于战斗力的、确相信自己力量的工会的帮助，我们也就不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③他进而指出：“党和工会协同工作的可能性却为它们有效地进行活动开辟了广阔的余地，并且使它们能够实现那些既有助于工会工作的发展又有助于政治工作的发展的措施。”^④但是，在考茨基这两本最激进的著作中，却隐藏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② 《考茨基言论》，三联出版社1966年版，第37—38页。

③ [奥]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页。

④ [奥]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页。

着一种深层的消极感，这就是当接触到现实问题时，尤其是当涉及革命的具体斗争方式时，他选择和平的手段：议会斗争、罢工、示威、报刊等。在他看来，这些方法虽然“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少”^①。由于考茨基过于依赖合法的斗争方式，不敢同资产阶级决裂，与他们斗争，而把革命的胜利推向了无限遥远的未来。由对非法斗争具体形式的否定，考茨基实质上也同时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可能性，虽然他一再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强调应坚持走社会革命的道路。

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②这就凸显了考茨基理论和实践上的“两难选择”，也造成了他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在革命这个问题上真可以形象说明，考茨基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进而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实现。”^③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繁荣景象之后，他更消极地认为：“最近几十年来，政府是无限地加强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却被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④既然否定了罢工等非法的革命形式，否定了革命的实际可能性，那么，考茨基实质上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走了一条同伯恩斯坦相同的道路，即社会改良的道路。实际上，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坚决地避免一切可能无谓的挑起统治阶级采取实力政策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就应当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从这里着眼。”^① 考茨基指出，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不清楚革命是不是流血的，是物质力量将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仅仅用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压力作为手段来决定胜负，不过，他认为，后一种手段即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手段将比物质力量即军事力量占优势。正像周宏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境遇》中所分析的那样，考茨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所以我们可以不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前提下，把最终目的适当淡化，充分利用议会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的权益，保护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而一味地强调革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当谈及目前的斗争情况时，他分析道：“从整个情况来看，通向在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重大历史局势的钥匙，今天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只有一种情况才会使我们失去这把钥匙，破坏对我们很好的形势：这就是我们的愚蠢。如果我们急躁冒进，打算在果实成熟之前就去采摘，如果我们打算在决不能保证我们胜利的情况下过早地挑起一场搏斗，那就是愚蠢。”^② 他明确认为：“有一切理由设想，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中，后一种手段将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所用的实力即武力更为优越。”^③

在第二国际召开的巴黎大会上，针对米勒兰入阁问题，考茨基提出了一项关于夺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决议案中，他仍然坚持上述观点。“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④ 考茨基因此主张，政权的获得“只有用争得一个又一个部长席位的方法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实现，“而不需要通过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② 转引自周宏：《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境遇》，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6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④ 《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页。

革命”。^①

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考茨基采取的是一种企图调和右派和左派的立场。虽然他在原则上主张社会革命，但当面临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时，他又采取了一条类似于伯恩施坦的道路，即企图通过议会等和平手段来取得政权的道路。在他看来，这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现有权利而采取的、调和右派和左派观点的两全其美之策。因此，当在新形式下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时，考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虽然口头上坚持社会革命的立场，但实质上采取的却是同伯恩施坦等右派理论家相同的取向，只不过他比伯恩施坦的说法更为委婉而已。考茨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致维·阿德勒的一封信中，针对伯恩施坦的“不委婉”的说法，他这样说道：“要是他从反对社会民主联盟发展到最后陷入反对全党，我们一定得努力使他离开伦敦。他必须重新和党接触。那时他的想法也许仍和今天一样，但说法就不会一样了。正是以机灵著名的他如今却一点也不懂得，要揭露一种幻想，就必须做得使我们的人能接受这种揭露，而敌人又不会把它看成是让步。”^②当他晚年回忆自己与伯恩施坦的关系时，他说：“我们两人各自保持其理论上的特色，但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上，我们这时几乎总是一致。”^③当然，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看法上，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以为民主具有纯粹的、超阶级的、永恒的价值，这是构成他们策略基础的出发点，最终导致他们两人最后殊途同归。

对于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实质上的一致性，美国历史学者卡尔·休斯克认为，虽然他们之间有争论，但是，“争论双方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主

^① 转引自〔苏〕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李兴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页。

^③ 〔奥〕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叶至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8—29页。

观上的。这种分歧是对现实作出估量的观念上的分歧，而不是行动领域中的分歧”^①。麦克莱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许多方面讲，伯恩斯坦与考茨基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不论他们在无产阶级孤立的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都完全投身于议会策略中”^②。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认识与批评的意义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系的阐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伯恩斯坦割裂了“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关系，片面强调“运动”，而忽视了“最终目的”。三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系的认识与批评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思想

众所周知，伯恩斯坦片面强调通过民主、议会、普选等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运动，而不关注“最终目的”是否能得以实现。他这样做，实际上忽视了为了取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所需要进行的斗争的艰巨性和反复性，一概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改良上的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在英国、美国、荷兰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国家谈论“旧社会可能和平地

^① 转引自 C.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p2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②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 页。

长入新社会”，尚有一定理由的话，那么在半专制主义的德国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实属一厢情愿的幻想。德国政府曾在1878年至1890年期间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将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在这以后，它又多次企图制定其他形式的镇压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法律。一句话，在当时的德国，伯恩斯坦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尤为严重的是，伯恩斯坦在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的过程中还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赞成暴力革命，而反对和平改良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19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由自由放任向垄断发展的趋向，其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也得到了发展。60年代，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重要作用。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的巴黎公社在遭到镇压的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却异军突起。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面对这些新的情况，马克思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论述无产阶级可能利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

马克思强调，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传统、习惯等不同，革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把暴力的、和平的两种方式并列地提出，并明确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说：“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①马克思在1872年也曾指出在英国、美国甚至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有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中，论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斗争采取何种方式，不决定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当该社会中的掌权者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①。

而对于这类国家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包括议会民主，以及如何实现这个过渡，马克思没有更深入具体的论述。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德法等国社会党利用普选权在议会斗争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对马克思和平取得政权的思想有很大发展。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②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虽然把变成了民主共和国的法国与英美一起列入可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但仍然认为在“半专制”的德国，和平合法的斗争只是积蓄力量的手段，还不能马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此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免德国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不知所措”。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愈发展，工人阶级就愈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争取合法权益，直到具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排除在民主制发展比较完备的国家工人阶级合法手段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伯恩斯坦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曲解恩格斯晚年关于和平夺权的思想。片面认为只有通过议会、工会、一些地方自治机构等领域进行改良工作，逐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就可实现社会主义。

通过三人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观的认识与批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卢森堡、考茨基等都是坚持革命与改良两条斗争路线的，这有助于消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者只注重革命，是布朗基主义者的错误看法。正像威廉·李卜克内西所指出的那样，伯恩斯坦陶醉于英国资产阶级巨大的、同时也是民主主义的发展。他指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和英国的不同在于，英国摆脱中世纪时期已经两个半世纪了，而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这里现在还得同中世纪的破烂货作斗争。德国没有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改良和连续不断的发展的优点，在我们这里主要是曲折前进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取得统治，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统治。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让位了，容克即资本的护卫军则随时准备把事情推向灾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不会发生任何灾变，那是愚蠢的。”^①但同时，李卜克内西还指出：“我们不想要政治灾变和暴力斗争，确实不想要，但是，俾斯麦一直到死都一心想实现一种想法，他最渴望不过的就是将无产阶级诱入街垒战，唆使他们进行街垒战，这种思想现在也还占据着支配地位。我们试图避免灾变，但是我们的敌人在准备灾变。所以在策略上和原则上必须坚定不移。”^②卢森堡也是这样认为，并身体力行的。

考茨基由于置身于欧洲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和工人运动的现实，在策略问题上提出了更大程度上是反映西方发达国家国情特点的策略。这一策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过渡的策略思想，比较具体地回答了这类国家走民主和平道路的条件、途径及必然性，并在理论上就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等理论进行了研究。考茨基考虑到西欧的情况，他既不赞同列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夺取政权，也不认同伯恩施坦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说法。

当然，我们肯定考茨基的策略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平过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合理性，但并不认为这一理论没有错误或片面性。考茨基的理论很明显有一种庸俗生产力论的倾向，这从他千方百计地反对十月革命能看出来，他和伯恩施坦曾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指责十月革命。他曾经批评布尔什维克，指责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停留于从俄国的独特情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做法，并且用特殊条件的特殊性来说明这种做法正确，按照他们的看法，由于特殊条件的特殊性，他们除了专政或是让位之外不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后来却宁可采取这种方法：即为了替他们的做法找根据而创造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1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2页。

出一套新理论，并且主张这种理论应该普遍适用。用考茨基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话来评价他自己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他以西欧发达国家为范例，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常道路应是民主道路，从而否定了经济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的合理性，而斥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实际上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形式。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在国内，与资产阶级和其他的反革命势力拼死反抗做斗争；在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正是基于沙皇俄国的特殊国情，列宁比较多的强调暴力革命，虽然强调暴力革命，但是也不是一味地依靠暴力革命。

通过三人对伯恩斯坦的认识与批判，我们还了解到伯恩斯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他抛弃革命的方法论依据。因为他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必然会孤立地理解革命，对此卢卡奇指出：“如果真是这样，好像马克思的革命的一面果真要堕落到早先的工人运动时期，即布朗基主义那里。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卢森堡当时所偏重的革命路线既符合当时俄国、德国的实际斗争情况，又进一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有助于引领工人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些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因而正像卢森堡曾明确地说过的那样，与伯恩斯坦的论战“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站在不同的基地上”^①。

综上所述，不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卢森堡都没有片面地强调暴力革命，反倒是伯恩斯坦不分条件地片面强调采取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因而他的想法不但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而且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嫌疑。回顾历史可看到，工人阶级用来争取改良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几乎都是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经过流血和不流血的斗争获得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产阶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级比较软弱，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通过斗争才能取得。在封建残余势力严重，官僚军事机构强大的国家，工人争取改良的斗争往往遭到暴力镇压，因而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暴力的性质。在有些国家，比如俄国，暴力革命几乎是唯一出路。

但我们在批判伯恩施坦“和平长入论”的改良主义的同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在充分民主的国家里就可以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二、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始终是 “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伯恩施坦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永远不能达到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由此，他认为，与其要劳动人民去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最终目的”，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经常的具体任务上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一些点滴的改良，谋取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来得“实惠”。

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决不应该满足于眼前、暂时的微小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正如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中所指出的，“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①。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搞清楚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他通过同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以及取消派的斗争，严重打击了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党内的影响。他指出，“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行的伯恩斯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①。

为了动员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认清修正主义的根源、危害并予以反击，卢森堡发表了《党代表大会的回顾》一文，她在此文中谈到，毫无疑问，关于策略的辩论是斯图加特大会讨论的重点。她严正地指出，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从党诞生时起，日常的实际斗争同最终目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直到最后也将始终如此，只要党还存在和发展着，这个问题就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一定要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②。自从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取消后，党“在合法性的阳光照耀下蓬勃发展，这就带来了新的危险”，即过高地估计日常的改良工作，产生了日益抬头并趋于成熟的机会主义倾向，这对党的活动造成了危害，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才是区别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因素。“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③李卜克内西也指出，如果我们党抛弃了自己的原则，抹杀了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界线，不再能使党员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们党也就失去了力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只要我们放弃了这种斗争，我们就没有力量了”^④。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批评，正是清醒地认清了这个问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4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2页。

题。她批判伯恩斯坦割裂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关系，将社会改良从社会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整个运动的目的，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这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上的差异问题，它涉及整个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性质，关系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①。

三、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理论上的争论关系到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

伯恩斯坦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理论对俄国的经济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经济派只强调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却不鼓励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鼓励工人只关注于当前利益，而不关注于工人阶级的前途和最终目的。

列宁在1902年的《怎么办？》中批评了经济派，提出要用灌输论的思想工作方法培养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说明如果不能较好地处理“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争论，而单纯依靠工人的自发性，这必然会影响到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也势必会进一步助长伯恩斯坦主义。

卢森堡明确指出了革命和改良的辩证关系，批评了伯恩斯坦片面强调改良的错误观点，指明了党的策略原则。为广大的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和合法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卢森堡还通过对伯恩斯坦的批评，说明了不要轻视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辩论，不要认为这种争论只是知识分子的事，如果认为理论争论只是知识分子的事，那就是对工人的侮辱和诽谤。“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争论关系到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工人必须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她后面在文中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认识这一点[在目前]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谈论的问题正是他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们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影响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斯坦从理论上表述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①。这充分说明同伯恩斯坦分子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争论的必要性、紧迫性，如果工人不明确最终目的，就会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工人运动就会失去方向。“正因为如此，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地、深入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的理论争论。”^② 卢森堡还进一步强调不能让理论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要让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化为精神武器。她认为：“只要理论认识仍然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那它就总是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③

四、“最终目的”和“运动”的争论， 关系到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中谈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空想上的东西：人们为了这种变更而诉之于基督教精神、正义、平等或者随便哪一个其他的‘观念’”^④。为此，他鼓动“回到康德去”，主张社会主义要引进伦理因素。在伯恩斯坦心目中，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3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的“功效”，远远胜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空想观念。在前面所述这篇文章中，伯恩斯坦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① 伯恩斯坦把康德的伦理社会主义当做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但伯恩斯坦却把康德的“善良意志”、“绝对命令”等伦理思想当做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而康德的“善良意志”、“绝对命令”等是以上帝为保证的，只存在于彼岸世界，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实现的信心，不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目标的实现。

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历史轨迹，完整地展现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得了成功，这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俄国为什么先于西欧北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正确回答这些新的重大课题，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努力实现理想；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俄国的现实国情，致力于探索适合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这一艰辛探索的成果铸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朽的里程碑：一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二是在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基本思路，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卢森堡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块“处女地”，未来社会并没有现成方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案，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开拓和创造。在她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是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① 从此可以看出，卢森堡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作具体详细的描述，也不像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在致力于未来社会的空想。虽然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未做详细地描述，但在她的许多著作、演说中，还是谈到了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比如在《斯巴达克同盟想干什么》一文中，就给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一幅社会主义的简洁图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②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我们正是通过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论争，通过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认识与批评，才清楚地知道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最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巨大气魄，不无鄙夷地讥讽说，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便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发展，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它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破烂货的堆积，“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③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②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第四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等 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伯恩施坦认为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越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越少，“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①。据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应该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拒斥把权力和所有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他还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巴贝夫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应成为一个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逐渐改革的道路来实现的目标，只有经过耐心的工作，才能从内部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运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

^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第一节 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 议会及政党的思想

伯恩斯坦根据他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民主党完全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合法的议会活动，通过普选、投票，争取议会多数等点点滴滴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指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少”^②。他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诬蔑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和“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是“恐怖和独裁政治”。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时候，是把法国恐怖革命当做典型来做的，它对于铲除封建主义及其等级制度来说是适用的。但是伯恩斯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因此用不着铲除它们。伯恩斯坦由此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的方式，通过民主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比如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应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和利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在经济上，则可通过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通过工人的经济组织像工会、合作社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总之，伯恩斯坦希望借助于他的“全民党”理论，并通过民主和议会以及争取普选权等和平改良的办法，实现他“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6 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2 页。

改良愿望。

一、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

伯恩斯坦认为，就政治上说，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已经使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变得过时，因为他们已经有可能通过议会选举赢得社会主义的实现。工人阶级应该从关注眼前开始，通过他们完全可以做到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过渡而努力。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伯恩斯坦认为，民主就是“不存在阶级的政府”。因而，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应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和利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伯恩斯坦的这些观点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民主论最早做出的较为系统的表述。

（一）民主是不存在阶级的统治

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也不是全民的民主。但伯恩斯坦却不赞成民主具有阶级性，他把民主视为“全民的民主”。他认为把民主解释为“人民的统治”，如果这样定义的话，不过是给民主下了“一个十分肤浅、纯粹形式的定义”，因为这样定义，会给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这一思想留有余地，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表现。伯恩斯坦还认为，民主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都被证明是社会进步强有力的杠杆。他继而进一步指出，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和形式。因而他认为如果把“民主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特权，那么我们就同问题更为接近得多”^①，而“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种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②。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强调民主对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于社会主义具有关键的意义，“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①。从手段看，民主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从目的看，通过普选权、议会民主制的扩大就可以使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比如像英国、瑞士、法国等，“民主已证明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如果单纯从伯恩斯坦所讲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我们很难发现其错误之处，但实质上，在当时专制的德国，只要民主而绝对否定专制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能是理论上的推论。实际上民主必然是以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无论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阶级的统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再进一步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伯恩斯坦话语中自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的地方，他一方面强调民主是不存在阶级统治，一方面又说，“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可以放弃，那么这也是有分寸的”^②。从中可以看出，伯恩斯坦所强调的民主就是妥协，就是放弃专政。因而，“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这句纲领性口号，在伯恩斯坦那里，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非理性的顶礼膜拜。他认为，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上镇压职能的削弱，“民主”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力宣传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有益的”。

比如，在英国，“国家对内几乎完全失去了镇压机器的性质”；而且“几乎在一切西方国家里，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的态度，而不是镇压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

（二）“民主”就要放弃宣传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可以改变和消灭资本主义

伯恩斯坦为了达到要无产阶级放弃宣传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从而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他竭力神化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吹嘘为一种能够改变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存在，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民主党完全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合法的议会活动，通过普选、投票，争取议会多数等逐步的改良，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必搞流血的暴力革命。他认为，“民主”就是不存在阶级的统治。他认为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只要强调“民主”，重视民主就足够了。“党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由于强调了它的民主性质、作为工人的民主派而强大起来的，我认为这一点即使在今天对党的斗争来说也完全足够了。”^②

（三）“民主”就是放弃阶级斗争，实现参与的民主

伯恩斯坦割裂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抽象、孤立地认识民主，他只强调民主，否定、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已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了。他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已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议会民主制“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③，“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并坚信“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⑤；因而，他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说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②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⑤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成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和“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在伯恩斯坦眼里，“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姑且撇开事情的当否和实现可能性不谈，如果激起了下面这样的思想，那就只能看成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一种返祖现象”^①。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和独裁政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改良、通过民主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伯恩斯坦说：“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② 这样的民主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致了。因而伯恩斯坦妄图独辟蹊径通过工会或工联及工会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参与的民主，他认为这也是实现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的渠道之一。伯恩斯坦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不重视的、在实践中又连遭失败的合作制经济，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表明自己的生命。“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合作制的规模和活动领域都在迅速增加。”这些合作制对于导致工人摆脱雇佣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到目前为止，生产合作社只是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指点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按照哪一方向寻求工人合作社的最有成功希望的继续发展”^③。

与之相适应，伯恩斯坦指出，工会或工联在争取工人权力和解放斗争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工会或工联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说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④ 伯恩斯坦还进一步解释说：“把工会首先理解为民主不可缺少的机关而不仅是暂时的联合，这一功劳应当归于若干英国著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作家。”^①也就是他强调指出实现工会民主并不是他的首创，他想通过工会实现参与民主的思想是合情合理的。伯恩斯坦还进一步断言，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主要“靠言论、报刊、投票纸进行斗争”，“一切对民主制度要求有发言权的党派必须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只有”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伯恩斯坦所讲民主是同专政相对立的，被阉割了阶级内容的、超阶级的民主，即所谓“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这种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伯恩斯坦从民主与专政的抽象对立出发，否认专政。伯恩斯坦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美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二、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议会的思想

巴黎公社失败和第一国际解散后，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暂时繁荣的景象，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立宪的、议会的国家制度繁荣昌盛的时期。

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首先使用“议会迷”这个术语。议会迷们把议会斗争看做是唯一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由于痴迷拉萨尔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因而也是一个议会迷。他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还通过考察，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即将崩溃，而是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应当破坏它，而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应当进一步发展”它，不应当搞“革命”、“起义”，只能搞“社会改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应该要以普选权作为支点，以议会作为场所，以费边主义的市政社会主义作为杠杆，走“立法或者合法改良的道路”。

(一) 普选权是能“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

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伯恩斯坦把民主和普选联系起来，他认为实现民主的关键，在于工人有普选权。他说普选权是能“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①。也就是说，在伯恩斯坦看来，只有普选权，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由仆人而变成为主人。1904年，他在为纪念拉萨尔逝世40周年而写的《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中盛赞拉萨尔在争取普选权方面的功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拉萨尔对普选权所作的研究和鼓动工作，“俾斯麦在一八六六年是否会实行民主的选举权，是大可怀疑的”^②；而如果没有普选权，德国“尽管仍旧会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经济发展会促进它。但是未必会有如此强大、如此统一、如此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③。他在此书的最后用黑体字引用了拉萨尔的这句话：“直接的普选权，这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政治原则，而且还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④他以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② [德] 伯恩斯坦著：《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郑异凡、梁建华、于沪生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0页。

③ [德] 伯恩斯坦著：《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郑异凡、梁建华、于沪生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0页。

④ [德] 伯恩斯坦著：《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郑异凡、梁建华、于沪生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0页。

此来表示希望工人们牢牢记住拉萨尔的这句遗言。

从伯恩施坦对拉萨尔关于普选权论述的推崇，可以看出他是十分醉心于普选权的，他认为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并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①。虽然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没有公平的选举就不能真正反映民意。但是通过议会制就能真正反映民意吗？

伯恩施坦立足于渐进式的改良，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自然生长出来，人们无须过多地考虑社会革命，只要在日常问题的基础上，就可以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不必坚持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中心的“崩溃论”，只要坚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渐进、和平、改良的策略，即可达到使资本主义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由此，伯恩施坦把阶级斗争的文明化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他说：“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②从这段伯恩施坦的名言可以看出：伯恩施坦不希望通过灾变即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民主、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他“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

^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

(二) “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

1875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而成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就强调议会斗争、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以及自由国家的重要性等，并提出“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目的。1890年1月，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也因此获得了在德国公开活动的机会，同时也有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这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1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与之相适应，当选的工人议员也由1877年的12人成倍地递增”^①。在此种情况下，德国社民党面临着如何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问题，对此伯恩斯坦非常兴奋，他密切地关注着1890年2月20日的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在此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又获得惊人的选举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这就极大地鼓舞了社会民主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走和平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同年4月，伯恩斯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以《礁石》为总标题的三篇短文，他心目中的礁石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什么呢？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他说：“如果这种空谈还有信誉，那对党来说，将成为危险的礁石。”在这里他把反对议会，当做最主要的危险，当做社会民主党前进航路上最致命的礁石，可见他是多么推崇议会道路。后来伯恩斯坦的这三篇文章统称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在这三篇文章中，伯恩斯坦认为“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应该把扩大党在帝国议会中的活动范围，作为党“必须考虑的最重大问题”。他指出了此次议会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声称不能低估150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党今后在议会中不能再满足于“一般

^① 徐觉哉：《对伯恩斯坦主义的重新解读》，《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第7页。

的批评”，而要提出“议案”、提出“质问”和“推举代表参加各个委员会”，并希望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不是那么死守教条”，而要“在适当时机提出积极要求参与立法”。他在这里迷恋于社会民主党150万张选票的胜利，对此忘乎所以。他以一个“议会迷”的口气说，党应当敢于冒“受到议会痼毒素的传染”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正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人们不是通过回避带有危险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而是通过敢于冒这种危险、并克服这种危险来征服自己的力量”。^①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伯恩施坦要人们正视议会的作用与影响。在他看来，议会就像新生事物，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但我们一定要克服惧怕危险的这种心理，勇敢接受这种新生的事物。他认为，根据德国当前的形势，帝国议会对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将大大加强。这样，党作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天然辩护士在帝国议会中的任务将加重了。伯恩施坦认为，由于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普选制和议会制，渐进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因为，“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因为“带有种种缺点的议会制度在今天的德国毕竟是一切社会机构中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②伯恩施坦还认为，假使由于我们根本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及社会制度而无视或低估议会的作用，他认为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避开的一块暗礁。同时，他认为，如果党能够从事帝国议会党团的任务，“党在这种意义上活动时，丝毫都没有放弃它的彻底的革命性。它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③，从此可以看出伯恩施坦是多么迷恋议会，他片面夸大了议会的作用，把它当做无所不能的机构。

（三）普选制和议会制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自己的武器”

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普选制和议会制。伯恩施坦对此十分

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②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③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迷恋，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国家”的性质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否具有平等的选举权。他认为，在普选制下，人民将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但是，随着工人数目和知识的增长，伯恩斯坦认为它就会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他还举例说明。他说：“普选权在德国可能暂时曾经作为俾斯麦的工具为他服务，但是最后却迫使俾斯麦作为它的工具为它服务。”^①伯恩斯坦以此来说明普选权双重身份的互换性和普选权的工具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一向政治立场强硬，常用恫吓威胁手段以达到目的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否会把普选的权利拱手让与他人？这岂不是像一则寓言故事狼与小羊在讨论到底谁把水弄脏了那样可笑吗？

关于宪法上的普选权，伯恩斯坦认为，首先，随着普选权的逐步扩大，最终将实现全民的普遍选举，从而实现政治上真正的人人平等。其次，在民主的原则之下，多数的意见将成为政治决策的唯一根据；既然工人阶级占据了人口中的大多数，那么非常自然地，他们会成为社会中真正掌握政权的阶级。除此以外，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会自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相信，普遍选举制的出现将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成为一种自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过程。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选制当做把整个世界翻过来的“一块立足的地方”，宣称“给我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②。从伯恩斯坦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对普选权、民主寄予了厚望，并希望通过普选手段，实现全民的普遍选举，从而实现政治上真正的人人平等。由于实行了民主原则，多数的意见将成为政治决策的唯一根据，那么工人阶级自然将成为掌权的阶级。又由于社会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他们会自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就是这样通过反复推理，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通过普选、通过议会选举将是一种自然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1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

的同时也是必然的过程。但问题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会拱手把民主、普选权让给工人吗？伯恩斯坦没有回答，他也不想或者是没有办法回答。

伯恩斯坦认为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议会能够通过各种有利于工人的法律，而“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①。在这里，伯恩斯坦寄希望于通过议会斗争，制定出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法律，这样工人的利益就能在比较广泛的规模上得到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要也能得到满足。第二，在议会制度下，政府军队不是从国王而是从人民代表机关接受决定性的指令，不是向站在民族前头的个人而是向宪法和人民代表机关宣誓效忠，于是，武装力量就由“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了“民族的武装屏障”。因此，他认为议会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

三、伯恩斯坦对无产阶级政党及策略原则的认识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党，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随着1875年两党的合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在议会选举中的票数也节节上升，选举和议会讲坛的作用随之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由于社会民主党在改良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改良主义开始在党内滋生蔓延。

伯恩斯坦作为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否定革命、主张改良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②。伯恩斯坦认为党的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党应该“追求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为此，他试图通过修改革命理论来使党能够追求理论和实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06页。

践，言语和行动的一致，并把原来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党，改变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在体制内推进社会改良的党。他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完全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纲领，而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这就是伯恩斯坦试图建立的“改良党”。

伯恩斯坦认为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与马克思的预言并不完全相符，资本主义不是要崩溃，而是具有了更大的“适应能力”，所以关于资本主义将因经济危机而崩溃的期望找不到现实依据。因此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能对“灾变”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抱有期望，相反，它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①。

伯恩斯坦第一次以系统的理论形式提出了把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改良政党的要求。

（一）社会民主党的本来面目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党，是“人民党”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伯恩斯坦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三人共同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就提出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都可以参加的改良主义的“全民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去世之后，他认为这一目的就得以实现了。1878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就是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性质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即要求全民参与的“全民党”。为此，党必须把“在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争取”到党内来。伯恩斯坦为了维护他的“全民党”思想，进一步推行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还认为不应该把那些虽然还不十

^①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03页。

分积极地追随党，但只要承认党的原则的人，留在党外。“它不只是接受工人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政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①这段话明确地表明伯恩斯坦认为只要承认和捍卫党的原则，不要管他是工人还是其他资产阶级等都可以参加到党内来。这就是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全民党”思想，伯恩斯坦还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基本上保持为工人阶级的党，还是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党”。这些思想实际上都是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在政党方面的反映。

（二）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和平的党、民族的党

在伯恩斯坦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不会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逐步地一点一滴地慢慢实现，所以，社会民主党不能对灾变的发生和资本主义崩溃满怀希望，而应该立足实际，从现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就是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党更关心的应当是当前的实际事务而不是世界观的问题，党致力于现实的改良运动比预想未来更为重要。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将自己定位为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认为：“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末他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②

第二国际时期，欧洲工会组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伯恩斯坦深受英国工联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向推崇组织松散，纪律松懈，行动盲目的工会，主张进行纯经济的斗争，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工会仅仅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包括议会斗争）的范围，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伯恩斯坦认为，政党是工人阶级为了改进自身的处境而成立的组织，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他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②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说：“工人阶级毫无理由用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孤注一掷。相反，工人阶级有义务进行实践表明卓有成效的活动。”^① 伯恩斯坦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去孤注一掷”指的就是政治罢工。“工人阶级有义务进行实践活动”指的是议会活动。这也表明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政治权利的总罢工而支持以经济斗争为目的议会活动，这就是要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为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

伯恩斯坦极力篡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试图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为此，伯恩斯坦首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极力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和平的党”，“已经成为人民的党，它的任务已经不是去完成革命和摧毁现代国家，而是用社会主义去‘渗透’现代国家”。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界的暴力革命”。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应热衷于实行暴力革命，该党不应该也不要以太高的要求吓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不会同样威胁市民阶级的所有构成要素，也绝不会威胁任何个人。党根本不热衷于对无产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实行暴力革命。”伯恩斯坦为了进一步表明他的观点，还进一步解释说，“请人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做许多年了”。^② “社会民主党，正如它的名字所已经表明的，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是一个争取今天被称之为国家那一公共组织具有民主制度的政党。”^③ 伯恩斯坦认为，这个党应当如它的名字所表明那样，变成“一个

① [德] 伯恩斯坦：《论政治罢工》，转引自 [法] 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②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376 页。

③ 转引自 [德] 伯恩斯坦：《民主原则及其应用》，载《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册第一期，第 19 页。

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服务于国家这一公共组织。实际上伯恩斯坦只看到了国家的管理职能，而没有看到国家阶级统治的职能。这是为他推行合法改良的政策服务的。他给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任务是“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自信地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一套词句并且‘愿意按它今天实际上的样子来表现自己’为‘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么，它的影响将会大得多。”^① 伯恩斯坦还认为，党内掀起的反对他的风暴，主要是因这最后一句话而大为加强的。并指出“人们宁可原谅我的全部异端思想，也不愿意原谅这句话”^②。伯恩斯坦千方百计想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资产阶级改良党。他认为，只要社会民主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就可以使资产阶级的恐惧心情更早地消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实现。

为了进一步宣扬他的改良政党理论，伯恩斯坦竭尽全力搜集了一整套“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此政治要求辩护。他不仅否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还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从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阶级斗争理论，等等。由此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坚决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伯恩斯坦不仅仅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改良党，而且他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而变成一个“保卫德国利益”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民族的政党”。他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人物，并且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维持它的势力，就会像英国革命时的独立党或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派那样，成为民族的政党。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必须表明自己担负得起同样坚决地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以此来加强它作为领导政党或领导阶级的能力。”^①“社会民主党，作为劳动者阶级的党及和平的党派，是否关心国防力的保持呢？”^②

伯恩斯坦还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他叫嚷《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工人没有祖国”的话已经过时，并宣称，“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遥远，看来是隶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他宣称，德国派兵夺取中国的胶州湾“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为了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社会民主党就理应“对此表示赞同”，这就是伯恩斯坦所宣称的“民族政党”理论。“社会民主党显然是一个和平的党，如果它拒绝同时充任和平各国人民信任的维护者的话，它就将会背弃它的最首要的使命之一。”^③在这里，伯恩斯坦把殖民侵略看成社会民主党最首要的使命之一，说明了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强烈愿望。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 议会及政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与理论上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相一致，伯恩斯坦在政治上鼓吹改良主义，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鼓吹阶级合作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一般民主”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伯恩斯坦主义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为道路和模式的改良主义理论。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中指出，伯恩斯坦在政治学方面，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③ 转引自〔德〕伯恩斯坦著：《社会民主党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月刊》1900年第5期，第250页。

竭力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政治自由、民主、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使《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旧原理不正确，在民主制下，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不能再把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应该用和平、改良方式来变革社会。列宁在归纳伯恩斯坦主义要点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深入批判，揭示了伯恩斯坦理论本质在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国家的阶级性质，反对暴力革命。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修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吹捧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普选制，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实质以及修正主义者宣扬这一套东西的反动意图，并警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而且必须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及其思想侵蚀，二是批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充分体现列宁对第二国际以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为代表的伯恩斯坦主义思潮批判的鲜明性。

一、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伯恩斯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认为它“不符合民主原则”。他认为，民主意味着一视同仁，意味着“公公道道”地对待所有的人，因此它与专政概念是不相容的、民主就是要取消一切阶级专政，而不是用一种阶级专政去代替另一种阶级专政。因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推崇“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是与专政相统一的民主而不是“纯粹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既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体现的形式和内容。因此，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最高度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反对抽象地谈论民主与专政，而不问是什么阶级的民主，向什么阶级专政。列宁决不笼统地评价民主，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列宁与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伯恩斯坦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地区分和确定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及其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意义。列宁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

上的进步性，同时还指出它的历史的局限性和有条件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谁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但不能把他们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①然而，无产阶级要实行的却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充分的民主”，这种民主是要最终引导国家的消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一是无产阶级如果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二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特别强调，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得以巩固所需要的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有限”民主，而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充分的民主”，这个“充分的民主”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针对新历史条件下受伯恩斯坦主义影响的经济派否定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把它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列宁阐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②。无产阶级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就不能实行这个革命；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不能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列宁在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认识是充分的，到位的。但他并不迷信，伯恩斯坦、考茨基所谓的“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他认为，只要阶级存在，就只能是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只给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决不给剥削者以民主，对剥削者实行专政，并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反抗。因而，“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是没有的。列宁说：“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①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当然也适用于伯恩斯坦分子这样的一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者。

（一）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不存在的

民主是我们孜孜以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在历史上，“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民主”（democracy）由democratic演变而来，由demos（民众、人民）和crates（统治）两部分组成，意思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列宁在使用“民主”这个概念时，也同意历史上关于民主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这个解释。他在论述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时说：“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② 他还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③ 在这些场合，列宁是从民主这个概念原始的、直接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但是，列宁扬弃了古希腊民主制关于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民主在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当家作主，而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当家作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同专政一起，最终是要消除的。正因为这样，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而且，也从未赞成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前冠以“民主”二字，或在其间附加“民主”字样，以示民主的重要。列宁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本清源，对伯恩斯坦所提出民主就是“无阶级的统治”，“一般民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科学批判，在对伯恩斯坦民主观批判的基础上，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民主观。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与联系。

伯恩斯坦不赞成民主具有阶级性，他把民主视为“全民的民主”。他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认为把民主解释为“人民的统治”，如果这样定义的话，不过是给民主下了“一个十分肤浅、纯粹形式的定义”，因为这样定义，会给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这一思想留有余地，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表现。他认为如果把“民主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那么我们就同问题更为接近得多”^①，伯恩斯坦无论是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称，还是为了突出“民主”而称社会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用意。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利用民主的手段，而反对无产阶级使用革命暴力的方式，通过人人都有的民主，来建立社会主义，而绝对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斯坦所说的民主，在表述的形式上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资产阶级民主。伯恩斯坦说：“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形态。”还说：“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说，它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②

列宁与伯恩斯坦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决不笼统地评价民主，而是正确区分和确定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及其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意义。比如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批评考茨基超阶级的民主观时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③“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他指出：“纯粹民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只要阶级存在，就只能是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①。

列宁还指出：修正主义者一贯使用“民主化”、“社会化”这种含糊不清的模棱两可的词句，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和特殊嗜好”。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阐述了民主的实质、特性，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等等。列宁认为，伯恩斯坦用“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来论证民主，不但认为民主是全部覆盖和普遍适用于全民的，而且认为全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就如同空气中随意飘浮的气体分子一样。在全民范围内，不分阶级，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人一票，多者胜出。这样一来，推行普选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民主的阶级性、选举的阶级性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民主的一般性”、“纯粹性”也就顺理成章了，民主就由“矢量”，即民主的阶级性变成了“标量”，即民主的“超阶级”性。所以，在批判“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时，列宁指出了民主的鲜明阶级性，同时，他也把自由、平等作为与民主密切相关的问题来论证。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②；“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③。这是因为，首先，在阶级社会，民主意味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自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民主所排斥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其次，在阶级社会，被统治阶级不可能与享有民主权利的统治阶级平等。在剥削者执政的国家里，被剥削者不可能同剥削者平等；被剥削者夺取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被剥削者的国家必然要消灭剥削，改造剥削者，而这就是对剥削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伯恩斯坦主义者盲目崇拜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假象，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从而把这种“政治形式当做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破血流”。列宁指出，“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它不过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必定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既决定于又服从、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由民主依附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民主的特征表现为任何民主都具有历史性，“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都是具体的，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都具有阶级性，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①。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全民”的“纯粹民主”，今后也不会有，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伯恩斯坦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共同享受的抽象的全民的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全民享有民主，也就意味着民主的消亡。所谓“全民”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实质的遮盖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过是资产阶级实行复辟活动的武器。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民主的阶级实质，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1.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议会制和普选制等自由民主制度都曾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②从无产阶级发展的角度来看，列宁指出：“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①

列宁还特别揭示了民主共和制对于保证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特别意义。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趋于稳定，共和制和代议制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发挥着制度文明应有的作用。对此，列宁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他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② 列宁将民主共和制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政治外壳”，实际上是肯定了民主共和制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特别意义，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秘密。我们知道，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理想的政治文明状态就是“政治外壳”与“政治内核”的内在统一，换句话说就是制度形式和制度本质的统一。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开展阶级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如果谁否认这一点，那就不但不能把他们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③ 然而，无产阶级要实行的却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充分的民主”，这种民主是要最终引导国家的消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④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2.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列宁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和阶级局限性。

(1) 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总是以“自由、民主”来标榜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资产阶级国家负有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维护每个人的自由的使命，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民主权力，凡此等等。好像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再存在暴力强制机构，而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尽管资产阶级的宪法里冠冕堂皇地把“自由”、“平等”等写进去，但它归根结底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列宁说：“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①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考茨基胡说什么民主就是“保护少数”，胡说什么国家愈民主，资产阶级“想要调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保护少数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② 列宁还指出：“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③ 列宁指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①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主当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为了欺骗人民，也允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不危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集会、结社等各项民主权利。这就给无产阶级提供了组织、训练阶级队伍、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因此，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就愈容易导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因此，残害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例如，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机会，工农群众也建立了苏维埃甚至掌握了武器。但是，就在这个当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残害和内战：7月，临时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彼得格勒的群众示威运动，把布尔什维克打入地下；9月，发生了阴谋消灭苏维埃、实行军事独裁的科尔尼洛夫叛乱；10月，临时政府调动军队，妄图镇压首都的革命运动，由于布尔什维克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倒了临时政府，才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列宁在一次回答资产阶级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了集会自由”的指责时，作了非常生动的说明。列宁说：“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①

(2) 资产阶级民主是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资产阶级事实上的专政

列宁说：“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② 资产阶级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君主制度下更能发挥“财富”的权力。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勾结外敌来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民主和自由完全变成了它们的反面，被血腥的屠杀和镇压所代替，因而这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用更激烈的暴力去解决争执。谁看不清这点，谁就永远不能在民主制度下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以必胜的信念投入这种“争执”。同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联合，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迁就动摇者和叛变者。

总之，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是狭隘的，是专门为少数统治剥削者所享有的。比如说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雇佣劳动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是少数资本家阶级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他们的“自由”只是意味着挣脱了封建枷锁，但是又立即套上了资本的枷锁，他们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而绝对没有不受剥削的自由。“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③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的实质。

列宁特别强调，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得以巩固所需要的民主、自由，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有限”的民主、自由，而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充分的民主、自由”，这个“充分的民主、自由”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散布谎言，谩骂布尔什维克，攻击污蔑苏维埃政权是“强盗国家”，造谣说布尔什维克实行专制统治，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等等。同时，又大肆吹嘘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自由和民主，似乎资产阶级国家是保护民权的，把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民主制度”说得完美无缺。

列宁不但以充分的论据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欺骗宣传进行了回击，而且还对各国资产阶级的攻击和污蔑进行了批驳。他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①“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②

列宁指出，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③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④。所以，列宁指出：“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⑤

二、列宁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 议会制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一）列宁运用历史、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的认识与批评

伯恩施坦说普选权是能“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仆人的工具”。^①这说明，在伯恩斯坦看来，只有普选权，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由仆人而变成成为主人。伯恩斯坦把普选权吹得神乎其神，把它当做无产阶级的“基本社会原则”，当做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伯恩斯坦高喊普选制是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最佳武器”，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黄金通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深受伯恩斯坦主义影响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也拜倒在伯恩斯坦所赞美的普选制的石榴裙下，他们期待着普选制的“圣光”能驱散沙皇专制的黑暗，迎来俄国民众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普选制的科学观点似乎已被风靡世界的“普选制童话”所淹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普选制的科学思想似乎已被国际工人运动所遗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普选制的科学思想，旗帜鲜明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选权的基本观点。

列宁首先运用历史的观点，指出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这一时期曾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开展合法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78—1890年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曾出色地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终于在1890年冲破“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争得了合法地位。列宁还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普选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指出：“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②列宁特别强调：普选制“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③。

其次，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还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普选制的虚伪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普选制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普选制的阶级局限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虚伪性。因此，抽象地谈论超阶级的普选制是荒唐的，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体现。列宁批判考茨基关于普选制的思想，当然，他的这一批判也适用于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列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①按照考茨基编造的“纯粹民主”的童话，无产阶级首先争得普选权，然后争得议会中的多数，就可以和平地夺取政权。但是恩格斯是这样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②对于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说法，考茨基一再提到，而对恩格斯说的后一句话：“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③但考茨基对此却闭口不谈。恩格斯说普选制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指的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不可能经过普选和议会的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恩格斯这一唤醒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提法，是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也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所不能接受的。在对待普选制问题上，面对国内甚嚣尘上的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大合唱，列宁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批判各种形式的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他认为：“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④机会主义者深知这一点，因而，在斗争的手段和目标上他们只强调利用资产阶级的立法、议会制度来争取普选权，而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作茧自缚的状况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法前进半步，而机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义思潮却得以在国际内部不断扩大影响，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妨碍新的革命力量发展。

因而，列宁还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如果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那么，他们就无法科学地认清资本主义普选制的阶级本质，就会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断送整个工人运动。

列宁结合俄国的国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流行的一种抽象地谈论超阶级的普选制的观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普选制的应有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立场：

第一，列宁认为，普选权是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获取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现代革命运动中，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一般斗争中，努力争取“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他明确指出：“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①“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②普选制是对封建专制的反动，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共同特征，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获取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③列宁特别指出，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就不可能“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④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求：“凡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⑤列宁明确强调，努力争取“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的基本要求，“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①

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充分利用普选制的口号来有组织地推进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列宁认为，必须不遗余力地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宣传灌输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一般真理”。即“四条”要求（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六项政治自由”（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的政治自由）和“三大紧迫任务”（即武装起义、革命军队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要争取“他们大概会争取根据普遍的……选举权立即举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以便当无产阶级组织程度还不够高，士兵和工人的关系还不够密切，农民运动还不够开展，很多很多人对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军事帝国主义政府还没有完全失望，因而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府’代替这个政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那里建立起革命中心等等”^②。

第三，工人阶级政党在争取和利用普选制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毫无疑问，普选权这一口号早已成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的“共同的财产”。但是，所不同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在争取和利用普选制的斗争实践中决不能“随大流”，不能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流合污”。

列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在争取和利用普选制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立场：

首先是“真实性、彻底性”的原则立场。列宁认为，资产阶级虽然是普选制的发明者和积极的倡导者，但资产阶级普选权最本质的特征无疑就是它的不彻底性、虚伪性。因为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再加上他们处在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这两团烈火之间，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变更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③。相反，工人阶级政党普选权口号最本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质的特征就是它的真实性、彻底性，因为工人阶级不仅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而且也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特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既能坚持真正普选制的“四条”（即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又能“不倦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①。其次是“独立性”的原则立场。列宁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②。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③。列宁特别强调，我们一方面决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决不能把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④要坚持说明，“要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要说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⑤。最后是“革命性”的原则立场。列宁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自由空谈派”关于普选权能够将13万户地主的利益同1000万户农民的利益“调和起来”的谎言。列宁认为：“普选制是测量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是否成熟的标尺。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⑥就召开反对沙皇专制的立宪会议而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普选制主张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论完全不同。列宁将其革命性的原则立场作了明确的表述：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切实保障充分的宣传自由和选举自由，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④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⑤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①。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最终解决而言，也就是说，当世界历史已经把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的时候，普选制就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了。列宁坚持认为，普选制作为一项民主措施关系到“国家的纯政治的社会改造”，但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②。他强调：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③

（二）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列宁对议会制度的认识坚持了一分为二看问题的立场，他一方面强调了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对于推进工人阶级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提出了资本主义议会的虚伪性。

“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的发展。”^④对于议会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带来的作用，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明确地指出：“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⑤因为议会制不仅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活动场所，而且在客观上成为衡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进程的标尺。

列宁在1906年5月所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一文中，第一次说明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议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页。

④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会的问题。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利用议会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应当揭露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议会迷。列宁一方面批评伯恩斯坦，“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①。另一方面，列宁还批评伯恩斯坦的积极追随者孟什维克主义者帮助立宪民主党人传播立宪幻想，过高估计立宪民主党人的作用，过低估计革命民主派作用的议会迷思想。

不仅如此，列宁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的实质，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说明了为什么不能过分地迷恋议会的原因。

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议会制时，批判考茨基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奉为“纯粹民主”的典范，他认为，其实，资产阶级议会只是掩盖资产阶级国家丑恶面目的装饰品，“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②。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弊端之前，已经想好了摆脱议会制的出路，那就是把代表机构不必建会议会式的，而在于转变过去议会的功能，由过去的清谈馆而变为工作机构。而是这个工作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也不必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当然，列宁对考茨基议会观点的认识也适合于对伯恩斯坦议会思想的批判。列宁在谈起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时指出，“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①。资本主义虽然找到了“最好政治外壳”，资产阶级议会制也为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某种制度保障，它所提供的游戏规则表面上似乎也很公平，但是，所有这些表面的东西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议会制镇压人民、压迫人民的本质。“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②比如资本家可以通过制造舆论、资助竞选、直接收买、“个人友谊”以及各种渠道，操纵选举，控制议员，使议会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资产阶级议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最民主的议会，由于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者的机器。”^③这就是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事实上的专政。所以，列宁在这里又一次指出，我们虽然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绝不可忘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而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决不能像考茨基之流那样，把议会斗争“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④。同样的，按照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立宪会议是“全民”选举的机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列宁说，这是“形式主义的民主观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只知道立宪会议是全民投票选举的，不懂得全民投票只是选举的形式问题。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所产生的机构的阶级内容是另外一回事。列宁指出，同样的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关键在于哪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一个马克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④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研究问题时应该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下苏维埃是哪个阶级的机构，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构，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伯恩斯坦、考茨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方法，说什么立宪会议是全民选举的，这是片面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

列宁通过分析，指出：“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① 列宁不但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还指明了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困境的出路。针对资产阶级议会由于受到不同政治力量的制约，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等弊端，列宁提出了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困境的出路。他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② 在列宁的心目中，理想的代议制应是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的模式。“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③ 在这里，列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本构想。

（三）列宁在实践中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议会制更为先进的民主形式——苏维埃

苏维埃是20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新现象。作为一种与议会体制相并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行的新的民主机制，苏维埃构成了对议会制的直接的、有力的挑战。

苏维埃的实践是新型民主的一次伟大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其初始形态渊源于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它来自于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创造，是人民民主和革命民主的物化形态，它反映了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渴求解放和参与社会与政治管理的强烈愿望。

列宁正是在实践中创造了苏维埃这一较之资本主义议会制更为先进的民主形式。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共和国”。他写道：“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①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在议会之外另起炉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与议会那样的全民代表组织不同，苏维埃只是一个阶级性代表组织，其成员只包括工人群众，资产阶级等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将苏维埃称为工人议会。不过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才避免了议会具有的诸多缺陷。比如，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拥有议会多数，而是因为其在议会外掌握全部社会资源而形成全面统治的既成事实。苏维埃不但保留了旧式议会民主的合理性，而且还将民主扩展到了议会之外，使民主不再仅仅是片面的政治民主，也包含了经济民主，使民主从脱离群众的间接民主上升为直接民主。民主由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扩展，从而更加有利于群众直接参与管理——也就是自我管理，更加符合古典民主的要求。这就是议会外阶级民主高于议会全民民主之处。

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不是按照地区，而是按照生产工作单位来进行，这既有利于确保苏维埃的阶级性，有利于加强选民之间和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有利于苏维埃通过其代表获得对工厂、矿山、金融、交通、通信等经济领域进行直接控制的权力。

苏维埃代表没有固定任期，随时可以罢免和更换。苏维埃尤其是地方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苏维埃的选举是经常性的，这就使苏维埃能够及时地反映群众情绪的波动和变化。

俄国革命初期，即使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也是相当频繁的。从1917年6月到1918年7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达五次之多。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后，苏维埃将成为组织推翻资本统治的行动的机构；推翻资本统治的同时，苏维埃自然又变为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的机构。苏维埃的民主性将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苏维埃容纳了所有的工人政党，是各政党影响广大工人的最好渠道，不管是革命期间还是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各党派工人之间的分歧都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在苏维埃内部解决。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可以对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案进行选择，对不同的计划方案进行选择，而不像在斯大林官僚主义统治之下，工人阶级只能被迫接受官僚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计划方案而别无选择。民主的计划既否定了官僚专制，又否定了金钱专制，非但不是对自由选择的抛弃，反而是自由选择的实现。

列宁认为：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①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资产阶级假借“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以及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的剥削性质。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三、列宁对伯恩施坦政党观的认识与批评

古希腊的大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世界翻转过来。”列宁借用这句名言改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这个革命家组织就是列宁主张建立，并为之付出心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有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坚强的创导核心、和广大群众有联系的党，才能够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伯恩施坦在《前提》中也曾经就阿基米德的名言进行了改动，他说，“给我普遍的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可以看出，他提出了一整套否定革命、主张改良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所谓“改良党”，就是主张把原来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党，改变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在体制内推进社会改良的党。伯恩施坦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成改良党，他热衷的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策略，而其策略和理论的支点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普选权”。列宁则决心建立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新型革命党，认为这是把资本主义旧世界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支点”。列宁的改动，实际上是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自发论”的有力批判。

（一）批判伯恩施坦改良党理论，主张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

在伯恩施坦看来，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再好，也不如脚踏实地解决具体问题。这实际上说明了伯恩施坦对共产主义远大前途的认识是非常渺茫的。列宁曾经这样描述：“伯恩施坦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者说：请看看实际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情形吧，鼓起勇气说出实际情形吧——我们在德国都在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①在列宁看来，改良不可能“消灭雇佣奴隶制，这只是一句空话，是不切实际的空想”^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卢森堡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系统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反对把社会民主党变成资产阶级改良党，但真正彻底批判“改良党”的主张，并建立起一整套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是列宁。列宁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党”概念的确立者和阐释者，是按照这一建党理论进行成功实践的第一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过程中，在与俄国党内“经济派”、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在领导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列宁写作了《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

1. 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精英党而非松散的党、全民的党

1898年到1905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初创时期。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由于沙皇凶恶的专制统治和党组织的极端涣散，大会闭幕后不久，新当选的三名中央委员即遭逮捕，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都被取缔。1893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不久党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叫经济派。这个派别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主张工人搞经济斗争，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醉心于细小的改良运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由党来领导工人运动，而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它是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它的出现和蔓延，给社会民主工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党的工作同俄国社会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经济派的影响，消除党内混乱、涣散和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动摇的状况，重建一个真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亟待解决的任务。

俄国为了完成此建党的任务，必须批判经济派，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列宁于1902年3月写作和出版了名著《怎么办？》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建党见解，阐述了他的建党原则，列宁指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并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组成党的领导核心，他提出了必须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原则问题，彻底批驳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提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推崇“自治”和“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等观点，也打击了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首先，列宁认为经济派所谓的政治顺从经济，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与工厂主进行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派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正统为借口，声称要用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阶级放弃独立的政治要求的工联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和伯恩斯坦主义一脉相承的。

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地指出，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企图把主张社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他提出一大串骗人的论据和理由，都是为这个目的辩护的。经济派为了这一目的，也制造了种种论据和理由，来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党。他们所认为的，工人阶级只应该关心经济斗争而不要干预政治斗争，工人的党不必组织领导工人从事政治斗争的观点，在列宁看来，无异于政治上自杀。

基于以上认识，列宁驳斥了经济派关于工人运动本身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发性的产物的谬论。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产生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理论只有同革命的运动相结合，才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列宁看来，改良主义是一

种适应了工人阶级的“自发”要求的不革命的政治主张，而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能够适应的也只是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①。“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②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曾经受到良好教育（“有教养”）的人，才能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革命理论，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并通过党的“教育”，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而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形成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还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③。只有“十来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聪明人”，才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列宁明确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用什么力量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呢？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如果工人阶级离开了自己的政党，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教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育，那它就永远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

其次，列宁全面论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主张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以改良主义为指导，以议会斗争为手段，只着眼于运动，不顾其目的的合法的、松散的、手工作坊式的组织；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本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同时又借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与机会主义者建党主张相反的建党理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建立的党，应该是最合乎俄国社会条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这种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能够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必须制定出党的纲领和党的基本策略；党的纲领应该准确地反映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必须明确党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指出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是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策略是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利用各种力量去开展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要善于正确处理暂时利益与最终目的、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善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并善于随着形势的变化巧妙地从一个斗争形式和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党的组织应该是统一的、稳定的、持久的、有战斗力的和能够保持连续性的领导组织，这样的组织应该以革命家组织的形式来建立，它不是党员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革命家组织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的简单相加，而是以革命家组织为核心有机地组织起来的一个整体，从中央到工厂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内部实行精密细致的分工，实行秘密性和集中制两条原则等。列宁的这段论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由于《火星报》为建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后迁到伦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国26个革命组织的43名代表。他们之中有的属于《火星报》派，有的属于经济派，还有“崩得”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以列宁为首的派别主张以集中制的原则组织一个政党，在党章中

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活动；而马尔托夫等人则主张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在大会上，针对马尔托夫等人提出的建立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的政党的主张，列宁进一步阐述了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的思想。1904年，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文中强调指出：“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再次阐明并完善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强调以集中制为基础建党。列宁建党原则中最重要的要点包括：

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应该使“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①。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由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②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③。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④用集中制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反对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①。

2. 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及特征

根据列宁的阐述，“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也凸显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改良党的基本特征：

第一，“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由这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他说，把作为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不行的，如果每一个参加罢工的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就是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取消党。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是先进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最后，政治纲领是先进的，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党在作风上是先进的，在思想、道德、工作等方面都优越于一般工农群众，等等。列宁还提出了“职业革命家”的理论，认为具有先进性、自觉性的职业革命家及其组织，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他说，没有职业革命家，没有能干的干部，事情总是寸步难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客观规律的科学，只有掌握了这个理论，具备了“自觉性”，才能建成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而正确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推翻反动的旧政权夺取革命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是党必须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条件，决定了党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第二，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组织的总和，但却不是算术总和，即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每一个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并且要在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内生活。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才能领导整个阶级去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组织形式上的特征。在列宁看来，党是有组织的部队，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有组织的部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队这一特征指的是，党以民主集中制把党的组织和成员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它具有组织统一、行动统一和权力相对集中的特点。组织统一指的是在革命党内，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隶属一个组织，每一个组织都隶属于其上级组织，各级组织隶属于党中央。行动统一，指的是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一旦决策形成，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执行，党以“铁的纪律”对此加以保证。权力相对集中，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权力相对集中于党的中央委员会。

应当说，革命党作为“有组织的部队”这一点尤为重要。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①因此，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列宁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使要不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性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争论，变成了“革命党”和“改良党”、“议会党”、“机会主义党”的分野：按照党是先进部队、有组织的部队这一理论去建党的，才是“革命党”，反对这一理论的政党就不是革命党。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曾经指出：“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维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③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很多，如青年团、工会和合作社等等。但党不同于其他组织，而是领导和团结无产阶级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其他组织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是党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机器关系上的特征。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有组织部队的特性所决定的，党必须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具体说来，在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机器的关系中党领导一切。在革命年代，党通过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从而由党直接控制军队。

1907年5月，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一文中说：“无产阶级组织应占绝对统治地位和拥有决定权，所有的军事和战斗组织要完全服从它，这些战斗组织必须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充任骨干（或许甚至要用党员民兵队代替战斗组织），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容置疑的事情。”^①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列宁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②。

第四，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不然党的生命就会停止。

第五，党必须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党内要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的方针和政策，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集中制”。当时列宁偏重于强调集中制，而不是强调“民主集中制”。

第六，党内必须有全党共同遵守的纪律。这种纪律不仅普通党员要遵守，党的各级领导人也要遵守。否则，不能保证党的组织纪律性。

（二）列宁虽然在党内强调集中，但从未放弃党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力地批判了伯恩斯坦把民主与专政相割裂的政党理论

伯恩斯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即要求全民参与的“全民党”。为此，党必须把“在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者”，“争取”到党内来。

伯恩斯坦为了维护他的“全民党”思想，进一步推行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不应该把那些虽然还不十分积极地追随党，但只要承认党的原则的人，留在党外。“它（指社会民主党——编者注）不只是接受工人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政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①这段话明确地表明伯恩斯坦认为只要承认和捍卫党的原则，不要管他是工人还是其他资产阶级等都可以参加到党内来。这就是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全民党”思想。经济派就是伯恩斯坦在俄国的变种，他们推崇伯恩斯坦的“全民党”理论，主张建立松散的、可以自由参加的党。列宁曾经批判经济派，指责他们受伯恩斯坦思想的不良影响。

列宁在1917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曾经批评伯恩斯坦对集中制的误解中说：“伯恩斯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伯恩斯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②

实际上，列宁虽然强调集中制，但并不反对民主制。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列宁都把民主制视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和动摇过。他在《怎么办？》中批评经济派不顾现实情况空谈“广泛民主原则”时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③“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④列宁认为，党内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必须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①而这两个条件在当时都不具备。可见，列宁只不过是认为当时党的处境十分险恶，“广泛民主原则”难以行得通，而并非一般地反对民主原则。列宁甚至指出，即使党处在秘密状态，其领导机关仍应通过一定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实行一定的民主。这对一个秘密政党来说，这样做是有巨大困难并可能遭受重大牺牲的。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不顾一切巨大困难，甚至不顾重大牺牲，在组织中真正实行民主制。”^②

1905年至1917年间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列宁明确提出用“民主（的）集中制”的建党原则来代替“集中制”原则，并更多地注重党内民主建设。列宁在党初创时期明确强调集中制，不仅在党内遭到孟什维克的抵制，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卢森堡的批评。1905年1月，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按照民主原则产生了名为苏维埃（意即代表会议）的组织来领导政治罢工，同时，革命也带来了有利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190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③。1906年4月，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还全面阐述了其中包含的党内民主原则，即：“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①“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②由于党内已经从下到上建立了民主制度，1906年5月，列宁在《让工人来决定》一文中自豪地说：“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③然而，随着1906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党内民主发展丧失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即便如此，列宁仍在1907年9月重申：“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④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7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党内民主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新党章重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拥有最后决定权；中央委员由党代表每年选举一次；党的各级机关普遍实行选举制；各级党的机关要定期向党组织报告工作，接受监督。新党章还第一次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1918年至1921年，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俄国进入战时状态，这种战时状态反映到执政的俄共（布）党内，就是在组织原则上实行极端的集中制，在工作方法上实行“战斗命令制”。当时，“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⑤。即使在被迫实行“极端集中制”的情况下，列宁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践行党内民主。如：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决定，以体现集体领导原则和实行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民主决策。1919年党的八大不仅讨论了应对战争的各项迫切问题，而且就党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对当时的党内民主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1920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必须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等党内民主的20条具体措施。可见，即使在战时状态下，列宁仍努力发展党内民主。1921年到1923年，俄国进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和平建设时期。由于具备了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的有利条件，列宁对发展党内民主进行了比过去更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1921年3月，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十大决定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战争时期实行的“极端集中制”，其内容包括：广泛的定期的党内普遍选举制；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报告制；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民主讨论制；党内监督制；等等。党内的工人民主制旨在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遗憾的是，十大之后，党和国家所处的形势又陷入恶化，工人民主制未能付诸实施。列宁晚年对党内民主建设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贯穿其中的清晰思路，就是把党内民主建设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特别是对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促进党内高层民主的发展、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等，提出了一些重要构想和措施，从而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综上所述，列宁在建党组织原则上使用过“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极端集中制”、“民主制”等几种提法。从总体而言，列宁强调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党根据所处的客观政治环境的变化调整其侧重点。虽然列宁一度特别强调“集中”，但皆因党所处的严峻的政治环境的压力所使然，并非漠视党内民主。事实上，无论在怎样严酷的条件下，他都尽最大努力来发扬党内民主。一旦条件许可，他就主张从集中制向民主制过渡。在列宁思想中，民主制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斯大林把列宁在特殊情况下的强调集中当做无产阶级政党的固有风险继承下来，使缺乏民主成为党乃至国家的一种常态。这种后果不能归罪于列宁，更不能因此而否认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

第三节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 议会及政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卢森堡毕生致力于对马克思的民主理想的研究与实践，她对于民主有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认识，尤其对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她的这些思想既影响深远，又发人深省。她曾经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批评列宁提出的“集中制”思想。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她犯有不了解俄国国情的错误，但她在党的组织原则上的所提出的民主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列宁作为一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革命家，在俄国条件适合时还是根据卢森堡的批评，吸收了她的民主思想，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的组织原则。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卢森堡作为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在民主理论方面的贡献。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民主观的认识与批评

卢森堡在民主方面的认识深刻、全面，在对伯恩斯坦民主观的认识与批评中她一方面充分肯定民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要”，民主制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①，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对民主的认识以及伯恩斯坦民主观中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评。

（一）卢森堡的民主观

首先，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的民主理想，卢森堡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主，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反过来民主也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逻辑是绝对不能打破的，一旦打破这个逻辑就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她在《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只有由大多数劳动者去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①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则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来管理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者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②。而民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③。这就是说，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与民主具有一致性，即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社会主义勾画了轮廓，实现它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发扬民主创造精神。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就会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就没法实现社会主义。

其次，卢森堡虽然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但她并不是孤立地强调民主，她在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重要性的同时，还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社会主义民主的同义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她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方面，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上看，她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当它走向政权时，在资产阶级民主地位之上，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以代替之，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肇始于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时刻。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别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④ 卢森堡同时还强调无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7页。

③ 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页。

④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45页。

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专政，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①。另一方面，她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看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参与的积极性，全国的政治生活就会受到压制，从而成为一种“虚伪的生活”，官僚风气就成为“唯一盛行的东西”。“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② 卢森堡在这里指出，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蜕化为集团统治，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衰竭。卢森堡还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同一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她写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象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③

（二）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单纯强调民主的形式、而忽视民主内容的片面观点

卢森堡说：“固然，从形式上看，民主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504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

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①在这里，卢森堡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和民主内容的脱离与相悖，表明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民主实质上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她接着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因此，对伯恩斯坦而言，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卢森堡认为：“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思想就是完全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作出的一种盘算，只考虑到民主的形式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即它的实在内容。”^②这清楚表明了伯恩斯坦所谓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他所谓的民主是只重形式，而忽视民主的内容。对此，卢森堡在《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提出，只有用完成革命任务所需要的全部政治权力来这样地武装团结一致的劳动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雇佣工人坐在资本家的旁边，农村无产者坐在容克地主旁边，貌似平等，用议会方式辩论他们的切身问题，这不是民主。只是在亿万无产阶级群众用他们长满鬃子的拳头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以便象雷神使用他的锤子那样用这个权力砸在统治阶级的头上的地方，才有不欺骗人民的民主。”^③

卢森堡既不单纯强调专政，也不单纯强调民主，而是强调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为此，她在《论俄国革命》中针对托洛茨基所说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④，她在肯定托洛茨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基观点的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斯坦之流“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的区别在于“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①。这里，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卢森堡既认为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又指出了如果要使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相一致，工人阶级必须要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这样才能把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变为真实的平等和自由，从而完成消除民主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这一任务。

伯恩斯坦过分强调民主，把民主绝对化，对此卢森堡是这样批判的，她说：“在伯恩斯坦看来，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民主制的实现必然要促进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起作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对最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短短时期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肤浅的生搬硬套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民主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也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那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②卢森堡在此说明了伯恩斯坦片面强调民主，如果他能考察一下民主发展的历史，他就不会那么绝对，把民主当做万能良剂。

（三）卢森堡批判伯恩斯坦“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错误观点，并论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

卢森堡指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是而且能够是实现民主制的唯一支柱，这样看来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中批判伯恩斯坦时写道：“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① 从中可看出，她认为民主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还说明了民主制为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充当跳板和支撑点，而且还能使无产阶级在运用自己的权利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

在此基础上，卢森堡又用二难推理的方法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伯恩斯坦否认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放弃最终目的的做法，她说：“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复活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反过来也就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多么不可能。在这里，伯恩斯坦的推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的结论‘贪食’了它的第一个前提。”^② 卢森堡在这里明确指出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卢森堡接着论述道：“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蒸蒸日上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面前吓破了胆，根据这一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③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卢森堡在此向伯恩斯坦指出一条路，如果要想发展民主制，必须重视、并实践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运动，这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失望，而希望借助于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用一般民主掩盖资产阶级民主实质，将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在于它实行民主制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卢森堡写道：“民主制整个说来不像伯恩斯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手段。”卢森堡还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她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是形式上的民主，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始终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的平等及自由和甜蜜外壳所掩盖社会不平等不自由的酸涩内核。由以上可看出，卢森堡所强调的民主和伯恩斯坦所强调的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卢森堡所说的民主并不是无原则的民主，而是与专政、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她的民主思想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综合”，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

二、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议会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一) 卢森堡尖锐地批评伯恩斯坦“议会迷”的思想，认为在应该夺取政权的时候却消极地等待议会多数是彻底的机会主义

卢森堡深入研究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与议会斗争的关系，她批评了机会主义者迷恋议会讲坛与普选制的行为。在《策略问题》一文中，她反复指出，真正的斗争力量，胜利的保证……不在议会，而是在街道上。1902年4月，比利时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卢森堡针对自由党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就背叛工人党的行为，明确地说，在议会内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议会内的斗争同议会外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只能陷入议会主义的泥潭。她还指

出：“议会痴呆症昨天是一个弱点，今天是一种暧昧态度，明天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①她驳斥了修正主义理论和改良主义的议会痴呆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在应该夺取政权的时候却消极地等待议会多数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卢森堡由此还认为是否需要暴力革命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

针对米勒兰入阁，这次议会主义的一次大演习，全国范围内运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卢森堡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及其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之间的关系。她在1901年发表的《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一文针对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指出：“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像一部齿轮机，它的各个部分在所有方面都相互联结在一起，彼此决定和调整它们的运动，使整个齿轮机转动起来的直接传动装置是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原动力首先是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应该说，卢森堡的这个比喻是十分贴切的，她道出了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及其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的性质。在亲身参加俄国和波兰的1905年革命后，卢森堡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中在论述俄国革命时欣喜地说：“资本主义世界以及伴随着它的国际阶级斗争看来终于要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跨出议会争吵的漫长阶段，重新步入自发的群众斗争时期了。”她说，虽然这次革命不是“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又是法国的雄鸡的放声啼鸣给欧洲的下一次革命报晓。相反，对于法国来说，议会时期的泥潭是最为危险的”，但两场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将革命所积聚的自发力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这两次起义将现代社会的躯体内部积聚着的革命的自发力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并像驱散轻飘飘的秕糠那样，驱散了所有那些在国际上风平浪静时期繁茂生长起来的对今后平静的、‘合法的’发展进程所抱的幻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337页。

想”。^①

总之，卢森堡除了批判迷恋议会的错误思想外，还认真思考了如何充分发挥议会选举的作用，把议会外斗争和议会内斗争结合起来，如何从合法斗争转向非法斗争的问题。但卢森堡并不像伯恩斯坦那样迷恋于议会讲坛，而是将议会选举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宣传的途径，一种对群众能够施加社会主义影响的方式，一种唤起群众支持的、广阔的而真切可见的讲坛。

（二）卢森堡针对议会迷们疯狂地追逐议席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揭露了议会选举的虚伪性

卢森堡在《五一节的思想在前进》中，分析了议会迷们妄想通过议会和工会手段“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产生的背景，那就是：以伯恩斯坦为首的议会迷们感觉“七十年代的倒闭浪潮以后国际市场上的长期不景气时期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正进入一个辉煌的高涨时期，它几乎延续了十年。同时，经过二十年的持续和平，世界摆脱了对曾经使欧洲现代国家制度受过血的洗礼的战争时期的回忆，缓过气来。平静的文明发展的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指望通过息事宁人、心平气和的讨论来解决劳资分歧的幻想和希望社会主义的队伍中纷纭滋长起来。各种‘向善意伸出手来’的建议显示九十年代初的特点，关于不知不觉地‘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预告又是九十年代末的特点。据说，危机、战争和革命已是过时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的童鞋，已穿不下了；议会和工会，国家的民主和工厂里的民主会打开通往新的、更美好的制度的大门”^②。卢森堡在《今后怎么样？》中又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议会思想所带来的后果，她说：“将近两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生活的主要方面是以国会选举为基调的。这件大事现在已过去了，我们可以环顾一下总的形势。经过国会选举，是否开创了崭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新的局面？”^①但是事物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幻想发展。“事物的发展对所有这些幻想作了令人可怕的检验。九十年代末以来，没有出现宣告过的温和社会改良方面的文明发展，却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矛盾极其尖锐化、高度使用暴力的时期，在社会的基础中，出现了风云激烈、矛盾冲突、动荡不安的局面。在十年经济高涨时期以后的十年中，出现了两次震动全球的经济危机；继二十年世界和平以后，上世纪最后十年中发生了六次血腥的战争，本世纪头十年中又爆发了四次流血革命。”^②从卢森堡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充分看出，社会的发展并不会朝着伯恩斯坦所设想、所描写的温和的改良方向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矛盾，因而寄希望于民主的改良这条道路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国家政体中，民主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连最后的一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也已毁灭殆尽。”^③卢森堡在这里指出寄希望于民主的改良这条道路，民主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连最后的一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也已毁灭殆尽。她还进一步批判了伯恩斯坦放弃革命而绕道议会道路的改良路线，她说，伯恩斯坦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走国民会议这条路会得到什么呢？是“加强资产阶级的阵地，用虚无飘渺的幻想削弱并迷惑无产阶级，在狼和羊羔之间的‘讨论’上浪费和损失时间和精力，一言以蔽之，给所有这些人帮忙，而这些人的目的和企图是诱使无产阶级革命放弃其社会主义的目标并把无产阶级革命阉割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④。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机构曾经起过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作用。但是，当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议会就变成一个欺骗人民的“清谈馆”了。马克思说过：“议会形式只是行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27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页。

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①

卢森堡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她指出如果相信统治阶级会容许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过程获得政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她说：“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代的一件道具。”^②

伯恩斯坦在正确论证党应当重视议会工作的同时，片面强调“通向彻底的、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他孤立地考虑议会斗争的作用，没有认识到整个党和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潜在力量才是议会斗争的基础，而议会外群众的斗争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伯恩斯坦错误地认为当工人阶级运动加强，成为“人民运动”以后，它就要使自己的要求成为立即可以实现的目标，但在德国专制环境下，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采取武装夺取政权和议会相结合的方式，且应以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张渐进地改良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实行民主议会道路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虽然后来德国按照他的设想，发展了民主，走议会道路，但德国的民主却被法西斯打败，希特勒上台。因而伯恩斯坦所倡导的议会改良之路绝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

（三）卢森堡揭露了德国普选的虚伪性与狭隘性

卢森堡指出：“在德国，唯一实际的民主设施——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在政治上把各个小邦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意义，他们过去却满足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在俄国，资本主义光辉灿烂地在东方式的专制制度下繁荣成长，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地利，普选权大部成了这个四分五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页。

的王朝的救生圈。”^① 卢森堡后来又在 190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揭露了德国普选的虚伪性与狭隘性：“且不说在我们德国大多数邦议会还没有普选权，也不说我们必须忍受一大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残余，甚至连我们享有的一点点自由，例如选举帝国国会的普选权、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也没有真正的保障，经常受到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冲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同盟军，所有这些场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德国的民主发展唯一牢靠的支柱。”^②

这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所谓的民主、普选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与普选，卢森堡指出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1906 年的 1 月 25 日的选举中几乎失去了它的一半选区，种种迹象表明，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势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唯一战士和捍卫者等。

三、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 及其原则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卢森堡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系统批判了伯恩斯坦妄图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为一个以改良主义为指导，以议会斗争为手段，只着眼于运动，不顾其目的合法的、松散的、手工作坊式的资产阶级改良党的主张，但真正彻底批判伯恩斯坦“改良党”的主张，并建立起一整套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是俄国的列宁。故在此只大致介绍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政党理论的认识与批评。

（一）伯恩斯坦妄图把党“反复训练成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马，并且要它耐着性子套在资产阶级剥削者的破车上”

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特别是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5 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1 页。

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论述，从这些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卢森堡是坚定地反对伯恩斯坦关于改良政党的理论的，她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若无产阶级政党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不进行政治斗争，就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人民党。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要善于处理暂时利益与最终目的、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善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结合起来。

在卢森堡等一批革命家的推动下，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通过了指名谴责伯恩斯坦的决议，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明确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欲把党从革命政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意图，这一决议成为第二国际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的决议的基础。1906年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批判了伯恩斯坦分子，“党和工会”权利平等的理论，她指出，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平行地行动和“权利平等”的理论倒全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种理论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平静的“正常”时期的一种幻想，卢森堡认为不管是议会斗争还是工会斗争，都是伯恩斯坦分子推行的政治改良与经济改良的手段，都是为伯恩斯坦改良政党理论服务的，而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似乎溶化在议会斗争中了。殊不知与工会斗争相对应并加以补充的议会斗争和前者一样，也无非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土壤上进行的一种斗争。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①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7页。

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假使社会民主党愿意接受关于工会同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它也就间接地默认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早已追求的那种转变”^①。

（二）卢森堡对“党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的评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斗争通常与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结合进行，是各种斗争的中心环节。一个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最终实现。随着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并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根本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但伯恩斯坦却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片面强调经济斗争，而忽视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卢森堡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不但支持倍倍尔对伯恩斯坦关于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攻击的批判，还在10月11日的发言中批评了伯恩斯坦关于党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的观点。卢森堡批判伯恩斯坦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细小的改良运动的错误思想。她说：“伯恩斯坦及其拥护者的理论观点的最大弱点是他们关于所谓经济权力的理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在目前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获得这种经济权力，才能够成功地进行一次政治革命。大卫以及伯恩斯坦的另一一些拥护者常常指责我们空谈和偏爱死板的公式。我却要证明，在夺取经济权力的问题上，死板的公式和空谈恰恰是在他们那一边。”^② 卢森堡指出，马克思已经证明了，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上的一切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努力掌握了经济权力，资产阶级也不例外，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因而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那只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有三种基本形式，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是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其中，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最熟悉、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只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不进行经济斗争，就不能团结教育广大工人群众，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卢森堡指出：“没有一个同志不明白，在德国，在工会领域内，大部分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这一任务上。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人们使我们放弃工会斗争或者工会斗争不再继续发展，那么，政治斗争也必然因此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首要的条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而工会斗争是这一方面的最好手段。”^①但是，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斗争，如果只搞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而放弃政治斗争，就不能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就会滑向工联主义道路。所以，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互相配合、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既不能把它们彼此孤立起来、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互相代替。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灵魂，如果忽视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就会迷失方向，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政治斗争必须以思想斗争作指导，没有思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政治斗争的胜利。但思想斗争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否则，思想斗争也将遭到失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政治斗争的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政治斗争居首要地位，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务于政治斗争。紧接着卢森堡又说明了被伯恩斯坦分子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合作社并不是阶级斗争，那些认为合作社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的人忘记了目前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后备军问题。卢森堡进一步指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出，人们不管把哪种合作社看做是理想，看做是抽象的模式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一直是合作社运动的典范的英国合作社，就其生产部分来说完全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从历史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斗争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上升的阶级在旧社会内部通过细小的进步、合法的改良慢慢地愈来愈发展壮大起来，一直到它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通过一次社会的和政治的灾变来挣脱旧的桎梏。它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它在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就已经能够把它的经济权力发展到最大限度。卢森堡指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样做就十倍地更加必要。那些认为不经过激变就可以平静地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的同志完全不是站在历史的基础之上，他们错误地把革命理解为动用干草叉和流血。革命也可以用文明的形式进行，如果说某一种革命具有这样的前景，那么，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卢森堡最后还谈到了倍倍尔所作的六个小时的发言在批判伯恩斯坦分子中的必要性。大会经过四天的讨论，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案。决议严正指出，“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等。这是对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沉重打击，是德国党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三）卢森堡批判伯恩斯坦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党的思想，提出实行党内民主的“自我集中制”

伯恩斯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对每一个愿意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人敞开大门，不管他这种意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面，是唯物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基督教的，还是什么别的。承认不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应当作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先决条件。对此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遵循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科学的、最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了彻底解放而进行战斗的先锋队，因

此它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有高度的觉悟、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卢森堡在《党的纪律》中说：“任何以好些个人的协作为基础的团体、任何这样的较大的集体都需要纪律，也就是需要个人服从，舍此就不能合作。没有纪律，工厂就不能生产，学校就不能上课，军队和国家就不可能存在。”^① 在这里卢森堡明确指出了纪律对于党的重要性，是对伯恩斯坦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党思想的一种反击和抵制，她与此同时还指出，实际上，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的纪律与工厂或军队的纪律在本质上和根源上是截然相反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纪律建立在外部强制的基础上，而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建立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前者为少数人对人民群众的专制服务，后者则为民主服务，也就是为同个人相对的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服务。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后者是以士兵群众漫不经心、毫无主见地屈从上级的命令——它所表达的是异己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② 卢森堡在此指出，虽然社会民主党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的党，而不是松散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③ 卢森堡关于“自我集中制”的提法，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集中制的主体，也说明了实行这种“集中制”的动力是“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是“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思想蕴含着对党的组织原则，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丰富论述与深入地思考。她既强调党内必须实行充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分的民主，但这种民主又不同于伯恩斯坦所谓的纯粹的民主，而是与集中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民主，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思想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绝对民主”。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综合”，就是说卢森堡虽然强调党内民主，但她强调的党内民主并不是无原则的民主，而是民主与专政，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却主张把社会民主党改建成改良主义的党、人道主义的党，反对民主集中制，认为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在物质上支持党的人都可以自己宣布为党的一员，罢工中的每个工人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

除此以外，卢森堡还对伯恩斯坦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污蔑群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她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作用。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的认识

一、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认识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夺取政权

伯恩斯坦在谈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提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说，它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正像伯恩斯坦论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主题一样，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民主和夺取政权”中也专门指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①在此他既分析了没有民主的社会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主义是不可思议的，又分析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①

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一样，他们认为，民主不是同国家的产生相联系的，因此它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新型的民主制，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利用民主的手段反对无产阶级使用革命暴力，通过人人都有民主，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的确没有绝对否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或者说完全迷信民主走和平道路。但是与列宁相反，他认为对于西欧国家来说，正常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民主的道路，而暴力则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联系。

在考茨基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存在民主制和议会制民主的传统，只有“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正如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的最好的工具一样，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②。考茨基指出，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虽然意料中的统治阶级有废除民主的企图，但是这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反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捍卫民主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定会非常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当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民主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并且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越高，越珍惜民主，那么这种情况就越可能发生。他说：“一个牢固地扎根于民主制度的政党，决不会遭到惨败。”民主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成为“和平的、不流血的、不采取强制手段的革命”。但是，他也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愈民主，那么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于人民的意志。他还特别强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调，如果无产阶级数量少、缺乏组织性和思想独立性，那就可能会政治上软弱。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手段。相反，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上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话，那么资产阶级想要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考茨基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是不同的。他指出：“在上述国家里，有产阶级中确实有某些阶层，它们想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倾向正在增长。但是另外也还有其他的阶层，它们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们想要通过让步来讨好无产阶级的愿望也正在增长。”^①他还认为，目前还根本无法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将如何影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也无法看出民主在促使双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采用和平方法方面将起多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民主的存在在这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茨基认为，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照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种暴力、流血的方式。由于武器装备的悬殊，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应更多地使用民主的方式，因为暴力的道路比民主的道路需要工人阶级付出更大的牺牲，而“说服一个人去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比鼓动他放弃他的工作或他的生命时要容易得多”^②。实际上，在当时的德国和法国，由于无产阶级很好地利用了议会斗争这个武器，资产阶级政客已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制度上，他们宁愿工人筑起街垒，而不愿他们参加选举斗争，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对付工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③。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资产阶级的恐惧，正好说明民主这个武器是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的有效武器。

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夺权的方式并不是主观臆造的模式，而要取决于具体国家、社会以及阶级关系的特定情势。

考茨基指出：“究竟应该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并不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只是当我们从国家、社会及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特定情势的立场来观察我们的策略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这种特定情势是不能由我们主观地决定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在行动上采取民主方法还是革命方法的东西。”^①可见，考茨基并没有把民主方式无限地运用于一切国家和场合，而是认为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他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没有民主的武器可用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用民主的武器进行斗争”^②。考茨基认为，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道路、方式可以不同，因此，他认为那种把革命方法和民主方法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把革命方法只归结为暴动和总罢工的思想方法是十分错误的。考茨基指出，“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③。他认为，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

基于这样的认识，考茨基提出，现代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或流血手段不可”^④。毋庸讳言，考茨基在许多场合，更多地强调民主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迷信这一方式。相反，他认为，要想走和平的道路，必须拥有一定的暴力手段作为后盾，因为“意识到这类手段的存在，或许可能足以促使正在衰败的阶级与变得强大的对手达成和平的协议”，“无产阶级的力量手段越多，越强有力，它对于这些手段知道得越多，从资本主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④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页。

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越大”。^① 他还引用了“如果你要和平，就准备战争吧”这古语来比喻暴力手段与和平方式的辩证关系。

（二）民主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

考茨基认为，民主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这是因为：首先，民主的胜利、民主的实现，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他在批判伯恩斯坦时指出，“如果伯恩斯坦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我们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我们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②

其次，考茨基认为民主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考茨基在“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这部分内容中，针对西欧无产阶级的现状与资本专制下无产阶级的发 展前景，认为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还需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当时的无产阶级并不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两个重要素质：独立的思想意识和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也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但是，如果继续实行专制只能使无产阶级这两方面的素质更加匮乏，而普遍且真实的民主则会使无产阶级学会独立，并走向成熟。因为，民主是一种自由宽松的氛围，它从不外在地替人做出任何决定，而是注重培养人敏锐的辨别能力和较强的认识能力，让人面对公共事务可以独立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考茨基在1920年《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到可以夺取政权的时候，这时候民主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了。“民主不仅是衡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政治知识的程度的晴雨表，而且也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样，是发展这种力量的不可缺少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4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8页。

的肥沃土壤。”^①

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民主首先要求无产者从心理上抛弃物教意识，从自己囿于其中的日常生活圈子里走出来，突破狭小的生存视域，提高自己的素养，主动地关心政治、社会和国家，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对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清自己的全部生命被挤压到个体生活中而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事实，自己和自己的同类都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割裂的原子，而且，对这种割裂的感受越深刻，他对普遍性的向往也会越强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才会产生，也才激发出改变自己的整个社会的愿望。因此，考茨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培养无产阶级在这两方面的素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手段，必须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的方法是根本不够的。……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的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②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茨基批判苏维埃政权的专制，而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专政政策则是考茨基预言它必将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其次，考茨基从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出发分析当时俄国的现实，认为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由此得出结论：俄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考茨基指出，“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③，也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是有其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他认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即一个国家发展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这却促使人们去思考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考茨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三是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力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50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量即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四是无产阶级必须成熟起来，具备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成熟是在反贫困化的过程中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这种阶级斗争是一种群众斗争，必须以民主为前提的，而不能靠秘密方法组织和教育群众，因为“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①。只有无产阶级成熟起来，具备夺取政权并且保持和运用政权的能力，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考茨基认为，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错误的，而没有大企业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但起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物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要数量足够多、力量足够强大、要具备足够的智识和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具备那种能使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实现经济民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实践是说明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在人数、力量和智慧方面的不断增长，可以肯定地说，它正在愈来愈接近它的成熟时期，但还不能说明它已经达到成熟时期，“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②，从而使革命“不致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过早地发生，不致采取徒劳无功的突击，而且一旦获得胜利，胜利也不致再丧失，而能成功地保持下去”。^③正是由于以上的分析，考茨基认为，“一个国家一方面愈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愈是民主，那么它就愈接近社会主义”^④。也就是说经济资本主义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愈高，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愈大。虽然他看到了民主有时也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他依然强调民主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实现社会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和民主先进的条件下取得了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国家政权，“它就会在那里发现已经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来使经济立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且立即增进普遍的福利”，“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时刻估计得很遥远”。^① 总而言之，在考茨基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原本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和民主先进的国家发生，而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无产阶级占居民少数并且民主意识不强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是不成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得出结论：“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② “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③

考茨基同时还阐述了对民主制的看法，他认为，“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同时，考茨基也强调，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所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估计过高，“实际上它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是一种空想”。^④

（三）民主就是取消专政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⑤ 考茨基对此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肆意歪曲。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3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只是马克思在这里随意说出的一个词。“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按字义来说，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但是，当然按字义来说，专政还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是暂时的应急办法。”^①他强调，千万不能仅仅按照字义来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词的含义，“必须排除这一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②。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那么“政体”和“状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前者是完全排除民主的一种独裁，甚至是个人的独裁，而后者则并不排斥民主，甚至以民主为基础。他以巴黎公社为例来证明，马克思所说的专政只是一种“状态”。他说：“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③

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就在于片面地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理解成是一种“政体”，而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么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④。

正如后来列宁所批评的是，考茨基在这里无论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解释还是他自己的正面阐述，所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政体”与“状态”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来抹杀民主和专政的阶级性。考茨基的意思是说，他主张的“状态的专政”，是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在议会里面取得大多数；而布尔什维克主张的“管理形式的专政”则是暴力的专政。列宁指出，把“状态”同“管理形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348页。

式”相区别是愚蠢的。因为考茨基所说的“统治的状态”所借以表现出来的场所——议会，也是“管理形式”的一部分，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政体的一部分。考茨基在讨论专政时大谈“管理形式”，即政体问题，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指的是国体。他的目的在于宣扬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可以“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通过“人道主义和民主的道路”取得议会多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①“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②

当然，考茨基对民主、议会的认识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合理的方面，比如他认识到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成熟的关系，但是他也有局限之处，就是他看不到民主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将民主归结为人自古以来的本性，他们所说的民主，在表述的形式上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资产阶级民主。伯恩斯坦曾经说，“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形态”。考茨基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纯粹民主也是可以想象的”。

因而，可以看出，考茨基在民主方面的认识与伯恩斯坦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不仅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声称专政就是取消民主，而且更反对在整个过渡时期内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恶毒地讽刺布尔什维克创造一种“新颖的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和无产阶级本身的统治长期共存”，直到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为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

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武装斗争没有存在的必要，等等。

从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考茨基也与伯恩斯坦一样，认为：“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卫少数派。”^① 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长久执政，政党力量的变化比阶级力量的变化还快。所以，任何政党都有变成少数派的可能，“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你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②。

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其抽象的民主理论，将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认为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就是独裁，并坚决反苏反共，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由此指出，“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斯坦了”^③。

总之，考茨基无论是侈谈“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还是鼓吹议会民主、和平过渡，这都是他的超阶级民主观的必然表现。

二、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议会及普选权的认识

考茨基在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3 年的《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题》等著作中，重点阐述了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

（一）议会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如果从考茨基对资本主义议会、普选方面的认识来看，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伯恩斯坦主义的继承者。这主要是因为他同伯恩斯坦一样，都竭力主张走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而反对通过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宣扬通过争取普选权，获得议会多数，从而不必通过暴力革命的流血牺牲，他说：“按本义来说，专政这个词意味着取消民主。”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曲解为和平地争取议会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9 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2 页。

多数，他认为：“这样以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他还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一味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

考茨基由此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这也是考茨基攻击俄国革命的著名理论——“早产论”。

考茨基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在《新策略》中反驳潘涅库克，说他是“群众行动痴”，并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是“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①。这句话是考茨基的名言，也彻底说明了考茨基是一个“议会迷”、“议会痴”。他把议会斗争看做工人阶级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考茨基在每每谈及无产阶级革命时，总是特别重视阶级斗争的和平形式，而对武装起义则三缄其口，这也说明了他害怕革命，嘲笑革命的心理。这也再一次验证了他的名言：“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②

考茨基认为，在存在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选权的欧洲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主要应采用议会的合法斗争，尽管民主斗争的手段“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少”^③，但这将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本手段。因而，按照考茨基的观点，那就是当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之时，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性质，议会这时候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了，而这种斗争将会唤醒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这种人本来对斗争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现在由于相信议会斗争，而对未来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33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③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抱有美好的希望。这种斗争，也是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巩固起来，团结起来，从而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最有力手段。所以，总而言之，考茨基最终指出：“议会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①

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民主武器就是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他说，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权完全从属于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尽力使议会能够成为政府和法院的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必须为使自己的代表便于参加议会而斗争，而不是破坏国家政权。他声称，议会制之所以表现得软弱在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而不在于议会制。他把这种论断奉为信条，并以此来拒绝左派对议会斗争手段局限性的日益增加的批评。当然，也以此来拒绝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不满。考茨基以英国为例，指出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其最初的特性，从而使无产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促使国家的政权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摆脱自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所以，“在真正的议会制国家里，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并且，“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②

考茨基在文章《对于深思熟虑的深思》中谈到，在非革命的时代，那种存有持续性群众罢工的想法，是荒谬的。俄国的例子决不能成为西欧的样本。他认为，那些主张按俄国的榜样搞群众罢工的人，过低地贬低了议会对无产阶级的价值。他指出：“帝国议会里的拥有四百二十五张选票的一百一十名社会民主党员，……我们在帝国议会里或许还能够更加强大大起来并且达到迫使议会进行社会改革的地步。”^③ 这种对议会阶级斗争方式的夸大只能意味着完全否定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至少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这样。考茨基继续迷信着议会制，他认为资产阶级拥有一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②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9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60页。

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得他们可以在议会竞选和议会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①而议会又可以为无产阶级培养演说家、法律专家和一切组织人才。同时，这样也将会使资产阶级畏惧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胆战心惊，从而使无产阶级成为不可战胜的，使政权手段不再发挥作用，使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没有理由逃避议会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议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②。由此，考茨基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如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样”^③。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而“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会导向它的僵化，导向一种无止境的连篇累牍和浪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状态”^④。同时，它还导向办事专断和行贿舞弊。因此这种官僚专制的国家就处于一种同生产条件愈来愈大的矛盾中，并成为一种妨碍生产条件的桎梏。因而，这时候就迫切需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置于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中央议会的、也即国会的监督之下。“议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监督政府，在这一方面，议会是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来代替的。”^⑤

事实上，在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已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制度上，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9页。

④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⑤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他们已不再相信，这种制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障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议会制度的软弱无能上，寄托在德国实际上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在统治的这一事实上。^①

总之，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代议制，我们都不可能发现它会这样地损害无产阶级，以致使无产阶级有理由避开有朝一日会构成并且在目前社会中必然会构成我们政治生活重点的议会。^②

因此，考茨基指出，如果认为议会制度单单只为资产阶级服务，那是只有政治上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断言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选举权类型的不同，代议制是可以为各个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真正的议会制度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消代议制，而是破坏政府对于议会的权力，但同时也是通过平均地划分选区、保护选举秘密、短期议会、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完全自由，而尤其是通过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已满 20 岁的国民来给无产阶级进入议会开辟一条尽可能广阔的道路。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所宣扬的议会道路“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③的具体表现。列宁指出，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④。

（二）普选权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考茨基指出，下层诸阶级的，也就是“人民”的口号，就是普遍选举权。他深化普选权的作用，把普选权夸大为一种“万能的良剂”。“取得这种选举权，不仅符合工资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23 页。

②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2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3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2 页。

级的利益。”^①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抨击苏维埃俄国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是“对普选制的侵害”。考茨基认为，不需要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只要使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只好安分守己了。不过，考茨基不明白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不是哪个人的个人决定，而是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必然要求。考茨基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要么就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手中，要么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过来，但却绝不容许工人阶级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之所以如此，考茨基认为，除了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在议会中加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的，首当其冲的是普选权。“使那种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今日的社会里成为唯一合理的选举权，并且使这种选举权愈来愈得势”^②，他还指出，“平等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是唯一合理的选举权，也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③。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考茨基认为，“今天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再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同意普选权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选举权的任何一点扩大都必需由工人阶级加以争取，而且，如果说在普选权存在的地方它还没有被废除，那也只能归功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④。

在此，考茨基指明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争取普选取的恐惧。他认为，为什么资产阶级担心无产阶级获得普选权呢？这是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今天已经看穿这种选举权对他们来说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的话，那么，今天各地的无产阶级也都知道，在选举权上他们拥有多么强大的革命的武器。考茨基指出，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选权不仅是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胜过那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级而具有的武器；而且还是激励各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8页。

④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

个党派的精神。因而，在工人阶级方面，为了普选权，也就是为了自己参加议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仅仅动一根手指头也是疯狂的了。相反，我们现在恰恰在一切地方又看到争取普选权的极其激烈的斗争开展起来了。在无产阶级被剥夺选举权的地方，他们在为争取它所需要付出的极大努力和牺牲面前是毫不畏缩的……德国工人取得选举权的任何一次尝试，都会有给国家招致一场可怕灾难的危险。^① 考茨基还指出，“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都不能一下子完全占有政治权力。在真正的议会制的国家里，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条道路上的最重要的一步”^②。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及政党思想认识与批评的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民主与专政、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民主与专政本来是国家政权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也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既可以采取民主的办法解决本阶级的内部矛盾，也可以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以便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被统治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则割裂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抽象地对待民主与专政，疯狂地推崇和迷恋民主，否定和污蔑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比如伯恩斯坦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已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议会民主制“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他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诬蔑马克思的暴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

^②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4页。

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和“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是“恐怖和独裁政治”。伯恩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改良、通过民主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但实际上伯恩斯坦所推崇和迷恋的民主并不是他所想象的民主，而是在民主掩盖下的暴力和凶杀。列宁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德国革命的实例使我们深信，‘民主’不过是幌子，它掩盖着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最野蛮的暴力。”^①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还说：“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只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②。从中可看出列宁认为民主是离不开资本、财产和占有关系的，空谈民主是没有意义的。

列宁在总结俄国党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不但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和原则，而且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的宝库。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美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伯恩斯坦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党放弃最终奋斗目标，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口号，并明确提出要使社会民主党由工人政党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用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他就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考茨基也割裂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认为专政就是取消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这里随意说出的一个词，“马克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因而，全面认识列宁、考茨基、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民主观批判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民主与专政、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民主与专政，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既不能只强调民主也不能只强调专政。列宁、卢森堡辩证地论述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卢森堡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国家只有民主而无专政。即使是今天宣扬最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存在专政，如果谁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浅见了。美国同样致力于搞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完全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的，就算他们的总统是平民出身，但是只要他成为总统，他就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这种异化现象绝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有的人根据伯恩斯坦、考茨基所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句话，就认为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卢森堡在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所讲民主是同专政相对立的，被阉割了阶级内容的、超阶级的民主，即所谓“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他们的民主实际上是人的“类本质”，是既保护多数也保护少数的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观。这种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他们一方面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一般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本质，肆意夸大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中的失误，攻击它不人道。

卢森堡虽然也强调民主，也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她不仅没有割裂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只强调民主，而是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基本公式：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反过来民主也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循

环往复地联系着，谁也绝对不能打破这个逻辑，一旦打破这个逻辑就可能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只强调资产阶级民主，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民主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可能是全民的民主。

伯恩斯坦认为，民主在实现社会主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论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他说：“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呢？可以说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之前的历史阶段民主是目的。因为，民主是“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一切非民主的国家制度都要走向民主制，从这一方面看民主具有目的性。但是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进程中，民主就是手段，“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从恩格斯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是要能起到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重要作用的。但伯恩斯坦却主张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和平地改良，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

（二）有助于我们弄清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

西方人民表面上享受很多民主，但他们的民主实质上是被限制在一定的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意志。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特·曼德尔曾详细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性。他指出，首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间接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有几千或几万受委托的人（国会议员，市长，地方议会代表等）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大多数的公民并没有机会参加，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每隔四五年投票选举一次。即使选民可以通过选票选出国家领导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用选票改变这个国家由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如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人民要求上台执政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一样会受到他们统治

政府的镇压。退一步说，假使西方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权，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也就只有一种结果，就是这个政权会很快被资产阶级给绞杀或异化。这是因为决定政治的是经济，国家的经济命脉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那么就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抵抗住了资产阶级的绞杀，也绝不可能抵抗住自身的异化，它自然会异化成资产阶级新的代理人。其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平等纯粹是形式上的，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形式上，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权”去做些事情。可是，由于实际行使这些权利必须有强大的资财支撑，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够充分享受这些权利。资本家由于有钱，会做到影响大批在物质上依靠他们的投票人，会收买报纸、电台和电视时间。资本家靠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议员和政府。最后，即使不理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这一切特殊的限制，错误地相信它是完美的，它到底也不过是政治民主而已。富人和穷人即使在政治上平等有什么用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日益增长。即使富人和穷人的政治权利真正是完全相等的，富人还是有穷人所没有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一定会使穷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富人支配，包括怎样实际运用政治权利在内。

西方民主其实质就是，在大多数民众承认少数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由少数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府，出面承认民众有限的民主权利，以使得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更加有效的运作，因而其民主具有虚伪性、狭隘性。社会主义民主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性，是真实的民主。实质上，民主无论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形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阶级的统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三）有助于我们认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把握科学的民主观，推进我国的民主建设

民主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民主观与伯恩施坦、考茨基的民主观是一脉相承的，并在他们民主观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所推崇的民主观就是：第一，从民主与专政的抽象对立出发，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

级民主的框框里；第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可以改变和消灭资本主义。最后，企图把资产阶级民主当做渗透和演变社会主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属于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建立于一定的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当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时，也就无所谓民主了。列宁、卢森堡根据马克思的民主理想对伯恩斯坦的民主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鲜明的观点、犀利的笔锋、敏捷的辩才给伯恩斯坦、考茨基以沉重的打击。

通过对伯恩斯坦民主观的批判，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列宁、卢森堡的民主观与伯恩斯坦的民主观是截然不同的。伯恩斯坦所揭示的民主神话只能是一种空想。民主社会主义推崇伯恩斯坦的民主观，只能是自取灭亡。因为伯恩斯坦所讲民主是同专政相对立的，被阉割了阶级内容的、超阶级的民主，即所谓“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这种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他在这里奢谈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民主最根本的含义就是主权在民，即人民的统治。伯恩斯坦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当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能实现人民的统治吗？

（四）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清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政党建设

在对伯恩斯坦、考茨基民主观的认识中，列宁曾和考茨基之间产生过很大的分歧。列宁和考茨基所产生的分歧实际上是与伯恩斯坦民主观的分歧一致的，因此通过列宁对考茨基民主观的认识，我们也能看出他对伯恩斯坦民主观的认识与批评。

考茨基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中主要对两个层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二是评论和分析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一系列“反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后果。同样，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批判考茨基的，一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二是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等行动进行历史和理论上的辩护。列宁在文章中批评考茨基的民主是“纯粹民主”、“超阶级民主”。列宁之所以强调阶级民主，批判形式上的程序民主，主要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在俄国沙

皇制度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得不到合法地位，只能在秘密状态中走一条体制外的革命道路。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开始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型时，俄国才刚刚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不断发展民主时，俄国才刚刚踏上构建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当民主的增长在缓和西方国家阶级矛盾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用民主、参与政治的政治空间时，俄国却在经受着一种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巨大阶级矛盾之中。自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就无法从俄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去体验和感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民主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历史发展的差异，最终导致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也开始出现巨大的历史分化。

二、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议会、普选的限制性， 认清它们的本质

从伯恩斯坦以《礁石》为题的一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的许多机会主义观点的萌芽。这些观点集中于对待资产阶级议会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的时候而不去利用，就像“青年派”那一类左倾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幻想通过议会制度而“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上面。”^①

^① 彭树智著：《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一)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议会斗争与武装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

列宁在《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改良主义》等著作中，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错误做法。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并不是不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这种手段进行革命，但是他认为这种手段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关键还要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倒向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① 列宁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揭露孟什维克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大谈特谈立宪会议，只能被沙皇把民主派打得落花流水；另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议会斗争虽然“不可能成为目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但这样做，决不是“要‘否认’议会斗争，拒绝利用议会斗争”^②，而是“应当把杜马看作是革命的工具之一”。^③

列宁主张，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将议会形式的斗争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总的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在杜马外的斗争起着决定的作用”^④。列宁不仅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对待议会斗争的态度，而且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议会斗争的策略思想，具体地运用于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不单纯是哪种斗争形式的胜利，而是暴力革命起决定作用，多种革命形式相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结合的胜利。没有“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①就没有十月一声炮响而一举成功。

通过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与议会主义》中对伯恩斯坦关于议会斗争与武装夺权观点的认识与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出，卢森堡也并不是不主张议会斗争，但她反对那种迷恋于议会讲台和普选制，只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限制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所许可的范围内，而完全忽视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她在《策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真正的斗争力量，胜利的保证……不在议会，而是在街道上。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与议会主义》中还进一步强调应该向群众指出，“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活动，不要把议会斗争看做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中心”。由以上可以看出，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应该参加议会斗争的，这是争取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但是，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心不在议会，真正的斗争力量，胜利的保证，不在议会，而在街道和工厂的无产阶级群众身上。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聚革命力量。19世纪末期，欧洲各国社会党，特别是德、法两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就，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中的部分机会主义者鼓吹“议会至上”，而完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偏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所依靠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而不凭借武装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不仅完全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自欺欺人之谈。

现在，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争取议会席位的多数。

还有一些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还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他们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1946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182席，但是在1951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103席，即少了79席。在1956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150席，但是在1958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10席，即少了140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等阻碍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

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二）有利于弄清议会、普选制的虚伪性及其实质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时，不仅充分肯定了议会制和普选制曾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而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普选的实质。他们认为，由普选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是议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普选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普选、议会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它不仅在同封建专制作斗争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而且对民主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①马克思主义者在剖析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时，充分肯定了议会、普选制的重大历史进步作用。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变成了统治阶级，议会就摇身一变，而变成一个欺骗人民的“清谈馆”了。马克思曾痛斥议会说：“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②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然、很少诚意。”^③

而资产阶级普选制也是如此，普选的本质实际上只是限制和剥夺劳动人民的选举权，而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的前提条件下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2页。

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资产阶级就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曾经驳斥了所谓普选权是代表全民意志的谎言，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全民”和“统一”的全民意志。所谓全民的意志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①普选权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②。

列宁说西方的普选制是形式上的普选制。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③。这些论述深刻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执政的本质，不过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剥削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根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政党所宣扬的那样，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全民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全民的、改良的党。

卢森堡针对议会迷们疯狂地追逐议席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揭露了议会选举的虚伪性。她曾指出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最初的旗号，但现在已经是没有内容的空壳，只是小资产阶级幻想时代的一件道具，最后演变为只是资产阶级的议会，而无“国民”。她还进一步说：“今天，谁抓住国民会议不放，他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革命拖回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他就是一个经过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①

总之，一谈到“议会民主”，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议会与民主的结合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是完美无缺的。实行民主，就必须是议会制；而通过议会所进行的广泛讨论正是民主的体现。因而他们认为批评和反对议会制，也就是反对民主，就是专制主义。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议会、普选，既不一定平等也未必普遍和民主，因为当权的资产阶级们往往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加上种种限制，使它变成少数富人享有的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利用以实现共同统治的工具。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实行的是“普遍选举制”似乎是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完全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劳动人民被种种限制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议会的席位，也都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霸占。可见，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在资本主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从未实行过。参政权事实上只是富人享有的权利。即便是人民都拥有了普选权，他们也不一定能真正拥有民主权利。比如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都有了普选权，英美人民也没用真正的民主权利。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用历史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普选权。他们认为，普选权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在无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普选权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来说，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卢森堡曾经指出，且不说当时的德国大多数邦议会还没有普选权，也不说人们必须忍受一大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残余，甚至连享有的一点点自由，例如选举帝国国会的普选权、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也没有真正的保障，经常受到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冲击。人们又怎么可能享受到伯恩斯坦所谈到的议会民主和普选呢？因而，总的说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资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523页。

产阶级自由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同盟军。所有这些场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才是德国的民主发展唯一牢靠的支柱。所以说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一点也不过分。当然民主、议会、普选制同封建专制与农奴制相比较起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①。卢森堡在对伯恩斯坦议会、民主、普选制的认识与批评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她认为，议会民主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发展、人类进步以及诸如此类美妙事物的绝对产物，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某种历史形式。

三、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伯恩斯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

（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伯恩斯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全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

首先，列宁、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政党观的认识与批评，使我们能充分认识到伯恩斯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全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

伯恩斯坦的政党理论是为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服务的，他的政党理论通篇充斥了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实际上，他是为了追求在合法斗争中取得多数人的支持，才鼓吹建立“全民党”的。“全民党”思想渊源于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问题”。伯恩斯坦要把党建成“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鼓吹不论何种人都可以加入党内来，从而容忍思想、组织不纯的加入党组织，给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敞开了大门，这也导致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伯恩斯坦“全民党”思想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首先，从理论上讲，“全民党”是不会，也不可能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指出，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的集中代表，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从来没有什么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如果有政党，就谈不上是全民的，因为政党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集中代表。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因为没有阶级了，也就不需要有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了，所以“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标榜“全民”性也显示了伯恩斯坦政党理论的虚伪性。因而他的“全民党”理论更像是一种基督教教义的善良愿望。所有标榜“全民党”的政党，都早就是、或者很快就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中率先声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此后，其他社民党“纷纷效尤，以致‘全民党’成了更加贴切的概括社会党特征的词汇”。

其次，从政党属性上来看，全民党的理论不符合政党的本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政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反映一定阶级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以实现其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理想为奋斗目标的，因而都是阶级的政党。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政党就一定是阶级的政党。

最后，从实践上讲，当代所有宣布自己是“全民党”的政党，统统是资产阶级政党，西欧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早就是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同无产阶级其他组织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

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这个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政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它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应“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全民党”的思想。当伯恩斯坦提出要把德国党由片面的工人政党改变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时，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9月专门为此发了一封《通告信》，在《通告信》中他们对“全民党”的思想给予了批判，认为建立“全面的党”势必会使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会使德国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充斥的大杂烩。马克思、恩格斯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伯恩斯坦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党应该有鲜明的阶级性，或者他本身就想把党建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充斥的大杂烩。伯恩斯坦分子在党的性质上的这种转变和重新定位，主要是为了适应普选制和议会民主的需要，党的身份的跨阶级性、模糊性，有利于他们争取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争取到较多的选票。如果确实是为了实现全民的某些共同利益，转而以全民党代替阶级党，也是无可厚非，有情可原的。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为了做到“全民党”，而完全放弃自己的“阶级身份”，就必然使自己失去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这显然不会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伯恩斯坦还故作天真地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这在当时资产阶级专制的德国又怎么可能呢？

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妄想把党建成为一个以改良主义为指导，以议会斗争为手段，只着眼于运动，不顾其目的的合法的、松散的、手工作坊式的组织，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在党的策略方面，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要善于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善于把改良和革命结合起来；还要善于把各种不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斗争方法结合起来。他阐明，只有制定正确的策略，党才能成为政治上的独立的、强大有力的革命领导者，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列宁认为，凡是党的现有力量能够采取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党得到最大成绩的一切斗争手段，都应该承认。但是，党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当主要着眼于政治斗争，着眼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的全局，着眼于最后进行暴力革命，而绝不能片面夸大改良和经济斗争的作用而考茨基却对此进行了调和。

（二）是正确认识党员成分与党的性质的前提

列宁、卢森堡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和觉醒是各国党得以建立的根本条件，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应该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由这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但这并不等于说无产阶级政党只能在工人阶级中而不能在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中吸收党员，更不等于说只有工人党员才能保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而吸收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分子入党就会导致党的性质发生变化而成为丧失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全民党”。因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

伯恩斯坦所要建立的“全民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在党的性质上，公开否定党的阶级属性，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是“容纳一切人的党”，不再坚持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实际上他所建立的“全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所要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伯恩斯坦所要建立党员成分庞杂的“全民党”，不但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否认党的阶级属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也势必不利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而此理论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才能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解放自己。社会民主党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修正，这一修正使工人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全民党，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异化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①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种绝对不相容的事情”，这种人“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4页。

第五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比德国经济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远比德国先进，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这时候，工人的收入好像比以前普遍提高了，生活改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而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垄断性质的卡特尔、托拉斯也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资本家也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以避免盲目生产的可能性，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段时间，正是伯恩施坦侨居英国的那段时期，英国的发展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通过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同马克思所预料的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加剧，没有给资本主义制度致命的打击，而社会结构也没有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在很大程度上统一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将崩溃。

但是，伯恩施坦没有想到的是：在 1896 年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学会管理生产，以便作为

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能够为公共福利而接管生产。”^① 对于大会通过的这项决议，伯恩斯坦十分郁闷和不满。他指出，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指“现代社会已经屡次遭遇的普通的营业危机”，而是指“真正的、巨大的世界历史性危机”，不是指“哪几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盘崩溃”。^② 而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他认为，国际社会主义制定的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空论，它忽视了制定策略时必须依据的前提。在伯恩斯坦看来，制定策略的时候必须要依据“两种性质”的前提：一方面是“要考虑这些纯粹实际情况的外部影响：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它的各党派的性质关系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的是“知识性”方面的因素，即“对社会状况的认识的程度，对社会体及其成员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洞察所达到的阶段”。他指出，“这两种因素都在变化着”，因此，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对于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要考虑”^③。但是“那些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常常无视这一原则。实际上，这些人恰似“迷恋革命的堂吉诃德”，他们“永远不敢承认在它的前提下有任何重大的改变”^④。因而，伯恩斯坦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在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上提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因而，他在《崩溃论与殖民政策》、《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文章中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了全面“修正”和堪称有体系的“批判”。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第一节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

伯恩施坦为了彻底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要修正马克思学说中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劳动价值论。按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这段评述虽然极其简单、粗陋，却句句釜底抽薪。如果伯恩施坦的论断成立的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直接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实际上伯恩施坦不懂政治经济学，他并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和内在逻辑发展。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两因素，并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他的局限是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该理论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为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石。但伯恩施坦却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现实可行性，因为马克思对商品及其价值的考察，缺乏“现实中”能够“衡量每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尺度”。就此而言，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抽象”“仅仅在一定限度内才能生效”。伯恩施坦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柏姆-巴维克、杰文斯（Jevons）的“边际效用论”并无二致。伯恩施坦从肖（Shaw）和韦伯（Webb）等费边派那里学到了有关杰文斯边际学说的好多东西。杰文斯边际学说把价值与效用等同起来，并使之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供求关系。伯恩施坦在《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经济价值的概念，并指出“经济价值具有二重性：它包含效用的因素（使用价值，需要）和制造费用的因素（劳动价值）。但他的概念确实有

点逻辑混乱，至少使人感到迷惑，因为他在使用概念时根本没有界定清楚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他说：“一件无需花费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无论它的效用有多大，它的经济价值也等于零；只要一件东西不能满足人的任何一种需要要求，投入这件东西的一切劳动便不能赋予它丝毫价值。”^①从这段话前句话可以看出，在这里，伯恩斯坦口中的经济价值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使用价值，后面半句话讲的是商品的价值。但我们前面在谈到他的经济价值二重性时可以看到，他那里的经济价值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体。因而，可以看出伯恩斯坦是混淆了马克思商品价值量这个概念的。伯恩斯坦由于对《资本论》第三卷感到失望，以至于他对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都产生了怀疑。伯恩斯坦说：“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映像。”^②他还说：“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③伯恩斯坦吸收了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柏姆-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的关于价值的思想，《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是当时批评马克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文中，柏姆-巴维克认为，价值概念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只是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是对使用价值的一种抽象。伯恩斯坦从此书中认为自己获益匪浅，他断言，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某种抽象的假说。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要假定一种决定价值的性质，“但这并不是劳动，而是需要，是效用。这种性质在实际生活中决定商品的价值量”^④。伯恩斯坦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看到了需要，也就是使用价值，马克思也承认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但伯恩斯坦却

①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严隽旭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④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严隽旭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否认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就使折中主义的伯恩斯坦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与边际主义的价值概念综合起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等同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在研究价值理论时所主张的抽象法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法，这种抽象法从大量个别的和偶然的現象中，概括出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它们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从商品的特性中抽出抽象劳动，认为抽象劳动它是决定价值实体的，而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规律。但是以柏姆-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抽象法，却把历史上不存在的孤立个人抽象出来，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用人的欲望与物之间的关系来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探讨。在价值论上把价值变成了人的心理产物，而力图否定价值是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毫无共同之处，但伯恩斯坦却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抽象与资产阶级的“抽象演绎法”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派的价值论看做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这样就成为价值不依赖于劳动，从而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伯恩斯坦妄想用他的这个理论来修正和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论，这不仅表明了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及其科学价值的无知，更表现出他对劳动价值论的偏见。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非是 “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

伯恩斯坦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为起点，进一步否定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伯恩斯坦为了挖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先是攻击劳动价值论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又说，马克思所讲的价值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思”，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映

像”。那么，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剩余价值理论就“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①。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

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家在花钱购买劳动力以后，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除能创造出保存生产资料的原有价值外，还会创造出新价值，这种新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工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也即工人的无偿劳动的成果，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源。

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也即它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伯恩斯坦为了否定资本主义剥削，说工厂主、商人、金融资本家都在“劳动”，都是剩余劳动的创造者。他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特别陷于错误的一点，是把劳动价值常常认为是测量资本家剥削劳动程度的尺度”，伯恩斯坦还进一步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使用的、试图揭示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一把钥匙”，但是，不幸的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而由此引出的最大的、致命的“错误”，就是用劳动价值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即以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率。他断言：“即使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出发并且把劳动工资的总和同其他收入的总和对比，那时剩余价值率作为这一尺度也是错误的。”^②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我们恰好是在剩余价值率很高的工业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中遇到地位最好的工人，即‘劳动贵族’的一部分，而在剩余价值率很低的工业中遇到被最可耻地压榨的工人。”^① 伯恩斯坦所说及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资本家的剥削作辩护，都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实质，从而为他的改良主义路线的推行扫除障碍。

三、伯恩斯坦从股份公司的发展、 小生产的顽强性阐述了资本分散论

伯恩斯坦为了推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却用并不科学的统计方法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来说明对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被马克思“抛弃”了。伯恩斯坦所讲的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一是股份公司的发展；二是小生产具有抵抗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的顽强性；三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四是工会的经济斗争，这也是伯恩斯坦的资本分散论的内容及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断是一种极端的“空想主义”，股份公司的发展是限制资本积累的因素之一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通过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组织股份公司等途径，使资本迅速积聚和集中起来，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伯恩斯坦在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断是一种极端的“空想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空想：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飞跃，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稳妥、最短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它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就会不可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收拾地崩溃。伯恩斯坦称这种“空想”为“崩溃论”。伯恩斯坦还举例说就拿《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来说，“似乎‘剥夺剥夺者’指的是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是这完全是空想主义地想出来的”。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反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中说到资本的分散是通过分割及其他方法，即“多数个别资本家的相互排斥”而形成的。马克思只是谈到了资本家的数目，由于这种分散，而同资本的积累一起，“或多或少地增加了”。然而，他认为，马克思在继续说明中，却完全忽视了资本家人数的增加，对股份公司的叙述也完全着重于从资本的集中，而不是从资本分散来阐述，但这决不是事实。

伯恩斯坦用大量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随着股份公司的兴起，极有可能使已经集中起来的资本被广泛地分散，凡是持有股票的人都会成为有产者，因此，资本不是集中而是分散，有产者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公司的形式对于通过企业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趋势在很显著的程度上起着对抗作用。它容许已经积聚的资本进行广泛的分裂，并且使各个巨头为了积聚工业企业的目的而占有资本成为多余的事”^①。这就是说，股份公司，有可能使集中起来的资本广泛地分散，而且使各个资本家豪族对以工业企业集中为目的资本操纵落空。他认为，股份公司的一个作用，就是使资本由集中变为分散。股份公司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中产阶级崛起，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他还用一系列的统计材料说明，“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②。因而，如果以现在的发展情况来说，认为有产者的人数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怎么也是错误的。与此相反，不论绝对地或相对地都在增加。但他并没有得出资本的所有权正在集中这样的推论。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有小生产经济的顽强性等，限制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各种因素

小生产具有抵抗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的顽强性是伯恩斯坦反对资本积累的第二个理论依据。伯恩斯坦认为，小生产由于具有自身的优势，因而它的发展并没有减少，而是有所增加。中小企业并未被消灭，而是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般繁荣。由此，他认为，这将会带来如下的政治后果：如果认定，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表明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已相对或确实绝对地减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有赖于“有产者”的减少，那也许真该躺下睡觉了。但事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

伯恩斯坦用若干国家大量的统计材料，说明“如果说，在数目日益增加的工业部门中，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企业集中化已经是一个真理，它的意义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顽固的反动派能够讳言了，那么，这同样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一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同大企业并存”^①。伯恩斯坦以此来证明所谓小生产者的存在和小生产者的“顽强性”，来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和生产集中的过程。事实上，一方面，伯恩斯坦所罗列的这些统计材料，以及依据他的这些统计材料所做的分析都是极不科学的。他选择的统计方法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他不是根据每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统计来进行纵向比较（德国除外），而是把不同国家一定时期的统计材料进行横向比较，这只能看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怎么能观察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呢？而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又恰恰是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最直接证据。

另一方面，由于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它可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排挤小生产者，从而必然促进资本的集中和中小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生产者的破产。

（三）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伯恩斯坦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它的后果是同样巨大的生产提高——使用品的大量生产。伯恩斯坦认为那些资本家巨头“哪怕有着比民间笑话说他们具有的还大10倍的肚子，并且有着比他们实际所有的还多10倍的仆人，但是同每年的国民生产的量比起来——我们不妨想一想，资本主义大生产首先是大宗生产——他们的消费仍旧像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①。伯恩斯坦由此认为，不是资本家巨头消费了剩余价值部分，而是剩余价值被平均化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出现的，将不是数目日益缩小的资本家巨头，而是数目日益增加的各种资本家”^②。

（四）工会的经济斗争

伯恩斯坦认为，工会和资本家商定的劳资合同，可以看做是在工业中劳资双方的合股，所有这些都“包含有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为此，伯恩斯坦强调工会的经济斗争，“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并强调必须“更高地评价工会在经济生活中所能行使的全部职能的社会意义”。伯恩斯坦用这些“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来“修正”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否定这个规律，宣布这种科学理论已经“过时”，目的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必然性。

四、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会走向“崩溃”

伯恩斯坦在1896年到1898年期间，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声明中，根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据他所谓的“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显著进步”，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过程中，经济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具有了巨大的“适应能力”。他否定恩格斯关于卡特尔、托拉斯“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的危机的萌芽”的论断。他说，“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多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抵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①，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通过一整套社会改良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经济企业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同时，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日趋缓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正在“愈加民主化”，只要采取“投票、示威游行”就可以代替“流血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他把社会的发展只看做一个量变过程，认为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一点一滴的改良，通过量变的积累，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从三方面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首先，伯恩斯坦把地方市政自治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拥有的地方公用事业，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他指出，只要通过地方市政自治机构的立法途径，在城市范围内实行一些“城市交通政策”、“城市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对城市的交通、住宅、卫生等进行一些改革，并且经营若干“地方公有”事业，其本身就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前进了。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能够消灭剥削，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伯恩斯坦把工人消费合作社看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伯恩斯坦一方面埋怨马克思“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另一方

^①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严隽旭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面他也反对人们对合作社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消费合作社或工会非常重要，虽然“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是它们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①。最后，劳动保险、劳资合同，甚至资本家为了欺骗工人所搞的工人参与“监督”，伯恩斯坦都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总而言之，在伯恩斯坦看来，上述种种都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萌芽，这些“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实现”。在此基础上发展，就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的新制度。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局部严密的计划性和整体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但伯恩斯坦认为，由于现代信用、交通通信、统计科学以及企业主组织的发展，这种根源于生产盲目性的危机逐渐消失了。伯恩斯坦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洛贝尔图斯“没有特别的不同”，世界市场的扩大，信用制度的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等，伯恩斯坦把它们的发展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并认为这些手段都能使危机消除和避免。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基础的崩溃论，只要危机理论不能成立，崩溃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是作为越来越重大的危机的后果而出现的。”^②

按照伯恩斯坦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发展而引起的全面崩溃，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是一个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它完全忽略了各种工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以及他们在采取公共服务形态方面极为不同的能力。“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②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9页。

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① 伯恩施坦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加深了工业的分化。

更何况，在伯恩施坦看来，经济危机是能够避免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已经产生了克服经济危机的种种条件，所以“过去发生的危机不再重演了”。他还列举了几种可以防止经济危机发生的办法，一是交通运输工具完善，世界市场扩大，商品销路增加，可以消除经济危机；二是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可以调节生产，减弱工业中危机，进而使一般性危机不到来；三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可以调节生产与流通，可减少危机发生的危险；四是军备增加可以缓和危机。

但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1896—1899年正是伯恩施坦高唱世界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再发生的高调最凶之时，1900年便发生了延续两年半之久的新的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等。

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危机等理论，根本目的就是为他们“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这样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如果经济崩溃不是一种必然，那末社会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必然性了，那末社会同样也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那末社会灾难也就不是一种内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②

伯恩施坦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而否认了资本主义崩

①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②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9页。

溃的可能性。19世纪中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伯恩斯坦能观察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就像伴随而来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样，都是些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他作为一位密切关注时代趋势的观察家和改良家，能够比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洞察到这些趋势。但因为他只是会片面地分析，却不能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看透资本主义的本质，关于这一点，他是清楚地知道的。“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①所以，他并不能准确地解释这些趋势，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伯恩斯坦看来，像卡特尔、托拉斯这样的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实际上这些垄断组织虽然提高了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但相对于单个资本和个人企业，股份制不过是一种由多个私人资本共同所有的企业制度，它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因为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因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仍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旧不可消除，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第二节 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 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列宁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研究，考察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的新现象，批判了伯恩斯坦在政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页。

治经济学方面，用什么所谓经济发展的新材料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说什么卡特尔、托拉斯可能解除资本主义危机，用阶级斗争缓和论否定资本主义崩溃论的错误观点。

一、列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伯恩斯坦通过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考察，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比如他认为在当时资本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有产者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由此，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现象得出资本主义不是即将崩溃而是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的结论。

列宁也通过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考察，却得出了与伯恩斯坦不同的答案，探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考察，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也能更清晰地了解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理论的局限性。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列宁在 1899 年的《我们的纲领》和 1900 年的《中国的战争》、1901 年的《危机的教训》、1908 年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等著作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生产与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和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因素。他指出，“20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①。这就是他关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特点的概括。

列宁在 1912 年写的《俄国的生产积聚》一文中，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用具体事实论证了俄国和其他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1 页。

家一样，生产正在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和最大企业中，而不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资本正在走向分散。列宁认为，在俄国，那些少数的百万富翁通过股份公司吸收了中等资本家的大量资本和“零钱”，更加加强了自己的实力。从此可以看出，列宁在当时就已经把垄断看做是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的经济特征。

在1914年8月—1915年8月期间，列宁发表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列宁在分析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时，进一步阐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和基本特征。他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谈到“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①。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列宁相对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各个基本特征和它的本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②

在1916年1—6月间，列宁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1917年，此著作发表。这部著作，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描述和分析帝国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书中集中体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列宁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概括出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及其五大基本特征，揭示出帝国主义和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等。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占首位的基本原理出发，开篇便指出帝国主义最根本和首要的特征就是由生产集中而必然产生的垄断的特征。列宁用丰富而确切的材料说明了20世纪初期，即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论证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被垄断的资本主义所代替一系列科学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这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自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及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①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这是帝国主义一切经济和政治现象的总根子和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基础。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从生产的集中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和燃料的掠夺，银行成为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工具，金融资本加强了殖民政策，今天的垄断已经发展到集团化、地区化、国际化，他们协调行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极少数数量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帝国主义“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有极大的发展，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① 张晓忠：《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二）帝国主义条件下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列宁接着进一步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垄断和竞争的关系。“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① 列宁论述了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使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与改良的过程，也开始社会化了。但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少数的资本家垄断了一切，这些垄断资本家，他们不仅要从国内市场上，而且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把竞争者排除掉。这样，就使得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垄断组织之间，竞争空前残酷，也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列宁写道：“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② 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而垄断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加剧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③。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做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④。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①。

（三）通过阐述银行的新作用，说明资本集中的现实

“早在 1895 年，列宁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新现象并做过一些研究，列宁提出大工业资本和大银行资本越来越多地带有国际的性质。”^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银行信用的分析，他通过考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和法国几家大银行的集中和兼并数据，论证了银行的集中是以工业生产的集中为基础的，是工业生产集中的客观要求的理论。在阐述银行通过不断集中产生新作用的同时，列宁认为，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银行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垄断资本的形成，使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详细地论述了银行的新作用。他阐明：“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③ 接着，列宁指出：“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1 页。

^② 张晓忠：《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2 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3 页。

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账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①“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②列宁的论述揭示了银行根据其特殊的业务职能是如何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中介人转变为万能的垄断者，从而控制工业资本家的经济命脉的。

列宁通过1907—1908年度德国柏林仅仅9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银行业的集中与垄断。银行这一特点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尤为明显。国际性的大银行不但掌握着工业资本家的经济命脉，还控制着电子、信息、金融、房地产等新兴产业的经营与运作，因此可以说，国际性的大银行将整个世界的各个产业各个领域都连接在一起。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随着世界五大投资银行纷纷陷入困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得以全面爆发，接着由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危机，使世界各地电力、煤炭、钢铁等大型工业纷纷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同时迫使一些小型加工业关门倒闭。这正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更加集中，流通更加自由，使得银行业的集中程度更高，出现了像高盛、雷曼兄弟这样的国际性大银行，这些银行在国际性的经营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全球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因此一旦运转不良，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劫难。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 300 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①

（四）通过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实现在经济、政治上的统治

金融资本是指垄断的银行资本和垄断的工业资本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型垄断资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关于金融资本的概念是这样说的：“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② 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定义，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质，揭露了金融资本不仅依靠资本占有权，而且依靠银行中枢，通过参与制，占有更多的资本。

列宁还通过金融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和金融资本向社会征收贡赋的种种勾当的阐述，进一步揭示了金融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之所以会走向融合，对银行来说，是为了扩大银行垄断资本的活动范围和分享一部分工业垄断利润；对垄断企业来说，则是为了获得更有力的贷款条件，并分享一部分银行垄断利润。列宁指出，垄断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③ 这段话就像针对当前发生的危机所讲的。

金融寡头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参与而实现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寡头实行全面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参与制”。“参与制”是指金融寡头通过掌握股票控制额的方式，控制和支配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6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6 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7 页。

其他众多的企业。金融寡头首先用自己的资本掌握总公司，把它作为“母公司”，然后利用“母公司”的资本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掌握股票控制额，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子公司”，各个“子公司”再以相同的方式控制更多的公司，即“孙公司”。通过“参与制”的方式，金融寡头就可支配比其自有资本大得多的他人资本，从而实现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治。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个人联合”的方式实现的。一方面金融寡头亲自出马或委派其代理人到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另一方面金融寡头又以各种手段收买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等，直接操纵国家机器。在实行“个人联合”的同时，金融寡头还通过建立各种咨询机构，影响政府的决策，通过控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把其势力伸向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在经济上的统治。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① 列宁在这里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指出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他根据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得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结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 这是列宁根据当时的事实材料对垄断资本主义未来命运所作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总起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写作之初就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目的性的烙印，因而不能把它看做一部纯粹的学术性著作。但它却是一部在实践中所写并为实践而服务的、兼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现实概括与理论预测的著作。众所周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和专著《帝国主义论》的问世，产生了深远的实践影响：这是这一时期列宁在理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论上的最伟大的贡献。该著作是依据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发展的实际材料，来揭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从而使人们厘清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认清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认识到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与危害，为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群众的革命情绪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社会主义的俄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围剿，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与教训，为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和试验；在苏联的影响下，欧、亚、拉部分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由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迫使资本主义为巩固自身统治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总之，《帝国主义论》的事实判断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是相符合的，在此基础上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预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俄国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实践。

二、列宁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批评

（一）列宁对伯恩施坦滥用统计材料，得出错误结论的批评

列宁在1908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首先谈到，修正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比较广泛、详细，伯恩施坦分子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认为，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

伯恩施坦曾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不是资本家的数目愈来愈相对减少和无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就是一个人数

众多的资产阶级，这是生产的不断提高容许我们做出的唯一抉择。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在有产者人数增加的问题上，采取了“惊人的轻率的态度”。他的论断都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他用的是官方统计的材料计算所得税材料。而在这些材料里，已经把资本的收入同工资收入混在一起了。他把不同时期的、用不同方法得来的，因而也是无法比较的材料拿来比较。甚至从一些街头小报中抄下关于英国有产者人数增加的数字作为证明。但实际上，垄断资本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事实。伯恩斯坦主义者说，现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但实际上情况如何呢？列宁专门写了一篇分析当时德国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在1880—1912年的三十年间，工人的工资平均增加了25%，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至少上升了40%，食品、衣服、燃料和房租都涨价了，因而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像伯恩斯坦宣传那样得到根本改善。

伯恩斯坦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列宁在揭露伯恩斯坦主义价值论实质时认为，关于价值理论，他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伯恩斯坦主义者除了发出一些像奥地利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外，修正主义者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

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列宁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正像二十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弱得多，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来愈卷入世界经济交换的农业生产部门。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①

（二）列宁对资本主义危机论与崩溃论的批判

伯恩斯坦“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他认为，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通信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能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他说，不用担心，有现成的药方，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已经产生了克服经济危机的种种条件，所以‘过去发生的危机不再重演了’。”^② 列宁认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也很快给了伯恩斯坦当头一击。因为，现实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列宁在1901年的文章《危机的教训》中谈道，“工商业危机延续快两年了。显然，危机愈来愈扩大，波及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了”^③。列宁在此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像慢性病发作一样。只是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因”，经济危机是“果”，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列宁指出，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②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危机表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破产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自称为‘批评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是多么短浅”^①。

列宁认为，伯恩斯坦所说的“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②。

他指出，与此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为了粉饰现代小生产，修正主义者根据所谓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混淆是非，说什么“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基本上不存在了。列宁指出，事实是“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③。

修正主义还“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说什么“阶级矛盾有减弱下去的趋势”，因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列宁指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阶级矛盾不是减弱了，“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④。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有一段概括的话：“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⑤ 20世纪初，可以说是欧洲新资本主义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和平”发展阶段，以电力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度发展的同时，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可见，列宁正是站在这一历史分水岭之上思索新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的。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以致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这也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他甚至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②列宁虽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他并没有排斥资本主义的某些部门、某些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列宁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920年7月，他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并夺取工会中的领导地位，给工人运动造成严重危害，这是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系统地论证了其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新结论。

当前，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崇尚自由竞争的英美模式确实居于上风。但就总体而言，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的垄断特征并未有丝毫的减弱，而且还在不断加强之中。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都在迅速扩大。到1999年底，全球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6.3万家，共有国外分公司70万家，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50%，国际贸易的50%以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在近年来的全球第五次兼并浪潮中，金融领域的兼并和一些超大型银行的出现是该轮兼并浪潮区别于从前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以致有些学者将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可谓从一个角度准确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时也说明，不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列宁所分析的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并没有改变。

（三）列宁通过《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表达了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观点的看法

列宁在《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中重点探讨了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评判，这说明列宁在很多观点上与考茨基是相同的。列宁指出，伯恩斯坦重复着俄国公众早已知道的议论，说股份公司“能够”使资本分散，使资本“不必要”积聚，并且还举出一些小额股票的数字。列宁在这一点是认同考茨基的，当时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上述说法，反驳伯恩斯坦说：“这些数字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各个公司的小额股票也都可能是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一点伯恩斯坦也得承认）。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股份公司增加了有产者的人数，因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和投机者服务的，让他们能够剥夺轻信别人而财产不多的公众。股票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财产有转换成股票的趋势，却丝毫不能说明财产的分配。总的来说，伯恩斯坦在有产者和私有者人数增加的问题上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资产阶级拥护者对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大加赞扬，吹嘘这一部分是根据‘大量数字材料’写成的。考茨基讽刺说，伯恩斯坦的手艺真高，用两页篇幅竟容纳了这样大量的材料！他把有产者和资本家混

淆起来，虽然谁也不否认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① 列宁还指出，伯恩斯坦把财产收入同薪水收入等已经混在一起了。他把不同时期用不同方法得来的因而是无法比较的材料（例如关于普鲁士的材料）拿来比较。他甚至从一张街头小报的杂文中抄下了关于英国有产者人数增加的数字，而这样的小报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寿辰祝颂备至，而对统计则轻率到了极点！另外，这些数字来处不明，从英国所得税的材料中本来也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因为根据这些材料不可能确定纳税人有多少，每个纳税人的全部收入有多少。列宁指出，考茨基在《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引用科尔布著作中 1812—1847 年英国所得税的材料，指出这些材料完全像伯恩斯坦所引的杂文材料一样，（似乎）说明有产者人数有了增加，而且是在英国人民的贫困增长得骇人听闻的时期！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伯恩斯坦的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说：伯恩斯坦并没有举出任何数字足以证明有产者的人数确实在增加。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也曾试图为这种现象作理论上的论证，他说，资本家本人不可能把大量增加的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换句话说，消费剩余价值的有产者人数增加了。考茨基不费多大气力就驳倒了这种完全忽视马克思的实现论（俄国书刊中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理论）的可笑论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不仅用理论的推断，而且用具体的材料驳倒了这种论断。这些材料证明：西欧各国的奢侈和挥霍现象在增长，日新月异的时尚对加快这一过程有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失业，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大大增长，即对新企业的投资，特别是欧洲资本对俄国、亚洲、非洲的铁路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大大增长。

伯恩斯坦声称马克思的“贫困论”或“贫困化理论”已被大家抛弃了。列宁在书评中赞成考茨基的观点，也就是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又是马克思的论敌的恶意夸张。马克思谈的是贫困、屈辱等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也指出了与此相抗衡的趋势和唯一能形成这种趋势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确已被现实完全证明：第一，我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1 页。

们确实看到，资本主义有产生和加剧贫困的趋势，如果不存在上述相抗衡的趋势，贫困是极可观的。第二，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适应。伯恩斯坦讽刺说，这种对“贫困”的理解是匹克威克式的（即只从字面上理解或只被少数人理解）。列宁指出，像拉萨尔、洛贝尔图斯、恩格斯这样一些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他反驳伯恩斯坦的讽刺说，看来“匹克威克”俱乐部聚集的那些人并不坏啊！第三，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边疆”，边疆一词既有地理上的含义（资本主义刚刚开始渗入的国家，往往不仅产生物质上的贫困，还有居民群众挨饿的现象），也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手工业以及还保存着落后生产方式的国民经济部门）。

“《新兴的中间等级》这一章，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也极有意义，极有教益。”考茨基说，如果伯恩斯坦只是想说没落的小生产者被新兴的中间等级知识分子所代替，那就对了，并说他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在国民劳动各部门中使职员人数迅速增加，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愈来愈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这些东西，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用辛辣的讽刺作过无情的抨击。

考茨基在“危机论”这一章中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过工业危机十年一循环的“理论”，而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恩格斯自己就说过，近来这个周期已经有了变化。有人说，企业主的卡特尔限制和调节生产，就能够抵挡住危机。但是请看美国这个卡特尔国家，它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大大发展了。卡特尔限制了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

国外市场的生产，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赔钱，在国内则以垄断价格把商品售给消费者。只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就必然会采取这套办法，指望用自由贸易制来代替保护关税政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卡特尔使小工厂倒闭，集中和垄断了生产，实行了技术革新，使生产者的境况大大恶化。伯恩斯坦以为，只要世界市场的条件能够从不确定变为确定而为人所知，那么产生危机的投机活动就会减少，但是他忘记了正是新兴国家的“不确定的”条件大大促进了旧有国家的投机活动。考茨基用统计材料说明恰恰近几年来投机活动在增多，预示危机即将到来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

第三节 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对“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与怀疑

卢森堡在《社会改良与革命》中指出，如果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能够成立，那么，不仅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被动摇了，而且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也将被放弃，其理论和实践的归属只能是改良主义。鉴于此，她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所质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快慢，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如何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和阶级觉悟的普遍提高，这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积极因素。由此可看出伯恩斯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

为此，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将问题的提法提升到了原则性的高度，既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革命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又从未来历史的基本走向方面规定了整个争论的性质和重要性。她以一种清晰的逻辑形式将问题尖锐地提出来，她说：“或者，伯恩斯坦对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①为此，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述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批判。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批评

卢森堡运用总体分析方法，高屋建瓴地揭示出伯恩施坦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的内在关系和本质，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了深刻的阐释。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惊人的混乱。卢森堡对此曾质疑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劳动价值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正直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②伯恩施坦断然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做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这就最清楚地表明：伯恩施坦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并不是思维中想象的产物，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伯恩施坦完全依附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已完全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只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对价值规律的科学分析，是难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把具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做一种历史现象来理解，不仅要向后看，而且还要向前看，尤其是要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因为，“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①。只有柏姆-巴维克、杰文斯这样一些心理学派经济学，才会把价值的对象当做是一种“思维映象”的产物。伯恩斯坦就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心理学派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卢森堡指出，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都是一样的，都纯粹是抽象。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凡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伯恩斯坦否定劳动价值论是为他否定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否定资本主义崩溃论做铺垫的。他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也就否定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同时也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是经济的原因，从而也就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伯恩斯坦看来，将社会主义的基础放在经济的必然性上，实际上是贬低了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公平分配原则。卢森堡对此认为，伯恩斯坦将社会主义的基础放置在公平观念的基础上，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她在《社会改良与革命》中开篇就批评伯恩斯坦的方法，并指出：“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射，那么，对于伯恩斯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反射。”^②

卢森堡十分正确地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他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念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③ 伯恩斯坦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认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真辨析过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却对马克思作了一种似是而非、自以为是的武断的裁定，伯恩斯坦在劳动价值论上与马克思的对立，说明他完全依附于唯心主义历史观，说明他已完全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的否定，不仅是他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诋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前提。

二、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的论据

卢森堡用犀利、辛辣的文笔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前提，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适应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卢森堡从具体事实方面逐点剖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论据，指出信用、企业主联合组织、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更不足以消除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适应的论据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部现象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一种辩证的总体观，将事物和现象从总体的联系中割裂出来，从而不能抓住现象的本质。

（一）信用恰恰是使资本主义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的特殊手段

伯恩斯坦用以说明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适应”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是这一制度采用了信用制度，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巨大的职能。对此，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了错误的理解。信用的发展确实促进了股份公司的产生，加速了资本的循环，从而起着极重要的“增加生产力”的作用。就此而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信用起着“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经济的力量解放出来”的作用^①。

但同时她又针锋相对地指出了信用的双刃剑作用，危机也恰恰是从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生产的膨胀能力和膨胀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的特殊手段”^①，信用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更不足以消除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卢森堡认为，我们不能像伯恩斯坦认为的那样，盲目神化信用的作用。“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②，卢森堡明确地指出：信用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四个方面的矛盾：（1）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交换关系界限的动力；（2）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信用使生产脱离所有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的一部分则采取了纯粹资本利息的形式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3）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信用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4）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因为信用使国家对生产的干预成为必需。这四个方面的矛盾表明，信用的发展不仅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还会在新的形式上，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卢森堡认为，信用职能有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某种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能力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她又强调，这种通过“信用”来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应”的本质“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其最后结果便是“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这样，信用必然加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矛盾。她的结论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③ 她甚至还这样说，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0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销信用。也就是说，要使资本主义能适应新的形势，不是要实行信用制度而是要撤销信用制度。像当今资本主义所实施的那种信用制度，“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①。卢森堡认为，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把它们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速度。

（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企业主的联合组织是伯恩斯坦用以论证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证据。伯恩斯坦所谓的“企业主联合组织”，实际上就是卡特尔垄断组织形式。在伯恩斯坦看来，像卡特尔、托拉斯这样的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伯恩斯坦关于垄断组织可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后来考茨基、希法亭等人所宣扬的所谓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他在这里严重误解了这些组织的性质，“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②。因而用它们来论证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也是毫无根据的。关键在于，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资本家建立卡特尔这样的组织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消灭无政府状态，但实际情况是加剧了无政府状态。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满足国内需求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结果造成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起于成熟”^①。卢森堡通过她的分析再三强调的是，“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的作用来看，卡特尔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②。

为了驳斥这一毫无根据的臆想，卢森堡对卡特尔这样的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形式作了分析。她认为，卡特尔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只是力求在一个部门内消除利润分配上的竞争。因此，它根本不是什么“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真的把这种联合组织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那么，它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同时，为了使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卡特尔通常还把国内的部分闲置资本用作世界市场的生产，这就加剧了同国外资本及其卡特尔组织的竞争，最后导致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③。

（三）卢森堡阐述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资本分散论”

在卢森堡看来，如果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就逐渐从地面上消失，这就“完全误解”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趋势。“如果人们以为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①她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中，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科技革命起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总过程中恰恰起着技术革命的作用。它们“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②。卢森堡指出，对于这一点，伯恩斯坦也是深知的，但他似乎忘记了这个资本主义中等企业发展的规律，“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而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命攸关的脉搏，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分离的伴随现象，它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在伯恩斯坦所指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并不象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工业发展的同时，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在绝对地增长。卢森堡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运动中，“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式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④。因此，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中，中小企业将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至于伯恩斯坦用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来反证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并由此做出否定关于资本积累规律的结论更是完全错误的。

卢森堡指出：“最初，在《新时代》杂志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速度，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工业统计对比材料。而为了利用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这个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纯粹累计的和机械的方法。但是，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伯恩斯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论证也丝毫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即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一定期限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① 卢森堡对此认为，既然如此，伯恩斯坦把股份公司这个经济现象恰恰反倒理解为资本的零散化，而不是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扬弃”的地方，伯恩斯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斯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

伯恩斯坦不仅限于收入统计材料。他还拿出了企业统计材料，而且有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统计材料呀？这不是每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国家一个时期的材料。因此，他不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况作比较（除德国外，他重复了过去1895年和1882年的对比情况），而只是把不同国家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用这种办法要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么这种证明所根据的理论是，决定社会意图结局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斯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但他在这里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指望暴力革命，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斯坦却相反，他根据人民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多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数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获得自己的最终目的的既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也不是依靠多数人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依靠经济必然性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引导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上。

总之，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什么信用、企业主联合组织、中小企业等所谓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只是从表面上调节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矛盾，但实质上却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趋势。马克思说过：“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① 资本形态的改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作为资本的实质。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适应的论据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部现象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一种辩证的总体观，将事物和现象从总体的联系中割裂出来，从而不能抓住现象的本质。卢森堡形象地指出，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的关联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现象中割裂出来，当做独立的存在，当做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使得伯恩斯坦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本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象上的变化当成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依据，只有坚持总体的观点才能理解这些变化。由于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是经济的原因，从而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卢森堡的批判击中了这种现象的实质，重申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真理理性。

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做废物、当做垃圾抛弃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经济危机，而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并且正是在这个资本主义“适应手段”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在当时就已经被事实响亮地击败了。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斯坦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1873年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来质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实际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认清其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危机发生问题根本不在于危机周期的长短，而在于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深藏的一般原因，它们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需要从总体性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能只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卢森堡认为，被伯恩斯坦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已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从而不再会陷于危机之中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资本主义适应论具有一些未被考察的理论前提， 忽略这些前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卢卡奇曾经指出，卢森堡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们能够无限制地积累资本，那么资本的无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制地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即经济上的进步，那么它就是不可征服的”。^①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卢森堡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她认为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具有一些未被考察的理论前提，忽略这些前提就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第一个前提是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这在理论上不可能。第二个前提是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至于它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事实上与发展相反。她说：“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的两者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是，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至于它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后者与事实相反，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紧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醒新的生产力。”^②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卢森堡是怎样批判伯恩斯坦所忽略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的。

① [匈]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一) 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这在理论上不可能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是不可能的。她在文中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中心，提出在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封闭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资本积累无法实现的观点，强调非资本主义市场是解决资本积累问题不可或缺的因素。她提出的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而且进一步论证了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把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逼向了死胡同。这是因为，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完善的交通工具，能够缩短各个国家之间的距离，扩大世界市场的范围，从而使生产过多的商品能够在国外找到销路，世界市场的扩大了就可以消除危机。但事实上，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使资本家不能更清楚地预测市场需求，生产的盲目性加剧并且扩大，从而使生产和交换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同时由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剧烈程度也加强了。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来往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世界市场的扩大，只能使得危机爆发的频率更高，范围也更加广泛。所以，卢森堡认为，交通工具的完善化，世界市场的扩大只能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卢森堡指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未完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马克思并未给予完满的解答。所以，卢森堡认为应予突破，她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非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她认为，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才不顾一切向非资本主义区域扩张，争夺殖民地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控制，也才能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合乎规律地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内在结构。卢森堡说：“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再生产的计划与现实相符合，那么它就表明了积累运动的历史局限的终结，从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结。如果积累是不可能的，那么生产的进一步增加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已成为了客观历

史的必然性。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矛盾运动，这是资本存在历史的最后阶段。”^①

(二) 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至于它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事实上与发展相反

卢森堡认为，事实上生产力的增长不仅没有受到阻碍，而且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紧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醒新的生产力。马克思当年曾经感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资本主义终于有一天再也找不到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实际只有一个限制，即市场的限制，没有了市场，生产力再高也会灭亡。在她看来，作茧自缚的资本主义，其生产力越是发展，灭亡的速度就越快。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说得清清楚楚，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卢森堡批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纯资本主义中自行发展，也即资本主义可以不需要国外市场的观点。根据卢森堡的看法，如果资本主义真如马克思所言，那么资本主义永远不会灭亡，而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资本主义终于有一天再也找不到国外市场。卢森堡此理论不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她的世界市场理论预言了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扩张自己的殖民地的必然性，也从理论上说明了，如果资本主义不必然需要国外市场，那么，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就完全成了一种偶然的、无所谓哪一个阶段，更谈不上什么最后阶段的东西。因此卢森堡关于国外市场的理论，凸显了其理论的逻辑必然性。从此意义上来说，卢森堡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上的认识与列宁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①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1年版，第393页。

四、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否定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因素

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他主观认为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可以知道，伯恩斯坦所提到的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并没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而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卢森堡在此处批判伯恩斯坦一连用了六个“但是”揭示出，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怎么一步步崩溃的。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隐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的彻底否定，从而从根本上取消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她指出资本主义适应论必然导致社会改良主义，否定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前面我们分析过，通过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组合。但是，通过消费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的根据在伯恩斯坦看来就不是经济的原因，从而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发生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① 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就是否认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伯恩斯坦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弊端的，但由于他放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造成了他关于经济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发展进程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是难以相容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由于伯恩斯坦所倡导的理论和运动没有确定的目的和没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卢森堡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斯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不过，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未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或者，如果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由于确定不移的逻辑，伯恩斯坦就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上去了。卢森堡通过对伯恩斯坦理论的分析指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即唯心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伯恩斯坦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要么社会主义改造一如既往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就是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要么“适应工具”真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会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使它的矛盾能够消除，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是另一个：或者，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卢森堡通过下面的分析又进一步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也从另一个侧面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

(一) 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崩溃不可避免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无政府状态”这个无法治愈的痼疾，也就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弊端，因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卢森堡这个分析非常精辟，不但真正领悟了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不可避免的实质，而且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和必然崩溃的真正原因。

而卢森堡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认识得非常清楚、透彻，才能断然、决然地反对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并给予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当头一棒的。当今，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仍旧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生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必然会出现比例失调。当这种比例失调现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

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

（二）生产过程社会化，为未来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基础

生产社会化也就是指生产由分散的小生产者转化为大规模社会生产的过程。生产社会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从单个人分散使用变为大批人共同使用。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第三，产品的社会化，即生产出的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

生产过程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根据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状况和主要趋势，把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可以理解为通过使用大型机器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原始积累剥夺小生产而得以确立之后，又通过资本的积累而获得迅速发展。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又通过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了资本集中的过程。少数资本家通过剥夺多数资本家，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巨头的手中，这就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也使得社会过程的社会化得以进一步完善。此外，随着资本的集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被日益自觉地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得到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劳动资料变成只能大规模地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乃是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然而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集中，生产资料却日益掌握在数量不断减少的资本巨头手中，他们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在竞争的压力下竭力扩大再生产，但又使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规律使工人更加附属于资本，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的积累。这样势必会造成劳动人民购买商品能力的衰退，从而引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激起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矛盾，这一切都深刻地证明：“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恩格斯指出：“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②

（三）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是未来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阶级觉悟如何，关系重大，它直接影响斗争的开展和斗争的结局。如无产阶级觉悟还不高的时候，以为自己陷于贫困是由于机器和厂房造成的，不了解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便停留在自发斗争的阶段；当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之后，认识到自己陷于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摆脱剥削和贫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便从自发斗争的阶段发展到自觉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具有无产阶级本身独有的阶级觉悟。但这种阶级觉悟要得到很大的提高，能够科学地认识本阶级的地位、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却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名普通成员，要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成员的阶级觉悟如何，不仅表现在他对本阶级的地位、根本利益、历史使命的认识程度，还表现在他为实现本阶级历史使命的斗争中，在日常工作中，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在理想、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

德、纪律等诸多方面。阶级觉悟高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往往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奉献，在改革开放中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能够积极地同丑恶现象作斗争，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他的阶级觉悟如何，特别表现在他对党所制定的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何种态度。

第四节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的认识

1898年10月初，斯图加特大会结束后不久，考茨基写给伯恩斯坦一封信，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卡·考茨基致爱·伯恩斯坦》，在信中，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说：“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①

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这本书，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方法论角度对伯恩斯坦进行批判。考茨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结论是能够改变的，有些结论就已经改变，还有些结论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改变。发展过程不仅提供研究的新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研究的新的手段。”

在《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这本书第二篇“纲领”中，考茨基突出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的论述。考茨基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他攻击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还不大重视。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的理解，“将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的论述中，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谬误，详尽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资本积累过程中大企业和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

小企业的发展趋势，股份公司发展的性质、剩余价值的用途等问题。

一、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关于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理论思想的认识与批评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前提和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该理论说明了资本积累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方式得以形成，那么，资本的不断积累则为资本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准备了物质条件。这是因为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大规模的生产本身必然会冲破私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在客观上势必导致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的社会化占有成为可能……总之，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中不断发展、激化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使之释放时，公有制便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否定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正确性。他正是从否定资本积累的一般历史趋势出发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的。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首先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和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消费不足论”没有多大的差别，认为垄断组织可以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因此经济危机的性质和频度能够改变，并最终得到消除。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适应论”。

（一）考茨基对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分析

针对伯恩施坦提出的“资本主义适应论”以及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学说当成“纯粹思维的产物”，而与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相提并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考茨基写了不少著作，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许多滥言诬语，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考茨基在1899年出版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土地问题》、《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反对伯恩斯坦》），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一系列专门的经济研究著作和某些其他的研究著作。总起来说，这些论著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总斗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这实际上就是动摇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这座大厦的基础。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反驳”毫无根据，伯恩斯坦的立场是折中主义。

考茨基认真分析和研读了伯恩斯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他指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曲解是他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诋毁的最集中反映。考茨基认为，这是因为：第一，伯恩斯坦是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性的。他说：“凡观察市场的人都容易发现，尽管由于供求的变动引起价格的种种波动，但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决不是任意变动的，都具有保持一定的波动幅度的趋势。决定这种一定的波动幅度的趋势就是它的价值，它在交换中或出售中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因此，价值决不是‘纯粹思维的事实’，而是真实的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边际主义者那里，“纯粹思维”的都不是“价值的事实”，而是“价值的理论”。这些“纯粹思维”都试图“力求发现这种貌似神秘的事实，同经济生活中人们共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从而阐明这种事实”。因此形形色色的关于价值的“纯粹思维”，都与论证者的“一定的目的”相联系；与这“一定的目的”相联系，必然涉及相应的方法论基础。

考茨基指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价值论所应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提供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钥匙”。因而，如果脱离了当代生产方式，即当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生产方式的前提，那么就失去了价值理论思维的现实基础与基本事实，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

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与基本走势为前提的。因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产生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基础。同时，只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作为“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钥匙”。伯恩斯坦诋毁唯物史观，就不可能搞清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与劳动价值论的“一定的目的”。按伯恩斯坦的思路，他选择的只能是曲解和否定劳动价值论。

伯恩斯坦是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来理解劳动价值的本质规定性的。他把辩证法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陷阱”，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阐述中所体现的辩证法思想。这样，伯恩斯坦就只能按照折中主义的方法来肢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调和并最终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就如考茨基所指出的：“伯恩斯坦并没有宣告马克思的价值论的破产。他只是表示对马克思的价值论不知怎么办。他感到它尚未完成，需要继续发展；但是他不打算按照它的创始人的精神去发展它，而想要通过掺入一些同这个理论的本质不相干的、甚至是敌对的观点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些观点是为了克服这个理论而被构思出来的，而且无法与这个理论有机地相结合。”“就此伯恩斯坦作为价值论的批判者正如他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者一样，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东西，他们超过马克思的‘进步’就是以折中主义替代观念的一致性。”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劳动价值论的反批评

考茨基不想否认伯恩斯坦所说的，“马克思的理论还不完备，留下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充分阐明’”的观点。考茨基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将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进一步发展理论。如果伯恩斯坦试图利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大家都会感谢他。但是这一点伯恩斯坦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一味对马克思的学生进行无聊的攻击，并提出一些非常含糊的、纯粹是折中主义的意见。针对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观点同柏姆-巴维克的反科学的“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的企图，考茨基批驳说伯恩斯坦离开

了对问题的严肃的科学的考察而企图机械地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结合起来。例如，说什么戈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正确。伯恩斯坦说，这两种理论各有各的用处，因为柏姆-巴维克本来有权把商品由劳动创造这一属性抽象掉，正像马克思本来有权把商品效用这一属性抽象掉一样。考茨基指出，认为这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理论各有各的用处（何况伯恩斯坦并没有说出这个或那个理论有什么用处）是非常荒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本来有权把商品的哪一属性抽象掉，而在于如何说明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现象，如何说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职能，等等。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说明，但是伯恩斯坦的价值论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说明的问题。伯恩斯坦还引用了布赫提出的劳动“边际强度”这一概念，但是伯恩斯坦既没有充分说明布赫的观点，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布赫呢，显然陷入了矛盾，他认为价值取决于工资，而工资又取决于价值。伯恩斯坦感觉到自己关于价值的意见是折中主义的，于是就试图为折中主义辩护。他称这种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伯恩斯坦只要回忆一下思想史，他就会看到，反对束缚思想的伟大叛逆者从来不是折中主义者，他们的本色始终是力求观点的统一和完整。折中主义者则胆量太小，是不敢叛逆的。如果我恭维马克思，同时又恭维柏姆-巴维克，那根本说不上什么叛逆！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否定资本积累理论的攻击

考茨基在《伯恩斯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二部分中用很大部分驳斥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攻击。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的理论，说明了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的过程。他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规律或发展趋势的概括是这样的：“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

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①而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规律，即通过资本集中进行的。随着资本集中，劳动协作的规模不断扩大，科学被日益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在这一转化中，一方面是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的不不断增加，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反抗也日益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了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无产阶级炸毁了，因而社会主义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灭亡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

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外壳的炸毁、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剥夺者的被剥夺应该当做一个历史过程来了解，这种过程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前景的到来是必然的，但是它们采取何种形式和速度却是不可预料的。伯恩斯坦否定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发展，他的理由有三：（1）有产者的人数不是在减少而是增加；（2）小企业并未衰落；（3）爆发全面性的、毁灭性的危机的概率越来越小。考茨基认为，在伯恩斯坦所提出的理由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考茨基针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谬误，首先从伯恩斯坦否认的基本事实——资本集中的现象开始，然后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资本积累过程中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趋势、股份公司发展的性质、新的中间阶层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考茨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理论问题展开的。

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在资本集中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考茨基引用伯恩斯坦写的一篇文章《当前德国工业的发展的程度》的资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考茨基指出，在伯恩斯坦这篇文章中，他自己曾经明确地认为，当前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小企业发展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3页。

大企业，手工业式的企业发展为工厂式的企业，工厂式的企业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很明显，这里描述的就是资本集中。接着考茨基通过对各主要行业中企业规模变化统计资料的分析，详尽论述了19世纪末德国资本集中的基本特征。他利用伯恩斯坦曾引用过的德国工业调查统计的数字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理论的正确性。

他首先根据1895年关于按职业划分的就业人数的变动的统计数字资料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工人队伍又是如何扩大的。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1882年业主与雇员的比例是一比二，而1895年的比例是一比三。从此可以看出，德国人口在13年的时间里，德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雇佣工人的比例增加了许多。

其次，考茨基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德国资本集中的情况，他引用辛茨海梅尔的《关于德国大工厂企业继续形成的界限》一书提供的资料说明，1882年大工厂工业的产值才占全德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而1895年即已占到2/3。如果我们不是闭眼不见，掩耳盗铃，那就不能不承认说明资本迅速地集中。他认为资本集中的趋势，在工业中比在商业中和交通运输业中发展得快；在工业中，矿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机器及仪表制造业、造纸工业中的资本集中发展得更快些，小企业减少得也较为迅速。相反，在牲畜饲养业和渔业、服装业和洗衣业、旅店及饮食业中，基本上还是小企业占主导。但是，即使在這些小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中，1882年到1895年间也出现了明显的资本集中趋势。例如，在德国的牲畜饲养业和渔业中，从1882年到1895年，在5人以下的小企业中就业的工人只增加了3.7%，而在50人以上的大企业就业的工人增加了700.9%。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大企业迅速增长的趋势。因此，只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全面的考察，人们就不难看到，资本集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趋势，在19世纪末并没有丝毫减缓，相反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伯恩斯坦认为股份公司的发展妨碍了资本和生产过程的集中，使“有产者”人数增加的论断，考茨基认为也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股份公司的成立并没有使现有的资本分配发生任何改变。“在这个不讲情面的世界上，股票不是赠送的，而是供出售的。股票并不仅是带来金钱，而是以有

钱为前提。股份公司的成立，并没有使现有的资本分配发生任何改变。股份公司的形式只不过干了储蓄所和银行也能干的事，它使少得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小额资金变成资本。”因此，股份公司的形式增加了可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数额，这种形式或许可以把那些本来没有变成资本而只是作为不生利的、暂时不用的财富变成了资本，不过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有财产的既存的分配状况，股票的发行同样也不会改变财产的分配状况，不会阻碍资本的集中，反而是一种加速资本集中的手段。

考茨基举例说，美国美孚石油托拉斯股金的额面价值总共为9725万美元，洛克菲勒共拥有4900万美元，可见他支配的资本两倍于自有资本，从而使他获得了两倍于自己经济实力的权力。所以股份制不仅不会妨碍资本的集中，反而是一种加速资本集中的手段。有了股份制，才有可能建立起单个资本无法建立的规模庞大的企业。

联系伯恩斯坦所谈的“有产者”不断增加的理论，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实际上是把“有产者”增加的问题看做是构成中间阶层的那些居民阶层在增多。

考茨基还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分析了资本集中导致“垄断化”的新特征。考茨基指出：“从生产中排除竞争，即通过把一切企业组合成一个唯一的组织而实现整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化——不仅是某一小城市的而且是某一大国的，甚至是全世界的整个工业部门的……这种垄断化是在马克思逝世（1883年）后才具有经济意义的现象；自那以后垄断化又有进一步发展以致越来越明显地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资本集中向资本垄断化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种同类企业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集于一人之手，这是19世纪末经济生活中最具有特征的现象。考茨基的结论就是：这个几乎不到20年的垄断化的发展，“只有靠资本的集中才有可能出现，这个发展反过来又十分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集中”。

三、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崩溃论”、“剥夺论”的质疑

关于伯恩斯坦提出的所谓的“崩溃论”问题，考茨基指出，这是由他本人杜撰并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过伯恩斯坦所说的那种“崩溃论”，也从来没有把崩溃一定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这是伯恩斯坦的歪曲，伯恩斯坦有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的理论。

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行”崩溃的结果。伯恩斯坦还把这种经他错误转述的理论，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核心”。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的论述中，“看到了推动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因素；这种斗争使得无产阶级在人数、团结、才智、觉悟、政治成熟程度等方面日益增长；这种斗争也使得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并使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组成政党和使这个党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胜利，同样也会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成为不可避免的”^①。他们片面地阐述马克思的理论，毫无意义地抓住马克思个别著作的个别段落，以便胜利地驳斥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和“粗糙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决于欧洲现代史上出现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力量。

列宁指出，伯恩斯坦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考茨基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引申。考茨基确切地摘引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著作，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使伯恩斯坦无礼指责马克思的学生“存心袒护、故意刁难”的这种真正刁难伎俩完全败露。

考茨基断然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存在伯恩斯坦所说的那种“崩溃论”。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发展和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是包括无产

^① 马健行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阶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无产阶级政党作用发挥的结果。

伯恩斯坦不仅通过杜撰“可笑的崩溃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趋势的理论，而且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中基本理论的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趋势理论的科学性。例如，伯恩斯坦把马克思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理论，贬斥为“吓人的奇谈”，把它看做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空想”因素。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的这些论点是极其错误的。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剥夺者被剥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概述，是作为历史的过程来理解的，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到来的形式与速度则是难以确切地预测的。预测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发生政治的或者社会的灾变，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论，而是要从一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态势中推断出来的。它“应该被当做历史过程来理解，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到来的形式和速度是难以确切预测的。我们若想确定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既不取决于这种灾变的或大或小的概率，也不取决于或快或慢的发展速度，而是取决于它所遵循的方向。预测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发生政治的或社会的灾变，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论，而是要从一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态势中推断出来的”。显然，伯恩斯坦在这里的错误，主要在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态混淆在一起；并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暂时的现象形态来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趋势。

其次，马克思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理论是以资本集中的发展为前提的。伯恩斯坦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却故意用一些孤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统计数字，用一些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统计材料，作出资本集中不是加剧了，而是变得缓和了的错误结论。考茨基认为，在对资本集中问题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各个工商行业中的资本集中的进展并不是平衡的。大企业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领域，把某一领域的小企业排挤掉，但并不因此就把这个领域的小企业主统统都赶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一种业务中被排挤后，企业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而小企业的数目从整体上来看未必就减少。在这里表现为大企业的发展，在那里则表现为小企业

的增加、分号的充斥，等等；在这里小企业由于大企业的竞争而衰落，在那里则可能由于小企业自身之间的剧烈竞争而破落。因此，小企业被迫日益实行劳动的专业化，这反过来又为大企业或迟或早向这个领域进军准备了条件。”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某些行业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充斥，来否定资本集中的趋势，也不应该把资本集中简单地理解为所有的行业都同时发生小企业锐减和大企业剧增。

伯恩斯坦认为现代经济似乎不是朝着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为了驳斥伯恩斯坦的这种意见，考茨基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是经得住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检验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仍然是观察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与历史趋势的科学武器。考茨基在书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都从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分析，并收集了大量的数字材料。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1882年和1895年的德国工业调查材料，他指出，这些材料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完全肯定了资本的积聚过程和小生产被排挤的过程。就连伯恩斯坦本人在1896年也十分肯定地承认过这件事，但是现在却无限制地夸大小生产的力量和作用。例如，伯恩斯坦断定20个工人以下的企业有几十万个，“显然，他在悲观的心情下多加了一个零”，因为这种企业在德国只有49000个。而且，在统计时把什么人都算做小企业主：马车夫、听差、掘墓工、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女裁缝等等，等等！同时，考茨基也没有停留在马克思已有的理论结论上，他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特征，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透彻的阐述。正因为这样，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就显得更为有力，也更令人信服，伯恩斯坦的理论谬误也暴露得更为彻底。

四、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批判

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一大典型特征，也是他们的一种普遍倾向。伯恩斯坦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首先是从他机械地

强调危机并不总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有规律地每十年出现一次开始的。因此他认为，周期性的危机并不存在。其次，伯恩斯坦特别强调由于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形成，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因而可以避免并消除危机。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考茨基认为，每十年一次的危机周期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仅仅是对经验事实的确认。马克思不是发明了危机的周期，而是观察和说明了危机的周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危机一定会每十年重现一次，而在于危机是否会定期重现。对后者考茨基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指出，危机的因素一开始就存在于商品经济之中，商品生产是彼此无关的生产者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体制中的调节因素是价格的波动。如果生产大于需求，价格就下降。如果生产少于需求，价格就上涨。因此不能按生产价格把商品卖出去是商品生产必然会定期发生的现象，恰恰是这种现象构成了危机的基础。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酿成真正的经济危机还需要其他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危机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把整个社会生产都越来越变成商品生产，从而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的生存都依赖于自己生产的商品毫无阻碍地加以实现。这时，由于社会分工和信用的发展使各个生产者彼此的依赖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以致任何一处商品滞销就会相应地引起别处的混乱。可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狭小的地方市场变成了巨大的世界市场，介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数目日益增多，生产者愈来愈无法通盘了解市场情况。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信用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了更大的伸缩性和跳跃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消除危机，因为需求任何较大的提高都会导致生产极迅速的扩大，以致很快便超过了需求，造成生产过剩。最后，竞争已使生产的不断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存在的条件了。但是，扩大生产的条件是市场的相应扩大，不仅物质需求扩大，而且经济的需求，即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要相应扩大。这样就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压低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力的价值的趋势发生了矛盾。不断扩大市场是资本家的最大难题。此外，市场的任何扩大都会对生产起促进作

用，驱使生产陷入过剩和危机。反过来，任何危机又会十分有力地促使资本家争取新市场。当市场再也不能以生产扩大的那种速度来扩大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的时刻就到来了。只要经济发展上去这种状况就会出现，因为国内外市场终究是有限的。当然这个极点，这个限度，不是僵死的，而是有伸缩性的。但是路子越走越狭窄却是必然的。世界资本主义增长的速度是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世界市场则很难长期相应地扩大。一旦市场扩大的可能性丧失殆尽，人民群众就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从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危机的根源单纯归结为生产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与消费市场的有限性的矛盾。而没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说明这一问题。这当然是理论上的严重缺陷。

另外，针对伯恩斯坦的积极追随者，俄国的杜冈·巴兰诺夫斯基用否认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来否定普遍危机的可能性观点，考茨基也进行了批判。为了批判杜冈·巴兰诺夫斯基，考茨基首先简单地概述了马克思对消费不足与危机关系的论述。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杜冈完全否定消费不足与危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危机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

考茨基指出，消费不足是以往阶级社会中存在过的普遍现象，但是由此而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只有在为出卖而生产的地方，才可以由生产过剩形成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由于商品生产的出现，生产过剩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了新的含义。以往，生产过剩是同生产超出已有的消费可能性相联系。现在，在商品生产产生以后，不论居民的消费是否已真正全部满足，凡生产超过占有货币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生产过剩。这种过剩是一个十分相对的概念。恩格斯认为，消费不足只是危机的“最后原因”，而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

考茨基还驳斥了伯恩斯坦分子所说的关于在股份公司中似乎正发生资本的“民主化”的观点，以及可以借助于垄断和信贷消除危机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者”人数增加和无产阶级状况日益“改善”的观点，等等。他反问道：“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缺点仅仅是它

在萌芽阶段所固有的，而且会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而减少；如果说有产者会增加，社会对立会不断缓和，无产者成为独立者或者获得满意的境况的期望会日益牢固，那么社会主义有什么用处。”^①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考茨基也同样对一系列尖锐的经济问题保持缄默，暴露出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比如，他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些“不完备”，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尚未完成”而须予以“完成”等等。他在《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中还谈到，把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单一的卡特尔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观点是他后来“超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

总之，考茨基在同伯恩斯坦论战时，在探讨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时，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是，他却避而不谈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不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是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界限、外部界限是销售的困难，国内外市场的狭小。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正是这种销售的困难和市场的狭小，才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或极端缓慢，导致资本主义的实际终结。因此，他没能全面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第五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 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思想批判的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联系当今的国际金融危机，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曾经感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

^① 转引自〔苏〕布赖奥维奇：《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产阶级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深刻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伯恩斯坦通过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公司，再加上信用制度的发展，小生产经济的顽强性和工会的经济斗争等情况，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走向崩溃，而是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发展的论述有一些合理的因素，我们当今要客观地评价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打破过去只要伯恩斯坦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有所不同，便简单化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法。

通过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以及适应论、分散论等理论的认识与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但仍旧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为特征的剥削制度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股份公司、中小企业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走向崩溃。恩格斯对股份公司是这么认识的：“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①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现象的实质，指明了资本主义正在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

恩格斯这里说的“没有了私人生产”，只是指“私人生产”变成了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这里说的“没有了无计划性”，只是因为单个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业或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有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必须关注这些新现象，但是，这些新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更不是已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生产了。

恩格斯在这段话之后，还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的纲领是要“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①。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读，其义自明，似不应留下任何误解的可能。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个人负责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区别开来。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条件，但前者转变为后者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垄断的出现，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解决自身固有的矛盾，而只是表明资产阶级通过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来缓和矛盾罢了。因为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竞争，却导致了国际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加剧，从而更加深了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他们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缓和。我们研究者确实应该高度关注这一事实。比如，在产权关系上，不少发达国家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财产所有形式进行了调整，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二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个人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股权分散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趋向。股权分散化的“象征性”的确给劳资关系以及政治行为带来了一些变化。当劳动者因为能够参与利润分配而更关心企业经营状况时，资本家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就实际结果而言，西方资本家阶级这方面的努力确实发挥了相当大的功效。19世纪曾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转入低潮。但我们也应看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资本主义虽然进行了“自我扬弃”，至今却依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工人持股并没有带来“人民资本主义”，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工人的股票仅仅是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凭证，从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工人持股无非只是一种分配方式而已。工人无法凭借自己的金融资产获得信贷进行经营性生产也充分表明，工人的雇佣劳动者身份在本质上没有改变。

在劳资关系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就普遍实行企业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否则就是违法。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坚持以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其中欧盟国家已接近50%。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一部分国民财富中，大约50%以上主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等社会福利开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在上层建筑方面，西方国家同样在坚持资产阶级根本统治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家政权结构、社会管理形式、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日益法制化，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也进一步加强。因而客观地说，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消失的。

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其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在部分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经营或控股；在某些行业实行国家专营；运用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垄断社会管理和调节体系。国家垄断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限的私人资本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私人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消极影

响。但这些调整 and 变化都只是资本主义内部局部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都不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依然面临着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2008 年以来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充分验证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美国的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由美国的“透支消费”、“金融监管机构失职、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诸多弊端等因素所造成的，但实质上就是一场经济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是实践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对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实质问题，马克思早就有过深刻的揭示，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虽然此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的形式不同，是以“消费过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说在于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与全球市场需求有限的矛盾。

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看清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列宁、卢森堡不但能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然要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能正确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变”与“不变”的关系，看穿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一点，是我们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世界资本主义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不仅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而且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客观地说，当时的资本主义与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相比，的确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千变万化中又有四个根本“没有变”。

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

前仍在发展。通过上文我们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是工人阶级受雇佣的地位没有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良的措施,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受雇佣的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工人阶级与占少数人口的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以更复杂的形式向深层次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2000年2月21日的文章指出,1979年,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10倍以上;到1999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19倍,居当今工业化发达国家之首,创下了美国人口普查局1947年开始跟踪这个问题以来的最新纪录。1992年美国最大公司的老板们的收入是其普通工人工资的100倍左右,而2000年他们挣的钱是普通工人的475倍。^①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发作,并且还有以新形式出现蔓延的势头,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消费过剩,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实际上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危机再次证明,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也没有变。在伯恩斯坦看来,像卡特尔、托拉斯这样的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实际上这些垄断组织虽然提高了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但相对于单个资本和个人企业,股份制不过是一种由多个私人资本共同所有的企业制度,它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因为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因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仍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旧不可消除,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变。现今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依然

^① 转引自英国《新政治家》周刊2000年7月3日文章。

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由大垄断资本集团占统治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从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高度的社会化乃至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相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了。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之后，西方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共同性已大大减弱，“西西矛盾”日益暴露。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制，这必将导致长期以来的“南北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这四个“没有变”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相对繁荣”并不表明它已经返老还童，可以永世长存了。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进一步向结构性矛盾激化的方向发展，其对抗性质继续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加强，固然克服了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但同时又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障碍；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又使科学技术本身与劳动者处于对立的状态，带来了难以避免的严重失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代资本主义对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这个极限就是，私有制即便是再发展，也不会使它的所有制发展到全社会公有的地步，这就必然要与未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总有一天，社会化生产力要冲破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外壳，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从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再次得到印证，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卓越的表现与成就，使中国特色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优势与价值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彰显，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道路”更是充满信心。同时在这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也使人们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变得越发理智和客观，发昏的头脑开始变得清醒起来。

三、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和危机论拓宽了思路

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判断，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而其理论对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通过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其理论的批评与认识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理解，为我们全面地理解和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入地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和危机论拓宽了思路。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停滞和腐朽的经济根源在于垄断。但是，列宁并没有把这种因垄断而引起的停滞绝对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列宁对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适应论”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列宁既坚持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又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实际出发，因而，他并没有低估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即适应能力。他在肯定垄断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生产技术停滞或腐朽趋势的同时，又认为这一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因此，帝国主义存在腐朽停滞的趋势，也存在迅速发展的趋势，或者，垄断资本主义存在有停滞腐朽趋势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有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趋势的一面。列宁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还会迅速发展是正确的，但用帝国主义存在停滞与快速发展趋势来理解列宁的思想，可能并不符合列宁的原意。列宁说：“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

(英国)的腐朽上面。”^①在这里,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平衡发展中发展的速度会更快,但更快发展中的更不平衡表现为资本最雄厚国家的腐朽。这里并不存在腐朽停滞和(不停滞)发展更快的两种趋势。

卢森堡在对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中,明确指出,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做废物抛弃掉,1900年、1907年又爆发了两次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事实已经响亮地击败了资本主义适应论。这些现实都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还有可能会出现危机。只是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正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所指出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是指一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②

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斯坦以1873年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来置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他实际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但问题根本不在于危机周期的长短,而在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深藏的一般原因,它们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需要从总体性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能只从个体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在分析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当前的经济现象时,应该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表象看清问题的实质,不被一些假象蒙蔽双眼。比如,对待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我们只从现象本身来看待危机,认为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市场约束机制失灵”、“金融监管机制失职”或“借贷过度”以及银行家的贪婪等引起,而不联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不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联系金融资本逐利的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①，就难以回答像美国这样的所谓“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也难以从根本上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四、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做出了贡献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二卷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时，马克思为了研究方便，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法，从理论上概括了一种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有些地方还包括地主）而排除了其他社会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而把其他阶级一律排除在外，因此，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假设C为固定资本（原料、机器、厂房等）、V是可变资本（工资）、M是剩余价值（利润）三个部分，从而得出下列公式，第一部类： $C_1 + V_1 + M_1$ ，第二部类： $C_2 + V_2 + M_2 =$ 社会总资本。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很清楚其他阶级的存在。他将研究课题限制在纯资本主义结构内，这仅仅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而做出的理论假设。马克思的公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把这个公式应用于社会实际，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时就陷入了困境，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二部类就会出现剩余产品。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这一著作中提出，封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它有一种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浸透和拓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一拓展必然有它无法逾越的界限。以此为基础，卢森堡对资本积累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考察，并提出了她的有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人物。在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做了逻辑推导。她认为，如果我们假设该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4页。

的纯资本主义性，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纯资本主义经济中，仅有积累的冲动和积累的技术前提是不够的。要确保积累事实上的发生和生产的扩张，还需要一个条件：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必须增长。那么，这一持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① 卢森堡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卢森堡紧接着分析指出，资本家和工人是仅有的两大阶级。一方面，资本家向工人出售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不会再多：“全体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得到的不会超过社会总产品的一个特定部分，即可变资本部分，不能‘再多一口’。”^② 资本家也向自身出售必需品和奢侈品。但资本家能增加消费的奢侈品只有那么多，而且，资本主义的动力显然是积累，而不是享乐挥霍：“积累的基础在于资本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将全部剩余产品消费光。”^③ 因此资本家唯一的另一条出路是产品的市场化。将更多的产品投入市场在短期内是可能的，但没有其他出路（公务员、军人、学者、教士等被视为资本家的附庸阶层），这一系统必然会处于两难境地：“从资本家的角度看，仅仅为养活更多的工人而生产更多的消费资料，为保证更多的人就业而更多地生产是荒谬的。”^④ 因此，必须不断发掘内部市场，或者，向那些不是或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地区拓展：“决定性的事实是，剩余价值不能通过出售给工人或资本家来实现，它只能靠出售给那些生产方式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或阶层来实现。”^⑤ 这就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增多物品”，这种剩余产品工

①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31—132 页。

②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31—132 页。

③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31—132 页。

④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31—132 页。

⑤ [德]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351—352 页。

人却无力吸收，因此，它的销售就成了问题。资本家为了实现全部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就必须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以外寻求外部市场，以吸收一部分用来投资的剩余价值，只有这个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外部市场，即农民和手工业经济，才能吸收剩余产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积累。没有这个外部市场，资本主义便不能生存下去。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争夺非资本主义市场和出口，就成了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尽管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方面存在着不足甚至误解，但是，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这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的话，卢森堡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拓展的外在限度，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论和永恒论的理论前提。

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罗莎的新著《资本积累论》读过了，胡说八道！完全歪曲了马克思。我非常高兴，潘涅库克、埃克施泰因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而且他们对这本书的批判，说的就是我在1899年反对民粹派时说过的话。我准备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②同样的内容还体现在列宁为批判她的这本书而准备的文章提纲草稿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对卢森堡的这本书是持明显的否定态度的。在资本积累的问题上，列宁主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技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卢森堡则主张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大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前提和条件，强调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作为同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者，并无谁对谁错之分，他们只是语境不同、视角不同、对应的环境不同而已。

虽然两人对资本积累的理解不同，但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

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上，卢森堡与列宁是完全一致的。卢森堡说：“帝国主义虽然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①

^①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59 页。

第六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局限性和现实启示

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得到一些机会主义者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在德国党内对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行为表示极大不满。因此，先是在德国党内，接着在第二国际范围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空前规模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涉及是否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重大原则问题。而当前认清伯恩施坦主义对于我们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有重大意义。

第一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几条界限，即“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

式的界限，等等。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领导干部不能是非不辨、美丑不分，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听之任之，不能让那些同党的宗旨和纪律不相容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分清这些界限，保持清醒头脑”^①。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涉及对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政党、议会、民主、资本主义崩溃等多方面的认识与批评。通过他们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民主、议会、政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党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认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等等。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学习和宣传“六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等等。因而，学习和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一）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条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他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相联。列宁在与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不仅从理论上厘清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概念，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征，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及伯恩斯坦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而且指出了它的国际性质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国家内的表现形式，并指出了伯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全部危害性。列宁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中更大的贡献是能够在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但坚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获得胜利，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做出了贡献。

列宁在 20 世纪初期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论著，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发展特点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对于伯恩施坦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如此的深刻和具体，认真研究和分析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列宁与伯恩施坦的分歧和斗争，其本质是如何在历史转变时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都要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问题是伯恩施坦以历史条件变化为理由，对“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进行思考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否则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社会民主党需要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检查一下我们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以“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为副标题连续发表文章，并于 1899 年公开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观点，“带有宿命论音调”；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折中主义才是“清醒的理智”；剩余价值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不

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完全是一种“空想”；信奉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条“不归路”；无产阶级是“虚假的阶级基础”，其“革命权”已经消失；社会民主党需要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顺着改良道路“回到朗格去”。在伯恩斯坦眼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整体上失去了正确性和实践意义。

1908年，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全面剖析了伯恩斯坦主义的理论体系，深刻揭露了其本质，他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①；伯恩斯坦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②。列宁还批判了伯恩斯坦在“革新”和“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和篡改，论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科学态度。列宁最初使用“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是把它同伯恩斯坦派连在一起的。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即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学说排挤了出去，因此，马克思主义便开始了同内部的，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地上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就是伯恩斯坦派。“伯恩斯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③列宁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④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伯恩斯坦在1908年12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版序言中反驳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认为，科学的理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任何一种新的认知、新的真理都是修正主义。他说：“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在那么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① 如果要谈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②。

伯恩斯坦认为，既然马克思也曾说过自己是修正主义者，既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在和当今不同的形势下制定的，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就不应该再把它当做衡量当今具体工作的标准。因而理所当然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伯恩斯坦在1898年10月20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谈道：“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证明一切，因为这样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③ 伯恩斯坦上述提法抽象来说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马克思也主张理论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④，然而伯恩斯坦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旗号，特别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来行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实。

伯恩斯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列宁在100多年前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当伯恩斯坦主义开始泛滥的时候，列宁就坚决地投入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去，并科学地预言伯恩斯坦的“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⑤。列宁指出伯恩斯坦主义分子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主义作为一种修正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⑤ 《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鉴于马克思学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伯恩斯坦不敢公开直接地否定马克思学说，而是把自己打扮成这一学说的拥护者，然后在这个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关键点，并且把这种攻击说成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继续发展。由于伯恩斯坦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使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具有更大的迷惑性。

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正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需要以新的理论进行回答。伯恩斯坦看到当时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变化，就借口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让理论为实践服务，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但他修正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伯恩斯坦等人的共同手法是欺骗人民群众，他们口头上所说的代表着人民利益，而实际上却是代表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因为他们也明白，要在马克思主义深得人民拥护的情况下以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来推行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显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借口为名，起修正社会主义之实。他们根本不可能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来吸引群众。

列宁在1899年《我们的纲领》中，对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修改”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过时论”、“批评自由论”和“革新论”等，他都一一予以驳斥。还批驳了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提醒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密切地关心和注意这些问题。“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① 列宁在此文中表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精辟地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阐明了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①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国的具体应用是不同的，因而应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殖民地制度仍然统治着世界各国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通过阶级斗争争取达到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的理论等，是必须坚持的。列宁强调指出，这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并没有过时。没有这些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可以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可以使他们从中取得一切信念，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指明斗争的前景。维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粉碎对它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②。但伯恩斯坦等人借“批评自由”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从而把工人阶级引向歧路，则是必须坚决拒绝和反对的。列宁揭露了新“批评”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③。他们所宣传的“批评自由”，实际上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伯恩斯坦派的“革新论”也是虚伪的和反动的。列宁说：“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① 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将投降主义、改良主义的理论贴上“革新”的标签，这就是伯恩斯坦派“革新论”的本质。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派的“过时论”和“革新论”，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相反地，他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同时，驳斥了伯恩斯坦主义的拥护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应用是各不相同的。他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一方面给予伯恩斯坦错误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列宁又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依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表现的异常突出的新情况，得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它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打破了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和平长入的种种神话，驳倒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种种谰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科学的思想武器这一客观真理，鲜明地体现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①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列宁全面清算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列宁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他正确处理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尽管伯恩斯坦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具有合理性，但是，他走到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学说基础的地步，则是极端错误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场”的当代性，并在实践中赋予这一学说以勃勃生机。

（二）批判了伯恩斯坦改良政党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无产阶级政党优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③。而伯恩斯坦要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则根本抛弃了这一点。伯恩斯坦所要建立的改良党的思想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的大杂烩。当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之所以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变成了改良党，也在于它们糟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改良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一开始就十分注重首先从思想上建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确定革命信念、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有决定意义。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1. 从思想上建党

伯恩斯坦主义对俄国经济派的影响，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发生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完备了，过时了；另外一种倾向是有一部分人醉心于细小的实际工作，不懂得革命理论的重要和思想统一的意义，习惯于党的涣散状态和思想上的混乱。面对这种形势，列宁认为，只有从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建设入手，才能使全党“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使党摆脱涣散、混乱的状态。为此，列宁进一步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意义。列宁总结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经验，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强调指出：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关键。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造成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产生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认为，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思想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同一切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从思想上击溃它们。若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妥协退让，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当时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重要特征，就是竭力抹杀阶级界限，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取消阶级斗争。其主要手法之一是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机会主义借“批评自由”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策略。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如一方面攻击“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的《共产党宣言》，攻击“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传播资产阶级理论，贬低、篡改、歪曲科学社会主义，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对立，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借以腐蚀工人阶级政党，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把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可见，伯恩斯坦主义的“批评自由”，是要求用“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民主党从革命党变成机会主义的改良党的自由，用种种时髦的资产阶级理论诋毁马克思主义、否认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列宁一针

见血地指出：“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① 列宁当时在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从理论上摧毁了伯恩斯坦主义，为党牢固地莫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2. 明确党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没有“明确的积极的纲领”的政党，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行动纲领是“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这面白旗表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因此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时期，高度重视从政治上建党，制定革命的政治纲领。他也先后拟定了三个纲领草案，尤其在第二个纲领草案《我党纲领草案》里，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关于党纲的基本原理。

列宁指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它用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最终目的和实现最终目的的根本手段以及种种要求，使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同时它也是衡量一切地方党组织和所有党员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有利于党摆脱“手工业方式”，组成坚强的政治大军。再则，党纲是一面判断党的性质和活动方向的旗帜，人民通过这面旗帜了解党的真正任务、要求和斗争方法。这有利于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凝聚最广泛的革命力量于党的旗帜之下。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实质就是：“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② 党纲的这一实质，同伯恩斯坦主义的种种观点，如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无关紧

^①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要，工人主要是关心经济斗争，党不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无论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较温和的形态”，“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不使用暴力革命的发展阶段”，等等，是完全不容的。列宁强调，党必须时刻注意加强自己的领导和组织的责任，把工人的自发运动引导到党纲的高度，促使其遵照党的近期目的和长远目的相结合的方针开展斗争，并把近期目的和长远目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一致起来，坚持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制定党纲的依据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要求制定党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充分反映本国的特点，并注意吸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当时在俄国的变种则坚持党纲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依据，同时借口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寻找论据。

在制定党纲的过程中，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1902年初列宁在起草的第三个纲领草案中，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并经过在苏黎世召开的《火星报》编辑部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载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这样的纲领就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别开生面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战斗红旗。

列宁从政治上建党的思想，在当时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政策即“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①日益流行的时候，从政治上保证了新型政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性。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特别突出了在国家问题上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阶级不与任何阶级分掌领导权的思想即共产党必须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实行领导的思想。当时出现了否定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列宁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在列宁看来，否定了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国家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只能是为一切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权是通过它的执政地位来实现的，如果否定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列宁维护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有效地防止和反对了帝国主义“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阴谋。

3. 重视从组织上建党，进一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在把革命政党变为自由主义的改良党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抛弃了这一原则，因此列宁在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非常重视从组织上建党，恢复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原则。

早在1903年以前，列宁就强调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①。1903年秋后，新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就应当承认组织关系”，反对集中制，倾向于自治制，主张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中学生以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自行宣布为党员，反对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等等，这是伯恩斯坦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翻版。列宁坚决批判了这类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谬论，进一步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原则。

首先，列宁阐明了作为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必须以无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始终保持同本阶级的联系，而且它作为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一部分，还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新型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阶级政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在这里，“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①。只有用组织的物质统一巩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党才能在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组织的核心作用。

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如果没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整体的组织原则，“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②。马尔托夫派妄图把党建成为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东西，同党的性质、任务根本不相容。崇尚组织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仇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党的结合规律——民主集中制攻击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农奴制”等，实际上是一种组织上的尾巴主义。这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必然产物，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③是自由资产阶级观点体系在组织上的顽强表现。经过列宁的斗争，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了党章。

其次，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党章对全党活动的意义，批判了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坚持宗派活动，要求党放弃工人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的错误。列宁指出，清除小组习气、庸俗观念、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任意胡闹等不良现象。坚持党性、对革命义务的自觉性和严守纪律性，这是使无产阶级政党肩负起特别重大责任的必然要求。

最后，列宁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意义和原则。他认为，按照正确原则积极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批评斗争，是建立起真正统一的、朝气蓬勃的和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条件。列宁特别指出，党内斗争要从全党的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反对以牺牲党的利益来满足宗派小组的利益，以牺牲工人运动的利益来满足狭隘的地位观念的利益企图。要特别警惕、坚决斥

①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②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

责一切旨在瓦解党的阴谋。

列宁还特别注意到党的领导人、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要求对其加强考察、监督。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健全和扩大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党的统一。他领导党粉碎了“工人反对党”和“民主集中派”等小集团派别活动，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了党。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后期民主社会主义斗争中提出的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它的灿烂光辉照耀着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道路。今天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当年遭到破产的民主社会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以新的形态再度蔓延，向革命的共产党人提出严重挑战，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曲折的时候，列宁的党建学说以及整个列宁主义宝库更加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绝对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定会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辟的航道，“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加强自身的全面建设，提高执政的自觉性，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继续向前奋勇推进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民主社会主义必将再度宣告破产。

（三）列宁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体化

伯恩斯坦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理解，以致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卢森堡对此行为进行过批判，但卢森堡的批判并没有指出伯恩斯坦的错误原因之所在，即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时代新变化。列宁则准确地把握住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没有过时。列宁在批判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时，曾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巨著。书中列宁总结了《资本

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 50 年的发展变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从而在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中，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这就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为俄国十月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四）团结左派以及革命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同修正主义作斗争

在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列宁利用斯图加特会议、哥本哈根会议等平台团结左派以及革命群众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宁写道：“修正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①

1907 年 8 月，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列宁率领俄国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第一次同伯恩斯坦及其拥护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不仅利用其在第二国际中的威信，竭力对其他党散布错误影响，而且为了操纵大会，还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一方面让党内右翼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大卫、列金、福尔马尔等人出席大会；另一方面，又阻挠左派特别是卢森堡参加大会。但是，卢森堡最后还是出席了大会，不过不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而是作为波兰党的代表参加的。大会讨论最激烈的是军国主义问题。爱尔威在决议草案中认为，应当用罢工来反对一切斗争；福尔马尔等人则宣扬机会主义观点，认为反对战争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对此，列宁亲自召集了有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参加的会议，并和卢森堡一道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最终，在列宁等人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正确的决议。殖民地问题是大会引起激烈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机会主义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建议本国政府签订国际条约，为殖民地居

^①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1 页。

民规定一定的权利。其中，伯恩斯坦、大卫等人在讨论中发言直接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列宁在反驳中认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社会主义者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

1910年8月，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另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在有关合作社问题上，列宁同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机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其中，饶勒斯等人模糊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把无产阶级和业主对合作社的看法混为一谈。列宁坚决反对饶勒斯的主张，加上革命派的坚持，大会通过了合作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的决议。哥本哈根大会还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决议包含了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点。决议还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

二、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历史贡献

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旗帜鲜明地对伯恩斯坦主义作了严肃的批判。她立场坚定、态度明朗，一开始就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它口诛笔伐，是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先驱和领头人物，为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列宁曾称誉卢森堡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①，“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②，“伟大的共产党人”^③。列宁还曾指出：“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①不但马克思主义者称赞卢森堡,甚至连拥护伯恩斯坦及其他机会主义者的现今的资产阶级右派社会民主党的辩护士都不得不承认卢森堡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巨大功绩。

P. 盖依这样指出,卢森堡对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无疑,是最强有力和最深刻的”。G. A. 里特认为,卢森堡是“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新革命策略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C. E. 肖尔斯克称卢森堡为“热情的思想战士”。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是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国际共运史上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当伯恩斯坦为修正主义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时,给这套理论以沉重一击的是卢森堡;当伯恩斯坦主义分子在各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时,他们遇到最顽强的对手是卢森堡。这是卢森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卢森堡比当时党内著名的权威人士更加懂得修正主义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危险性。她力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伯恩斯坦分子实行更加积极和坚决的行动。她愤慨地告诉R. 梯什科,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尖锐的、论战性的、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要费多大的劲,“该报主编舍朗克不愿恶化与修正主义分子的首领的关系”。

卢森堡同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策略的重大原则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我们如何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思想在事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她不是从静态的角度,即从抽象的公式或现成的结论看待历史的发展,而是从动态的角度,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前进中的新现象,去研究无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页。

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新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卢森堡许多思想之所以能在当代仍有巨大影响力和现实生命力，其谜底在于，它不仅有较大的适应性，更主要是有远见性，预见性，或者说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例如，卢森堡对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论述就适用于这种情况。

（一）阐明了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命题

卢森堡与伯恩斯坦在许多观点上的分歧和斗争的焦点问题，归根结底其本质在于如何在历史转变时期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通过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斗争与争论，可以给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倡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等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伯恩斯坦能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相当敏锐地抓住这些新现象、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义，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并根据新情况进行深入探讨，予以解释和论证，其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其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应该肯定的。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异端邪说。比如，伯恩斯坦曾呼吁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社会民主党需要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检查一下我们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对于他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是在理论上进行自我批评的典范，社会民主党也不应惧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为此他“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①。可见，伯恩斯坦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他的理论中有些观点错误、有些观点带有片面性罢了。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伯恩斯坦在他的大量言论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正确的因素。例如：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随着资本主义生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结构和生活状况都有着明显变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使工人阶级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有了现实可能，等等。考茨基肯定伯恩施坦提出问题“促使我们深思熟虑”的积极意义，同时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即不能因此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乃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然而，伯恩施坦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开始，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转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的憎恨，从而为修正马克思主义找借口，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等学说，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万能的公式，到处照抄照搬。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强调说，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都要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为以后发生所有问题准备好现成的答案，不可能对以后历史的具体进程未卜先知，他们的个别论断难免失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也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伯恩施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主要表现为：首先，伯恩施坦是怀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怀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不正常心态的“脱毛”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检验、疯狂的攻击，甚至提出“回到康德去”的。伯恩施坦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因而当他公然要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时，他的修正主义者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与此相应，当他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全面否定时，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系统化了。伯恩施坦在1898年10月《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充分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

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①

从伯恩斯坦的这段陈述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他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摆脱出来，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竟然做出判断说：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中错误的成分远远多于正确的成分。马克思当年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而他当时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却相反大多发生了；其二，他强调自己这次是公开与马克思的理论决裂。

其次，伯恩斯坦对自己所修正的理论，非常自信和欣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为以前维护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感到遗憾。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针对倍倍尔责备他的变化，为自己辩解时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一开始就不得不说，你对我的评论实在是错误的。首先，我在柏林时不是杜林分子。我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不过，我根本不认为这样做是我的光荣，相反，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我那时候的理论见解是多么贫乏，我的思想方法是多么肤浅。”^②这段话说明了他为自己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而感到自己那时候的理论见解的贫乏，思想方法的肤浅。还说明了他不但认识不到自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反而以现在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有了修正思想而自豪。二是他面对党内领袖们和理论权威的批判、指责，他不但没有低头，还把自己称做坚持真理的勇士。他曾说：“接二连三的最凶狠的攻击落在我身上，他们既然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行为牵涉个人利益，因此就更加粗暴地对待我的科学名声。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主张算在我的名下，用最专横的方式对待我的统计数字和经济论断……尽管这很不正派并且在那时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仍旧要为这些攻击辩护，说它们到底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①这些话和他的坚持使得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对他同情，但实际上他却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卫道士，而不是人民利益的拥护者。伯恩斯坦主义对德国和国际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把工人运动局限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范围内，麻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工人运动遭受挫折和失败。

最后，伯恩斯坦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变化为理由，对“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进行思考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这就使得他的理论离马克思主义是越来越远。伯恩斯坦相当自负，他自知“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但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要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清算”。他在《前提》的序中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期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今后我必须同那些象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我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大体上是错误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②由于伯恩斯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就造成了他的根本宗旨不可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从而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伯恩斯坦把马克思当时的个别具体结论当成一般抽象公式到处套用，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曲解、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对于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马克思主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9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义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反对和平的方式，而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国家，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是可以通过斗争取得一定的普选权，然而在封建残余等反动势力强大的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改良的斗争方式往往遭到血腥的暴力镇压，因而斗争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暴力的性质。像俄国，暴力革命几乎就是唯一出路。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愈健全，工人阶级的斗争才愈有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72年就曾指出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工人是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消解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一概否定，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改良上，这实际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理论是不科学的，也使得伯恩斯坦自己，这个曾经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

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卡尔·马克思》等文章中科学阐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卢森堡还指出伯恩斯坦一方面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一方面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虚伪性，她指出，指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开始就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这些修正主义者一开始肯定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是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①

另外，卢森堡还写了一系列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如她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针对修正主义分子叫嚣、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是限制独立思想活动的“框框”等谬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停滞不前不再发展的理论，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或者采取想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证明自己思想独立性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

（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有三条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基本原则。一是价值原则，就是为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二是认识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三是实践原则，就是改造世界。这三条原则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任何一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中，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

而伯恩斯坦主义信奉康德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推崇唯心主义哲学；否定辩证法，否定革命这种质变方式，鼓吹单纯的改良；伯恩斯坦处处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德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一味地追求英国那种工会、合作社式的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方式，这些都说明了伯恩斯坦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卢森堡则对伯恩斯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表现在：

第一，卢森堡以极高的政治敏锐感指明了与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实质。她明确指出，与伯恩斯坦分子所进行的斗争，其实质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的策略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即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伯恩斯坦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希望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与卢森堡和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卢森堡能够把问题的实质讲得如此明确和提到如此高度，这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第二，卢森堡指出了伯恩斯坦之流散布的所谓新的“资本主义适应性”。伯恩斯坦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为借口，大肆吹嘘资本

主义因为有了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和交通工具等的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有了新的“适应性”，普遍危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将得到稳定发展。卢森堡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一一予以驳斥。她指出，资本主义所有的新的适应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恰恰相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即当时所说的“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只能使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严重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从而资本主义为它自己的最后崩溃准备了条件。

第三，卢森堡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即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质的区别。她反复强调指出，议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社会改良只是手段，社会革命才是目的。针对伯恩斯坦关于议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通过革命而可以通过在现存社会制度内逐步改良、普选制的改进、工会和合作社的进步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卢森堡强调提出，改良与革命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一个社会制度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实行革命变革，“其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为新质”。她指出，伯恩斯坦不但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而且要用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反对发展过程的质变、飞跃，在政治上反对革命变革，反对夺取政权，这是一种市侩式的、庸俗的现点。她指出，资本主义不会“长入”社会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的“铁锤”，即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卢森堡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权威。卢森堡杰出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企图回避革命的唯一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她反复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有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上产生的各种客观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二是工人阶级在主观意识上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变革途径才能消除这些矛盾的必然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这种认识，掌握客观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利用它、发展它，通过明确自己任务的革命无产阶级坚忍不拔和坚持不懈的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经过革命变革来解决矛盾，而不能像伯恩斯坦所主张

的通过所谓经济改良和社会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总之，卢森堡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对伯恩斯坦主义这种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了深刻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她曾经指出，伯恩斯坦思潮无非是想对机会主义的实践“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①。从伯恩斯坦的书中，人们不难看到，机会主义理论上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个牢固结合的建筑物。这就证明，机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和基础是同马克思体系不相容的”^②。在这里，卢森堡揭示了机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它们从对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的怀疑、攻击开始，其内在趋势就是通过他们的理论要把工人运动推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麻痹，最后力图全面毁掉马克思学说从而根本动摇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中的地位。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进行分析的这些观点，既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不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赋予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以新的活力。她对社会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革命和改良两条道路上进行斗争的理论。

（三）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卢森堡和马克思之间并不是直线式的思想继承关系，卢森堡不是简单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她在继承与发展中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激烈的理论论争，又有思想的碰撞和不断地创新。这突出的表现在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公式的批评、修正和发展上。但她的这种修正、发展与伯恩斯坦的修正又是不同的，卢森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堡并没有完全照搬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式地搬用它，而是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森堡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批评和修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使其能够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积累中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有许多自己的创见，她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有许多创新性的研究。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过于抽象，甚至抽象了不应该抽象掉的对外贸易及对外经济关系等因素，因此，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非完全赞同，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垄断资本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对外贸易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是很难说服人的。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恰恰没能说明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对此，卢森堡通过增加对外贸易（情况）条件下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的新变化，系统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她在1913年和1920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等著作中，她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结论。她指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实现的。对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她认为，它不能由工人和资本家来实现，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只有通过出售给非资本主义制度的消费者，才能最后实现。卢森堡指出，剩余价值实现的出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它“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①。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这些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市场关系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也将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剩余价值实现上的矛盾将再度出现。不过，解决矛盾的最终出路，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崩溃。这些观点，均包含了卢森堡正确看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重要思想。

^①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6—277页。

(四) 对列宁主义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分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野产生了三个支流：一是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为起点的伯恩斯坦主义，它在许多方面已经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二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人物卢森堡理论为渊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三是以列宁主义为起点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所谓东方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和“东方国情”结合，后来产生了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他们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为满足无产阶级新的斗争时期的需要，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含义的名义，恢复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忽略了的许多内容。这些内容对列宁主义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卢森堡在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中谈到她对改良与革命、民主与社会主义、议会与普选、政党等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列宁主义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卢森堡在批评伯恩斯坦主义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卢森堡与列宁在政治观上也存在着一些论争与分歧；如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上的论争与分歧，议会制和苏维埃制之间的论争与分歧；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与专政的功能和作用的论争与分歧；等等。列宁和卢森堡两位伟人的思想交锋，如果不是只置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而是置于西欧和俄国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来理解，那么，卢森堡与列宁各自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就不是仅以俄国实践和相应的列宁的论述为检验标准了。从这个方面来说，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和国别特色的发展，是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性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方面说来，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发展的中间环节，对列宁主义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为思考和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借鉴参考

卢森堡毕生执着于追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仰，对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她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即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也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根本不可能实行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同样，社会主义也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伯恩斯坦在他的论著中也突出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乍一听，好像与我们当今所强调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实质上通过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批评，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首先，伯恩斯坦在资本主义社会强调“全民的”民主，超阶级的民主，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这种作为善良愿望的民主对人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是骗人的把戏，是资本主义暴力掩盖下的凶杀与掠夺。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抽象的形式民主，而是内容充实的人民民主，而人民民主不仅要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还要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政治生活，使其成为民主和舆论的真正主体。其次，伯恩斯坦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只不过，他所说的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采取了一些“人性化”的措施。比如伯恩斯坦所提到的议会选举、普选等。最后，伯恩斯坦所讲的民主是与专政相对立的民主，即无阶级专政的民主，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卢森堡强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对立统一，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对我们正确理解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路明灯，是我们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最有力的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如果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和‘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如果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那么，罗莎·卢森堡是这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最有建树者之一，尤其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最具影响的人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1898年以后，她实际上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之魂。”^①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贡献以及她身体力行参与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罕见的、集理论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社会主义者。

三、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历史贡献

考茨基和伯恩斯坦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他们的多年活动曾对推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起过明显的作用，而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两位理论家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并非始终一致。虽然，两人同为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者，但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他们的观点开始产生分歧。

（一）考茨基批评了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法，维护了马克思主义

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过了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中指出，“如果修正主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并且像历史学派一样，把重点放在描述发展和结果上，那末，修正主义就能够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成绩来”。这一段话表明考茨基对待修正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从侧面方面映衬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当然，他对修正主义的这一认识是随着伯恩斯坦不断发表的文章而逐渐形成的。考茨基起先对伯恩斯坦表示“深有同感”，后来慢慢开始“怀疑”，当伯恩斯坦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

^①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罗莎·卢森堡》，《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

党的任务》一书发表后，他的“怀疑”就变成了“激烈的反对”^①。考茨基在一封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我在一些观点上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② 即使他在说出“感激”伯恩斯坦之类的话的时候，他也同时表明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会胜利。”^③ 考茨基积极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尽管这些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维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路线；他坚持了《新时代》这个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挥了它在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他没有因为和伯恩斯坦的友谊关系，而抛弃马克思主义原则。从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始，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愈来愈坚定、愈来愈坚决。1898年12月23日，考茨基给阿德勒的信中说：“我将对爱德发动进攻，态度上纵然可以温和，实质上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④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抛弃了和伯恩斯坦的旧日友谊。1898年10月23日，他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明了和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之后，明确地指出，两人之间“公务上的合作完结了”，“在理论方面一贯合作是不再可能存在了”。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既不是它的继续发展，也不是以另一种学说来代替它；实际上，修正主义意味着不仅放弃马

① [奥]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叶至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1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页。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09页。

克思理论，而且放弃一切社会理论。因而，他对伯恩斯坦谈道：“我不能跟着你，我的信念和你的同样深，同样坚定。”^①又比如他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中说，伯恩斯坦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用另一种更高的观点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就会钦佩不已地予以赞许。我认为，他的批判的目的只在于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不充分，以便掺入一种在我看来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成分。我十分激烈地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我把这种修正看成是理论上的妥协，看成是向幸而业已克服了的折衷主义倒退的行为”。

由此可见，考茨基在德国党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表现，可以说他是站在党内左派一条战线上的。

（二）考茨基批评了伯恩斯坦方法论的错误

伯恩斯坦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混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正确考察的陷阱”，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致命之点”。他还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经济唯物主义”和“社会宿命论”，鼓吹利益、道德和认识这三方面的观念力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正当原动力，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针对当时“回到康德去！”的呼喊叫嚣一片的严峻形势，考茨基感到必须对此错误思想加以制止。于是他相继于第27期、第28期和第29期，在1899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分别发表了《伯恩斯坦和唯物史观》、《伯恩斯坦和辩证法》、《伯恩斯坦关于价值和阶级的理论》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考茨基批评了伯恩斯坦企图把宿命论说成是唯物史观的谬论。考茨基指出，伯恩斯坦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著作中个别词句的诡辩，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实的歪曲，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歪曲为一种宿命论。据此，伯恩斯坦把唯物史观所阐明的人类发展的必然性，解释成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被强制的境况，人们的意志是被决定的，人们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83页。

的行动也是不自由的过程。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论述，在伯恩斯坦那里完全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考茨基进而说明，伯恩斯坦正是在对马克思思想曲解的基础上，得出了两个极其错误的结论：第一是伯恩斯坦“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或者至少否认能用现有的手段认识它们的可能性”；第二是伯恩斯坦“为反对历史必然性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使人感到：他所信奉的观点是，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①

考茨基指出伯恩斯坦对恩格斯晚年著作的看法和理解的错误之处。他指出恩格斯并没有像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晚年放弃历史决定论。在这些文章中，考茨基还批判了伯恩斯坦反对辩证法的言论。伯恩斯坦曾断言辩证法似乎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任意解释。与此相反，考茨基强调，倘若不了解辩证法，那么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因为辩证法是理论研究的“最好的方法”和“最尖锐的武器”，“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恩格斯语），如果马克思主义中抽掉辩证法那它还剩下什么东西呢？”^②但伯恩斯坦却错误地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阻碍人们正确思维的“陷阱”、“泥潭”等等。

考茨基清楚地看到，伯恩斯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辩证法的种种“责难”、“清算”，“实际上……变成了对马克思的方法的责难，变成了对这种方法的最成熟的最光辉的产物——《资本论》的责难”。^③伯恩斯坦指责《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理论“承袭”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先验性”的错误，断言马克思为了依照先前已决定的“结论”来构思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牺牲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

在批判伯恩斯坦哲学观点的过程中，考茨基还写出了《伦理学和唯物

① 转引自[奥]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德文版，第18—19页。

② 转引自[奥]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德文版，第22页。

③ 转引自[奥]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德文版，第24页。

史观》、《阶级斗争和伦理学》等著作。应当肯定考茨基的这些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首次具体阐释，是维护唯物史观的。

（三）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评

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动摇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这座大厦的基础。他不但攻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且还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他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和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消费不足论”没有多大的差别，他固执地认为垄断组织是可以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的，因此经济危机的性质和频度是能够改变，并最终得到消除。这就是伯恩斯坦所谓的“资本主义适应论”。

针对伯恩斯坦此论调，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他虽然沉默过，犹豫过，观望过，但还是于1899年写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土地问题》、《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反对伯恩斯坦》）等不少著作，从而更有效地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许多滥言，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除此以外，他还有一系列专门的经济研究著作和某些其他的研究著作。总起来说，这些论著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总斗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反驳”是毫无根据的，伯恩斯坦的立场是折中主义。针对伯恩斯坦企图把马克思的观点同柏姆-巴维克的反科学的“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的用意，考茨基批驳说伯恩斯坦离开了对问题的严肃的科学的考察而企图机械地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结合起来。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没有能力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所以他倒退到原始的空想主义。同时，考茨基还依据许多统计材料，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论据，驳斥了关于在股份公司中似乎正发生资本的“民主化”的观点，关于可以借助于垄断和信贷消除危机的观点，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者”人数增加和无产阶级状况日益“改善”的观点，等等。

（四）考茨基批驳了修正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点

伯恩斯坦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修正”。为此，考茨基在1899年9月出版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对伯恩斯坦的所谓“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进行了有力地批判。考茨基指出，伯恩斯坦实际上是鼓吹倒退，是“要退回康德去”，“回到蒲鲁东去”。他说：伯恩斯坦“不是他在书中歪曲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他错误地对这一学说进行了批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①。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种倒退，一种空想主义，他指出：“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我们党幼年时代的这种方法上。”所以他声明：“我们一如既往……我们愿意在任何方面都保持我们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②在这本书中，考茨基从“自发论”、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政党、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批评，因而这本书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倍倍尔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信给他说：“祝贺你反驳伯恩斯坦的小册子，很出色，它严厉地谴责了爱德。”^③列宁也曾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向俄国读者介绍了考茨基的这本著作，并让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将此书翻译成俄文出版。

考茨基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批驳了修正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29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1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5页。

1.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自发论”的批判

当时，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宣扬自发论，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結果，即像伯恩斯坦以后所下的定义那样：“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① 1901年10月16日，考茨基发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正》一文，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这个观点，他指出，伯恩斯坦的观点是全然歪曲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是完全不正确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列地产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产生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知识也如同财富一样，并不掌握在工人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手中。因此“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②。基于上述分析，考茨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下述论断：“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③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工人运动的自发产物，从而同修正主义的自发论划清了界限；同时，此论断既肯定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作用，又规定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在工人运动中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这实际上包含着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思想，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指导的意义。列宁十分推崇考茨基的这个思想。1902年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曾引用了考茨基的表述，称它是“十分正确而重要的”。并把这一看法作为自己“灌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2. 考茨基在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

伯恩斯坦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作用，他认为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同时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伯恩斯坦离开了民主的阶级性而抽象地谈论民主，把民主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和形式。考茨基在同伯恩斯坦的论战中除了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以外，还指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另一个是目的，而是，两者都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考茨基着重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他说：“现代工业国家里的进步民主制，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才能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进步民主制衰退的原因。”^①同时考茨基还正确地断言，社会民主党无须担心革命“过早”的胜利，他写道：“那种认为我们明天可能成为德国的专制主义者的担心，始终很少引起我的注意。”^②只有在社会民主党自身消失的情况下，才可以避免革命的胜利。这样的论述是有趣并且颇有见地的。

当然，考茨基多半是用形式的法律的观点，来考察民主问题，因此不可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观念，比如对民主的阶级性、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制约性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论述。

3. 考茨基批判了伯恩斯坦关于议会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观点

在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上，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因为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才通用的，“在这一格言下所进行的宣传并不是有益的”。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

^① [苏]斯·布赖奥维奇著：《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② [苏]斯·布赖奥维奇著：《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和“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伯恩斯坦认为时代变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他一味推崇议会制，并将议会制度理想化，把议会斗争、通过议会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高的、决定性的形式，这就是他的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批判了伯恩斯坦以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的理论，即议会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观点。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考茨基原则上赞同左派理论家的观点，即主张走社会革命的道路，但当真正涉及实践问题、涉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应采取何种具体的斗争方式时，他实质上又采取了与右派理论家相同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他则与左派理论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左派共同构成了同修正主义相对立的“正统派”。

在革命策略上，考茨基之所以坚持与伯恩斯坦不同的观点，主要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同判断。在他看来，虽然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工人阶级待遇较以前也有所提高，并且工人阶级利用工会等组织也为自己争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权利，但这些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工人阶级受到更大剥削和日益贫困化为代价的。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他始终坚持认为应该走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的道路。无产阶级应该采取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应完全依靠和平的方式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主要包含在《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两本著作中。他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①。同时，他还以举例的办法，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实质只能是被压迫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突变过程，即他所说的“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39页。

入其更高的发展阶级”。

在政党问题上，考茨基在批驳那种认为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是逐步取得政权的途径的构想时写道：“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人会想到社会民主党同现在某一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然而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社会党人暂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可能是适宜的。他说，党越是团结，就越有战斗力。这是对的。然而，他又补充说：“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似乎党内不存在并且不应该存在各种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有时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党不得不容忍他们。”考茨基正确指出，必须努力设法使党的政策不要变成冒险政策。然而，他却又把革命暴力同冒险政策混为一谈。总之，在政党问题上，他往往把理论上的争论同党的实际任务以及制定社会改造的战略和策略割裂开来。

第二节 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作为革命左派，卢森堡立场鲜明，意志坚定，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在当时残酷的斗争条件下对伯恩斯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和斗争经验不足，再加上缺乏一定的理论素养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就造成她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无法解释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只能教条式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甚至在批判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甚至错误。当然，卢森堡对此缺陷和错误不能负全责，德国党在这场斗争中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没有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德累斯顿代表大会虽然取得了反修斗争的又一次胜利，但是，德国党内修正主义者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在继续活动。德国党却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

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终于使党受到了修正主义的严重腐蚀，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遭到破产。

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德国党的领导人把修正主义的产生看成是个别人物的过错和罪孽，而不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他们多次说伯恩斯坦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者，是由于他长期居住伦敦的结果，如果他是住在德国，就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第二，德国党的领导人和卢森堡对修正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也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认为，放弃实践原则比理论攻击要危险得多。因为理论的争论，只涉及少数人，而放弃实践原则，放弃党的策略原则，就会引起全党的混乱。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完全相反，理论是策略的基础，理论初看起来似乎是“并不重要的”，但理论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德国党后来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三，由于上述的错误认识，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就表现得不坚决：一边批判修正主义，一边安抚修正主义分子；既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又不能用太激烈的手段来反对修正主义者，妄图“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修正主义者。这样，德国党历时6年多的反修斗争，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远远没有肃清修正主义的影响，给党留下了隐患。由于德国党领导人和德国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再加上卢森堡没有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同时，正确地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造成了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不够

1. 未能对伯恩斯坦“全民党”思想进行批判，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不够

前文提出在19世纪70年代末，伯恩斯坦就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三人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中，共同提出社会民主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

此，党必须把“在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争取”到党内来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他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都可以参加的改良主义的“全民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去世之后，他们认为这一目的就得以实现了。伯恩斯坦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只是接受工人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政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

由于伯恩斯坦倡导建立全民的党，党员成分过于庞杂，不仅有工人，还有不少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同情工人，但由于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中很多人虽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很肤浅，因此只希望作些改良，并不想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即使他们中有些人出身工人，也是深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如，在德国1918年革命中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艾伯特和谢德曼就是出身工人，却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

由于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成分复杂，很容易被机会主义思想所腐蚀，势必影响党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必须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并对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进行领导。这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然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为追求合法斗争的成就，容忍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涣散的状况，使党对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敞开了大门，这直接导致党内思想复杂、派别林立、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主要政党，甚至在实际行动中有意抬高一些合法组织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确认党与工会平权的原则，而且赋予议会党团诸多特权，使其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就大大地降低和削弱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最终导致党本身也蜕变为改良主义组织。伯恩斯坦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党应该有鲜明的阶级性，或者他本身就想把党建

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充斥的大杂烩。伯恩斯坦分子在党的性质上的这种重新定位和转变，主要是为了适应普选制和议会民主选举的需要。党身份的这种跨阶级性、模糊性，有利于伯恩斯坦分子争取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争取到较多的选票。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为了做到“全民党”，而完全放弃自己的“阶级身份”就必然会使自己失去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那么就不会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而当时的卢森堡对此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伯恩斯坦这种思想没有进行批判，她只是批判了伯恩斯坦改良党的思想，在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上重视不够，并曾经批判了列宁的集中制思想。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应该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富有才干和经验的坚强核心来领导党。卢森堡认为：“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① 她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②，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从中可看出，她与列宁在建党思想上就集中制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她并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集中制，而是在集中的程度上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卢森堡认为列宁所建立的“集中制”是“极端集中制”，缺乏必要的民主。由于卢森堡对俄国当时的客观历史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的批评并不完全正确。

与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全民党”理论相比较，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党的群众性和开放性，强调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强调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党，一贯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以群众性、开放性、民族性来排斥和否定党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的重要问题上与伯恩斯坦妄图建立的“全民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页。

党”、“改良党”存在根本区别。从思想体系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阶级属性来说，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党；从政治目标来说，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而伯恩斯坦所要建立的“全民党”、“改良党”却并非如此。

2. 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形势和策略，回答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问题，澄清思想，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

卢森堡尽管对修正主义的本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却未能在理论上对修正主义予以有说服力的回击，特别是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形势和策略，回答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问题，澄清他们思想的困惑，为党的建设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没有引导和教育群众认清机会主义的实质和表现。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到处发表演说，迎合部分群众的心理。这就造成了群众思想上的混乱，有的就跟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右倾分子利用工会，通过在工人中组织互助、救济和提供社会保障来吸引工人、扩大影响，随着工会的发展，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些都促使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一部分人热衷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温和改良主义。因而随着工人阶级政党势力的不断壮大，党员人数的急剧增加，党的组织机构迅速扩张，党内官僚政治滋生。对于成分复杂、人员来源渠道多样这样组织的来说，党的理想和最终目标已经降到次要地位，组织领导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保住自己待遇优厚的岗位。而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直接影响着革命的发展方向，由于没有把握住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因而，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左派越来越不利。1910年前后，修正主义势力由于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向其靠拢而更为增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居于主导地位。

随着德国1918年11月革命的爆发，政权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谢德曼所攫取。12月召开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488名代表中斯巴达克派只有10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未能选上代表，整个会议被右派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了党的领导权，骗取了群众的信任。当他们背叛革命时，左派没有力量来防止，没有很好

地引导和教育群众，擦亮群众眼睛，就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逐渐得势，最后得以搞垮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此伯恩斯坦的主张逐渐获得了工人阶级政党内右派和中派的认同和支持。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批判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并在组织上与之决裂，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反对修正主义，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转折关头保卫了马克思主义。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则由于批判不力，使修正主义在党内逐步占上风，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麇集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旗帜之下，并导致第二国际最终破产。

（二）对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对党的危险性缺乏足够清醒的估计

由于伯恩斯坦当时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的，所以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再加上一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对其危害程度估计不够充分。因而，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连续五届代表大会都涉及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而且在这些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卢卑克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谴责伯恩斯坦的决议案。但还是没有有效地抵制住伯恩斯坦主义的流行和猖獗。

卢森堡当时对伯恩斯坦的认识与批评，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各理论家中”最有力的。根据是她的名著《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彻底批判了伯恩斯坦以改良主义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罪恶企图”。但是，这本书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同时忽视了在组织问题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使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继续得到传播。在1899年德国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问题才正式列为大会的议程，卢森堡在会上虽然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猛烈地反击，并在代表大会上第一个提出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的建议。但在代表大会之后，她又收回了这个完全正确的建议。1899年秋，卢森堡断定：“一个严密的大党不致

由于报纸文章而分裂，不致由于个别的政治偏向而分裂”，只要“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未’成系统，‘未’成为部分党组织的习以为常的实践……。”^①这些都说明了卢森堡没有充分认识到伯恩斯坦主义的危险性。卢森堡认为，如果说伯恩斯坦主义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观点“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意向和改造工人运动”^②，这对德国来讲是难以置信的。她在大会上就是本着这个精神作发言的，她在大会上指出：“如果你们仔细考察十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一下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看到，伯恩斯坦派已逐渐加强，但是还决没有达到成熟：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熟。”^③上述事实说明，尽管卢森堡已经正确认识到伯恩斯坦主义已经形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其派别力量也在加强，但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主义的发展不会导致党的分裂也不会成熟起来。实践证明，此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不但导致了党的分裂，而且在国际上泛滥成灾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

卢森堡过低估计了修正主义对党的危险性。她只是在1899年秋即将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前的一些演讲中强调指出，如果代表大会把“机会主义驱赶出去”，它就会成为德国和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卢森堡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却未能在组织问题上与修正主义分子决裂，这样就会使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分子得以继续留在党内，侵蚀党的肌体，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也导致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不够彻底、斗争不够有力。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当卢森堡明确提出要把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议题展开讨论时，倍倍尔的看法不同，他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

① [苏]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② 转引自《罗莎·卢森堡选集》第1卷第2分册，莫斯科1930年版，第84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页。

为，伯恩斯坦所论及的并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伯恩斯坦这些问题的态度，必须在报刊上加以透彻地讨论，特别是在伯恩斯坦的观点在党内已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因此，倍倍尔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及其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但总的来说，斗争得不够有力、不够坚决。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正确观点没能以全党的决议、文件形式出现。伯恩斯坦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断地进行反驳，结果形成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广大党员难以分辨谁对谁错。而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人物的倍倍尔并不理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有力批判。甚至到1903年倍倍尔仍不同意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伯恩斯坦的不满直到1898年10月，才在斯图加特大会上表现出来，但这次大会又是妥协的大会，在大会上没有对伯恩斯坦及其他机会主义者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与此同时，卢森堡没有足够估计到在工人运动中战胜机会主义思潮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是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①。卢森堡解释说之所以这样看待伯恩斯坦主义，把伯恩斯坦的理论看做是为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斯坦的体系中，无论在消极方面，即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在积极方面，即在把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东西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方面，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这流露出了卢森堡低估伯恩斯坦主义的情绪。其实，就伯恩斯坦本人而言，这确实是他理论上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是，就伯恩斯坦历次代表的那种机会主义理论思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第一次出现之后，并没有成为最后一次。“复活”或者“复制”伯恩斯坦理论的倾向，在20世纪的一些适宜的气候下曾一再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地出现过。

(三) 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认识不清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这本书里，阐述了她对帝国主义的理解。首先，她将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政治名词”，并将其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她说：“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① 卢森堡还明确地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并提出要研究其产生的经济根源问题。她认为“不仅存在着说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上牵涉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其次，卢森堡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卢森堡在研究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时她写道：“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② 这说明卢森堡在这里已经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她宣称，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发展，非资本主义领域不断缩小，而当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全世界，排除掉一切非资本主义领域时，资本主义就因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而到了末日。但是必须明确指出，卢森堡本人并未推导这个结论。相反，她曾一再指出，这只是一种理论分析，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她曾说：“在正式达到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③ 可见，卢森堡充分肯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①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②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3页。

③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

义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是想用此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也是她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精神支柱。

当然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她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认识不清，也没有认识到垄断是帝国主义最具决定性的本质特征。她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未能给予较完整系统科学的回答；也未能用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批判披着“时代变了”外衣的伯恩斯坦主义思潮。虽然她在同伯恩斯坦论战时曾尖锐地提出了垄断组织作用的问题。当时伯恩斯坦宣扬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发展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除经济危机，卢森堡批驳了这种论点，认为这一类组织只会加深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内外矛盾的尖锐化。但是卢森堡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垄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变化和出现的各种特征，这就造成了她不能认识到垄断是帝国主义最具决定性的本质特征。情况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还没有从它们多方面的经济作用研究过。”^①因而未能把对帝国主义的看法推进一步。后来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理论时，也没有充分注意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她说：“卡特尔和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②

由于卢森堡始终把目光放在资本主义国家同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关系上，没有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没有把帝国主义置于垄断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因此她没有也不可能创立科学的帝国主义理

① [德]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页。

② [德]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7页。

论，也就不能彻底地反对修正主义。这一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他不但挑起了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的担子，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卢森堡尽管已经看到了伯恩斯坦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工人运动渗透的结果，但她却没有联系到帝国主义的崭新特点而认清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揭露它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垄断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修正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是由于它抓住了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现象，表达了一些人在实践中对多种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世界正由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有某些过时的论断，但卢森堡由于受思想和理论的局限，却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和他们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并没有本质的或者根本的变化。概括地说，因为时代没有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管用的，没有过时的论断。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就是时代变化的显著标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而在一些问题上，往往限于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已有的结论，这就使卢森堡的批判有些苍白无力，所以在理论上反而让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占了上风。由于她不能辩证地分析自己时代的本质特征，把握住新时代社会生活中各种趋向的总和，从实现局部目的的多种可能性中揭示出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从中引出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案。而与卢森堡同时代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列宁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材料，首次对帝国主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把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

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某些部门、某些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发展的可能性。

列宁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920年7月，列宁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系统地论证了其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新结论。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力地克服了卢森堡学说的不足。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卢森堡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未能给予较完整系统科学的回答，也不能用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批判披着“时代变了”外衣的伯恩斯坦主义思潮。

卢森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杰出代表，担当着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任和使命。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中的杰出贡献，肯定她在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实践和理论工作。但是她没有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来认识和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对伯恩斯坦在哲学和辩证法方面对马克思的诘难批判很少或明显不足。

当然，客观地说，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求全责备，卢森堡在同伯恩斯坦主义的论辩中，虽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从她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的整体来看是正确的。她的论著、讲话、报告所具有的革命内容，批判的战斗精神，远见卓识的见解，异常精辟的论述，表明她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对她和伯恩斯坦都作了形象而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深刻的比喻：“卢森堡是翱翔凌云的鹰，而伯恩斯坦一类叛徒，不过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啄食垃圾的一群鸡。”^①

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认识与批评的局限性

尽管，我们前文谈到考茨基在与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他批判了伯恩斯坦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党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等于说考茨基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完美无缺，无可非议。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党的有资格的理论家，他的表现同卢森堡、蔡特金等坚定的左派相比，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不足和错误。这表现在，他初期在着手批判伯恩斯坦的观点之前，曾长时间动摇不定，在对待伯恩斯坦主义的态度上表现比较暧昧，以后一段时间对伯恩斯坦存在幻想，思想感情上“剪不断，理还乱”。

考茨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的主编，1896年，发表了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文章，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起先对此表示极大的同感，把他这种做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的继续。”伯恩斯坦文章发表后，他还说：“我曾经满意地说过，没有人因为我发表这些文章而责备我。各方面都承认，这些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②

在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在辩论结尾时才发表了一点意见，并以普列汉诺夫的名句结束发言：“伯恩斯坦迫使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感谢他”^③。针对别人对他沉默的批评，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论，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3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4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页。

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没有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暧昧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话，并且不再加重讨论的不必要的尖锐性。”^①当考茨基在晚年再次谈到当时的情景时，他仍坚持认为，伯恩斯坦的那些文章“对我们迄今的观点加以批判，我起先对此表示深有同感，把他的这些做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的做法的继续”^②。不仅如此，考茨基当时还对伯恩斯坦在新时期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寄予了厚望，并充满感激之情。在一封致伯恩斯坦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全靠你构思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了。”^③当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要“感激”伯恩斯坦的说法提出质疑时，他在答普列汉诺夫的信即《卡·考茨基的私人声明》中解释道：由于现实的变化，我们必须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像伯恩斯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他的巨大的功绩”^④。

总之，在考茨基看来，“尽管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退步，是它仍旧能够促进社会洞察力的发展”^⑤。

在一些理论观点上，考茨基虽然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但是他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与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理论的那种“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相比，考茨基在批评时尽管显得十分犹豫，但还是真诚的。不过，由于考茨基在立场和观点上与伯恩斯坦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因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评虽然不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5页。

② [奥]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叶至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1页。

③ 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页。

⑤ [奥]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属于“小骂大帮忙”式的，但也充满着折中主义和不彻底性。

当伯恩施坦亮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考茨基对党内的同志这样说道：“当1896年秋，伯恩施坦先生在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开始批判我们从前的观点时，起初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把这看作是恩格斯和我开始所做的工作的继续。”^①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不但一样把恩格斯的后期思想与恩格斯的前期思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恩格斯后期的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理论，而且也像伯恩施坦那样把自己的理论视为是对恩格斯后期理论的继承。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当时考茨基实际上把自己同伯恩施坦视为同路人。

随后在1898年10月23日，他给伯恩施坦写了一封长信，规劝伯恩施坦不要太积极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他在信中这样对伯恩施坦说道：“我并不否认，我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从内心赞成你对抛弃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②最能表明当时他对伯恩施坦的态度的，还表现在他反对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伯恩施坦，考茨基借口《新时代》杂志的读者对哲学不感兴趣为理由，不让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在该杂志上刊登。他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这样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伯恩施坦仅仅在这个方面（在哲学方面——作者注）‘褪色’，我丝毫不会为此感到不安。”^③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考茨基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伯恩施坦只是在“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而这无关紧要。

所有以上这些证明：考茨基并不能明确地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政治任务而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妥协，而促使考茨基

① 转引自[苏]N.C. 纳尔茨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② [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③ [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从这种犹豫不决的立场中走出来的原因是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左派人士以及党员群众的压力，还有他们日益强烈要求批判伯恩斯坦的呼声，以及那些反动势力日益利用伯恩斯坦的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局面。由于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中的被动，也客观上导致他在批判伯恩斯坦上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方法论对伯恩斯坦进行批判，却不了解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理论批评的不彻底性与肤浅性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从方法论上对伯恩斯坦主义的错误加以揭露，似乎伯恩斯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主要失足于他用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考茨基非常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甚至这样说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唯物史观。如果考茨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推崇唯物史观，而相应地，如果考茨基批评伯恩斯坦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应该批判伯恩斯坦背叛唯物史观，如果是这样，考茨基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问题在于，考茨基在这里所说的伯恩斯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主要不是从伯恩斯坦背叛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而主要是从一般的思想方法这个角度论述的。考茨基批评了伯恩斯坦试图把宿命论说成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批判了他对恩格斯晚年似乎放弃了历史决定论的错误看法。但是，他在批评中没有同机械地歪曲马克思对决定论的理解作原则性的斗争。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摆脱对历史进程作庸俗进化论的理解。比如他认为历史以自然的必然性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发展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历史运动本身的结果，不取决于人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物并不是千方百计地让工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去策划运动，而是在工人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愿望，坚信在所有的国家里以自然的必然性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表面看，考茨基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他忽视了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制

定工人运动的策略的必要性。这实际是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了进化论的理解。

考茨基还批评了伯恩斯坦反对辩证法的言论。伯恩斯坦曾经断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致命之处”，他借口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做出正确推理的“陷阱”，目的在于诋毁唯物辩证法在经济与暴力中的作用。考茨基指出，倘若不了解辩证法，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成就。因为辩证法是用运动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的方法。它是理论研究的“最好的方法”和“最尖锐的武器”。但是，考茨基自己也不懂得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他自己也轻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这就妨碍了他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因而，在和伯恩斯坦的论战中，他只局限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他也没有弄明白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在哪里，这实际上使辩证法失去了客观性和普遍性。

考茨基不重视哲学，不懂得哲学在社会生活和斗争中的作用。正如他在1901年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所表白的：“在哲学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我认为最好是不论及哲学问题。”^① 尽管考茨基宣称自己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信念，但他实际上没有摆脱对历史进程作庸俗进化论的理解，只承认事物发展的量变，不承认质变，更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因此他在与伯恩斯坦的论战中，就不可能有同机械地歪曲马克思的决定论的理解作原则性的论战。同时，考茨基由于竭力信守马克思的词句而转为教条主义，不懂得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只有同积极解决新时代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换言之，只有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原则性的深刻批判。在伦理学方面，考茨基也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即把人的道德等同于动物的道德，这样就倒退到康德区别生物的人和理性的人的水平之前去了。同时，考茨基认为伦理学在马克

^① [苏] 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思那里几乎是空白，马克思根本拒绝伦理学。这种看法是绝对的、片面的，恰好给攻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口实。因此说，考茨基的批判，未能有力地捍卫历史唯物主义。

（二）政治经济学方面，考茨基暴露出改良主义的倾向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考茨基也同样对一系列尖锐的经济问题保持缄默，暴露出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比如，他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些“不完备”，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尚长完成”而须予以“完成”，等等。因此，考茨基在同伯恩斯坦论战时，完全不谈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不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反而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界限、外部界限是销售的困难，国内外市场的狭小。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正是这种销售的困难和市场的狭小，才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或极端缓慢，导致资本主义的实际终结。

（三）在民主问题上，重视从程序上考察民主问题，忽视民主的阶级性

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多半是用形式的法律的观点，来考察民主问题，比如他认为，民主制度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民主所赋予的政治斗争的形式，由于有此特征，民主被称为“社会的安全活门”^①，他指出：“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必然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但是民主能做到一件事：这就是它虽然不能防止革命，但能防止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且能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不必要……”^② 从此描述中可看出，考茨基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观念的影响，因而他对民主的阶级性、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制约性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论述。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343页。

(四) 回避无产阶级专政

对考茨基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本质的差别是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当然，他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也是极不彻底的，在批判时只是着重经济方面，却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考茨基曾公开承认，他起来反对伯恩施坦，是极为勉强的，而且常常是被迫的。在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虽然批判了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某些方面，比如通过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又具有相同之处，他预料说：“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一切地方，都将以‘和平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①他还指出：“民主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也许显得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斗争方法单调些；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较欠戏剧性，不够有声有色，但是这种方法所要求的牺牲也小得多。”^②这些都说明了他是极力推荐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这和伯恩施坦虽然在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骨子里是一致的，尽管他也曾试图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他特别重视阶级斗争的和平形式，从而就闭口不谈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回避评论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问题的歪曲解释，甚至认为在当时无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甚至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③

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考茨基这个错误，实际上是向伯恩施坦让步，是向机会主义投降，“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④。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

②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

③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另外，考茨基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他指出：“无产阶级用一个突然的袭击就会取得国家政权，并给人们带来社会主义。这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须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的。”但是，他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布朗基在革命发生的条件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不能单靠主观愿望；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则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既通晓本阶级的状况，又洞悉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①。在反驳中他竟然这样说：“我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和阶级统治非采取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可。”这就说明了考茨基在革命斗争与和平改良上是摇摆不定的，并最终偏向改良。

列宁曾指出，在政党问题上，考茨基在批驳那种认为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是逐步取得政权的途径的构想时写道：“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人会想到社会民主党同现存某一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然而，他同时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社会党人暂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可能是适宜的。他说，党越是团结，就越有战斗力。这是对的。然而，他又补充说：“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似乎党内不存在并且不应该存在各种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有时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党不得不容忍他们。”考茨基正确指出：必须努力设法使党的政策不要变成冒险政策。然而，他却又把革命暴力同冒险政策混为一谈。总之，在政党问题上，他往往把理论上的争论同党的实际任务以及制定社会改造的战略和策略割裂开来。对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明显地估计不足，对于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及其真正的阶级实质并不彻底了解。因此，考茨基把修正主义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国会党团和邦议会党团的范围内，他看不到修正主义危害的国际性和对党、对工人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运动的影响。考茨基指出，党的大多数是统一的，修正主义在其中找不到地盘，只有在小资产阶级地区的少数地方存在，……修正主义是没有军队的参谋本部，它几乎是仅仅从知识分子中吸收自己的成员……因此，它决不会导致分裂，因为知识分子不能够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党……总之，修正主义不会取得胜利，但也不会完全消失，这种状态并不总是会导致令人高兴的结果，但是也决不像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变得十分危险。他后来还断言“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已经死亡”。

从考茨基的论述来看，他认为修正主义者只是从知识分子阶层吸收成员，而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同工人贵族、党和工会的官僚的增加之间的联系，换言之，他不懂得机会主义的滋长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由于不了解机会主义的阶级实质，就使考茨基得出结论，似乎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只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使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所有派别互相接近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考茨基主张采取宽容态度，而低估了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意义。结果，这致使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止修正主义者东山再起，反而使修正主义者加强了他们在党内议会党团、工会中的地位。

考茨基缺乏亲自参加革命斗争的锻炼的经验，在长期的理论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往往用调和或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考茨基本人竭力申辩说他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但是他也承认，他并不属行动家之列。他“总觉得自己是个研究家，而不是自己事业的捍卫者”，因为“研究工作只能在单独的、僻静的环境中开花结果，而不是在生活的洪流中”。^①因此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他缺乏十分坚定的立场，一遇到关键问题，就常常摇摆不定，含糊不清。这也是他后来慢慢走向机会主义的一个主观因素。

从考茨基走向机会主义的客观原因来说，这与德国党的整个思想水平有关。德国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思想水平和斗争水平都有提

^① [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高。但是在国家问题上，德国党的领导人的理论观点，较长时间是比较含糊的，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直至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还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而受到恩格斯的批评。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时，回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可以说在某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德国党的思想水平。正如考茨基在德国党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作用，需要放到德国党的整个斗争中去考察一样，考茨基在伯恩斯坦问题上的错误，也必须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恰当的结论，得出正确的解释，既不苛求前人，又不掩饰他的问题。

在实践中，考茨基在反对米勒兰入阁中不够彻底。他把米勒兰入阁问题仅仅看做法国社会党的内部事务。这反映了他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国际性和危害性缺乏深刻认识。实际上，米勒兰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一经发生就得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喝彩。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茨基的决议案提出“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这都是对国际性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让步。

考茨基在与伯恩斯坦作斗争时碍于他们之间的友情，斗争不够坚决彻底。就是当他起来反对伯恩斯坦并且知道后者实际上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由此提出必要的组织措施。1899年春，他在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必须把爱德开除出党。”1899年9月，考茨基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发言中说：“对于‘宗教裁判’和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的想法，就连最激烈反对伯恩斯坦的人也是坚决不同意的。一般说来，应当让每一个党员自己决定他是否还站在党的立场上。开除只是用来对付那些损害党的分子，一贯高度重视辩论自由的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进行了纯粹客观的批评就把他开除出党。即使伯恩斯坦对于我们的事业没有作过这么巨大的贡献，即使他没有由于从事党的活动而被迫流亡，也谈不上开除他。”^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对于党是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72页。

做了“纯粹客观的批评”，不应该对他实行‘宗教裁判’”，当然他也不可能是那些“损害党的分子”，因而考茨基实际上是维护伯恩斯坦的。

考茨基所写的反对伯恩斯坦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前言最后几句中，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当由于存在对立就闭眼不看伯恩斯坦过去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个人从他那里获益不浅，他不仅在《社会民主党报》和新时代的工作中给我们大家以鼓舞和教诲，而且也在多年来亲密无间的合作中给我们以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推动。”^①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颂扬。但是如果把以后修正主义的泛滥一股脑地完全归罪于考茨基，那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考茨基主要是理论家，除了通过他的著述发表意见以外，在组织中所起作用很小，而当时在组织系统里地位较高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以，未能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不在于考茨基，而在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所发生的这些错误，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前面关于考茨基所发生的主客观原因，我们已做了探讨，在此不再重复阐述。

第三节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一）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研究列宁、卢森堡、考茨基所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69页（注释）。

运、思考与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颇具启示性意义。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其本质是如何在历史转变时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般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都要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通过前面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能够明确知道，伯恩斯坦打着所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惜全面否认、修正或歪曲马克思主义，因而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发端者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已是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但仅仅认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首先要求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评判马克思主义，要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理论，而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形成、发展、完善以及成功的实践，都是一个在历史的逻辑中不断展开的过程。因而，这就要求我们明确地判断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要判断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被时代所超越，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及其内容进行判断。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看，它不但是时代的产物，而且还同工人革命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形势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表现，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和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同工人革命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形势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大机器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产业革命迅速发展，德国也开始了产业革命

的进程。工业革命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造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不断激化，并引起了生产过剩的危机。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以后每隔8—10年就周期性地爆发一次。继1836年英、法经济危机之后，1847年的经济危机几乎遍及欧洲各国。危机期间，商品生产过剩，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增长，工资下降，危机给工人增加了新的灾难，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病。其二，工业革命导致阶级关系的成熟，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标志着欧洲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表明欧洲先进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上升到了突出地位。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而出现的这种经济、政治形势，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谁能承担变革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共产主义新社会、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规模的扩大，海陆交通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切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解答这个历史课题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经济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其三，19世纪科学发展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及其对新的世界观的需要，为马克思的创立提供了科学基础。其四，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起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其五，作为创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深入社会实践，积极参加、研究欧洲工人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才能日益显示出自身的魅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敌对思想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追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经受过种种责难和攻击之后仍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有着独特的理论魅力而备受关注，马克思之所以能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都是在同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批判、分析和甄别的过程中延续下来的。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都经过了较量和战斗，一方面，它要反击来自资产阶级阵营日趋频繁的攻击，另一方面，也要进行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也正是经历了资产阶级敌对思想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多重挑战，经历了多种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其诞生16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具有强劲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不过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派别之一。19世纪30—40年代，当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纷至沓来，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批判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及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50年代，继续同蒲鲁东主义及在1848年革命中显露出头角的党派和学说作斗争，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总结了法、德等国的革命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实践方面，战胜了第一国际中的巴枯宁主义。70年代，进一步清算了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战胜了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之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经过这样的多次斗争，“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① 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世纪70至90年代，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相对处于发展上升时期，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少变化，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等垄断组织的出现给人们产生了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假象，好像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失”了，于是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理论“过时”了。于是，涌出一股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思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使得一些工人阶级理论家鼓动“议会道路”，主张走“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进而演变成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更加狂盛，进而在马克思内部出现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在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列宁、卢森堡、倍倍尔等勇敢坚决地给予了剖析和批判，才最终得以坚持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以前，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是独树一帜，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话，那么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被战胜之后，他们便不得不改变手法，“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①。也就是“跪着造反”。列宁同第二国际中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它之所以能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唯一的思想武器，因为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具有毫不妥协的革命性和完备而严密的科学性，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革命理论要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不是僵化故步自封的学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将不断发展和丰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任何理论权威，反对任何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也不把自己看做最终完成的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和完善，就是他们坚持在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生动范例。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实践的发展，先后为《宣言》的不同版本写了7篇序言，对其中的一些地方做出了补充、完善甚至修正，指出某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宣言》中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它不承认有“任何最终的东西”和“永恒的真理”，敢于公开地宣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还在自己理论创立的初期，他们就明确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在运动之中，都在变化之中，不承认“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是变化无穷、丰富多彩的，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到客观世界运动和变化的永恒性。其次，马克思主义把对真理的认识看做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承认所谓的“永恒真理”和“终极真理”，认为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而，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革自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拒绝凭空描述未来社会的每个细节。作为现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关于人类社会的各种乌托邦设计，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一切以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断从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吸取营养，推动自身理论的创新。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在于，它不承认除实践以外还有什么更高的权威，任何理论和学说都必须严格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第二，马克思主义还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不仅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学说，而且是向人类文明成果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它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产生，除了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和时代条件，也离不开吸收当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作为自己创造思想理论的条件。列宁深刻地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它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直到生命的晚年还在始终注意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及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他们还密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每一个突破性成果，并把这些成果当做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公开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这个阶级性却不带有任何的宗派性。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胸怀最宽广、目光最远大，它所谋求的不仅是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是要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阶级，这个阶级性决定了它能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它的学说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就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过时。因而，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不是要我们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结论、个别观点。而是，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结论、观点必然要被新的结论和新的观点所取代，即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时代化。

（二）旗帜鲜明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在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列宁通过团结左派等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斗争过程及策略启示我们，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要旗帜鲜明，要团结大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各种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们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驱除”马克思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旗易帜。特别是现阶段，由于诸多的直接关系民生的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一些错误社会思潮的滋长或重生。这就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这些错误思潮一经产生便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们极大地干扰了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和巩固，导致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因而，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旗帜鲜明地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就要做到：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要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即在政治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思想上赞成什么，排斥什么，理论的倾向性和意志的坚定性要鲜明，这样才能产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信仰不坚定，就无法做到旗帜鲜明地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实践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历史是厚重的，是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任何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历史面前都将是徒劳的。当然，历史也是现实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心的现实保障。信心从何而来，主要还是从社会现实中来，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带来人们真实的美好生活中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最尖锐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

被打倒。”^① 另一方面，要团结大众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就是让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 and 解决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藏之名山的秘密文献，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按照他们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改变世界。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并自觉地用于指导实践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是我们今天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策略和根本途径。只有让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信服马克思主义，继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想境界，还是一个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最高境界。

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抛弃把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的无原则”的错误倾向

我们应该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不能像伯恩斯坦那样以种种方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及恩格斯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不能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大做文章，而全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的丰富内容，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随意加以解释。俗话说，“只要再往前稍走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即便我们看来好像是向相同方向走的一小步，如果夸大或缩小马克思主义的适用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因而，我们要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坚决抛弃把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无原则”的错误倾向。

何谓“功利主义的无原则”呢？也就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功利化、实用化，没有原则的错误做法。不管什么马克思，也不管什么马克思主义，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拿来，就像当今流行的所谓无阶级的民主、自由以及“普世价值”等观点就是随意肢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是好马克思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抱着“有用就是真理”的功利主义思想。“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比如谎言对于骗子来说，是有用的，但却不是真理。因而，我们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功利化，使它失去原则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首先反映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性、彻底性和严整性上。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首先，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其次，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并贯穿和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和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与它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同它的全部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内容上的彻底性，决定了它在体系上的严整性。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作是“由一块整钢铸成”的，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②。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充分发挥马克思

^①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就必须坚持体系上的严整性，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重要之点，也是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第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鲜明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其次，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最后，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第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理论品质和活的灵魂。这一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第四，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实现了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整体上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反对各种各样的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内容。实践中曾多次出现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批判经验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片面理解以及割裂歪曲，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反复出现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与运用的右倾、左倾路线。这些都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评判标准

对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评判标准，对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做出评判，评判者必然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关键在于评判者自己所运用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从伯恩斯坦的所有言论不难看出，伯恩斯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怎么会将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公正的评判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

第一，伯恩斯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原因，正在于他实际上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而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

伯恩斯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还在于他在工作和学习中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比如伯恩斯坦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宣布这种科学理论“过时”。此论一出，连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跟着起哄，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没有贫困化，群众的物质福利虽然增长很慢，但是在不断增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鸿沟不是在加深，而是在缩小。

还比如，伯恩斯坦认为，只要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的经济斗争，特别是

同资本家签订劳资合同，就可以提高工资，消灭贫困，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伯恩斯坦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伯恩斯坦主义形成后，受到各国资产阶级的吹捧和青睐，伯恩斯坦主义之所以能受到资产阶级的吹捧和青睐就在于他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是因为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和利益，用修正主义对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他宣称要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他承诺和坚持了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是主要的或唯一的斗争形式，他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改良党、全民党，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调和了劳资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阻挠了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列宁、卢森堡、考茨基都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站在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列宁、卢森堡都是非常关心群众的。列宁认为，“我们拥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广大的人力后备”^①，这里“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广大的人力后备”就是指人民群众。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他深刻地指出：“如果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劳动者没有联系，如果摧毁旧社会的无产阶级没有以奋不顾身的斗争在一切劳动者中赢得尊敬，如果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政党没有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那就不可能有革命。”^②而“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有组织的先锋队，一经同千百万人联系起来，就比它原来的人数强大几十万倍”^③。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想获得永远的力量源泉，必须得到来自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只有通过党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密切联系才能获得。因此列宁强调，对于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而言，“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④。他坦言：“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①他要求共产党员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②。列宁曾在主张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时指出：“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③这句话反映了列宁的一个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必须得到广大群众的政治信任。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意义，而且，正因为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在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列宁才理直气壮地宣称：“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④

1920年10月，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他在1906年提出的重要观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⑤。在这里，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来自人民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根源。

卢森堡也非常相信群众的力量，《再论群众和领袖》、《策略问题》等多篇文章中表露了她的这一观点。卢森堡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通过广大群众亲自参与才能影响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突变、战争危险、选举权问题、工人阶级的荣誉问题都迫切需要群众采取行动。卢森堡注意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由于忽视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基层工人群众的主动性，而只着眼于取得议会斗争的成功，把党变为保守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东西。她同时还看到了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增长，她强调党与群众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极力反对某些党的领导者遏制革命运动规模的扩展，阻挠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她认为：“如果群众在关键时刻不站出来，党的行动就软弱无力，缺少锋芒，党会痛感自己力不从心。”^①她把群众能否积极参与看做党的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她还热情洋溢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发展的关键，即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②她还说：“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③

考茨基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事应该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能歪曲和胡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说”。他对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这一学说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①

考茨基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理解性地接受，而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接受，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要使用“灌输”的方法，这样才能深入群众，为群众所了解、所接受。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抛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依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第二国际诸理论家均试图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总体方法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依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可以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划分为三条基本路径：即以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径、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坚持总体方法论的历史辩证法阐释路径、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

但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伯恩斯坦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却是采取的新康德主义阐释路径。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阐释路径具体说就是指伯恩斯坦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社会主义阐释问题的方式。即伯恩斯坦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强调道德等观念因素的作用。他完全从非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把观念力量当做社会进程的“原动力”和“基础力量”。他认为，被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力量”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观念力量”是利益。利益要在某个运动中起刺激作用，它首先必须是一种“被认识了的利益”，从事活动的人必须有一个关于他的利益的“观念”，才能决定采取符合这一利益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00页。

的行动。^① 第二种形式的“观念力量”是认识。它不仅是单纯的一般认识能力，而且是一种完全确定的认识，即“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一定的‘观念’，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观念。”^② 只有具有了这种观念，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认清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历史使命。第三种形式的“观念力量”是道德意识或法权观念。^③

伯恩斯坦认为，伦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非常重要。它既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也是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力量”，因此，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④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伯恩斯坦在阐释和继续“向前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极为重视伦理因素。实际上，他完全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展开这一工作的。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伯恩斯坦将“利益”和“认识”两种观念都归结为作为基础力量的伦理因素，并且从道德的角度对它们做了解释。首先，就“利益”来说，它不是指个人利益，而是指阶级利益。“为确保这种利益，在许多方面需要至少暂时牺牲个人的利益”。因此，“马克思社会主义所假定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或伦理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不但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也固有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观念性”。^⑤ 其次，就“认识”观念中的经济观念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雇佣关系称做一种剥削关系，实际上“就假定了道德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榨取的污点”^⑥。

然而，在伯恩斯坦看来，对于伦理因素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基础力量”和“创造性作用”，无论是无产阶级自身，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④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⑤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⑥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5页。

有明确意识到。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即使“他觉得财产的不平均分配是不公道的，他的正义感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因为“贫富之间的一般矛盾比雇佣主人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特殊矛盾对他的感情影响要强”^①。伯恩斯坦认为，不管承认与否，道德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固然并非在一切情况下如此，却是常常如此；固然并非无限制的，却是范围很广的”^②。

“如果没有道义上的动力就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持久的群众运动。”^③ 由对道德作用的强调，伯恩斯坦进而主张将追求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首位。“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因而，在他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首先在于道德宣传。可见，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作为其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论证完全是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社会主义式的。虽然他没有像新康德主义者那样明确否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反而主张用“经济史观”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以突出经济的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论证过程中他却把伦理因素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悄悄地将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和“支点”由经济因素置换成了伦理因素。

伯恩斯坦还否定黑格尔辩证法，他对于辩证法的消解是打着“科学”的名义，在“剔除马克思学说中的空想因素”的旗帜下进行的。崇尚改良、否定革命，崇拜自发性、蔑视辩证法，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基调。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新现象，面对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一下子从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他们要求人们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改革，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顺从者。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用专门一节，谈论了“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①，他还认为，“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②。因而，“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③。辩证法是以“是一否和否一是”代替“是一是和否一否”。正是由于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和认识，造成了伯恩斯坦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不能用运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问题。

列宁从方法论上，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归纳了伯恩斯坦主义的要点：那就是伯恩斯坦在哲学方面，跟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屁股后面跑，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开启了研究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并没有结束这种研究。列宁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理解为历史过程：“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我们今天研究当代帝国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仍然需要坚持列宁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分析入手，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对帝国主义做出整体的分析。

正如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谈到“伯恩斯坦的方法”所

①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③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说的那样：“伯恩斯坦的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① 这说明了伯恩斯坦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时不能全面地运用总体性的观点分析问题，而是经常把问题简单化、孤立化。比如伯恩斯坦无视现代社会本身运动所自发导致的、没有差别的社会劳动抽象这样一个完全可以用经验说明的事实，而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只是一个假说。他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认真辨析过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却对马克思做了一种似是而非、自以为是的武断的裁定，客观抽象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则更是完全在伯恩斯坦的视野之外。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有要求是开放的、非封闭的。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历史地、全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正如她在《我们的导师的遗著》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思想作品之所以具有这种不寻常的作用，不仅是他本人的天才，而且也因为他始终按他所论述的一切问题之间的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从最全面的历史观点去阐明它们。”^②

因此，在卢森堡看来，历史性和全面性即总体性乃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她正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这主要是针对伯恩斯坦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用庸俗经济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不要以静止的眼光，而要以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现象。”^③ 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分析所采取的也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④。

卢森堡认为：“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的关联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①

以信用为例，如果人们把信用看做是交换的一个自然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把信用看做似乎是一种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像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看做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但是，信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有机的一环。因此，它也同货币、商品和资本一样，“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也是一个破坏工具，因为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②。卢森堡从而认为，“伯恩斯坦的适应论不过是单个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他所犯的错误实质上与庸俗经济学派一样，“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③来加以理解的。在她看来，也正是因为方法上的这种错误，伯恩斯坦才会得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结论，从而导致他对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歪曲。因此，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批判首先是从批判他的方法入手的。^④

再比如，伯恩斯坦在理解资本主义民主、议会、政党时，也是如此。他仅仅是注意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党的形式，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民主、议会、政党的实质与内容。

卢森堡由于运用了总体性的科学方法论，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就能高屋建瓴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的意义就在于她从根本上揭示了伯恩斯坦分子的错误之所在，使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积累这一现象背后所掩盖着的東西。伯恩斯坦之所以会走上成为资本主义帮凶的道路，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主要是因为他在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科学”，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研究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08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方法。

卢卡奇曾经强调，伯恩斯坦假借马克思的牌子，开始对辩证法猛烈地攻击，这决非偶然，“因为只要你根本上放弃了总体性的观点，你就肯定会舍弃辩证法的出发点、目标、假定和要求，这是必然的。这样就不会把革命作为过程的一个部分去理解，而是把它从总的事态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看待”^①。卢卡奇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丢掉了总体性方法，也就等于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意味着不能把革命理解为“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只是理解为“从总的事态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看待”，这也就意味着等于丢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当然也就意味着向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投降。伯恩斯坦的基本要求是放弃革命，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会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资本主义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更难于相信，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的攻击和以所谓‘客观的和准确的科学’的名义对孤立现象的‘科学’分析”的现象越来越不可能。^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政治上决定是对资本主义采取赞成态度还是继续对之持反对态度，往往取决于在理论上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观察资本主义。“要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全部社会历史即把它们作为总体性来看，以便从理论和实践上抓住帝国主义的现象，要么，与之相反，把自己局限在社会历史的一个孤立方面或其他专门研究的方面进行分析。”^③在卢卡奇看来，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用前一

① [匈]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② [匈]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③ [匈]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种方法来观察当前的资本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把资本主义当前的一些现象放到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就能把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但是倘若使用后一种方法来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即只是表面地、孤立地看待资本主义的一些现象，那么就必然会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而根本无法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显然，卢森堡就是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而当时的伯恩斯坦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现象时所使用的就是这后一种方法，所以他得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而不是资本主义崩溃论。

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时期，无产阶级运动也往往处于革命的低潮。对此，卢森堡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在如何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认识党内新出现的变化上，唯一的科学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在实践斗争中勇于创新 and 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

列宁认为考茨基的反批评是从方法问题上着手的。考茨基研究了伯恩斯坦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见，指出伯恩斯坦把“决定论”的概念同“机械论”的概念混淆起来，把“意志自由”同“行动自由”混淆起来，并且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必然性和人们被迫所处的绝境混为一谈。伯恩斯坦所重复的对宿命论的陈腐指责，已经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最基本的前提所驳倒。伯恩斯坦说，决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应当“估计到”其他因素。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关于这一点是任何研究者，不管他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历史观，都应该做到的。

如果要放弃马克思的方法，放弃这个实际上已经光辉地证明了并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方法，那么就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根本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但这样就会抛弃科学地论证社会学的一切尝试；要么说明怎样才能从其他因素，比如伦理观点等推论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哪怕用远远不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相比拟的分析来说明。伯恩斯坦不但丝毫不想这样做，而且一味空洞地谈论要“估计到”其他因素，继续在自己的书中运用唯物主义的老方法，好像他根本没有说过这个方法有缺陷！考茨基指出，有好几个地方，

伯恩斯坦运用这个方法之草率和片面是令人难忍的！伯恩斯坦还指责了辩证法，说辩证法会导致随意的编造等。伯恩斯坦重复着连俄国读者也听腻了的滥调，却根本不想指出辩证法不对在什么地方，黑格尔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曾犯过方法论上的错误，等等。

五、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反对情绪化

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和背叛者而不是继承者，这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即使有的人要重新肯定和评价他，但也用不着把他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那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恭，特别是在伯恩斯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后，如果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但会亵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也是对伯恩斯坦自身的歪曲。伯恩斯坦自己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他本来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这也是我们反对的，无可非议。但伯恩斯坦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过程中，却极端情绪化，他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比如，伯恩斯坦一方面固执地认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不代表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有理由反对马克思的人，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但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并不是细枝末节问题，而是根本问题，是关于党的原则与策略问题，是维护不同阶级利益的问题。他提倡改良主义思想，并修正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结论。伯恩斯坦还错误地认为社会民主党对他的批判是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作的粗暴的判决，对此，他还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殉道精神，好像在殉“真理之道”。针对他作出的决议，他引用布鲁诺的一句名言来回答：“你们作出了判决，你们对这个判决也许比我这个受到判决的人更加害怕。”^①布鲁诺宁死不屈，宁愿烧死在火刑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伯恩施

^① 《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48页。

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伯恩斯坦就像日本侵华的武士一样，他们侵略中国，战争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殉道只能是更加愚蠢。伯恩斯坦也是如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身就错误了，再进行修正和为他所谓的理论殉道，只能是更加愚蠢。伯恩斯坦却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深信，将来总有一天，社会民主党将为拥有这样一本书（指《前提》一书，作者注）而感到骄傲。是的，这决不是自吹自擂。这是我的坚定信念。当争论过去后，你们将会看到，我的书包含着大量的认识要素，它们将给运动带来成果，而不会造成损失。我有权说出这一点，这不是狂妄自大，这是我的信念，我坚持这一信念。”^① 他在这个发言的结尾说：“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党工作，我将继续这样做，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功绩。”^② 伯恩斯坦在党的领袖们声称“是他埋葬党，还是党埋葬他”的声讨声中仍然固执地喊出“他在为党工作是他的功绩”。

当年，伯恩斯坦针对他被谴责为修正主义曾回应说，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革命理论时所依据的前提已“大大地改变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事实，这些事实迫使我修正我的信仰所依据的观念”^③。既然发展不会停顿，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如果说“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根据时代的变迁对已有理论做出修正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变迁和发展，对已有理论做出恰如其分的修正，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换言之，任何一种修正对于传统的理论来说，都有一个限度、原则的问题，超过了这一限度和原则，就会变成脱离——失去原有理论的宗旨、目标而迷失方向，甚至与原有理论的宗旨和目标背道而

① 《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54页。

② 《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55—456页。

③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问题》，转引自《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0页。

驰。这样，修正就变成了背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是活的体系，不是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否定修正。相反，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存在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它反对拒绝承认现实的变化而固守原来理论的教条主义；但是同时，更值得强调的是，它也反对完全被动地去适应现实，以牺牲原则去满足现实的机会主义。伯恩斯坦仅仅强调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去修正，而不讲修正得是否正确，可见他有多么愚蠢。

我们在批评伯恩斯坦的同时，还就要求我们千万不能把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指责与修正仅仅看成是伯恩斯坦的个人行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伯恩斯坦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与修正，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密切相关。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但伯恩斯坦“审视”的结果是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历史常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的一幕。当今的资本主义再度处于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的阶段，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样非常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必须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促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焕发出更强劲的生命力，必须坚决避免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年版。
3. 《列宁全集》第1—60卷，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版，第2版。
4. 《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 《伯恩斯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9.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
10.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
11. 《列宁专题文集》（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4.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
15. 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7.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16 辑），人民出版社 1981—1986 年版。
18. 《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梁家珍等译校，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9. [德]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
20. [保] 布拉戈耶夫：《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魏城、冯维静译，三联书店 1964 年版。
21. 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22. 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23. 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
24. 赵永清：《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5.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6. 张传鹤：《全球视野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年版。
27. 郑言实编：《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28. 熊伟：《关于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些历史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29. 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30.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编：《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年版。
31. 吴忠观：《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观点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32. [英]利·拉贝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柴金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3. 《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4.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资料室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言论摘录》，内部资料1963年版。
35. 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6.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1—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986年版。
37. 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 马健行：《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9.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
40. [英]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4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3. 殷叙彝：《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4. 张之沧、龚廷泰：《从马克思到德里达》，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5. 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 俞良早：《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47. 俞良早：《列宁后期思想探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 [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青载繁译，三联书店1963—1966年版。
49. 刘佩弦、马健行：《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0. 程人乾：《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51. [苏] 罗·叶夫泽罗夫：《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52. [美] 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53. [德] 罗莎·卢森堡、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梁丙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54. 梅荣政：《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55. 《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56. 《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年版。

57. 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

58. 何宝骥、李应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长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59. 《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习出版社 2009 年版。

60. [德]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61.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62. [德]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三联书店 1973 年版。

63. 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版。

64. 方章东：《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65.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66. [苏] 布赖奥维奇：《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67. 张晓忠：《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68. Lenin, *Against revisionism*.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Tudor, H. (Henry) *Marx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Revisionist Debate 1896 - 189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9. Fletcher, Rog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70.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22* by Paul Levi, translated by Bertram Wolfe. Workers Age Publishers (New York), 1940.

二、论文类

1. 王学东：《罗莎·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2. 丁俊萍：《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5 期。

3. 杨正喜：《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简析》，《学习论坛》2005 年第 7 期。

4. 詹真荣：《卢森堡关于党内民主思想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2005 年第 1 期。

5. 俞吾金：《卢森堡政治哲学理论述要》，《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6. 周尚文：《论罗莎·卢森堡的党内民主观》，《探索与争鸣》2005 年第 3 期。

7. 管怀伦：《从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论列宁组织思想的转变》，《学海》2005 年第 2 期。

8. 戴海东：《论罗莎·卢森堡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求索》1999 年第 3 期。

9. 陈学明：《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过程中如何吸取伯恩

施坦的教训?》，上海市社会科学第五届2007年学会论文。

10. 陈学明：《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学海》2009年第2期。

11. 程玉海、郑永朝：《伯恩施坦在1880—1895年间的思想变化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

12. 詹真荣：《关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主义批判的回顾——兼论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3. 曹长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伯恩施坦民主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中华魂》2007年第11期。

14. 高放：《列宁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

15. 俞良早：《马克思主义关于俄、中等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形式特殊性的理论》，《理论探讨》2008年第5期。

16. 张荣臣：《对列宁和卢森堡关于集中制与民主集中制争论的再认识》，《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17. 赵大朋：《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5期。

18. 周懋庸：《卢森堡论及伯恩施坦思想来源的三篇文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1年第2期。

19. 谷亚红：《论考茨基和卢森堡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差别——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 俞良早：《列宁对考茨基民主观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理论月刊》1991年第6期。

21. 殷叙彝：《伯恩施坦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过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

22. 徐觉哉：《关于伯恩施坦几个观点的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6期。

23. 徐觉哉：《目标与运动——兼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式”》，《宁波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24. 徐崇温：《列宁与伯恩斯坦：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7期。

25. 周懋庸：《朝气蓬勃的“新兵”——罗莎·卢森堡1898—1899年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集）。

26. 方章东：《论罗莎·卢森堡的政党建设思想》，《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

27. 张光明：《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在当今的意义和不足——重读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两篇论文》，《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28. 张雷声：《罗莎·卢森堡资本主义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29. 吴家华：《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0. [印度] 苏班拉尔·达塔·古普塔，刘仁胜译：《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1. 费小平：《“永远是一只鹰”：“新马克思主义”先驱罗莎·卢森堡与乔治·卢卡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2. [南非] 昂德·霍普曼，熊文译：《从历史的观点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33. 罗骞：《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34. 梁瑜静：《帝国主义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解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传承》2008年第3期。

35. 叶剑锋：《列宁推进党内民主的历史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36. 俞良早：《工人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37. 俞良早：《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

《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

38. 俞良早：《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工人阶级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理论探讨》2009年第3期。

39. 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溯源——从拉萨尔到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年第3期。

40. 周新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华魂》2010年第3期。

41. 何萍：《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42. 何萍：《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43. 蔡中兴：《罗莎·卢森堡是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对一种传统看法的异议》，《世界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

44. 陈学明：《评卡尔·考茨基的主要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8年第4期

45. 余汉熙：《论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

46. 苏颖：《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7. 吴恒：《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及其当代启迪》，《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48. 孙关宏、王向民、梁莉：《民主与社会主义：历史与逻辑的考察——对考茨基民主理论的再认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

49. [联邦德国] 埃里希·马蒂亚斯：《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摘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思想体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作用》，联邦德国新教派学术委员会出版的丛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外论选译。

50. 孙来斌、李玉姣：《妙论抑或谬论？——从苏联演变看考茨基的“早产论”》，《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7期。

51. 王双金：《对考茨基关于取得政权的策略思想的商榷——兼论考茨基与列宁策略思想的分歧》，《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后 记

这本著作《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与观点的比较研究”（项目号09BKS034）的结项成果，该成果一次性结项并获良好等级。

在报国家社科项目选题之前，正值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在此期间，我翻阅了大量的期刊、杂志，特别是人大复印资料，比较了近几年的杂志、期刊，发现这些杂志、期刊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至两篇文章，围绕作者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我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的导师也启发我博士论文可考虑做有关第二国际人物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的研究。我决定按照导师指引的方向去努力，着手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当我真正接触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后，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关注与争论的若干问题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他们之间关于资本主义崩溃与适应的论争、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该建设成全民党的理论以及议会民主与普选权等问题。更何况第二国际理论家讨论的这些问题，即便在今天，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正如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所说的那样：“要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侯慧勤教授也认为，“第二国际是当今研究的少有的富矿之一”。在这些专家的指引下，我于2009年以“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与观点的比较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并有幸入选。本项目于2009年

5月立项，2012年9月完成，为了完成此项目，我查阅了大量的中文、外文文献资料，严格按照当初项目论证计划书展开研究工作。

在短短几年里研究第二国际几位重要人物，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解读他们的思想，作为一名知识储备相对薄弱的年轻学者，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取得了一系列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博士论文就是该课题的子课题。因而在此我要感谢各位专家给予我的帮助与指导，其中，我的导师俞良早在督促、帮助、指导我课题的完成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除此以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雷声教授、上海社科院的胡振平教授、南京政治学院的李昆明教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孙建社教授、王立新教授、孙迎光教授、赵晖教授等，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定的为学信念也使我受益匪浅，并将继续激励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感谢淮南师范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他们为我课题的完成提供了较好的科研条件，感谢我鬓发日渐斑白的父母，他们长期以来对我工作和学习的默默支持与鼓励，这也是我顺利完成此课题的精神动力，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给予我的最无私的奉献和最深厚的爱。同时也要感谢我的爱人高嵩先生和我的女儿高婧蕾，在完成此书期间，我多次谢绝了女儿要与我一同玩耍、娱乐的请求，还多次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好奇地提问，妈妈在此对你说声“对不起”。

本著作完成的过程，也是挑战自我的过程。在这期间，由于既要忙于干好单位的本职工作，又要忙于阅读文献和研究，忽略了锻炼身体，从而胃病、感冒各种毛病不断，有几次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感觉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最终我还是克服了身体的病痛，坚持把课题完成，并一次通过鉴定，良好结项。我想，马克思曾把科学的入口比喻为地狱的入口，如果我没有下地狱的决心和毅力，怎么能攀上科学的高峰呢？“不经一番寒彻骨，又怎得梅花扑鼻香呢”？

此外，由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论卢森堡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的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子课题，该选题得到了2010南京师范

大学优秀博士培育计划和江苏省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资助，在此对他们的资助表示衷心地感谢。这两个项目均优秀结项。

总之，我深深知道，尽管自己对课题研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只是掌握了学术研究的门径而已，有不少收获，但远非完成了相关课题的深度研究。对于我来讲，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仍需要不懈地努力，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我决心以此自勉。

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文献，吸收借鉴了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本书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请诸位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教，我将认真吸取诸位前辈的建议，并尽力在日后学习、研究中加以改正。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汪莹

责任校对:张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贾淑品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2252-6

I. ①列… II. ①贾… III. ①列宁主义-研究②卢森堡-R.-1871~1919-
政治思想-研究③考茨基主义-研究④伯恩斯坦主义-研究 IV. ①A82
②D351.6③D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625号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

LIENING LUSENBAO KAOCIJI YU BOENSHITANZHUYI

贾淑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9.25

字数:432千字

ISBN 978-7-01-012252-6 定价:6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贾淑品,女,安徽砀山人,1975年生,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马克思主义学会、公共关系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项目一项、省级项目多项。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先后荣获安徽省优秀教师和安徽省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荣誉称号。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议会痴呆症昨天是一个弱点，今天是一种暧昧态度，明天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罗莎·卢森堡

资本主义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

——卡尔·考茨基

ISBN 978-7-01-012252-6



9 787010 112252 6 >

定价：68.00 元